

# 教会历史人物(于中旻)

## 目录:

- 01.LifeOfChrist 基督生平
- 02.NestorianismInChina 景教在华史
- 03.RobertMorrison 马礼逊
- 04.WmBurns 为主焚烧的宾为霖
- 05.RichardBaxter 贝克斯特
- 06a.AbrahamKuyper 凯柏(上)
- 06b.AbrahamKuyper 凯柏(下)
- 07.LitSenChang 章力生
- 08.TheHarvardOfChina 中国哈佛: 广文大学
- 12.ASketchOfSantaClaus 圣诞老人画像
- 13.WmWilberforce 卫博福
- 14.Athanasius 安坦耐修
- 15.Ambrosius 安波罗修
- 16.Augustine 奥古斯丁
- 17.Jerome 耶柔米
- 18.Anthonios 安笃尼
- 19.FrancisOfAssisi 方济(法兰西斯)
- 20.Dominic 多明尼加
- 21.ThomasAquinas 亚奎那
- 22.MartinLuther 马丁路德
- 23.JohnCalvin 加尔文
- 24.JohnKnox 诺克司
- 25.WesleyBros. 卫斯理兄弟
- 26.GeorgeWhitefield 威特腓
- 27.WmTyndale 廷岱勒: 译经殉道
- 28.WmCarey 维廉克理
- 29.JohnNDarby 达秘
- 30.Watts & Modern Hymnology 华慈与现代圣诗
- 31.AllynCookeOfLiSuMountain 栗僂杨智敬

32.Yih-LingLiu 刘翼凌

33.TalkingLeaves 伊利安宣道

34.Fox&Quakers 福克斯及公谊会

35.C.H.M. 麦钦陶

36.ARealRichman 富而能足有百祥

37.DavidLivingstone 李文斯敦

38.PhilippMelanchthon 墨兰顿

39.JonathanEdwards 爱德华滋

40.RobertRaikes & Sunday School 创始主日学的睿可司

41.Wycliffe 宗教改革先锋威克里夫

01.LifeOfChrist 基督生平

祂用膏膏我

约但河边的旷野，竟然成了会堂。

穿着毛衣的约翰，在那里给人施洗。成千成万的人，涌到他那里去，受他的洗。人群的河流，远远超过了那条窄小的水道。

人活着，总要有个盼望，作为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那个以利亚一般的先知，使他们觉得明天会比今天好：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该要来了。

算起来，耶稣是约翰的表弟，比他小六个月。他们小的时候，该曾见过面。但那已经是久远的事。现在，约翰住在犹太的山地，他的父母都已亡故；耶稣住在遥远的北部加利利，养父约瑟，也已不在人世。他们没有见面的机会，约翰怎也认不出他父亲所预言的救主：神“在祂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角”（路一：69）。

当耶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约翰的心忽然悸动，就像是在母亲胎中，马利亚来问安那样的跳动（路一：41）：他觉得，自己不配给这圣洁庄严的青年人施洗。

耶稣知道他的心意，就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太三：15）。于是约翰许了祂。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祂开了，祂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祂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太三：13-17）

约翰记得父亲的诗歌，和老人家的期望勉励：

"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面前，预备祂的道路，  
叫祂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  
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一：76-79)

现在，他的眼睛看见了清晨的日光。黑暗就要过去了。

撒但是个无事忙。它最殷勤的试探人，常是在人最软弱的时候乘虚来侵。(见路加福音第四章 1 至 13 节)  
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饥渴疲倦。山坡上的石头，圆圆的像是一个个的饼：那多么熟悉的香味，  
虽是基本食物，却最能满足这时的需要，如果能够吃下去该有多好！  
山风猎猎的吹着，送来魔鬼的声音：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的话，显然是回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验。神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程中，从天降吗哪给他们作为食物。神能从无中生有，曾降吗哪供应二百万以上的人口，四十年的需要；现在有现成的石头作素材，变成一块饼就解决了神子饥饿的问题，岂不是容易得多！

看看真理仇敌的恶性逻辑！它使用简单的二分法：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把石头变成食物；你不把石头变成食物，就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神的儿子，在此一举来测定。但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可能：一是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而不是神的儿子；一是神的儿子却不把石头变成食物。

主耶稣把这个挑战化解了：祂指出，不是能与不能，而是为与不为。为甚么要那样作？神的话比食物更重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既是确定的事实，不需要向撒但证明，也不能以石头变饼证明：如果那样作，只证明把吃看成最重要。主耶稣是神儿子的最好证明，是神的话，是祂与神同样性情，祂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约四：34)。

魔鬼又领祂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祂看，对祂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祂’。’"

魔鬼的话并非全无根据；它几乎是讲真话，只是不完全的话：“这原是交付我的”，却没有说出是神交付它。始祖犯了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罗五：12），“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不过，神仍然有最高的主权，魔鬼掌权只是暂时的，而且有一定的限制。主耶稣站在彼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祂曾对那巡抚说明主权是在神，神有最高的权威。因此，当敬拜神，遵行祂的旨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受苦，受死，复活，得着天上地下一切权柄（参太二八：18 腓二：9），而不与魔鬼妥协。

魔鬼又领祂道耶路撒冷去，叫祂站在殿顶上。对祂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它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的试探，一步一步的更深入：由肉体的肚腹饥饿，最基本的需要，道掌握世界荣华权势的欲望，再进到属灵的，宗教上成功的欲望。但在语意学的技巧上，则显得愈来愈拙劣，最后简直呈现智穷力竭，败象毕露，不得不断章取义，最下乘的方法。原来魔鬼所用的那节经文是：“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见诗九一：11-13）。魔鬼不曾借口记忆力欠佳，却轻易的把“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几个字省掉了：从“殿翅”上跳下去既不是行的方式，也难以解释为“道路”。主耶稣却是完整平衡的显明真理，也明白的申明祂是主，祂是神。

在人类历史的前页，魔鬼试探胜过了亚当，以致罪入了世界。现在，神的儿子降世，成为第二亚当，胜过了魔鬼，使信的人因主得新生命。

船在海上

风息浪平，广阔的加利利湖面上，是无边的恬适，无垠的宁静。

夜色慢慢的降临了。下弦月的光辉，照在湖面上。小舟在水上驶着，那么安逸的驶着。欸乃的桨声，催人进入睡乡。门徒们大半都睡着了。摇橹的人仍然在摇着，虽然半清醒的。他们熟悉这片水。

小船像是摇篮，把他们带回幼年的甜梦。夜已经深了。

回头看看，那刚跨越过的昨天，和昨天朦胧的边岸。那是他们生命中多么不平常的一天：启明人心灵的讲道，疲倦，饥渴；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把有限的五个饼和两条小鱼，分给那么多的群众吃；他们坐在草地上，那么大的一片都是人，怕不有上万的人，剩下的零碎，居然装了满满的十二个篮子！多使人兴奋！当然，从主手中接过祝谢的饼来，传递给众人，服事众人，然后再收拾场地，又是多么疲倦。

那充满挑战的一天，把他们身心灵的每一纤维，都带到紧张的极限，最后，他们也各自吃饱了肚皮。随着暮霭的降临，一切都松弛下来。

我们真是祂草场上的羊。那位慈爱的牧者，用祂那双满有怜悯的手，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用祂的手，轻抚着祂的羊。祂，散播着满足与平安。祂向门徒挥挥手，要他们把船驶向湖的对岸。

主耶稣瘦长的身影，独自缓缓的向山上走去。从船上，彼得回头望着祂的背影，觉得主背后也有眼睛，在注视着船上的小群。别的门徒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他们都没有交谈。又何必再谈话呢？那一天的经历，使他们都长大了许多年，真的。

天上的云层，急速的涌来，遮掩了西方天边的月亮。不知从哪里来的风，掠过湖面，推起了小山般的狂浪。小舟顽强的向前，爬上了浪峰，又陷入走不完的谷底。

全船的人都惊醒了。彼得迅速的走到船头，分派各人各就本位，协力分班摇橹；四人奋力摇了一阵，疲倦了，由别的人换上去。替换下来的人，也不能得休息，要帮忙把浪打进船里的水舀出去。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要保持船在水面上，却不要水进到船里面。他们唯一的方向，是要把船驶到对岸。

当然，多马想到过回航，驶到他们来的地方。

到那里，有耶稣在一起，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耶稣是否还留在那里？祂自己不是要往山上去祷告吗？山上，哪里去找？而且回去的距离，也是一样的遥远。更重要的是，耶稣的吩咐是去到对岸：只有向前！

尽管他们用完了所有的力量，拼命的动作；但逆风行舟，即使有进展，也是很缓慢：他们并不能确定有多少进展。

约翰一边工作着，叹口气，自言自语的说："主啊，你在哪里呢？慈爱的牧人啊，你在哪里呢？"

雅各说："如果你在船上，那有多好！你可以指导我们，如何胜过这风浪。..."

"要到几时天才会亮呢？"

风仍然怒吼着，波浪一各连着一个的涌过来。人筋肉的膀臂，怎么能同不止息的风浪一直搏斗？

但船在海面上。人，想不沉到水底下，总得搏斗，搏斗下去。

耶稣在山上祷告。祂的心，没有一刻不在门徒那里。祂的眼睛，穿透了深沉的夜色，穿透了迷蒙的浪花，祂看见了那无助的小群：只有主能救助。祂必须救助。

爱，缩短了祂脚下的路。爱，促使祂等不及到天亮再觅船渡湖。祂踏上了水面。湖上汹涌的波浪，在祂脚下变成了平坦坚稳的路。祂往他们的小船走去。

黯淡的月色，凄迷的浪花晓雾。在想不到的时候，门徒看到一个蒙胧的人影，在水面上走来。那实在只能够说是影子，轻飘飘的，似乎全然没有重量，在水面上走过来，脚下都不留一点痕迹。那不是鬼是甚么！

他们的寒毛都直立了起来，有的还流着汗：分不清是出力鼓桨摇橹的紧张，还是浪花溅湿，或是惧怕的汗水？

他们喊着说："有鬼！有鬼！"

从浪中，传过来那永远平静清越的声音："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一听到那声音，惧怕奇妙的消失了，仿佛是雪在太阳炎热之下融化，是忽然的融化。

不知是哪来的勇气，鼓舞着彼得。他看见了，听见了那是主，太兴奋了。虽然主正在向船接近，他迫不及待的说：“如果是你，主，请叫我也能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彼得，恢复了他小孩子般的坦率和天真，不管那完全没有必要。

耶稣说：“你来吧！”这是确定的应许，鼓舞着彼得的信心；语音中也蕴含着笑意。那粗犷的使徒，不知如何忽然忆起幼稚的时候，父亲向摇摆举步的孩子点头招手。那微笑中有保证，又仿佛有诱惑，叫他不怀疑的向前走去，投进父亲有力的臂抱中。

彼得的勇气增加了。他果真从船上走下水里，从安全跃入危险，只为了主耶稣的那句话。那话奇妙的托住他，他果真能在水面上走，要往耶稣那里去。那是何等的奇妙经历！他只看见耶稣，只看见他的主在迷雾后面隐现的笑脸，忘了自己的危险。他向耶稣走去。也许，他的心中有多少向同伴夸耀。

大风吹动着他的外衣。彼得忽然感觉到，他浸在水中的双脚，是那么的凉，看到波浪是那么的汹涌起伏！他想到自己的危险，想到自己，想到赶快用自己的力量，保持不沉到水里去。但他越挣扎，却奇怪的越沉下去。彼得想到了那可怕的后果，却想不出办法避免那后果。死亡的恐惧从他脚下迎上来，随着风浪从四面包围过来。他多年在水上生活，知道喊救是不光荣的事；却不能不紧张的大声喊着：“主啊，救我！”

就在那一刻，他发现一只温暖有力的手抓住他；原来主就在他身边。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甚么疑惑呢？”彼得没有怀疑，船上每一个门徒都听得到。

耶稣仍然拉着彼得的手，一同上了船。就在那时，风止息了，浪也平静了。天，慢慢的亮了。

许多年之后，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了。福音传开了，进行着，迅速的发展，迫害的试炼极奇严酷。那时，彼得已经老了。忆及当年的经验，他写给教会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彼前五：7 参太一四：22-34）

## 古井与活水

在撒玛利亚的叙加城。

一位旅人，坐在古老的雅各井旁。

太阳悬在天中。祂几乎没有影子。连影子也没有，使祂显得更孤单。谁知道祂坐在那里多久了。也许，比你想象得更久一点。而且祂是一个犹太人。祂不属于这个地方；但有谁能明白，这个地方是属祂的，全地都是属祂的。

静静的中午。祂在静静的沉思。

一个妇人，不知从甚么地方走出来。她跟别的妇人没有甚么不同，至少是外面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她的里面也是跟别人一样；不同的是她在中午到井边来。

向那井边坐的旅人望了一眼，知道祂不是本地人，她的心里就更轻了些。她从头顶上取下水罐。她不

想讲话，自顾自的去打水。她真不愿每天跑这远来打水，却又不能不来。

那旅人却开口说话了：“请你给我水喝！”原来是个犹太人。想不到犹太的拉比，会跟妇人讲话，而且是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为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成见很深，总把他们当作血统不清白的外族人，虽然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却不相往来，走路的时候，宁肯绕远路，也不经过他们的地方。

不过，这人同别的人不一样，祂的声音，正是表达祂的意思；并没有轻视，也没有敌意，这个她听得出来。祂不但不像其他的犹太人，也跟她同族的人态度不同。祂和任何人的态度都不同。

她想：“还是不知道我的异乡人对我友善些。”她对于这友善，感觉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奇异。她心想到哪里，口就问出来：“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想不到，对外邦怀有成见的骄傲人，也有向我们求帮忙的时候！无论如何，她没有拒绝的意思，很愿显明她的大方，并不等候回答，就开始预备把水罐放进井里打水了。

她想，这人真的是困乏透了，从祂脸上的神情，额上的汗珠，从祂衣服上和脚上的尘土，可以看得出来。...

那奇异的旅人，并没有感谢她的恩惠。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祂，而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原来祂不是要求那妇人甚么恩惠，是预备给妇人恩赐的。

“活水”！在这附近一带地方，就只有这口井；不知多少年了，也许快两千年了吧，从我们先祖雅各起，他的家人和牲畜，到现在我们这社区的人和牲畜，都喝这口井里的水。这么多年来，这口井很可靠，没有一天干过，我们也从没有想到别的水源。“活水”？哪里来的活水呢？这口井有一百多呎那么深，你连打水的器具也没有，难道你有别的水源，别的方法，可以得“活水”吗？我们可从没听说过呀！难道你比我们老祖宗雅各还精明能干吗？妇人听了这个新的消息，既希奇，又有些儿信不下去。

她还在思想，那旅人又说话了：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她再一次注视那奇异的旅人。祂不但是犹太人。祂仿佛是从更远的地方来的，好远，好远，说不上有多远。她懂得那位旅人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但又好像不懂。祂的话中多了解甚么，却很难说得出来那是甚么。她望瞭望那口深深的井。那人的话好像比那口井更深，有更深的意义。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事实简直太显明了，还用得人说？对于她，在今天，却成了新的真理。渴，打水，喝，打水...每天如此，难道这就是人生？怎么能突破这无意义的圈子？

有的东西，看来像是世界上最可羡慕的，我曾渴想得着；但是当到了我的手，却又渴望别的东西。永远是同样的渴！这神秘的渴！没有真的永久满足。

如果能永不再渴，那有多好！我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改变了。我就可以成为品德高尚的人，不会再作出叫人看不起的事情。啊，现在我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是那个永远不满足的渴，心灵深处的渴。但“活水”，“涌到永生”，在里头的泉源，又是甚么呢？

她的心里，从希奇，盼望，泛起了敬意，不知不觉改了口吻：“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她诚恳的祈求，期待。

"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这本来是一句极普通的话。祂带着权威吩咐，正是先知和神的使者宣告重要信息的语气：教谕是要传给男主人的。(参士一三：9-11)

妇人不得不承认，照语意说，她现在没有丈夫。虽然这样说来心中怀着惭疚。

那异乡人的话，似乎对着她的心说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祂从哪里得到的消息？祂显然还没有见过村中任何的人，却知道我一切所行的事！祂不是个普通的人。从外地来的人，竟然知道我生活中的隐私。我在祂面前是赤露敞开的！祂是个先知！她第一次感到在神面前的惧怕，敬畏。

先知是传神信息的，是要叫人悔改，离开罪，恢复与神的交通。妇人知道自己有罪，需要神的怜悯，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她不愿意放弃她的文化传统，多少年，多少代，在基利心山礼拜的地方，不是犹太人的耶路撒冷。

真理不是在二者中间的选择，这个不对，那个对；不可能两者都对，但可能两个都不对，没有一个是

对的。那位疲乏的旅人，现在变得精神焕发。祂好像忽然高大了许多，满有尊贵和权威："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神是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终于这撒玛利亚妇人的认知力，达到了更高的层面：云雾消退了，她心灵的光，渐渐明亮，知道了这同她说话的，就是弥赛亚，他们所仰望的基督，救世主。她遇见了耶稣基督。

她忘记了口渴，忘记了那喝了还再渴的水，甚至把那口古井也留在背后；她的心理面，就有喜乐的泉源，活水涌流：跑回村子去，传扬这好信息。她自己成为这涌流活水的一部分，越流越广，越传越远。(见约翰福音第四章)

### 三人行

新春的天气。

是一个下午，像每一个春天的下午一样。春天的太阳光，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使人有将醉的感觉。两个人在路上，迎着西方的太阳走去。他们是刚过完了逾越节，从耶路撒冷的方向来的。那路虽然大部分是走下坡；但他们的脚步却很迟缓，显得吃力的样子。他们低着头走着，彼此还谈着话。有同伴谈话走路，常是会觉得快些；但他们却觉得那段路走起来很长，特别的长，虽然还是那条常走的路。有个陌生的旅人，出现在他们旁边，没有声息的。也许是出乎他们的意外，或是他们太专注谈话了，没有留意到。更可能是他们走的太慢了，竟然给后面的行人赶上来。

对陌生人，礼貌上需要打个招呼。他们尽量作出笑容。虽然，笑容不会比皮肤更深。

现在，他们才打量那位同行的旅人。他完全跟平常的人一样。穿着跟常人一样，没有甚么特点，这才是他的特点。他看来那么安定，好像甚么事发生都不会出于他的意外。而且他没有疲乏的样子。谁知道他走了多远；不过，他总不会是就住在旷野的路边吧？

陌生人说话了。他说："你们一边走路，一边谈论，是有甚么重大的事情吧？"他说话时，那么轻描淡写的，似乎嘴角上还挂着一丝隐约的笑意。

二人听到他问，都站住了。眉头蹙在一起，脸上盖上了一层浓雾般的深愁，好像走路的事变成了并不再重要。陌生人自然也跟着站住。

革流巴是二人中的一个，回答说：“这还用问吗，还有甚么比这更大的事呢？”他转过头来，看着那陌生人说：“噢，你不也是上去过节的吗？怎会不知道在耶路撒冷这几天里所出的事呢？城里还有人谈论别的事吗？”

陌生人仍然那么安详，好像真不知道甚么事发生过：“甚么事呢？”

革流巴说：“岂止是大事，我们的希望都破灭了！大概你总该知道，在加利利的小城拿撒勒，出了一位大先知，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从加利利到犹太各地方，宣讲奇妙的教训；他的话里有能力。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大有能力，解救一切被魔鬼压制的人，医好各样的疾苦，赶出各样附着人的鬼。这一切的事，如果没有神同在，绝没人能行得来。因此，人民都认定他就是弥赛亚，是我们列祖所盼望要来解放以色列民的，要领导我们脱离外邦辖制的轭，而得自由。但我们的祭司和官长们，却说他是我们生存的威胁，以为争取自由不成，反而会带来战争和毁灭。在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借口之下，控告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定了图谋反叛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我们自由的盼望就跟他一起死去了。在这样公义死亡的黑暗时代，使人对活下去的意义产生怀疑！”

革流巴很激动，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神情转成绝望，极为沮丧的低垂着头。另一个旅伴点点头，表示完全同意他所说的。那陌生的旅人却没有说话，默默的看着他，好像在等待他醒来。

过了好一会儿，革流巴好像从极远的地方回来，又像是忽然记了甚么事。他抬起头来，目光刚好跟陌生人相遇。

那陌生人向他点点头，说：“还有呢？”对悲剧这样的反应真有些奇怪，而且还似乎带着隐约的微笑。

他始终没有笑过。但从他里面发出一种感染的力量，会使人喜乐。也许，这跟他那出奇的平静有关。

革流巴的希奇，只仿佛一闪就过去了：死了就完了，谁还问以后的事？

他继续说下去：“这些事已经过去三天了。有一件新发生的事，却真是使我们惊奇的消息：我们里面有几个妇女，等不及刚过逾越节，今天一大早就去到坟墓那里。回来的时候，那份儿兴奋真难形容：他们喘着气，整个人都在颤动，说是他的身体不见了；又说，看见了天使，说甚么他活了！当然，是那些妇女实在很爱他，想念他，会以为见了天使的神奇事，也是可能的。有几名弟兄去查证，虽然回来报告，没说看见天使，但所见到坟墓的情形，却跟妇女们一样。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想法。”他报告新闻，只是把最重要的新闻忽略了。

那陌生人的神情，变得很严肃，也带着些怜惜的说：“无知的人哪！”叹息重过责备的语气。“你们查考圣经，信其中的话吗？怎么对先知的話那么缺乏敏锐的感应！基督这样的受难，又复活进入荣耀，经卷上早都记载了。因此，事情照神感动先知所预言的成就，又有甚么意外呢？”

“经上哪里曾有这样的预言呢？”

那外貌平凡的陌生人，就开口对他们讲解起圣经来。他没有先加准备，想不到他竟然对圣经出奇的熟悉，比穿长衣的拉比更熟悉，而且所引用的经文，是一般想不到的，从他口中说出来，带着权威和极大的能力。

他们三人一起走着。陌生人一面走，一面滔滔不绝的讲。他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摩西所说，神要在以色

列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先知。在祂降生之前七百多年，先知弥迦早就预言说：“祂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也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祂起名叫‘以马内利’”；又说祂是“担当我们的忧患”的受苦仆人。祂受苦而又复活得荣耀，是约拿所预表在地里头三天三夜的人子。祂的事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了。

这陌生人讲圣经的方式，使他们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的，但一时说不出是在哪里。听他的话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叫两个听的人心中，十分兴奋，如果此时他们互相看一眼，一定会发现，对方脸上的愁容变成了欢笑，眉头的愁结舒展开了。他们仿佛脚下增加了弹力，步伐也轻了许多，路程不知不觉的缩短了。实际上，他们宁愿无限的延长，反倒怕路程会走到尽头，到了家，他们必须跟那陌生人分手。他们似乎已经成了知己朋友，认识了很久很久。

但太阳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他们一路走着，谈论着，放慢了脚步，差不多成了散步。他们的身影慢慢拖长，终于暗淡得看不见影子。

等到走近二人所住的村子以马忤斯，太阳已经平西了。

革流巴和他的同伴，放慢了脚步；那陌生人却似乎要继续往前走的样子。不过，革流巴知道，由此再往前走，好远一段路都没有村镇可以落脚，绝不应该让单身旅人在夜路上摸索。而且，实在说，他也深愿眼前的这位教师留下来，好有机会再向他请教。他知道同伴的心意，也必然跟他相同。

两个人差不多同时开口，哀求般的强留那位陌生人，全不像还只是两小时前途中偶遇：“你看，太阳已经下山了，时候晚了，前面没有住宿的地方，请你同我们住下吧，可以在这里用晚饭歇息！”

陌生人似乎迟疑了一下，但只是在等待他们表示同心诚意的请求。他终于进入了他们的屋子。晚餐很快就准备好了。

一到了餐桌前，他好像习惯性的变作了主人。不待请求，陌生人拿起饼来祝谢；姿态又是那么熟习，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他祝谢说：“父啊，天地的主！你创造万物给我们享受，我们感谢你。阿们。”

这本来是犹太人一般用餐时祝谢的话，只是开始的那句，他们只听到一个人这样说过：在加利利海边的野地上，把少数的饼和鱼，擘开分给众多的人吃饱的时候。

他们的心震动了。把眼睛转向他看时，他已经擘开了饼，递到了面前；啊！看他手腕上的钉痕！

不会错的，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钉痕，就是那位被钉十字架的加利利人耶稣！

就在那时候，陌生人好像是长大了许多，面貌改变了；仿佛从原来的脸后面，奇妙的长出另一张脸。那是他们所熟悉的脸，所爱慕，所思念的脸，满有慈祥，又那么荣耀，威严。但在他们二人惊奇欢然注视之下，祂忽然消失了，没有声响的消失了。

火炬

革流巴和同伴彼此对望了一眼，同时站起来。

“在路上，祂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革流巴好像是得到了启示，立刻去找着火炬，点着了。擘开的饼仍然放在桌子上。二人顾不得晚餐，跑跑跳跳的，高举着火炬，奔向回耶路撒冷的路。

太阳沉落在西方的海面下很久了。二人却高举着火炬，从西往东走，走上坡路，一点也不觉得吃力。很容易在约翰的家里，找到了十一个使徒，和其他信从主道的人。彼得早就不哭了，只是张着嘴在笑，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其余的人也都很兴奋；他们太兴奋了，各人都在说，叫外面进来的人，弄不清该听谁的。

有几个声音说：“那几个妇女的话是对的，主果然已经复活了，显现给西门彼得看了。”

有的人见到他们出现，觉得希奇：“咦！这么晚了，你们怎地又回来了？”

革流巴说：“还不是赶回来给你们报告这大好的信息，原来你们也知道了！”

于是他们说到从离开这里，在回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一位陌生旅人，一路同行，给他们讲解圣经，激起他们的希望；然后要和他们一同用晚餐，在擘饼的时候，给他们认出原来是主。然后，主就不见了。

当然，谁也不会连夜跑来，只是讲个笑话；而且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再说，他们先前的忧愁叹息尽都消失，那兴奋的神情，无论如何也装不来，而且没有装作的理由啊！

马提亚悄悄的对身旁的腓力说：“听起来恐怕他们所见的是魂；否则为甚么擘了饼却不吃？又为甚么会忽然不见了？如果有多马在这里就好了，他最会析理审辨。”

腓力却有不同意见：“多马如果在这里，他也难以作高明的断定。任何人不作甚么，不就等于不能作甚么：不吃饼，并不就是不能吃。至于忽然不见了，一般的人固然作不到，但不能证明只有鬼魂才作得到。至少他们不再看到祂，绝不等于祂的不存在，只不过是不再看到。我确信我们的主是复活了，正如祂在世的时候，早就给咱们讲过的。”

忽然，屋子里变得出奇的宁静，大声细语的交谈都停了，好像连空气都凝结了。每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一点：使他们悲痛的耶稣，所思慕的主，站在他们中间！

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吗？

但周围那么多的人，竟没有一个向前问安拥抱，也没有欢笑，甚至没有人出声。

倒是耶稣先说话了：“愿你们平安！”是主耶稣惯常的语气。“我不是在这里吗？你们为甚么害怕，为甚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就可以认出实在是我了。用手摸我看！即使魂会单独显现，也是没有骨，没有肉，像虚无的风一样；但你们可以看到，我是有骨有肉的。”说着，伸出手和脚来，给他们看。

门徒们证实是主，忧伤变为欢喜；但这突然来的喜乐，却使他们难以相信。

要向别人证实自己的存在，有多么好笑；而且要向自己亲信的人，证明自己的身分，更是难堪。门徒们虽然没人这么明说，但他们的心里还不是如此？除了俯就他们的条件，又有甚么办法？

耶稣好像知道他们议论，在以马忤斯擘开了饼不吃的事，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甚么吃的没有？”

在一般情形之下，他们该问主耶稣要不要用晚饭。但因为心中的怀疑，竟然没有人提起。当然，复活的主不需要饮食；但为了祛除门徒心里的疑团，耶稣有必要自愿接受试验。

有人递给祂一片烧鱼。祂接过来，当着他们的面吃了。

门徒们看见他们的主吃平常的食物，才确知这不是只具有耶稣外形的鬼魂。门徒接受了耶稣复活的事实，这才敞开心接受祂的话。

但是，感官的经验，是主观的，是可以改变的，不能作为信仰的根基。因此，耶稣不是要门徒宣扬奇事，而是要他们宣扬圣经。

耶稣对他们说：“我从前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曾对你们说过：摩西的律法预先刻画出人子的头，先知的书记述人子的脚，并诗篇上所记人子的心，凡是指着我所说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从此圣经的话，对他们不再是封闭的，都有了新的意义，使他们坚信不疑。耶稣又开口说话了。他们再一次听到，亲爱主熟悉的声音说：“经上记着”。不过，这次是用在祂自己身上：“照经上记着的话，基督必先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信的人要奉祂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开始，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听到这里，门徒们才警觉主是指着他们说的：这是多大的责任！主不是不知道他们才具的低微，岂不是太奢望？

主好像已经知道心中的意念，继续说明既然交付这使命，必然供应完成使命的装备。原来主深知他们，也并没有谁幻想他们以天然的力量，去完成这无限艰巨的事工：“我要将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复活的主和他们在一起，有四十天之久，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然后，在众人注视之下，祂被接去，乘着云升上了蔚蓝的晴空，上升，上升，仿佛是进入太阳的光明里面。

等候的时间是漫长的。但是，他们有希望。

一天，一天又一天；四十九天过去了。五旬节到了。照复活的主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门徒披上了能力，敞开门出去，成为主的见证人，传递好信息。

这好信息是人可以解决罪的问题，与神和好，而得平安。

唯一的道路，是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祂是神的儿子，为救赎人的罪而降世，被钉在十字架上代人受死，而且复活了，使信祂的人，得蒙称义，而有永生。

这信息的根据是圣经。

门徒将这火炬传递下去，传递下去，点燃起人心的希望，照亮了世界。

## 02.NestorianismInChina 景教在华史

明熹宗天启五年(A.D.1625)，在西安附近掘得一古碑，碑额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景教在华传播的记录。这碑是唐德宗建中二年元月七日(A.D. 781年二月四日)所立，大秦寺僧景淨(Adam)述，吕秀岩书，碑文汉字有一千九百多字，并刻有六十八个波斯僧名；此碑经湮没八个多世纪，字迹仍清

晰可辨，是景教在华的主要记录。景教是来自波斯的基督教一支，亦称聂斯托利教。其创始人 Nestorius(c.late 4th cen.-c.451)，曾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深为皇帝 Theodosius II 所器重。后来因为有人拒绝承认马利亚为 Theotokos(上帝之母)，因基督的神性不是由马利亚而来，所以不能尊崇为"上帝之母"，如同人类关系的父母观念；后来演变成对于基督神人二性的争论。在 431 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中，被定为异端。聂斯托利本人被放逐。但其教训在波斯等地继续流行。

唐太宗李世民 (在位 A.D.627-649)，由于涉及残酷宫廷斗争的罪咎记忆，寻求各种宗教。其为人和圣经中的波斯王古列(Cyrus) 不无相似，对各宗教采取容忍。景教派遣的教士阿罗本，于贞观九年(A.D.635)来到中国。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他"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抵达长安，太宗皇帝派宰相房玄龄至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至贞观十二年，秋七月，皇帝更特别下诏书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宣行天下"。并且拨款建寺(教堂)，甚为支持，一时颇为兴盛。

虽然当时的译经，难以充分传达原义，却得一些人欣赏，而称为"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是说知道圣道的简要，不是重复，而使人得知真理。这比不明真道的人，任意轻侮圣经的态度好得多了。

碑文中有这样的记载，表明其对于基要真理的认识："我三一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这是说，他们接受了三一真神的道理，承认"弥施诃"(弥赛亚)隐藏原来的荣耀，成为肉身同人一样，降世代赎；有天使宣告，从童贞女生而诞生。"大秦"是指波斯以西的地方；更直接把朝拜圣婴的博士们，说为从波斯去的。后说到："亭午升真"是主耶稣的复活升天；"经留廿七部"，是新约的二十七卷。并且记载："七日一荐"，是说那时也是每周有主日聚集敬拜。但他们对十字架的道理知道多少呢？碑文说："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不仅望文生义，更看见十字，就以为是定四方，而没有说到救主受死赎罪的真理；又把圣灵称为"元风"。

在中国所传播的景教，有的地方与原来的信仰相差甚远，几乎可说面目全非。为了适应当地文化，为了尽量讨好朝廷，不惜牺牲真理，与异教混合，甚至可能要争宠。就如欢迎景教来华的唐太宗，于景教传来的前六年，即贞观三年，差遣玄奘去印度取经，就是小说所载的"唐三藏"；于贞观十九年返长安，受到盛大的欢迎。

唐太宗李世民崩逝，景教碑记为："青驾西升"，当然是佛教语词；他们把皇帝的御像画在教堂墙壁上："将帝写真转摸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为了讨好皇帝，把他的像弄成偶像，装饰堂中，当作是荣耀，可谓卑贱之极。

嗣位的高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并"于诸州各置景寺"(景教教堂)。景教在全国兴盛起来，"法流十道国幅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但当时在景教，佛教之外，还有本土的道教，因为道教徒拉上了道家创始人李耳作招牌，跟唐朝的皇帝同宗，道教成了皇帝的宗族宗教；唐高宗于干封元年 (A.D.666)，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而这些都成了碰不得的"圣牛"；景教也需要这几位元皇帝的大力支持。以后从武后则天皇帝，到睿宗 (A.D. 683-712)，约三十年间，政局变迁，景教也不会得意，大概颇有一段时候，"法栋桡，道石倾"，是说凄凉景况。

到玄宗皇帝，诏令宁国等五王子，修复景教堂寺，外表更加辉煌壮丽。"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

五圣写真寺内安置"。大概是五位王子，每人捧一幅"圣像"："五圣写真"即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的遗像，都安置在寺内，仿佛教堂就是他们的家庙，少不得会烧香并隆重礼拜。寺既然是官家造的，皇帝愿弄些偶像点缀崇拜，谁敢说不愿？因此，得到皇帝御笔写的金字招牌："天题寺榜，额载龙书"！是多大的光荣！

代宗皇帝还会庆祝圣诞节呢！"每于诞降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景众"就是景教徒众，大家自然会皆大欢喜。景教碑就颂扬历代皇帝的恩德。当时的政教关系是如此密切。

景教士对于讨伐安史之乱，倒还颇有贡献；当时，兵荒马乱，社会雕敝，人民生计困苦不堪，景教中人并作过社会救济事业：

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侔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摠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人施利。每岁集四寺僧众，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饫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姿，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景教碑的记载的"大秦"，据说，是指波斯以西包括巴勒斯坦，也有以为是罗马帝国；但其所描述的模糊印象，却是神话般的极乐世界，说成不似人间的乐园：

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通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紈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

在信仰上妥协，要求取当权者的欢喜，是景教不顾原则的唯一原则。为了得皇家的恩惠，就不传讲人的罪，也就没有悔改赦罪和救恩；只顾外面的扩展，教堂增加，却不管得救重生的真信徒。没有根的工作，自然经不起风暴。当权者能给你恩惠，在某一时候，也能够摧毁你。唐武宗时，道士赵归真向皇帝进言，痛抑佛教，结果，会昌五年（845年），下诏"毁天下佛寺，勒令僧尼还俗"；称为"会昌灭法之年"，取法佛教，仰望官方的景教，也连带受池鱼之殃，在取缔之列，而一蹶不能复振。

不过，中国佛教注重译经及文字事工，禅宗虽然说不立文字，但以后禅学的文字影响更广。佛教于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东汉桓灵间即开始译经；大翻译家鸠罗摩什（A.D.336-409）来华，主要是为了

翻译事业。因此，他们已有相当的文字传播根基；后来，更以"变文"（散文和诗混合的通俗说教方式），小说，传扬宗教信仰。

景教来华后，在翻译技术上也受他们的影响，甚或借助于佛教徒。如：弥赛亚成为"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耶和华是"三一妙身阿罗诃"；撒但则作"娑殚"；主日敬拜叫"七日一荐"；教堂称"寺"；教士则称为"僧"。至于"景尊"则是基督，所以"景净"等名，是仿照佛教僧姓"释"，景教徒也姓"景"了。学者以为景净其人精通汉文，并所撰碑文的语词典故，多处出于易经，诗经，春秋，及四书，史书，诸子。以他们同官方关系的密切，其语文程度，自然该是可能的。虽然，初译一种新语文，有不可避免的困难，但其借用许多佛道语词，到使人莫辨是不是佛道教变种的程度，是不幸的事实；以至宣教士称为"僧"，还有甚话好说？而且在表面的兴盛："寺满百城"，风光之极，但似乎仍没有本地的传道人，更不必说华人宣教士了。推想大概是有花无果。遭受三武迫害后的佛教，还得以复苏；景教则连根也枯干了，距得意的立碑，还不到半个世纪。

综观景教在华二百余年，由盛而衰，所留给我们的，是重大的教训：逢迎王室，依附权贵，与政治势力结合，而没有靠圣灵能力，更新生命，更不要谈重建文化了；有教堂而缺少信众，没有得着灵魂的永远果子，在人民中间扎根，用真理栽培浇灌，自然不是宣教的正当策略。牺牲信仰，仰望官方恩惠，真是贪近昧远，讨人喜悦，得一时小利，而不能得神喜悦，要付出多重的代价！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在华人眼中，佛教的洋和尚，与景教的洋和尚，自然难以分辨其不同。至于忽略文字事工，尤其是不可补偿的损失。

在蒙古，景教称为也里可温教，意思是蒙福之人，一度甚受尊崇，皇太后也成了信徒，成吉思汗并曾诏令对其教士加以礼遇。不过，到入华以后，仍然被当作外来宗教，未能深入民间。

以后到十九世纪，更正教宣教士来华，自然是进步了，但仍然是扎根未深。而且即使到了晚近，牧师们还是想尽方法攀援，往上爬，热心作宫廷太监神学家，出卖真理，依附官方，不敢指责罪恶，对于贪污腐败，噤若寒蝉，跟景教并无多大不同。幸赖主的恩典，经历狂风暴雨后，总算是在中国灾难的土地上滋生繁荣了。只是盼望华人信徒不要自满，要接受历史的教训，从以往的错误学习，传扬圣经真理，为主发光。

景教流行中国碑 并序

大秦寺僧景净述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  
摠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洎乎娑殚施妄钿饰纯精，间平大于之中，撰冥同于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

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恩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远休复。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藏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圆廿四圣之旧法，理家国于天猷；设三一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阴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和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经留廿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开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即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以有外行，削顶以无内情。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财货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及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摠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宁义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摸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通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纁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

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舍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方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

亲临福宇，建立坛场，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龙髯虽远，弓箭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舍，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于是天题寺榜，额载龙书；宝装璀璨灼烁丹霞，睿宏空凌腾日。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道无不可所可哥名，圣无不作所作可述。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诞降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饌以光景众。且干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亭毒。我建重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州以维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至于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乐，念生响应情发自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

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

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传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摠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人施利。每岁集四寺僧众，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饫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

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姿，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词曰：

真主无元 湛寂常然 权舆造化 起地立天  
分身出代 救度无边 日升灭暗 咸证真言  
赫赫文皇 道冠前王 乘时拨乱 干廓坤张  
明明景教 言归我唐 翻经建寺 存歿舟航  
百福偕作 万邦之康  
高宗纂祖 更筑精宇 和宫敞朗 遍满中土  
真道宣明 式封法主 人有乐康 物无灾苦  
玄宗启圣 克修真正 御榜扬辉 天书蔚映

皇图璀璨 率土高敬 庶绩咸熙 人赖其庆  
肃宗来复 天威引驾 圣日舒晶 祥风扫夜  
祚归皇室 袞氛永谢 止沸定尘 造我区夏  
代宗孝义 德合天地 开贷生成 物资美利  
香以报功 仁以作施 眇谷来威 月窟毕萃  
建中统极 聿修明德 武肃四溟 文清万域  
烛临人隐 镜观物色 六合昭苏 百蛮取则  
道惟广兮应惟密 强名言兮演三一  
主能作兮臣能述 建丰碑兮颂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  
时法祝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  
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

大秦景教三度威蒙赞

无上诸天深敬叹 大地重念普安和  
人元真性蒙依止 三才慈父阿罗诃  
一切众善至诚礼 一切慧性称赞歌  
一切含真尽归仰 蒙圣慈光救难魔  
难寻无及正真常 慈父明子淨风王  
于诸帝中为帝师 于诸世尊为法皇  
常居妙明无畔界 光威尽察有界疆  
自始无人尝得见 复以色见不可相  
惟独绝凝清静德 惟独神威无等力  
惟独不转俨然存 众善根本复无极  
我今一切念慈恩 叹彼妙乐照此国  
弥施诃普尊圣子 广度苦界救无亿  
常活命王慈喜羔 大普耽苦不辞劳  
愿赦群生积重罪 善护真性得无繇  
圣子端在父右座 其座复超无量高  
大师愿彼乞众请 降筏免使火江漂  
大师是我等慈父 大师是我等圣主  
大师是我等法王 大师能为普救度

大师慧力助诸羸 诸目瞻仰不暂离  
复与枯焦降甘露 所有蒙润善根滋  
大圣普尊弥施诃 我叹慈父海藏慈  
大圣谦及淨风性 清凝法耳不思议

此赞约作于第八世纪，可能译自叙利亚文，为古"三一颂"。  
"淨风"即圣灵。此赞见中文圣诗集普天颂赞第二首。

### 03.RobertMorrison 马礼逊

把福音带到遥远东方古老中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1782 年一月五日，生在布勒古林(Buller's Green)，英国北边近苏格兰的一个村镇。父母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所以他在基督教信仰熏陶下长大；年十二岁时，即能背诵诗篇第一百十九篇。早年作过鞋匠学徒，在十五岁时，悔改重生，接受了耶稣为救主。他进入奥克斯屯学院(Hoxton College)，学习神学，天文，医学，并初步学习中文。

1807 年，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按立授马礼逊牧职，差他往中国宣道。那时候的中国，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严禁外人居住，传福音更不必说。到这样一个遥远带有神秘色彩的地方，最理想该是至少二人结伴同往；但没有别人肯去，马礼逊只得孤身登船。另一个问题，是找不到航海的船肯带他去那里。他只得先横渡大西洋，绕南美洲到美国，然后转往中国。航程既长，行船又苦；那年一月八日离岸启航，到九月七日才抵达广州，历时八个月！

到了广州，却不能进行传教。因为他通晓中国语文，就于 1809 年，接受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身分，才得合法居留。不过那时的中国政府，不准华人教授洋人华文，违者处死，更严禁向华人传福音；英国当局，也拦阻他传道。当时，受聘教授他华文的老师，常身怀毒药，预备被察觉时，即服毒自尽，免得身受酷刑。在这样的环境下，马礼逊不能不认真苦学。同时，他进行翻译圣经为中文的工作。1811 年，首先译成出版的，是使徒行传；想见他是追慕使徒受苦传福音的脚踪，更可解决所面对的宣道问题，也可以勉励自己；华人同工，也必然受到感动。那时，还没有中文活字版印刷，刊印书籍需刻木版；在 1812 年，清政府再颁禁令："凡刻印基督教书籍者处死。"因此，马礼逊的译经与刊印工作，是冒极大的危险，必须秘密进行。虽然在困难之中，1813 年，中文新约圣经出版。

马礼逊在 1807 年，同玛丽(Mary Morton)结婚；但新婚夫人不获准居住广州，只得居住澳门；夫妇分居异地，马礼逊需要往返奔波，甚少家庭之乐。他们第一个儿子夭折，竟然没有葬身之地：当地华人不准他埋葬；英国在澳门没有墓地；经过了许多交涉，才得以在澳门北一个小山上，安葬小小的躯体。1815 年，马礼逊夫人因为一家水土不服，挈年幼的儿女返回英国；留下了马礼逊孤身一人，继续艰苦

奋斗。

1812年，伦敦差会才派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来华协助马礼逊。米怜是苏格兰人，1813年，到了澳门，因为他是传更正教，不见容于葡萄牙政府，被逐出境，而继往广州。米怜在那里，分发福音单张及小册，也学习中国语文。他帮助马礼逊译经。两年后，在马来亚的马六甲，设立了一座印刷所，印行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The Indo-Chinese Gleaner)。马礼逊和米怜，并于1818年创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宗旨是“教导华人青年英文，并向他们传播基督教信仰，并教导宣教士等华文”。由米怜担任校长。可惜，米怜于四年后期逝世。他们二人合作翻译成的全部新旧约圣经，则于1824年出版，成为更正教的第二本中文译本圣经(只比马士曼 Joshua Marshman 译本，1822年在印度出版迟约二年)。马礼逊也出版了中文文法及中英字典。成为当时在华洋人学中文必备的书。他也编译了第一本圣诗集，名为养心神诗，只有27页，于1818年出版。宣教士们先后出版了四种同一名字的圣诗，最晚的为1857年，可见当时对圣诗功能的认识。

1820年，马礼逊夫人带着小儿女从英国返澳门，正可重享相聚的快乐；但因染霍乱症，遽然逝世。而他的同工米怜，也于是1822年病故。马礼逊伤痛的心情，可想而知。

1824年，马礼逊首次回到英国休假，应邀在各地讲道，宣扬在华传教工作，得到故乡人士热烈欢迎，声名大噪。得英王乔治四世(George IV, 1762-1830)召见，他呈赠所译的中文圣经。二年后，返回中国的时候，带着新婚的续弦妻子伊莉莎白(Elizabeth Armstrong)同行。他们又生了四名儿女。1833年马礼逊夫人留下大的儿子伴同父亲，带着前妻的女儿和自己生的四名幼年儿女，返英国居住；那也是他们的永别，此生未能在地上再见面。马礼逊继续努力事奉，一生为在华宣教工作立下根基，让后人在上面建造。

马礼逊的第一个果子，名叫蔡高，成为首先承认主名的华人基督徒。协助印刷圣经的，有一名刻木版的工人名叫梁发。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顾清廷的禁令，成为最早期信徒之一，后来并作了第一位被按立的华人牧师。

马礼逊在华传道二十七年，只见到十人受洗归主，但每一个果子都是诚实坚贞。

1834年八月一日，马礼逊病逝于广州，年仅五十二岁。

三年之后，1837年，一位宣教士，手里拿着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分发给广州考场的考生。其中一份到了屡次落第的洪秀全手上。后来，到1843年，第四次赴试失败，他才拿来细读，加上自己的意见，用来倡导太平天国革命，侵扰及于二十省，延续十五年，几乎倾覆了满清皇朝。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脚步。(箴一六：9)

神给人有思想，就是要叫人用的。人自己筹算计画，并没有甚么不对，但总要以主为中心，倚靠祂的力量完成。

多数神的仆人，在行神道路的时候，要经过一段摸索，探求神的旨意。在这过程中，如果有主内的先进，对他们帮助，引导，予以适时的鼓励，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论这样的经历有多么美好，总不能代替神的旨意，和神给每个人所预备的道路。

明天就行

宾为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苏格兰人，

是个很敬虔的青年。亚伯丁大学毕业，二十四岁时，献身预备往印度宣道。当他启程之前，在父亲的教区讲道，圣灵大大动工，英伦三岛的教会复兴。因此，他没有去印度，而成为青年游行布道家，也远渡大西洋，到加拿大工作过。

1845年，英国长老大会通过了派遣宣教士往中国宣道。

经过了祈祷，但无人愿意前往。如此经过了两年，大会失望了，考虑放弃中国的工作，以为该往印度。

1847年，三十二岁的宾为霖来应征了。他们不明白，为甚么这位颇有名的布道家会肯去东方，但合格不成问题，就接纳了他。当问起他何时可以成行时，宾为霖回答说：“明天就行！”这样，在极短时间之内，他启程前往中国。

宾为霖先到达香港，在那英国属地的岛上，学了广东话，并传道两年，然后去广州。到那里以后，住了十六个月，大部分在洋行区，无法长久安身，更难以展开工作。

1851年，宾为霖转到另一个开放商埠厦门。又是两年过去了。

人如其名热情“焚烧自己”(Burns)的宾为霖，并不是甘于领薪游埠的宣教士。学了中国语言，辛劳六年之后，却看不见显著效果，并不如他在英语世界一天内可以引几百人信主，不免心寒难过。这能说是神的引导吗？那位惯于布道复兴的神的仆人，心中的烦恼可以想见。

1853年末，他流着眼泪说：“我不知甚么时候，能领一个华人皈主！”但他祷告更加恒切，工作更加热烈。

1854年回国之前，收获了第一个初熟的果子。

宾为霖与戴德生

1855年，宾为霖卷土重来，到了上海。在那里，遇见了乍到中国的青年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那时，二十二岁的宣教士戴德生，初履异域，原来预备投奔的宣教士，有的死了，有的返国，工作茫无头绪，正在学话；见到了年长的宾为霖，有识途老马引导，自然甚为欢喜。

宾为霖对戴劝慰帮助，约他一同南下。刚好有一艘川航欧亚的船“基隆轮”在港。一次偶然的机，遇到了船长葆尔斯(Cap. Bowers)是虔诚的基督徒，极力介绍汕头才是传福音的好地方。到他离上海南航时，

宾为霖和戴德生二人，成了船上的免费搭船。

1856年三月十二日，“基隆号”在汕头外韩江口寄碇，他们乘小船登岸。

汕头地属潮州，是当年韩文公（愈）被贬为刺史的地方。韩愈反对唐宪宗的迎奉佛骨，上了“谏迎佛骨表”，文中抵斥迷信，慷慨直言，列举崇奉佛道的朝代“国祚不长”。宪宗皇帝看了震怒，把他贬到当时蛮荒僻野的潮州。但他到任以后，提倡文教，在短短时期，把那里改换了面目，民性淳化，被称为“海角邹鲁”。韩江就是纪念韩愈而名的。

当宾为霖和戴德生到那里的时候，汕头还不是通商口岸，洋人在那里，不能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但有些洋商在那边住了下来，经过买办串通，地方官竟然不问不管。

汕头当时的主要贸易是甚么呢？进口货是平均每月月三万二千磅鸦片烟土，总值约二十五万英镑，转销内陆各县。出口是中国廉价劳工，通称“卖猪仔”，实际上是把人运往古巴，中南美各地，参加集体劳力。严格说来，那算不上奴隶买卖；但采运及使用方式则差不多：装载在拥挤的船里，运到时会有三分之一染病损亡。那些或拉或骗去的人，叫作被“上海”了(shanghai 作动词用，因为开始于上海)。活着工作多年，如果不赌博输光，也可以积蓄一笔钱回乡。洋人看那些华人是没有灵魂的(例见 Joseph Conrad, Typhoon)。华人就这样怀疑憎恨洋人，鄙视在中间经营的“洋买办”华役。这是当时的情形。

宾为霖和戴德生到了汕头，他们不愿和外表高雅清洁灵魂卑污肮脏的洋商认同，不肯住在他们的特区。二人进到市区，经过两天的寻寻觅觅，在一条热闹街道的香烛店后院，找到了一间房子；租金是每月十块银圆，可算相当昂贵。那间房子，他们用床单分隔成三小间，设备得非常简陋。床，是用木板支起来的；桌子，用纸盒盖子代用；坐椅，是用一个多先令买来的竹椅，和一只摇椅。鲍尔斯船长来探访他们，发现他们的居住环境和设备，实在太差了，问他们为甚么不找个更大些的地方。宾为霖含笑说，他已经付每月十块钱了，觉得很满意。鲍尔斯说，那点钱怎能够我吸雪茄呢！

夏天到了，那住所的不够卫生更为明显，酷热的程度更为难忍。宾为霖写道：“在一切事物，惟独是否有神同在，决定我们是否满足。”

二人同住在华人中间，白天出门布道。宾为霖穿着中国衣冠，对人彬彬有礼，给戴德生印象很深，亦步亦趋的效法他。年轻的宣教士说到跟年纪大十七岁的长者同工，认为所得的效益，“远胜于学院的课程”。

谈到传福音的方略，除了用他们有限的语言口传之外，只有用简单的福音小册和单张辅助；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加上医疗传道。宾为霖初踏上香港土地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他在香港感化了一个作医生的 Dr. James Young，并且建议差会派这位医生作医药宣教士，和他前往广州同工。但是，这医生在1850年，先他去了厦门，就留在那里。

现在他和戴德生都认为汕头人抗拒福音，难以建立据点；但在生病的时候，不会拒绝洋人救他们的命。因此，莫如先办一间医院或诊所。戴德生在伦敦的时候，是个医学生，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二人在一起四个月，同处甚为相得，于是约定将来共同传道医病。戴德生有一部分医药器材，存在上海；决定返回上海，去取寄存的器材，可以带来汕头应用。哪知竟一去不返。当时通讯不便，过了很久之后，宾为霖才知道朋友没有回来的原因：戴寄存上海英国差会的器材，给一把火烧掉了。这把火，似乎烧掉了戴德生回头的桥。他的本人则去宁波的伦敦会医院工作，1858年一月，同一位在宁波宣教士

的女儿 Maria J. Dyer 结了婚，是在医院的护士。以后，夫妇同离开医院，于 1865 年，创立了中国内地会。那是在他抵达中国工作了十二年之后。内地会的宗旨，是专注向广大的中国内地传福音。他凭信心事奉的原则，不避艰苦的作风，影响极为深远。到 1905 年，逝世于长沙。

宾为霖与戴德生还有通信，但从此没再相见，更没有再度同工。

### 汕头的拓荒者

宾为霖又落单了。他独自留在汕头，在那里拓展基督的国度。幸而有两位汕头基督徒，从香港来到。他们二人虽然解决了语言上传通的困难，但仍然没有找着开展工作的好土。

宾为霖没有灰心。他不退反进，传福音的涟漪，扩展到周围的乡下去。当时，太平天国反清战争正在进行。洋人政府虽然保持中立，但洪秀全类似基督教的教义，和使用的名词，混淆了一般人，给传教士们带来猜忌和不安全。何况内战遍及十六省，兵燹泯没了人性，增加了残忍的兽性，在如此不友善的环境中，这行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宾为霖住在他们中间，汕头人民普遍的堕落和丧失，完全暴露在他面前，很叫他伤心怜悯；他也亲眼看到了丑恶的聚族私斗。在写回英国的报告中说：“这地方的人，是我一生所见最残忍的。在近二十年当中，年年有宗族械斗的事发生；甚至杀害对方的俘虏，剖开他们的心脏来吃：以为吃了活人心，可以壮胆！”

当然，宾为霖没有被人捉去剖心，但他遇到过“盗贼的危险”。一个深夜，盗贼闯入他屋里，抢去他一切所有的，身外之物，只剩下身上所穿得衣服。他说：那就是需要为这些人代祷，和需要传福音给他们的原因。他爱这些不法作恶的人！那就是他从英国东来的原因。

政府并没有认真处理各样的恶行，忽略了治安问题，视而不见。但在阻挡宣教事工上，忽然醒觉了，变成非常有效；那多半是有人为了利害关系，去告密的结果。一天，宾为霖和他的华人同工，正在传福音的时候，官府的差役忽然来了，把他和二名同工抓走拘禁；经过审问，把宾为霖押交广州的英领事馆。文中说：“他为甚么身为英国人而不穿西装，而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岂不是藉而方便行动，作害人的勾当吗？”

在那时，洋人在通商口岸以外居留，已是超越条约保护范围，何况他又在各处宣传福音！但宾为霖，像初期教会的使徒和历代的圣徒一样，知道基督教本来就是“非法”的：基督教本来就不是这世界的王创立的，他们的法没有经教会同意，教会也根本不是要讨他们喜悦，为他们效劳。

### 上帝国主义

不仅中国政府不欢迎他，连他本国政府的官员们，对他也缺乏好感。1856 年，“亚罗” (Arrow) 号事件，引起英法联军再侵中国。后来，英国特命专使额尔金伯爵 (Earl James Bruce Elgin) 来华谈判 (当时流行的谈判方式是：中国人可谈，但洋人判)。宾为霖有次见到了他，就仗义执言，表明他对官贩鸦片和贩卖人口的意见。额尔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新条约谈判的结果，汕头也辟为商埠。

宾为霖的“上帝国主义”，不为他本国的帝国主义者所欢迎。

从 1857 年末，至 1860 年，额尔金勋爵是实际英占领广州的太上皇。他派巴克 (Harry Parks) 为驻地代表，

满清总督不过是他手上的傀儡而已。巴克也是不赞同宾为霖宣道的人。

宾为霖因在汕头宣教罪，被押交广州英使馆。那时的英使是巴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巴令训斥警告他，叫他不可再去汕头滋生事端。巴令是个有才能的人，据说：他能讲一百种语言，能懂得二百种。可惜，他不会善用其才能，为了英商服务，为中英战争造因，却阻挡传和平的福音。他阻挡主真理的光，是因为与他的品德冲突，难以兼容，是显然可见的。

宾为霖得到自由后，念念不忘仍留在府城监牢里的两位华人同工，尽量设伏营救。他听到他们曾受虐待，迫使他们否认耶稣；但他们坚定不移，并且向同被监禁的囚犯，见证耶稣福音的真实。过了四个月，他们也被释放了。他在汕头的工作，也意外的渐渐发展；当地人民看到他的见证，转而对他欢迎。但他被促离开汕头，回到厦门工作。

1858年，宾为霖回厦门，建议施饶理牧师(George Smith)来接替他的工作；在厦门的事工，则由杜嘉德牧师(Carstairs Douglas)接代他主持。他们在宾位霖所立的根基上建造，渐渐巩固，并发展壮大。拓荒者宾为霖，又往福州宣道，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宾为霖通晓多种方言，也长于音乐。在1861至1862年间，他共出版了神诗合选(收64首圣诗)；潮腔神诗(含29首)；榕腔神诗(30首圣诗)；厦腔神诗(20圣诗)。这四种圣诗集，对闽粤初期教会的敬拜，和基要信仰的传播，必然有相当贡献。

1863年，他在北京出现，希望通过英使，为中国基督徒取得信仰和良心的自由，争取免缴赛会和祭孔祀祖等派捐。他留北京四年，作布道工作之外，并从事写作，并将约翰本仁的天路历程译成中文。

离开北京后，宾为霖去到牛庄(营口)。这是他在华宣道最后一站。1868年四月八日，他离开了世间，年仅五十三岁。那是早春还寒的时候。福音新绿希望，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萌芽。

为主烧尽

与主同行是随主的指引，不是随从世人，不是凭自己的意志，甚至不是看工作的立即效果。

在许多年后，我们才可以了解神旨意的奇妙。"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二〇：24)

宾为霖，这位焚烧的宣教士，福音的火炬，在中国的大地上，由南烧到北，终于为主烧尽了。但他使许多人得到了主爱的温暖。

## 05.RichardBaxter 贝克斯特

模范教牧贝克斯特

在十七世纪，英国有一位杰出的教牧，把一个品德败坏，人以为最没有希望的地区，变成了模范教区，成为"城造在山上"，为主发出光辉。

这人是贝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1691)。

这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生不受人欢迎，可说是左右不逢源。他唯一的错误，是要讨主喜悦，所以常

不讨人喜悦。在早年的时候，英国国教圣公会当权；他属于官方教会，却同情独立教会；以后，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被清教徒推翻了，他曾任清教徒军牧，却为了圣公会的教牧说话，后来并帮助促成英王的复辟。复辟后，他不接受封立为主教，却被关进监狱。这个性向中和的和平之子，为了他的意见，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受反对，遭迫害。

贝克斯特从早年就体弱多病。在神学毕业后，于1638年受立为圣公会牧师。在那时候，英国的宗教和道德，都极为低落，无论是国家，是社会，是学校，情形都是一样。但贝克斯特洁身自好，追求敬虔，并且极力与人和睦。

他事奉的地区是期德寺(Kinderminster, Woccerstershire)那地区，约有二十哩方圆，在当时的人口约有三四千，或八百左右家庭。当地的居民，大部分业纺织，酗酒而品德败坏，恶名昭著。虽然如此，贝克斯特爱那些人的灵魂，以为他们像别的人一样诚实，而且立心要帮助他们。

他爱他们的灵魂。不管自己体弱，病痛在身，他殷勤的工作，真是拼命工作。他有一首诗说：

主呼召我出去工作趁着白天；  
警告可怜的灵魂转回切莫迟延：  
决心尽快去传播主的道，  
随学随教导同安波罗修一般。  
时时想到我不能活得长久，  
心中火热为得人灵魂争战。  
我讲道，不确知是否能再讲，  
像将亡的人传给将亡的人！  
啊，传道者该如何切望得人悔改，  
谁知道教堂与墓园原是比较？  
看到人在传讲，在听，在死亡，  
转眼从时间进入无尽的永恒！

因为英国的墓园常就在教堂后面，所以这样说。他不但勤劳工作，而且诚心竭力。他拒绝尽力求速效和数字的试探，而打下坚实的属灵根基，要求会众把教导化为实践。在品质上，他绝不妥协，在教区一千八百名达到领受圣餐年龄的人中，只接受六百人受圣餐。

许多年之后，追述在那里所作的工作，贝克斯特归荣耀给主，感谢主的恩典，同时也检讨在人一方面所作的。这值得关心教会增长的人注意。他的著作，至今为事奉主的教牧重视。

他认为地区教牧的同心合意，有很大的效果。因为他倡导教牧协会，包括区内所有教牧，不管是国教，或任何独立教派全予容忍，全予接纳。教牧的合一相爱，建立见证，可以率导信徒奉行，建立良好见证，保持和睦精神，而且能防止异端侵入，因为建成了没有缺口的属灵堡垒。

另一项原因，他归功于当地信徒都不富裕。他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地上物质的丰裕，会阻止他心向天上；他们悔改归信之后，往往再被贪财私欲迷惑。但期德寺教区的信徒们，多能继续坚守忠心，注重

属灵的事，因为地上的财富不多。

他在同一地区继续牧养工作，也有相当关系。在那里工作了二年之后，英国内战就起了。战后，又继续工作了约十四年多。附近的地区，几乎每个人都认得他，他也认得所照顾牧养的羊群。

贝克斯特相信保罗的话，以为多年独身，使他可以专心事奉，对工作大有好处。他自己没有子弟，能爱所有的教区信徒，都像自己的子弟。一直到1662年，离开了期德寺教区之后，才同敬虔爱主的查勒屯小姐(Miss Chalton)结婚；那时，他年已四十七岁了。

贝克斯特擅于文学，对于讲章总是尽力准备。他忠心有系统的传讲神的话，并且注意适应信徒的需要，针对他们有的毛病。同时，他每次都有新的供应，增加一部分信徒不知道的新东西，以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并且使他们保持谦卑，渴慕。这在教学上是很重要的。

他的道德生活，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的。贝克斯特注意自己和自己的教训，绝非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更不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连诬捏恶言毁谤他的人，也承认他是圣徒模范。

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当贝克斯特确信所作的是神的旨意，合于真理，他就全力以赴，坚持到底，不问自己要付何等的代价。他本来是圣公会的牧师，但同情非国教的清教徒，不问是长老会，浸礼会，和别的独立教会；一旦清教徒胜利了，他却又为圣公会说话。他认为大家都该有信仰自由，主张基督徒无间的爱，而不要求别人都跟自己清一色同路。

贝克斯特的教牧神学，最为卓越。他很关心主所交托的羊群，不把人作为填满座椅的数字，或缴交奉献的人民。除了忠心于讲坛事奉之外，更注意探访，像使徒保罗一样，“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都尽心尽意的教导，凡与人灵魂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参徒二〇：20)。他把教区所有的家庭，编列一张名单，每周平均探访十四五家；这样，至少每家每年探访一次；这与那些只拣富贵人家跑的，有多么不同！他看自己是一个尽责任的牧羊人：“我必须知道每一只羊，他们的需要或疾病，注意他们的迷失，帮助他们，治好他们，带他们回家。”在实施这方式之后，得到良好的反应，有人向他述说他们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贝克斯特甚至说，有时候半小时的辅谈，胜于十年讲台教导。这真可以说：“与君一席话，胜听十年道”了。

那么，他在探访时作些甚么？他的逐家探访，不仅是推心置腹的谈话，而是综合性的，包括家庭敬拜，查考圣经，和辅导。他探访时，也亲自送书上门；所送的书是教义问答，和别的属灵书籍；不问贫富，家家有分。在那个时代，书籍的价格比现在高得多。哪里来的钱去买呢？他建议：“如果来得及，由教牧负担费用；比较富裕的人家，也可以出钱帮助贫穷人；另外一合可行的办法，是为了购买书籍特别奉献。”当然，这是唤醒人注意文字事工的方法。他认为，如果任由信徒买书，他们会借口许多理由而不去买，也就不读书了。但把书送在他们手中，他们就不会推诿了。在此以后的跟进工作，就像是负责的教师一样，他考问教义，个别查询会众对所阅读的书如何领会，进行讨论，加以指导。他相信，这是教导的双翼：口传和文字并重(参帖后二：15)。他说，如果谁不肯受教，就不是门徒，也不算基督徒。会众可以体会，他是诚恳的关怀人的灵魂，所以他的工作，有真实的效果。

贝克斯特深信，圣洁蒙爱的会众，有圣灵住在里面，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他注重品德的教导，以在主的道上成长。结果，整个社区都更新而变化，成为全英国的模范教区。这蒙福的效果，

延续了一百多年之久。

他不以数字为满足。因为教会是有灵魂的活人，不止是统计分析的对象，不是没有生命的百分比。因此，他留意观察信徒救恩的果子，生命的改变。他说：

无神思想是一切邪恶的总合；所有真虔诚与敬虔，是奉献为主，与祂有心灵与生命的关连，为祂而活。实际的无神论，是表现在生活上，像世界上没有神一样。真敬虔刚好与实际的无神者相反，相信神的存在，因此，无论处世为人，或在教会里，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与神同行。...敬虔是一切宗教和道德的总和。

贝克斯特坚信，信徒应该顺从主的绝对主权，以主为最高的利益，为生活的中心。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实际的无神论者。基督徒应该有效法基督的生活。这是从清洁的心生发出来的。他说：“人不是舌头；心才是那个人。”

他一再强调，基督徒品德的重要。基督徒有良好的道德生活，才是正常的基督徒。如果只为了自己而活，是病态的，要从主得到医治，过圣洁的生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健全的，是理所当然的；这要靠神的恩典，顺从圣灵，绝不是“心为形役”的为了肉体活着。

在今天，有一行人，把教会当作宗教生意，玩噱头，搞广告，弄数字把戏，以为这就是教会事奉。有时候，甚至党附政治，歌功颂德，点缀升平，把主的身体，贬为政权的尾巴。更有的人则把现今的世代看成无望，以为新黑暗时代即将来临，教会腐败至不堪救药。如果只看人的情形，他们都有理由；但忘了一件事，就是圣灵的工作。

贝克斯特当时的情形，跟我们现在大致没有两样。他出身英国国教，却没有视为职业，当作名利的阶梯，进而被封立为主教。他也没有咒诅黑暗，更不曾加强管辖，排除异己。他靠主默默的耕耘，培养建立圣徒，扩展主的国度。

这是世界的希望。这是主的托付。愿先贤的典范启示教导我们，激励我们，存盼望，凭信心，殷勤工作，直到主再临。

附录：

教牧与合一 Richard Baxter

作为一个教牧，我们需要视教会受伤损为自己的伤痛。不要领袖分争；倒要防止分裂，寻求医治。不分昼夜，我们要设法弥补破口，使它不再扩张。我们不仅要谈说教会合一，而且要寻求合一，为此目标尽力。我们不但要寻求和睦，就是当它跑掉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心追赶和睦。

我们要谨守固有的原始基督教信仰，建立我们的根基，在原始的合一上面。要远避某些自高的人，扰乱分裂神的教会，还假作是改正错误，固守“真道”。当然，固守真道是很要紧的；但不要让人加上甚

么别的东西。

我们必须学习清楚分辨确定的和不确定的，基要的信仰和猜测的理论与解释。然后，我们可以清楚分辨信仰的要件，或仅是个人意见。教会的和平，在于共守的信仰，不在于个人的见解。

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性的神学为确据，看教会曾如何奋斗以保持信仰。我们也必须熟悉早期教父的著作，从他们更清楚的教导和解释得到益处。但这些都本身，都不是我们对神的爱和信仰的基本要件。有的人根本是异端，有的不过是溜嘴说错话，不应该混为一谈。某些人不自己去寻求了解事实，就把弟兄离弃了，是何等可悲！

我们要学习了解分争的基本理由，分析其究竟是出之于偏见，或是真正的差异。切不可把差异弄成更糟。不要跟弟兄争吵；宁可彼此同心，共同对真正的仇敌争战。

因此，教牧们彼此联合，友好团契，互通音问，是很重要的。要时常共同聚集，以促进合一。我们会发现，意见上容或有小异，但不会妨害团契的大同。

我们要尽量寻求和睦合一 [正如清教徒长老大会实行的]。不是要立法订规，辖制别人；却是要免除误会，互相协商，彼此建立。神的话命令我们相爱和团契。

如果所有教牧人员，都喜爱和睦，完全合一，而没有分门别类的心意，基督的教会，就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如此，海外的加尔文主义和弟兄会派的人，国内不同的宗派，就不会各怀异心，彼此倾轧。

他们持续的互存怨毒，只能帮助共同的仇敌；但那会阻碍教会的建立和健全。这是不该有的现象。

### 06a.AbrahamKuyper 凯柏(上)

牧师也有灵魂

新任的乡村教会牧师，去探访他的会友。

教会领袖中，有人先告诉他们的新牧师：“牧师，在这教会里，有几名‘不满分子’，他们给每一位牧者不少麻烦。他们有点儿怪，喜欢批评；有的好久都不来礼拜了。他们对教会经济上的贡献微不足道，也没有甚么社会地位。你可以像前任牧师一样，不要去理他们就算了。”

这几名不参加教会聚会的人中，有个女子，名叫佩蒂·巴勒特(Pietronella Baltus)，是磨坊主人的女儿，三十三岁了，仍然独身未嫁，禀性倔强。她跟几个同心的农民一起聚集，读读圣经，和几本宗教改革者所写的老旧书；有时，她宁愿单独敬拜，也不肯去参加教堂里的聚会。他们坚守起初的信仰，绝不妥协；认为那些心持两意，假冒为善的教牧，说些逢迎人的好话，却不能使灵魂饱足。灵魂无法在缺乏真理喂养下活着。

邻近的人告诉她，牧师在附近探访，也许不久就会来到她家。佩蒂决绝的回答：“我与那人毫无相干！”她的朋友说：“不过，佩蒂，不要忘记，我们的牧师也有一颗不灭的灵魂，他也往永恒里去！”

牧师来了。他觉得牧者有照管羊群的责任，不管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在见面的时候，佩蒂拒绝同牧师握手，因为她相信他们没有相交；是牧师坚持，她才同他握手：不是因为他是牧师，是因为同为人类。

但是，经过朋友的劝解，佩蒂的敌意基本上有些消除了。她用相当长的时间，同牧师谈论今世与永生的问题。她说到自己有永生的把握；并且劝勉牧师，必须确定有永生的盼望，否则将要永远失丧。牧师听的时间多，说的话少。分手的时候，他还要再来。

从不满足分子得满足

那新牧师是凯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

凯柏于 1837 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兰海边 Maassluis 牧师住宅中，父亲约翰凯柏(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里的牧师。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亚伯拉罕。他从小就爱海，对着浩瀚的海洋，充满了憧憬。他在加尔文派的熏陶下长大。

1849 年，约翰牧师应荷兰南部礼敦(Leiden)教会约请，作他们的牧师，举家迁往那里。亚伯拉罕凯柏就入了礼敦大学。

1862 年，九月二十日，凯柏还不到二十五岁，得了礼敦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学博士学位。1863 年七月一日，他同约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结了婚。新婚夫妇都来自城市，去位于荷兰西南部的乡村卑斯得(Beesd)，牧养他第一个乡村小教会。

八月九日上午，凯柏正式就任牧师，是由他父亲约翰凯柏牧师主持。那天晚上，他的就任讲章，经文是约翰壹书第一章 7 节。虽然是正统信仰的信息，但他在讲台上，持守道德上的诚实，只能讲说他自己所知所信的。他的会众大部分也都满足现状，不注重灵里深入的追求，对于这位神学博士很满意。问题仍然是“不满分子”。

他们倒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他们不满的，是牧师的正统信仰里，有一半自由派的思想。凯柏牧师觉得他们不是死气沉沉的会友。他们的圣经知识很丰富。他们注重属灵的事。他们的生活表现很有规律，而保持归正教会对世界的观点。他们不是谈论宗教，而是谦卑的见证圣经永恒的真理，以温柔敬畏的心，说明“心中盼望的缘由”。

凯柏同他们谈论，有时且是辩论。但他勤去探访他们，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师自然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他们拒绝了；并且坦白的说，前任牧师不传讲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这班简朴的农民知道真理？他们连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说圣经原文了。这感受仿佛是博学多识的亚波罗，握着亚居拉织帐棚粗糙的手，听他说是基督更认识。凯柏真的惊奇。

他们指示真理给他：神创造万有，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祂的荣耀。祂的主权统管万有。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荣耀神。

这是伟大的发现！大有学问的博士，竟作了卑微农民的学生。他不顾牧师的尊严，放弃了世界的虚骄，同他们谈论。他发现，从此以后，主日的讲坛自由释放得多了。

从那几个不满现状的人，所看见，所听见的，使凯柏对自己的生命作了深省。这转变时期的结果，是他经历了神“全然主权的恩典”。他没有不满他们，没有反对他们；反而谦卑的接近他们，想了解他们，从他们学习自己不知道的。十年后，他写道：

我没有定意反对他们，直到现在我仍然为了所作的选择

感谢神。他们不动摇的坚持，成了我心灵的福分，是我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却没有寻得和好的福音。他们用简朴的话，告诉我灵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方式：敬拜高举那位行作万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为要成全祂的美意。

凯柏常去跟那位农村女子佩蒂谈话，更深的受她归正信仰的影响。凯柏的父亲本是正统的归正派信仰，但趋向中和，成为一位传冲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师。凯柏受教育的礼敦大学，是有名的自由派学府；但他自己对加尔文思想认识颇深。不过，还是那位约比他年长七岁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属灵的母亲。她帮助启导凯柏，把知识转化为宗教经验，和神学的信念。他们在基督里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离开世界。佩蒂一直关心凯柏的事工；凯柏也一直感激纪念佩蒂。

在卑斯得乡村教会，四年的事奉，是凯柏最重要的准备时期。那几名归正信徒帮助他，从半正统，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进入光明，从游移浮荡而建立在坚实纯正的根基。在这根基上建造，发展，有超奇的成就。凯柏成为神学家，政治家，演说家，大学创立人，报刊主编，作家，教会改革家，领袖，组织家，旅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贵为首相，而在他始终是谦卑奉献虔诚的基督徒。历史记载，他是在荷兰混乱危难中神兴起的领袖，也是加尔文以后最杰出的领袖。

1867年，凯柏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会的约请，担任他们的牧师。

十一月三日，凯柏向他所爱的卑斯得教会作告别讲道。他选用的经题，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2节，主祷文中的第五项请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说：

“我现在感觉到良心的控告：我在自己还未全心悔改归向福音的时候，就胆敢到你们中间担任牧职；因此，使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分受我信仰动摇的困扰...现在请你们中间爱我的人，与我一同跪下，同我祷告，也为我祷告，求主赦免我的债。”

凯柏离开了那安静的乡村，可爱的会众，去省会悟垂克。他不是为了高薪厚俸，不是羡慕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而是去争战，为了神的荣耀。凯柏已经准备好了。

### 征文的神迹

礼敦大学的达扶立教授(Prof. Matthias De Vries)，兴奋的告诉凯柏，一项有奖征文比赛的消息；他并且坚定的对他的学生说，那是天造地设为了凯柏预备的，极力鼓励他参加。凯柏本就长于文学，既然教授对他信任，殷切的期望，他决定尽力以赴的一试。

教授不能制造天才，但可以引导他们的方向。达扶立就是这样一位关心学生的教授。他是卓越的荷兰

语文学者；他敏锐的觉察出凯柏是一名卓越的学生，这样，很快他们就成为亲密的知己，建立了特出的一生友谊。

发起征文的，是歌乐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题目是：对宗教改革者加尔文和拉司基处理当时教会问题方法的比较与评价。

凯柏积极的搜集资料。他很快的找到了加尔文的著作，放在房内的书桌上。但是，拉司基(Johannes A Lasco, aka. Jan Laski, 1499-1560)是个问题。其人是谁？其思想如何？

### 其人何人

首先，凯柏到礼敦大学图书馆。那里竟然找不到任何拉司基的著作。国内另外二所大学及神学院图书馆，也是如此。所能找到有关拉司基的资料，简略提到那位波兰的宗教改革者，所列他的著作有十六种；以后找到的资料，列有二十四种；但拉司基的作品，却连一册也没有！凯柏遍查法国，德国，英国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所列只有三四本。看来拉司基的作品，在三百多年的历史灰尘中消失了。

凯柏可以想象得到，所有想参加征文比赛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恐怕连出这题目的教授，情形也不能够好到哪里去。但只根据有限零星的资料，撷拾别人的评引，而没有看到拉司基本人的原始作品，了解他的思想，无法在学术上作合理的评价。衡情度理，最合逻辑的决定，该是放弃参赛的打算。

凯柏去见达扶立，把放弃努力的想法告诉他。那位热心的好朋友劝凯柏，不要急于作放弃的决定，还得试作最后努力：“凯柏，事情还没有那么绝望。我们这个好国家，有许多私人图书收藏。我父亲是哈伦(Haarlem)教会的牧师，有不少教会历史书籍，我建议你去找他；即使他没有拉司基的著作，也可以指引你哪里去找。”凯柏见达扶立的诚意，就动身北上，到了约二十哩外的哈伦牧师住宅。

白发的老牧师，很亲切的接待他。知道了凯柏的来意后，老牧师说：“凯柏，这是很好的一项工作。我很愿意帮你忙。我想，我没有拉司基的著作。我有一本门诺(Menno Simons)的小册子，讲到拉司基。至于他本人的著作，不，我想我一无所。不过，我不妨找找看。那要费些时间，这样吧，你一个礼拜后再来一趟。”凯柏早就料到会有如此结果。他并不感到失望；因为本来就没抱着希望。

不过，凯柏还是再次搭北上的火车，如约去了哈伦，只当是到林野作一个下午的消遣，调剂调剂枯燥的研读生活。

老牧师慈祥的欢迎他，进到屋里。然后，指着桌面上的一大堆书，以平淡的语调说：“看，凯柏！这是我所找到的。”说来好像是世界上最寻常的事。在那里的大书小册，几乎是拉思基全集。

这牧师书房出现的神迹，对于凯柏，好像是饥饿疲乏的旅人，在小店的点心盘里，发现吗哪。在所知的罕有图书目录里找不到的书，在各大图书馆找不到的书，似乎是绝版了，竟在这老牧师书房里出现！谁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 峰回路转

把全欧洲收藏最丰富的拉司基著作带回家里，凯柏望着那神赐的奇迹，心中充满了感恩。这使他深信，神的手引导着他的道路。

在自由派的礼敦大学，凯柏以最优等 Summa Cum Laude 毕业；在灵性上却陷入最低潮。进了神学院的

这两年来，凯柏久已不祷告了。他的心注重在学术；自由派的教授们，把诱人的酵注入他的思想里，使他把以往接受的正统信仰，丢在遗忘的角落里，以为是见不得人的过时旧衣。

在神学院里失去了神；在老牧师的书里，又找到了神。

凯柏欢欣，有了信心，几乎觉得有使命完成这项目标。在以后的八个月里，奉献为了论文比赛而研读，成了他主要的工作。结果，他用拉丁文写的论文，赢得了金质奖章。主持的穆陵教授(Prof. Muurling)，给予这位神学生和他的论文，无限的赞美。

1862年，凯柏征得歌乐宁根大学同意，把这篇论文修订增益，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1866年，在卑斯得教会，凯柏编订出版了拉司基全集，并且写了一百二十一页的“绪言”。

这猎书的经验，给凯柏极深的印象，成为他灵命转机的第一步。十二年之后，他写道：

寻得拉司基宝藏，是我参加论文比赛的关键。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介绍我去那里，但他自己对那藏书一无所知。

在一周之前，连那宝贝的物主，也只依稀记得拉司基的名字，却不能确定有没有那波兰宗教改革家的著作。如果有人想要真知道神迹的意义，必须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番艰苦挣扎，才会惊奇的发现。现在我这样说，仍有无限深的感恩敬拜感觉。那时，我的心受到强烈的感动，恢复了疏忽已久的祈祷感恩。我不能否认，那绝非老妇的故事，妄言“神的指头”。

这难以置信的经验，在我灵魂的深处，留下了持久的印痕。我每逢回忆这可纪念的事迹，想到神寻找拯救我的大爱，我的思绪常是回到神如何赐给我拉司基的著作。

加尔文和拉司基，两位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都是过世已久了，为甚么歌乐宁根那样的学府，会忽然对他们垂以青睐？

原来歌乐宁根大学，虽然早已趋向自由派，却以福音信仰自命。当时的荷兰，像在美国一样，流行反加尔文情绪，以为他太过严峻和狭窄。而出身波兰世家的拉司基，曾在流落英国的欧洲大陆宗教难民教会中工作，虽被反对的人称为“波兰之熊”，比较起来算是中庸能宽容。凯柏当然不会存心趋附，迎合时好，口笔与心相违背，在学术上是不诚实的；但以那二十三岁的青年当时的教育背景，不免受影响而有诚实的成见，也自然会持有类同的看法。

就这篇论文而论，在信仰和学术的观点上，都不免有些缺陷。但这研究的过程，对他有极大的益处。首先，使他在早年就对这二位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和功业，有深入彻底的认识。其次，这得书的神迹，使他转向谦卑感恩的属灵心态；以后，随着灵命的进深，对宗教改革也有多向度而深入的了解。同时，引起他透视并关注教会的问题。所以，这不仅是历史的兴趣，也使他想到此时此地的荷兰教会。神需要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社会的各层面，都有完全的主权，彰显祂的荣耀。谁想得到，这神迹不但

奇妙的影响了凯柏的一生，也影响荷兰全国，以至世界的神学界。

### 小挫的大益

获奖的欢欣过后，精神松弛下来，反映出凯柏精力损耗的严重程度。他完全崩溃了。他可能手拿着一本书，整个小时的坐在那里，连书名都读不进脑子里。他试着回复童年对船的憧憬，买了工具和材料，建造了一艘模型的船。那具体而微的小船，连细节都甚完备，却不能载他驶回童年的宁静。未婚妻很体贴他，为了逗他的趣，把她自己的名字“约安娜”绣了一面小旗，悬在船桅上。

医生建议他易地休养，以恢复健康。凯柏去到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科泊(Caub)，他未婚妻有几个朋友住在那里。在那新环境六个星期，他的健康恢复了很多。

这场病，前后约有十个月的时间。在恢复期间，凯柏读到一本宗教小说 The Heir of Redclyffe，是当时的英国小说作家容琪(Charlotte M Yonge)写的，一时曾脍炙人口，助长了牛津运动精神的发展。

这部长篇小说中，有两个性格相反的人物：腓利是世界成功的典型，聪颖，刚健，自信，善于谈吐周旋，在任何环境，都可说是适者生存；另一个是顾依，温和，仁爱，似乎是柔弱的人，关怀别人，而有信仰。当二人在一起的时候，腓利愿意处处占先，控制；顾依却是谦退，忍让。凯柏作为一个读者，完全与腓利认同。但到结束的时候，情形改变了。顾依在濒死时，现出温柔才是有约制的勇敢，死亡是得胜和永生。书中也表示，教会有母性的爱，照顾她所有儿女的脚步。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凯柏获神学博士(Th.D.)学位。他准备进入教会事奉。

### 旷野的呼声：教会改革

####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最大的港口都市，原来名字的旧拼法是 Amstrelredam，被称为“平安之母”(Mater Salem)。远自宗教改革时期，就有更正教信徒，因为受罗马教迫害，从欧洲各地来这里避难。因此，这城市传统上是更正教信仰，教会是国际化的，而且有影响力。到今天，更正教信徒，还纪念这个城市，而且爱这个城市；有些教会机构的大规模国际性会议，常在那里举行。

1870年，有教牧出缺。教区的选任委员会受命遴选；他们选任了凯柏博士(Dr. Abraham Kuyper)。

八月七日就任后，凯柏于八月十日，在阿姆斯特丹大座堂中，作第一次讲道，题目是“生根建造：教会是机体，也是建构”。经文为以弗所书第三章 17 节：“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根”，说明教会是有机体，自然的合一与和谐，要向下扎根，才会生长；“有基”，说明教会是建构，要在信仰上立基础，并且按照神的规制建造，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不止是基督徒，而且是归正的基督徒，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

凯柏个人与神有深密的交通，有坚定的信念，坚信圣经启示的真理，对圣经应用有整全的认识；因此，他传讲的信息，能够深入听众的心思，触动他们的情感，而影响他们的意志。他信息的中心，是教会的改革；他的话语带着生命力，注重实践在生活上；他言词中肯，而有深湛的灵智。

他不倦不息的推动教会的洁淨，由沉睡麻木而恢复生机，并且重新建造。他的目标和范围，不仅限于阿姆斯特丹一地一区，而是全国教会的改革。

## 信仰之争

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总人口为二十六万五千，其中荷兰教会会友约十四万名，包括男女和孩童，分属大小十四所教堂，其中一所是大座堂。教区议员成员一百三十六名，二十八名为教牧，其余是长老和执事。

在 1867 年时，教区议会大多数是由自由派（新派）人士控制；但选任委员会情形不同，组成分子都是保守派正统信仰。当然，遇有因辞职，退休，黜免，死亡，或因失障等原因离职造成空缺时，委员会只选任正统信仰的归正分子充任。教区的二十八名教牧中，多属自由派；他们虽然不是永任，但教区选任委员会无权革除他们，只能调任。其他长执则是常任成员。此后，自由派的长执离去了，正统信仰的成为多数。所以，在 1870 年的时候，他们能够聘任凯柏博士任牧职。

1872 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十七名长老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自此以后，他们将不参加凡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聚会或礼仪；特别拒绝接受自由派教牧主持的圣餐及圣礼。他们说，这不是造反，而是基于深深的宗教信念：我们是为了信仰。

这次信仰之战的导因，是在于对基督身体复活的意见。早在 1869 年，阿姆斯特丹区会正式宣布：在一切讲道中，不准否认或批评圣经中的神迹。但在 1871 年时，有个胡根祸兹牧师(Rev. P.H. Hugenholtz)，在复活节讲道，否认基督身体的复活。一位长老致函阿姆斯特丹区会，请求依法革除那牧师；区会依情转呈上级大会。大会却认为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义，教会法规并无明确的表明。这样，等于任凭他们讲论，并不采取任何纪律行动。因此，引起那十七长老宣言。并不是他们心地狭隘，不能容忍异见，而是要卫护教会的纯正，保守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

在自由派(新派)方面，也不肯就此罢休。他们鼓动了一千余名男会友，并二百四十五名女会友，签名表示抗议，显然声势壮大；于四月十七日，把档送交区会，文中称那十七位长老是“哗变”。

区议会随即于四月十八日召开特别会议，检阅双方文件，推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答复，提交区会讨论；委员会则委任凯柏为主稿人。凯柏义不容辞，接受了。

九月二十七日，区会特别会议接纳了委员会的文稿，并通过印发给全体会友。这样作的目的，是让信徒了解整个的事实经过，并让区会内外都知道，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信仰立场。结果是出了一本长达一百四十一页的小册子，录有双方全部来往档及全部签名，并对他们的抗议，逐一分析答复。凯柏笔下的文字，是客观的，心平气和，析理分明；用字遣词，完全温和有礼，无懈可击，却是毫不留情的把自由派的抗议驳得荡然无遗。对于这样的档，连自由派的人也佩服无已；虽然他们对于档的内容忿恨不满，但只能悻悻于心，而哑口无言。

战争的序幕，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只是表面的平息。荷兰教会内信仰的两股潮流，仍然存在，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一家自相纷争”的情形，仍然持续下去。

荷兰教会的信仰之争，到现在已显然可见：不是一地一事之争，而是仇敌撒但魔鬼有系统的诡计。新派的人，侵入了神学院的讲席，占领了学府，然后，他们的党徒，占据了国家教会的高位。

从新约教会开始以来，在施行洗礼仪式时，施洗者宣告：“我为你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但在 1870 年，国教总会受到了新神学派的压力，准许施洗者说：“归于信，望，爱”，或说他们认为适当的

语句。这标识着重大的改变。因为奉“父，子，圣灵的名”，是表明承认三一神的位格，也就是神的主权；但他们竟改为一项抽象的观念。换句话说，失去了信仰的主体。

这项措施，刺激了正统信仰的基督徒，有的且甚为激忿，认为是敌基督的手段；但一阵狂烈的反应过去了，依然没有甚么显著的效果。反应止此而已！而且总是等事情发生了才有所反应，终究不是办法。

### 改革的助力和阻力

自由派神学是一种神学上的异端，必须从神学的观点去了解，去批判；自由派神学造成教会问题，必须以健全教会的体制去防杜，去解决。

凯柏早就看到，对抗自由派神学，不能局限于讲坛上的教导。1871年三月十四日，凯柏在阿姆斯特丹开始了一系列的讲座，批判自由派神学，指出其虚假，空泛和贫穷。他指出，自由派神学不过是海市蜃楼，披上基督教的形象。以后，这讲座也推广到荷兰其他城市。

凯柏综括自由派的错误信仰，仿照“使徒信经”的字句，代他们制订了一个不信派的“信仰告白”，这样说：

我，现代主义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稣不是基督，不过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进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对的；罪得赦免不过是人发明出来的。我相信所有人类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类都能得救，而没有末后的审判。

至于自由派人士，他们宁愿阴谋经营，破坏教会的信仰，对于未经授权代劳的“告白”，非心所愿。不过，这个“信仰告白”，揭发了自由派神学的真面目，直指他们只是败坏的异端，使他们无所遁形；他们却又无从反驳，辩说自己并不是那样。同时，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谨防危险。当然，自由派对凯柏是恨之入骨了。

在最初的时候，凯柏几乎是孤军奋战，发出旷野的呼声。但既然是神学上的抗争，还是需要更多的凯柏，唤醒信徒，奋兴教会，成为坚强的阵营。因此，成立学府，训练神学生，作为教会的主干，这需要就愈来愈显明了。

至于改革教会的步骤，凯柏采取先纠合同志，成立团契，互相勉励，共同祷告。参与的人，必须信仰保守，纯正，重生归正，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绝无错误的启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也让祂在个人生命和生活上，有完全的主权；并且遵奉主的差遣，传扬福音；不但使个人得到救恩，还要进而为主征服社会和文化，让基督作王。为了这个目标，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首先是尽力从现存教会争取内部的改革；如果这个重建复兴的目标不能达到，就出去建立不属于国教的自由归正教会(“自由”的意思是“自主”，与“自由派”大为不同)。

凯柏有坚定的信念，从不怀疑他的观点，目标和行动，是正确的。他坚持，艰苦，孤单，忍耐，进展是缓慢的，但终于有了进展。

不过，最使人痛心的，是部分正统信仰的信徒：他们宁愿抱持寂静的敬虔，在家作循规蹈矩的基督徒，而过平安喜乐的生活，却不愿牵涉入信仰的战斗。他们多是重生的基督徒，却是活而不动，爱而不热，

甚而其中包括有名的敬虔领袖。他们不仅置身事外，而且对加尔文主义信仰心存畏惧，有时还加以批评攻击。这对教会改革的阻力和伤害，是难以想象的。

1886年，凯柏和七十五名教会领袖，不见容于荷兰国教会，遭受革除。申诉辩解，得不到结果。奋斗多年的改革，不仅走了许多个第二哩路，更走到了尽头。他们开始以“读经”的名义聚会，结集的同道越来越多，都以为国教会的腐败，已不堪救药。于是，有约十万信徒，二百个教会，正式脱离国教会，另组成荷兰改革宗大会。

实在说来，那时的荷兰国教会，并不尽是自由派(新派)，更远说不上无神主义。在其中，也有许多是信仰纯正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是国家教会，是以政治为前提，愿意把全国维系在一个宗教系统之下，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信仰。他们不曾有迫害教会的行动，也不曾限制他们身体的自由；但在政治上予以不方便，在法律上不给予非国教信徒应有的权利。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荷兰国教会算是好得多了；甚至比十七世纪的英国圣公会也好得多。荷兰的非国教基督徒，并不会因信仰而被监禁。简单说：他们的地位，是被容忍而不被承认。

## 自由大学

他们把他从我掳去，  
用他们所有的疑思，奇想，  
啊，我最爱的儿郎，  
曾经是深藏在我心上。

---勃朗思威(Bronsveld): "母亲的怨诉"

作者是一位牧师。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可能想到一个历史的事件。

约在1360年，鄂图曼帝国的牟拉德苏丹(Murad I)，向欧洲扩张。当时的基督教国家，或在自相杀伐，或同教皇斗争，结果是屡屡败给牟拉德。牟拉德掳去基督徒孩童，有时在他占领的地区征募，把这些少年人编成特种部队，精选人才来教导他们各种战术，战技，行政，学问，最重要的是彻底灌输回教的教义，成为优秀的精英干部，在宫廷事奉他。这种军队称为“占尼撒理”(Janissaries, 原为Yeni ceri)意思是“新军”。苏理曼(Suleiman)和以后的领袖们，也沿用这种办法。那些归信回教的少年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于土耳其苏丹，不惜与父兄为敌，以至杀死他们。

欧洲的学校原都是教会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于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纪，情况改变了。无神的人本主义，弥漫在思想界：反对宗教的乱民政治，不信神权能的生物理论，否认神权威的评经和自由派神学，把许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掳去了，离开了教会的怀抱。

在教会中，冰冷的教条主义者，以为抱持着教条，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仪式，当作了敬拜的内容。寂静的敬虔主义者，则以为教条无关重要，知识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个人得着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问题自然消失。他们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训，努力高举富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当作经典，却饮水而不思

源，忘记了敬虔运动来自司班耐创的哈礼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至于占人口多数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赚钱生活，把生活当作生命的目的；虽然也有宗教活动，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习惯的出入教堂，以为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连奉献金钱也当作是投资。

但仇敌在认真的加紧工作，连连的胜利，忙碌的收取战利品。乱民政治在法国得势，排除了宗教，还输出革命思想。人本主义则以人为万事的尺度，把神隔绝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则占领了神学的讲席，派遣他们的门徒，去侵入教会，学校。

一间一间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学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种各式的活动仍然继续着，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见了，主耶稣基督不再是尊荣的中心。

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时，他们也感觉到讲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们以为是自己余梦未醒；或以为教堂换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适应，久之也就安于现状，懒于去思想其变迁的原因。实在说来，总是少数领导多数；而领导的人，总是怕变迁的人，因为那等于失去了安全的领导地位。只有少数，微不足道的少数，注心于信仰的重要，他们想讲话，想行动；但可惜声音太小，没人注意。最后，他们只好黯然离去；教堂空出了几张椅子，但教堂的奉献收入没有显著减少，教牧的收入反随着年资而加增。

信徒离开了教会，信徒的孩子们不可能不受教育。他们进入了学校。但回到家里的时候，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出改变：他们不再渴慕属灵的事，在言谈之间，也表示对真道的怀疑。世俗的基督徒，对这种现象全不在意；他们只要孩子进好学校，读书成绩好，将来找到好职业，生活富裕，事业也满意。信仰吗？似乎没有甚么现金价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荣。因此，在他们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们，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警觉到孩子灵命的枯萎，死亡；由中学升入大学后，这种可怕的变化最显著。他们搜索心灵的省察：是作了甚么错事？是神离开了我们？他们呼求神，呼求神，恒切的呼求，但看不见显著的效果。啊！他们想到了少年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经历，在离家往异地求学的时候，如何被异教思想掳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现在实现在他们身上。有位敬虔的父亲，在神面前流泪呼求，求神叫他的儿子回转，否则叫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传播人本主义的思想，为害别人。这种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亲，在战争中为了对主效忠，为了责任，宁可忍着心，杀死成为“占尼撒理”的儿子！更可哀的，是自己当初无知，亲手把儿子送在掳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里，可以听到母亲的怨诉，为了被掳的儿子，向神哀哭：“他们掳去了我所爱的儿子！”但安慰在哪里？如何能使被掳者回归？

### 信仰的危机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结果，荷兰在信仰上成为改革宗，并且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成为反抗罗马教人士的避难地，是一片自由乐土。后来，又受法国辖制，直至十九世纪初，才脱离法国。虽然如此，在思想上却深受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影响，只在名义上仍是基督教国家。本来学校是由教会创办，由教会管理，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了教会服务；现在的情形是，教会和学校都由政府经营，由政府维持，当然也是为了政府服务。这是说，由反教会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会和学校。

1870 年的荷兰，全国约有四百万人口，有三所大学：礼敦大学，歌乐宁根大学，悟垂克大学。当时，只有这三所大学是政府所承认的；他们也各有其神学院。所授的专业学位，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和神学学位，获得政府许可。无疑的，在这几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获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问题是他们的信仰。许多青年人，包括牧师的儿子凯柏，进入大学之门，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义，只是物质的享受，他们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学术知识的追求，他们是达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并不限于今世，而还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堕落开始了，会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凯柏毕业了，进入了教会事奉，经过了漫长的摸索，艰难的挣扎，仰赖神的恩典，才获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两所大学，却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学院依然都存在；不过，只剩下了空壳，内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蚀窃据。系统神学没有了，变成了宗教研究；实用神学课程也取消了；圣经不再被认为神的话的权威；基督教只是许多宗教的一种，虽然他们仍以为是较高级的宗教。

如此以来，高等教育的沦陷，不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机，使他们迷失；更失去了供应教牧人员的训练基地，使教会没有从神来的信息，使神的言语稀少，造成教会荒凉，延而影响将来临的世代。关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预见到可忧的后果，认识这是根本的问题，尽量的想办法，努力求取救济。

#### 06b.AbrahamKuyper 凯柏(下)

将人的心意夺回

教育，教育，是信仰的开端，是教会的根本。因此，不仅要防止信徒子弟，被引诱入不信和反抗神的文化，不仅要使被掳的归回，还要进而装备圣徒，使他们能作基督的精兵，“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它都归服基督”（林后一〇：5）。

荷兰独立以后，是君主立宪政体。早在 1848 年的宪法，就明文规定高等教育的自由。不过，当时的教会人士，没有觉悟到创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需要；原因是理性主义者，正假借科学的美名，渗透各学府；神学的自由主义，也趁着理性主义的风势，披上科学的外衣，反抗神的权威。在教会里面，敬虔主义的余波仍在。他们认为个人的救恩经验是最要紧的，得救后的工作，则在于保持与神的关系，并活出敬虔道德的生活。当然，这是重要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太强调个人经验，以为神学教条可以忽略，更进而反理性，反知识，几于到以无知世事为美德的地步。这样，不信的人顺利的占领了教育的领域。至于宪法对于高等教育虽有自由的明文，但没有规定，在甚么条件之下，才可以创立高等教育机构。等到信徒觉悟有此需要时，所遭遇的正是立法与实施的双重难题。

有一段长时期，大家在讨论，争议。1876 年，国会通过了“欣斯克高等教育法案”（Keemskerk Law）。从各方面看，那不是完美的理想法案。因为法案规定：私人或合法团体可以创立大学；但非国立大学的各科毕业生，必须再通过国立大学的考试，以甄定确认他们的学位和证书，才可以获得专业资格，不管他们的学术水准多么高超。在另一方面，有了专业资格是一回事，但不等于安排就业；福音派非国立教会的神学毕业生，也不确定能为教会所接受。至于经济方面，并不能获得政府的任何资助。

这也就是说，像教会或私立的中等以下学校，虽可以自由兴学，但学生必须先纳税付足邻舍的教育费用，再负担自己的教育费用，结果还是次等的地位。

其他规定的条件是，非公立大学，必须筹有一定数额的基金；有合格的教员；必须具有五个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自然科学院，和神学院，才可称为大学(University)。至于考试，颁发学位等条件，与国立大学相同。

虽然，距理想尚远，希望之门总算开了一条缝，只是不够宽广。

### 根基与原则

在1878年十二月五日，改革宗信仰高等教育建立会(Th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s)在悟垂克成立。次年二月，获得皇家认可立案。于1879年六月四日，选出四名董事，并四名信托人，正式进行大学的筹备事宜。

校名：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意思是不受政府和国教教会约制的私立大学。

宗旨：持守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信仰，不与自由主义(不信派)妥协，造就尊基督为主的专业知识分子，在各个生活领域，使主的名得荣耀。

当正在进行筹画的时候，试探来了。一位元知名的国教教牧传出消息，凯柏博士和另一同工洛哲斯博士(Dr. F.L. Rutgers)被提名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系统神学和实用神学教授。他们觉得，如果去为自由派的大学效劳，是叛离改革宗信仰原则，所以断然拒绝了。他们放弃了荣誉，厚俸，安定的职位，宁愿选择艰难而不确定的窄路。

凯柏和他的同工们，在他们的先锋报(De Heraut)上，刚一发布筹办大学的消息，质疑和批评，以至反对的信件，就大批涌来。有的问：在我们这小国家，现有的大学难道不够？何必再办一所大学？有的怀疑：如此大学，没有雄厚的财源，怎能够持久？有的诋斥办一所狭隘加尔文信仰的大学，是破坏国家团结，迹同叛国。而自由派神学人士，则是深痛恶绝，咬牙切齿，极不愿见到一所信仰纯正的高等学府成立，如灯光照入黑暗，见证他们的不是。也有人对新大学的学术水准表示怀疑，不肯参与。还有人讥讽，说是凯柏的愚蠢。

### 成功在严

像基甸选择他的精兵一样，凯柏不怕人少。

1880年九月十日，他发表了一个原则性的小册子，题目是“严格说来”。里面宣告了三个原则：一. 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二. 严格采取科学治学；三. 严格认真办事。

坦白说，办一所大学，需要的是：财源，教员，学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实际的筹备重任，多半落在凯柏和洛哲斯二人身上。这实在是信心的考验。他们都不是家财丰裕，但必须率先投入这艰巨的事工。从1879年十一月九日，董事会通过他们二人为自由大学神学院教授，到正式开学期间，在不同的城市，各样的团体，作推动的工作。校址定在阿姆斯特丹市。

1880年十月二十日，是自由大学正式开学的日期。

十月十九日，开学日前夕，在阿姆斯特丹的抗罗宗座堂，举行祈祷奉献典礼。这标识着在主的事工上，

先要仰望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人血肉的膀臂。那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奉献甚么呢？先要奉献的，是作主事工的人，和他们的心志。浩德莫克博士(Dr. Hoedemaker)致奉献辞，经文取自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 19 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以色列人制造刀枪’！”这真是一个适切的题目，精警的观察。正如当年非利士人想控制科技知识，使以色列人没有用以反抗的装备，而屈服在奴役之下；今世之子仍然聪明厉害，他们要控制教育，控制思想，夺取教会和圣徒的装备，使他们不能传布福音，拓展主的国度。现在，教会觉醒的时候到了，圣徒们要起而从仇敌手中，取回军器供应，取回教育的主权。

### 大学从小开始

1880 年十月二十日，荷兰改革宗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凯柏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他们共同的理想实现了：

自由大学诞生了。

那天下午，真是群贤毕集，表现改革宗圣徒志同道合的表现行动，表现他们对于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实在说来，这伟大的结集，就是一项教育，就是一个宣言。

自由大学的财源哪里来？苏特悟(Jonkheer P.J. Elout van Soeterwoude)作了一个简单愉快的致辞，呈献了十万盾荷币，作为政府规定的开办费。一项有价值的事工，必须有人认知这事工的价值，认为值得尽量予以道义上和资源的支持。以后的经费，要凭信心仰望神感动属祂有识之士的供应。这仿佛是一项互信之约。

自由大学的教授哪里来？董事会主席何畏(Mr. W. Hovy)宣布聘任五位教授：凯柏，洛哲斯，浩德莫克为神学教授；法必猷(Mr. D.P.D. Fabius)为法学教授；狄卢(Dr. F.W.J. Diloo)为文学教授。

然后，风琴奏出信心昂扬的“以利亚”曲调，由大学创办人凯柏博士致动人的开幕辞：“神在任生活范畴中的主权”，揭示了改革宗信仰的特点，扬起了自由大学真理的旌旗。

自由大学的学生哪里来？在开学那天，共有五名学生，都是为了维护真理，忠于真理，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介怀自己的前途，被神呼召来到这里。

他们没有自己的校舍。五位教授，五名学生，借阿姆斯特丹苏格兰宣教会上课。但他们极为严肃认真，知道是为了事奉主而作的。

第二天早晨，教授们发现在教堂的门上，有粉笔写的正楷大字：

一入此门全绝希望

原是但丁名著神曲中，地狱门上铭刻的字(见 Dante Alighieri : The Divine Comedy, Canto III)。是谁恶作剧的写在那里，作为对他们的嘲讽。擦去了；第二天又写上。但对于出入此门的师生来说，那毋宁是一个激励，一项歌颂：他们敢于为主而冒险，弃绝一切属世的希望，只求主的荣耀，为了真理。这是何等的见证！

1884 年，董事会买下了一幢雄伟的四层楼建筑。自由大学总算有了自己的校校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建校十年之后，在 1890 年，自由大学仍在艰苦挣扎中。经济上仍然困窘，没有足够的发展基金，仍然没有达到学术上的光荣成就，仍然没有全国性的声誉。

虽然艰苦，仍然前进。师生们与董事会合作，坚持信心和牺牲奉献的精神，不畏反对和拦阻。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国立大学同等的待遇。有时，向国家教会商量，借教堂作大规模的聚会，也遭到拒绝。

在暴风雨中，这棵信心的幼苗，在茁长，壮大。学生数目达到约九十名；而那时，三所国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合起来也仅仅有一千八百名。

到 1920 年，凯柏离世的时候，自由大学有学生二千名以上，教员二百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同国立的大大学相提并论。

1980 年，是建校一百周年，自由大学已经列名世界著名大学之林；有教员六百余，全时间学生一万二千名以上，图书馆藏书六十余万册。

凯柏凭信心种下的种子，发展长大了。芥子成了树。

### 文将凯柏

"文将"？这个名词，可能听过的人不多。一般人只说武将，是将帅军伍，领兵打仗。但在属灵的战争中，不是用血气的兵器，而是思想的战争。凯柏博士在领导信仰的战争上，用的是文字，所以称之为文将。

1869 年的时候，凯柏还在悟垂克牧会，史维思博士(Dr. C Schwarz)代表前锋报(De Heraut)，来约请凯柏为副总编辑。前锋报是荷兰全国性的综合周刊，半宗教性，半政治性。史维思任总编辑。凯柏一向坚信文字的功效，以为可以启发教育读者，宣扬教会改革的信念，就慨然接受了。十月八日的那期，刊载了凯柏的第一篇文章。以后，就经常有凯柏的作品发表。

1870 年八月二十五日，凯柏到阿姆斯特丹就任牧职。刚过二星期，前锋报总编辑史维思博士猝然逝世。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凯柏只得答应发行人请求，暂摄总编辑，到年底为止。在十二月三十日，是前锋报发行第二十一年的最后一期，凯柏特地撰文纪念史维思的生平与事工。

在那年的末后几个月里，凯柏发起组织前锋社。只有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并以圣经为个人和国家生命根基的人，才可成为社员。宗旨是传播归正宗同一的宗教及政治观点。他们决定买下前锋报，于 1871 年一月起改组发行；由凯柏博士为总编辑。在首页刊头，揭橥该刊的宗旨：

"为了自由国土上的自由教会与自由学校"

第一期于 1871 年一月六日发行。凯柏负担起这项额外的工作，使他得以有公开的讲坛，每周可以向读者讲话。他的影响力，也更加广大而深远。

### 同心的战友

1869 年五月，在悟垂克时，全国基督徒教育协会在那里开会，凯柏结识了葛瑞恩(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二人一见投契。葛瑞恩是研究历史的基督徒学者，见到法国大革命的暴乱和流血，知道病根祸阶，正在于他们所标榜的"无神无主"。他的深思远见，使他知道，为免蹈于同样的暴乱，荷兰需要的是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让基督在个人生命与国家文化的每一部分作王。凯柏多年深研加尔文主

义的结果，也达到同样的结论。他们所需要的，是把这信念广传出去。

马丁路德曾说：“除了救恩以外，神给人最大的恩赐是印刷机。”他也善用了印刷机，传播神的信息，成就了宗教改革的伟大事绩。

凯柏也认识印刷机是神给人的恩赐。他看到那恶者使用印刷机的武器，推广各种邪说，主义，散播思想毒素，反对荷兰基督徒历来视为神圣的原则，攻击正统信仰；基督徒岂应因循迟疑？何不夺回神所赐的武器，用以传播真理？因此，凯柏决意荷兰的基督徒，该有自己的日报。

### 展开真理的旌旗

当然，创立一份日报，经营维持一份日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比周报困难得多了。凯柏反复思量，研究，与同志讨论，集思广益，详慎计画。他提议拥有前锋报的前锋社，创办一份日报，名为旌旗报(De Standaard)，为真理扬起旌旗。以后，前锋报将不再独立发行，而成为旌旗报每星期六的宗教增刊；凯柏则兼为日报及宗教周刊的总编辑。凯柏的健笔是大家见过的，也是读者称道及信任的；他有主编前锋周报的经验，组织与治事的长才，完美周详的计画，大家都寄以信心。

旌旗报创刊号于1872年四月一日问世。那一天，是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Orange)领导荷兰独立反抗西班牙主要战役胜利三百周年纪念(八十年战争1568-1648)，极富爱国意义。

在举国庆祝中，旌旗报出版了。这是另一次改革宗教信仰的战争，要把荷兰从邪恶信仰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心意夺回归向基督。凯柏坚信，神启示的宝贵圣经，不仅是指引人天堂之路，也是照亮人生的每一部分，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

凯柏的中心思想，是“神的绝对主权”。他一生常常这样说。这简单的话，也支配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动方针，真可说是念兹在兹。他到处宣扬的，也是这个原则。这是加尔文主义的中心思想：以基督为中心，一切都是为荣耀祂，享受祂。

1873年十一月，凯柏在悟垂克发表一篇重要演说，题目是：“加尔文主义：我们基本宪法自由的源始和保证”。后来这篇荷兰的反思，于1874年五月二十日，印成单行本小册发行，一个月后即行再版，可见其是如何的受到重视。

大意说：瑞士，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是加尔文思想孕育和发展塑造的。最伟大的自由国家美国，是由清教徒创建的。清教徒的精神动力，是英国的加尔文主义信仰。英国清教徒的独立斗争信念，是法国胡格诺复原教派的启发与延续。这些伟大运动的基本思想，都是源于崇高的加尔文主义，是自由成长发展的动力。由于凯柏博览群书，他繁征博引，说明这个历史观点。

1883年，凯柏写了一本书：教会归正的途径。凯柏分析教会为四类：一. 真教会；二. 半路的归正教会；三. 完全归正教会；四. 假教会。他指出，连天主教也不是彻底背道的假教会，只有将来撒但完全掌权的组织才是假教会；但教会必须儆醒，洁淨，防备不信圣经的假教师；并积极建立，持守纯正的信仰，信守神启示的圣经，以恢复成归正的教会。

### 争战的呼喊

1886年，凯柏连续发表了三个小册子，用的是同一个标题：争战临到了。在那里，他宣称：荷兰归正

教会“被掳七十年”--1816至1886年。甚么是“被掳”？凯柏指的是荷兰国王威廉，在1816年下诏宣称他自己是教会的立法者，教会变成了国家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是自由主义信仰者，渗透教会的时候。现在，像但以理读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一样，他认为以色列被掳的七十年满了(参但九：2)，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满了，神的子民应该起来重建耶路撒冷。

争战的起因，是为了信仰。阿姆斯特丹区会，虽然大部分是归正信仰的教会，但仍有三名自由派信仰的教牧，在那里为难。而上级大会则支持自由派(新派)教牧。为了接纳信仰有问题的人成为正式会员，导致了正式冲突，而至大部分正统信仰的教会退出国家教会。在这场争战中，凯柏靠着圣灵的大能力，运用他的健笔，陈明真理。

在1897年四月一日，旌旗报创刊二十五周年，凯柏正六十岁。荷兰全国各界纷纷致贺，并为凯柏出纪念专刊。旌旗报虽然不是最大的日报，但因为立论公正，见地精深明确，极得各界推重。连天主教的著名报人索普曼博士(Dr. Hermanus Schaepman)，也撰文称颂他是“我们最伟大的报人”。

凯柏的文字，有其独特的风格，雄辩，庄严，明晰，而不失其生动，说理清楚动人，用词恰切，深入而流畅。

#### 健笔不息

他每天早晨起来灵修，然后从事写作。在书房中的时候，不许人干扰。他为旌旗报写全版的社论，还要为前锋周刊写评介，有关教会事工的论文；每日上午，他写默思录。默思录专栏是有系统的写作，后来集成两帙出版，名为与神亲近，很多人喜爱，用助灵修。分刊多年的为基督我们的王(Pro Rege)，则成为三巨册出版的书。另外，他还要写专题的研究，专文，小册，和演说稿。他历年的演说稿，先后辑为许多巨册。卷帙浩繁的巨著神学百科全书，是改革主义的权威作品，也是如此积渐写成的。此外，在有意义的纪念节日，他都撰文；遇到特殊事件，也发表文章；还有神学的讲义和专著多种。他治学博大精深，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亲自撰写，从不像一般不学有术的政客，要别人捉刀代笔。

凯柏相信，作为新闻工作者，必须事先从容有备，绝不在时间压力之下，急就应付。

从创刊以来，凯柏持续为旌旗报和前锋周刊撰写文稿，并且亲自校阅最后稿样；只有1901至1905年在首相任内，由别人代为负责，但他仍然自己撰写默思录。直到八十三岁生日前的一个多月，1920年九月二十四日，最后一校次改前锋周刊的终稿。一个半月后，十一月八日，凯柏离开了世界。

#### 良牧良相：由讲坛到政坛

凯柏对加尔文主义发生兴趣，长久的继续深入研究思考，使他发现那不是一种空泛的理论，而是最具系统，合理性的，有动力的信仰；在庄严谨密的结构后面，是要求人接受基督的全面主权。这自然影响了他的的人生观，使他整个的思想系统，起了极大的转变。

神奇妙的拣选了凯柏，引导他，造就他，使他的生命走在正确的方向；先有了归正的重生经历，然后进而改变世界，给文化和社会以新生。

#### 接棒有人

1869年，全国基督教教育协会在悟垂克开会，会期为五月十九至二十日。五月十八日晚，凯柏应邀发表预备会演讲，题目是：“向国家良心的呼吁”。

他说：“在相同信念的人中间，我们的运动进展，是显然可见的，因为我们的力量，在于唤起国人的良心。”

在座有一位是协会的荣誉主席葛瑞恩。这几句开始的话，进入他的耳中，引起了心灵的共鸣。那位老人已经是六十九岁了，他几乎是孤军奋斗，作旷野的呼声；三十多年来的希望，就是国人良知的觉醒。今天总算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动人的演说中，凯柏说到国魂和使命，宗教的自由，良心的自由，并学校教育的自由。凯柏在台上所讲的，一字一句，都仿佛是天降的甘露，滋润着那位老战士枯萎的心。多少年来，他所要作的，就是唤醒国人的良心，但始终未能如愿。今天，他发现自己所缺乏的，在眼前这年轻人的身上找到了：他认定凯柏是能够振奋国人的领袖。像年老的西面，在殿中见到婴孩耶稣一样，葛瑞恩感谢神，心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励。

葛瑞恩出身海牙的望族，家道丰富；礼敦大学毕业。他是有名的基督教历史学者，政治领袖。1830年，葛瑞恩接受了加尔文信仰。此后，他的政治哲学，就完全建立在加尔文信仰上面。

他研究法国流血暴乱的革命历史，知道他们所倡言“没有神，没有主人”，那种所谓平等自由的革命，实在是造反，实在是背叛神，背叛创造并管理宇宙万有的至高主宰。葛瑞恩看到：即使在一般情形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偏行己路，随从己意妄行，不遵守神的话和祂的定命，也就是背叛神，反对神的主权。因此，他认为当循的途径，是“高举福音，反对革命”。只有高举神的话，扬起真理的旗帜，遵守主的道，才是拨乱反正的道路，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方法。这种基督化的政治思想，在荷兰当时是完全创新的，是理想化的。

葛瑞恩主张，回到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归正或改革宗的信仰。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倡组了一个政党，名叫“反革命党” (Anti-revolutionary Party)。这个名字，现在如果望文生义，听来有些迂腐可笑，甚至有不好的涵义；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可以代表他的信念：反对法国式革命的暴乱，那不仅是一个保守的政党，而是保守的基督教政党。

“革命” (Revolution) 这个字，本来是说明天体运行的现象；中文译为“革命”，是取自易经“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先已寓有褒意。这样，反革命变成了倒行逆施，反天道而行。但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对于法国无法无天的恐怖统治，记忆犹新，缺乏好的印象。不过，研究法国革命的背景，那时的皇室和教会，确是腐败黑暗，专制而浪费，不顾人民死活，成为促成暴力革命的条件，人民以和平方式求平等而不可得，才起而暴力夺权，结果酿成流血争取。

但那条血路，是错误的路，更不是唯一的路。有另外一条各各他的血路，是神子主耶稣基督所开的，使人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可以解决社会的问题。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造成了贫富不均，道德的坠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期病征，极为显著。幸而有神及时兴起威特腓 (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及卫斯理兄弟 (John Wesley, 1703-1791; Charles, 1707-1788)，传播福音。神的大能，改变了文化，拯救了一个没有希望的世代，免于流血恐怖之惨祸。十九世纪的英国，仍然有社会病患问题存在。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 的资本论，是在英国

工业发展转型的阵痛中，在伦敦写的；但他所期望的阶级斗争，并后来的人间天堂生活，并未在任何地方实现。惟有神的真理，是人类的希望，是解决罪恶及社会病弊的方法。

葛瑞恩和凯柏都深知，国家教会是酿成腐败的因素。在法国，在英国，都存在着教阶官僚的病弊；荷兰也在1816年，建立了同样的制度。更不幸的是，十九世纪是自由派(新派)信仰兴起的时候。这种信仰，一旦侵入僵化淤滞的宗教机构，正是其寄生滋蔓的机会，而且不易清除。因此，需要有自由教会(即自立或在国教系统外的独立教会)，不受国家教会的辖制和感染，并有自由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包括神学院，以传递纯正的福音信仰。

葛瑞恩德政治理想，远见和原则，都是正确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学者，不是群众领袖。他典雅的学术气味的写作，可以获得知识分子的激赏和尊敬，无奈不能达到群众，说服广大的基层人民；他也缺乏组织力和领导才能。因了这个弱点。葛瑞恩在荷兰政坛有“无军之将”的雅号。事实上，这说法也并不是完全正确。虽然他一生走的是孤单的道路，他的少数党，在选举中也获得过六七个国会席位。随着时间的进展，葛瑞恩的写作，形成了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纲领。

1869年五月的那次会晤，对于葛瑞恩和凯柏，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凯柏后来写道：“1869年五月十八日，那个难忘的晚上，在悟垂克大教堂，我第一次与他晤面。他坚定的眼神，真诚的言词，立刻得了我的心，给我极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成了他属灵的同工；不仅如此，他属灵的儿子。”

那年六月二十三日，凯柏参加了悟垂克的“反革命选民俱乐部”。以后，二人书信往来甚密，建立了深挚的友谊，互相了解，并且同心合意，并肩作战。

葛瑞恩回到海牙的家中，心里充满了感恩。他发现了理想的“继承人”。仅仅相识一百天之后，葛瑞恩在九月一日的公开档中，指定未满三十二岁的凯柏，是反革命政党的未来领袖。

### 壁垒分明

政治上的保守派，并不等于信仰上的保守派。葛瑞恩的反革命党，在国会中的几个议席，本来是依附于占较多席位的保守党；后来渐渐发现，保守党同他们的合作，不过是利用他们，以促进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如果长此以往，以小事大，仰人鼻息，不仅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目标永远无法实现，还会被人吸收消化。

1871年的国会选举，葛瑞恩面临抉择。起初，他踌躇难决；后来，毅然采取行动：不仅同保守党决裂，为了原则，也不得不牺牲友谊。

葛瑞恩的口号是：“孤立中有力量”。他的意思，不是寂静的孤立，而是坚持原则，不怕孤单，近于圣经原则的分别出来，不怕表现与众不同，独立特异，持守自己的立场。他近于极端的作法，是放弃支持本党的所有现任议员，而提名三位新候选人：凯柏牧师，和一位法学家，一位学校的校长。这可以显明他着眼的重点：教会，政治，教育的总体改革。

凯柏在教牧及前锋报总编辑的职任之外，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但选举结果，反革命政党三名候选人全部落选。初试竞选的失意，并没有使凯柏灰心。跟几位同志检讨的结果，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宣传工具，政见得不到选民了解，和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得不着足够的选票。

1872年，旌旗日报组成出版了，他们的政党有了喉舌。全国性的提名大会，还是在1871年才由凯柏开

始的，难得到满意的成绩，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1873年，又是选举年。凯柏任全国初选大会的主席。这次是自由派获胜。凯柏在荷兰南部高达(Gouda)地区的初选获胜；但在总选中再度落败。不过，这次选举，反革命政党共得了一万二千票，比前年跃增了275%，使大家刮目相看。

1874年，在高达地区中期选举，凯柏当选了国会下院的议员。当选总比落选好，该是件可喜的事。不过，当选比落选困难，必须面临抉择；因为宪法第九十一条明文规定：“国会议员不得任教牧”。他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

写给葛瑞恩的信中，凯柏说：他在经验“灵魂的等待”；他必须得到主特别的指示，才作出决定：“绝不违背神的旨意行事，以致背离神的道路”。

在讲坛上宣扬教导，从内部改革教会，是他的呼召。但在另一方面，怎能辜负高达地区选民的付托与期望？基督岂不曾吩咐祂的门徒作“世上的盐”吗？凯柏自己迫切祷告，也请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会众，在聚会中祷告。最后的决定是向大会申请光荣退休。大会批准了。于1874年进入国会。

凯柏并不曾忘记他在教会的事奉，因为那是他全心奉献，全灵关注的。他保留在阿姆斯特丹教区，被选为教会的长老。他继续为前锋周刊写论评及灵修文稿，积极倡导教会内部的改革。从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观点，一切正当事业，都是神的呼召，都是事奉神；神的旨意必须行在人生和文化的每一部门，让神掌权并得着荣耀。国会是另一块神的禾田，也需要工人去工作。

一个教牧出身，奉行神的旨意，重原则，讲道德的人，能够与狡猾的政客们周旋吗？凯柏自然不会不知道，“羊进入狼群中间”的危险。在教会，是与进入羊群的豺狼争战，要卫护主宝血买来的羊群。在国会，是羊入狼群，要有更大的勇气，用更多的智慧和技巧。

凯柏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动人的辩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熟习神的话，从其中汲取基督徒的法则，对当世的社会问题，教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等，他都从基督徒伦理和圣经观点，决定自己的立场，寻求解决的方法。

### 圣经真理和良知

凯柏不赞成血腥的革命，暴力的斗争；但他反对当时资本家贪得无厌的剥削，殖民地主义者不人道的压榨。他极力主张社会正义。

凯柏绝不是奴颜婢膝巴结资本家的人。他建议特别立法，保持社会正义。他认为满有怜悯的主耶稣，绝不会对被压榨的人群视而不见。在下议院中，他打开袖珍圣经，朗诵雅各书第五章：“嘻！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接着说：“如果这是我说的话，在你们耳中听来会是过激，是革命，会予以拒绝。但这是主的使徒写的。你们能口里承认基督，而对劳工的哀诉置之不顾，不同他们站在一边？”

凯柏也反对当时欧洲的童工问题。“七岁的孩子们，要每周六天工作八十五，甚至八十七小时。这种不人道的恶行是那么严重，我知道，有五六岁的孩子，从睡中被摇醒过来，头上浇冷水，然后送到工厂去工作！”

他这样直言，不管别人诬指他助长阶级革命。他以基督的心为心，本乎圣经真理和良知发言。

他反对荷兰对殖民地的经济压榨。那个时代，是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经营东印度公司，作鸦片，走私，并掀起最不光荣的鸦片战争的时代，那是炮舰外交，公义不彰的时代；凯柏不管自己的言论多么不合时宜，不管政治路线的“正确”，而反对鸦片贸易。他强调：荷兰对于印尼等殖民地，有道义的责任，应该使他们基督化，并扶持他们走上独立。如果有人以为他不够爱国，那是因为他更爱神的国，更爱真理。他确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在教育方面，他主张自由教育：不属国家和国教会控制，而由家长督导。凯柏认为：政府可以立法管理学校的标准和规范，检定教员合格证书，可以督导教学。但政府也有责任，对学校在经济上支持，使贫苦儿童也能就学，而由他们的家长，作良心上的自由选择，送孩子去公立或非公立学校。

凯柏这颗政坛的新星，在国会闪耀的光芒，引起国人的注意和期望。

### 沉默

凯柏竭力的鞭策自己，夜以继日，以超人的精力工作。

1875年，又是选举年，葛瑞恩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让凯柏指麾运筹，他自己则退而以其残年作历史研究著述。凯柏筹画，奔走，写演说稿，写论评，忙个不休。

到1876年二月，凯柏精力衰竭，完全崩溃了。在那段时期，他思想成了一片空白，连一张明信片也写不来。医生建议他离开荷兰，彻底休养。凯柏夫妇卖去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十五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在瑞士和义大利，并有些时间在法国南部的尼西。耗费巨大，恢复却缓慢。到1877年五月，才完全康复，回到荷兰。那时，他快迈向四十岁了。在凯柏离国休养期间，法学家乐门(Mr. A.F. de Savornin Lohman)暂为摄理前锋报编辑；浩德莫克则负责星期六的宗教增刊。

这是凯柏灵魂安息与苏醒的时期。他经历了人的完全败坏和脆弱，神的全然恩典，神的话全然真实。他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全然的倚靠主。

### 新局面

当凯柏返抵国门，新选举的结果，政府已换成自由派的天下。反革命党则失去了创立人葛瑞恩，大家都瞩目凯柏，期待他作他们天赐的最高统帅。

果然不负众望，1879年选举，反革命党赢得国会下院十一席；应当归功于凯柏的领导。但他虽是党魁，却没有国会的席位，未能有效的指挥运作。

在这期间，凯柏的自由大学成立了。教会改革的斗争，则受到挫折，而不得不退出国教会，另组成改革宗教会。

1880年，曙光初现。在国会下院八十六议席中，左派占49席，右派37席(包括反革命党和天主教)；如果情势继续改善，成为多数党执政的希望，已是指日可期。

葛瑞恩早就着眼于“加尔文派与天主教合作”的可能，以击败自由派政党。现在，局势很明显：合则两利，分则俱伤！

凯柏起初不能同意合作的意图。但深思熟虑之下，觉得是唯一实际可行的安排。同时，达成谅解：两党各自保持其原有组织与名号；两党各自决定所支持的议案；不涉及信仰上的联合。凯柏说服其本党

人员，明了这样合作的意义和必要。

1888年的选举，反革命政党获28席，天主教党26席；左联则共46席。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反革命政党和天主教的右联政府成立，麦恺(Mr. Baron Mackay)任首相。三年四个月之后，于1891年八月的选举，又换了自由派当权的局面。

### 重返国会议坛

凯柏是反革命政党的领袖，自由大学的创立人和教授；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前锋报总编辑的工作上。但为了更有效的直接如意的领导国会政治运作，朋友劝促他重回到国会议坛。

1894年，凯柏再度当选国会下院议员。在议会中，凯柏显明是杰出的领袖，在重要的议案提出时，总会听到他的声音和雄辩，也成为荷兰全国良心的指针。每当他和反革命阵线的朋友乐门，及天主教党的索普曼博士三人发言的时候，咖啡厅座位都空了，议员席全满，旁听席和走廊上都挤满了聚精会神的人，总是有很多人不能进入。右翼的声势大振，执政的时机接近了。

1901年开始了新世纪。那年的选举，右翼联合阵线获得胜利：右翼联合阵线58席，左翼共得42席。1901年八月一日，凯柏众望所归，成为首相。

### 首相凯柏

那时，英国在南非进行残酷的波尔战争(Boer War)。在南非，有一些荷兰移民或胡格诺与非洲人混血的“波尔”人，荷兰语文是“农民”的意思。现称亚非利加拿人(Afrikaners)。在十九世纪初，南非成为英殖民地。1860年代，发现了丰富的黄金和钻石矿藏。洛兹(Cecil Rhodes)取得帝璧尔(De Beers)公司，成为垄断世界市场的集团，维持钻石市场高价，并收占矿区。波尔人“怀璧其罪”，被镇压屠杀；虽然打过一些英勇的游击战，终是势不均，力不敌。

荷兰小国寡民，前政府只能宣布中立，而英国政府拒绝任何外国势力干预。凯柏一向厌恶压榨的殖民地政策，但不能正面对抗。他致送一个备忘录给英国，并从中斡旋，于1902年英国同波尔人达成和平协议，停息了战争。这是凯柏正义外交的成果。

对于荷兰本国的殖民地，凯柏主张用基督教教化，最后，扶植他们达成独立的目的。作了首相以后，他任命同意改革殖民地政策的艾登堡(A.W.F. Idenburg)为殖民地大臣；而以休兹(General Van Heutz)任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在柯霖(Hendrik Colyn)辅助之下，奠定了自治及独立的基础。

凯柏慧眼识英雄，在柯霖返国的时候，几次交谈，发现志同道合，着意扶植他，辅导他。柯霖后来当选国会议员，在后凯柏的右联政府，作过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并在十几年后，作了反革命政党的主席，前锋报总编辑。成为凯柏的接班人。

1903年一月九日，荷兰的航运工人借口不满公司待遇，进行罢工。不久，铁路工人也参与支持罢工。到一月底，工潮延及全国各大城市，交通陷于停顿。凯柏向来关心工人工作环境，注意工人福利；但他看出这罢工行动，是从开始就具有破坏的意图，人民生活和国家生计，将大受影响。

凯柏立即采取紧急镇压措施，命令阿姆斯特丹的军营加强警戒，调用军队回复铁路交通；声明必须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严厉警告罢工分子，不得有任何非法破坏行动，否则以激烈手段对付。但罢工并未

停止，反有蔓延的趋势。不过，政府立场坚定。

二月二十四日，国会复会。凯柏提出了法案：设立铁路员警；为了促进劳资和谐，关心工人福利，政府设立调查仲裁的机构；对破坏性的非法罢工行动，则将予惩戒。

四月八日，鼓动罢工的反抗组织，号召全国性罢工。但凯柏不为所动。

四月九日，国会下院以 86 对 6 票，通过凯柏的法案。二天后，上院以口头表决通过。同日，女王签署成为法律。

反对的人，极力反对，特别对凯柏个人咒骂，讽刺，丑化他的形象为：Abraham de Geweldighe，意思是：“恐怖的亚柏”，或“暴力的亚柏”。不过，罢工的领袖们，都没有兴趣以身试法，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宣布停止罢工。全国秩序恢复了。

1905 年，凯柏致力奋斗的高等教育法案，在国会通过，使私立大学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地位，学位和专业资格同样被承认；并设立农业，科技和商业大学。

但左翼分子，看凯柏是他们的死对头：神的绝对主权，与无神的人本主义，冰炭不能相容。他们对凯柏极尽攻击，称他为“教皇凯柏”，立心要“打倒凯柏”；但凯柏的声誉，如日中天，极得国人信任尊重。有的人为了旁听凯柏的演说，要彻夜排队等候。敌人的攻击，终不能得逞。反革命政党的势力，在全国蒸蒸日上。

不幸，凯柏本党的投机分子，为了个人利益，起而造成分裂。结果，1905 年的选举，右翼联盟失去五席，而成为国会的少数政党。八月十五日，凯柏的内阁总辞。凯柏于 1908 年重被选任下院议席至 1912 年；1913 年，改被选任上院议员，直到逝世。

### 剩勇不衰

凯柏从政坛退休，自由大学请他回任教授，至少作兼任教授。但凯柏宁愿作海牙的居民，谢绝了。系统神学的教授，已由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继任。凯柏则向大学请延长假一年，至 1907 年，满七十岁，正式离开自由大学。

但他继续写作，绝不肯放下他的笔，直到 1920 年十一月八日，在主里安息。

凯柏的神学思想，并不囿限于荷兰。

1898 年八月，凯柏访问美国，接受普林斯敦大学颁授法学博士荣誉学位(Honoris Causa)。十月间，凯柏在神学院大礼堂，举行一系列的“加尔文主义”讲座：1. 加尔文主义生活系统；2. 加尔文主义与宗教；3. 加尔文主义与政治；4. 加尔文主义与科学；5. 加尔文主义与艺术；6. 加尔文主义与将来。这历史性的讲座，成为经典性的论述。

他也在宾州非拉铁非市的长老宗历史学会，讲“象征与启示的对比”；在芝加哥的麦考米克神学院，作了三次讲授，并讲“加尔文主义的政治原则”。

凯柏在美国旅行了三个多月，于十二月返国。

凯柏是加尔文主义者，并被认为是“加尔文以后最伟大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的神学著作，仍然有人所乐于研读。近年来，自由思想猖獗，使人怀念凯柏，他的思想系统，更为人注意。福音派教会，渐渐觉悟：主耶稣升天前给门徒的大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八：18-20)

这不仅是传福音的使命，使人得救，进入神的国；还有文化的使命，遵守主的教训，道化文化，使神的国扩展，占领文化的每一部分。

1998年，凯柏在普林斯敦讲座的一百周年，改革宗还举办纪念研讨会。

他常为人传诵的名言：

“在人的整个生命中，惟独基督有完全的主权；没有一方寸不是属于祂的，人不能说：这是我的！”

## 07.LitSenChang 章力生

章力生先生：不为自己的人

因这信仍旧说话(来一一：4)

章力生先生，于1996年一月十九日，息了他在世上的劳苦，到主那里领受他的奖赏。他是文宣的名将，为世人留下了约一千万字的重要作品：前半生写的五百万字，是为了国家；后半生所写的，则全是为了天国。单这不为自己的崇高写作动机，就少有人可及。

现在我们也许难以充分了解，章先生的作品，对教会所作是多么伟大的贡献。一位认识章先生多年的宣教士，而且是信主后最早相交，在信仰上对他有过帮助和鼓励的，也是在看了章着总体辩道学之后，才知道他这些年来作了些甚么，而了解神特地呼召他的目的。

记得，在章先生的丧事礼拜，他相识四十年的朋友，高敦神学院中同学，总结他的一生时，作见证说：章先生(Chang)的一生事奉，是在于“改变”(Change)：并不是说，他善变无常，而是说，他不为自己打算，而以改变世界为使命--在他信主之前，以救国救世为志，栖栖皇皇，著书立说，奔走呼号，立心改变世道人心。但是，他先要自己经过改变，皈信基督，生命重新开始，进而改变别人。然后，再是日以继夜，奋笔弘道，为教会留下了不朽的巨著，为华人神学界立下了稳固的信仰根基。综观华人教会史，章先生的作品，是神藉他的笔所流露出来唯一最够水准的杰作。

这位同学在章先生安葬时又说：四十年前，曾接受章先生送的一枝笔，珍藏作为纪念。章先生的一生，

就是为神所使用的一枝笔。现在，这枝笔已经用旧了，残破了，埋葬在这里；但这笔所写出来的文字，要继续流传，继续发生影响力，永远不会停止，直到主耶稣再临。这话十分适切。

记得，我刚走上生命道路的时候，有位未信主的江苏籍朋友，问我是否知道章力生这个人。那时，我正在热烈的追求属灵引导，尽量阅读所能找得到这方面的书籍。可惜，当时章先生还没有多少作品出版。那朋友又说，章力生是江苏的才子，自幼聪慧过人，有“小戴季陶”之称；不知如何，忽然信了耶稣。虽然，我们的谈话就止于此，但我仿佛记得，他脸上惶惑和肃敬的表情，对基督教不敢再肆意轻视。

后来我才得知，戴季陶(传贤)有一次看到章先生的文章，认为很了不起，问左右的人：“为甚么我不认识此人？”因为戴是考试院长，在中枢很有地位，影响力颇大。有人风示章先生该去晋见，但章先生年轻职卑，却有风骨，不肯奔竞曳裾侯门。后来还是戴折节下交，而相见恨晚，对其人格大加推重，结识很深。

这样建立的友谊，虽没有营取私利，到后来还是有些用处的。

在兴办江南大学的时候，政府因为怕青年知识分子在校园藉端滋事，对教育控制甚严。江南大学由吴稚晖任董事长，戴季陶任副董事长，而以儒家教育为主旨，才得以顺利立案。

有一次，在谈话中问起他哪里筹得办学经费。章先生回答说，是无锡同乡的企业家荣德生，对他无条件支持，经费近于无限制的用，自然减少了许多困难。想到当时不信主的人，在世事上有这样的远见，这样的气魄，基督徒岂不应该为主的国度更慷慨的投资吗？

现在年轻的一代，或对学术界不关心的人，大概不容易了解，当年章力生信主所引起的震动。就在那时候，或不久后，背叛圣道的林语堂，也宣称浪子回头，再归返基督教。林是个畅销的通俗作家，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归回了自由派，不是基要的基督教，没有生命改变的见证，对教会也没有发生甚么正面的影响。

章力生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在皈信基督以前，他就是尼哥德谟的好人典型；其重生改变，对于华人教会，就像使徒保罗的悔改之于初时的教会，奥古斯丁的悔改之于拉丁教会，是一件划时代的事迹。

不信主的权威学者也只得说：现在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没有学者了。

但要了解章力生信主的影响，必须知道假使他不改变，情形又将如何。章先生那时看到世道人心的败坏，以为必须以教育改变人心，因而辞官不就，要振兴东方文化宗教，在江苏无锡太湖之滨，创立了“江南大学”，作为基地。这所大学，一开始就不同凡响，虽然是创立得晚，却是当时所有中国大学当中，校园最大而最美的学府，而且规模宏伟，教授阵容鼎盛；在文，史，哲学方面，有唐君毅，钱穆，牟宗三等人辅佐，堪称为一时之选。

他更进而联络印度学术宗教首领，图谋共同努力，反对西方宗教；因为那时他心眼未开，尚不悟基督教是神的启示，实在是源自东方，而后西传。但是，人的忿怒，竟“要成全神的荣美”（诗七六：10）。

神的手，拦阻了他的妄行，并且拯救改变了他，拣选使用他，成为神的器皿，作为文字的使徒，把神的真道写给世人；靠赖圣灵的大能，使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徒二六：18）。

章先生有许多的嘉言懿行，道德文章都足为人效法。但他最特出的，是真诚与平实。当他信主后不久，很有些人慕名而请其出任教师或牧师。如果换了别的人，定会藉名招摇，俨然自命布道家，到处跑来跑去，去散播“我的见证”。那时候，他正是国破业失，远在异国，只要肯宣称是“神的旨意”，就会一帆风顺。但谁也不曾想到，他竟降心折节，报名高敦神学院，去规规矩矩安心理头作起老学生来。也就是因此，才得以打好根基，有日后的成就，对华人教会作出贡献。

他之所以能如此作，是因为得圣灵光照，彻底认罪悔改，认识自己的情形。

章力生先生信主的经过是这样的：

困居在印尼的三宝壟，他们一家在印尼教会闻道。以后，当地华人教会的吴乃恭牧师夫妇常去探访，章先生专心研求圣道，虚心求教，并开始去吴牧师的教会聚会。

在一次布道会中，听道时得到圣灵的光照，他竟然当众痛哭失声，认罪悔改。问起是谁讲道的，是林佩轩先生。用章先生自己的话：“他不像我是有道有理的，他讲道是有道无理，指着人说：‘你有罪，你该死！’”就这样，注重道德希圣希贤的“好人”，奇妙的改变信主了。

他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是傲岸难以接近的人物。实际上他有平易近人的一面，而且真诚热情。在彼此通信一些时间之后，一九六八年，第一次有机会跟章先生见面。地点是新加坡。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那情景。他从客居里面出来，真的是双脚跳离地面，像小孩子般的天真热情，用力的握着我的手，一见如故。

章先生谈话，超乎平常的坦诚。他说自己，并不是第一流的学者。他说，年轻时太早担当学校行政，后来又从政，没有时间实实在在的作学问。其实，这种知道自己所知不足，才是真正学者的表现。信主的人，更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经过了七年多之后，有机会再见到章先生。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初，我们去他波士顿附近的府上访问。农历新年正月初三日，是事先电话约定的，我们将于傍晚由纽泽西乘火车抵达波士顿。本来那是个不太方便的过时旅行方式。想不到那天大雪，飞机和汽车交通都停顿了，铁路成了唯一可行的通路！

不过，因为途中雪阻，需要花时间排除轨道上的积雪，到站时竟迟到两小时。我们想总得乘出租汽车去章府的。哪知下车以后，竟发现章先生跟他的幼公子在那里等候；而且老人家是自年前雪中摔断腿后首次出门！我们当然感觉过意不去，而这份盛情，更是永远难忘。

知道章先生日以继夜写作的生活，在他府上作客打扰两三天，不仅心里过意不去，还多少有些负疚的感觉。但他伉俪却一再说，有短暂的调节更好。

那几天的盘桓，不但使我们得到旅途的憩息，更领受了许多教益。

有一次，谈起话来，我问他：“听说有次在哈佛大学，您严斥自由派神学家，是怎么回事？”

他说：“那次聚会中，有些新派学者，大放厥词，葛培理在座也没有反驳他们。我站起来说，我们又读了几本书，有甚么好夸口的？就打开圣经，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18 至 31 节，他们都安静不再讲话了。”

我所听到的卫道雄风，当事人竟这样轻松平淡的叙过，可见主的仆人不张狂夸大的人。

章家的生活，很是俭素；但待客饌食却非常丰盛。我们则因为长途环球旅行，只带轻微的礼物，略表敬意。章先生在用餐的时候说笑：“我们可以互相标榜，都是照圣经的教训：我是‘客要一味的款待’；你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说：“我们都不遵照圣经：你预备这多味的菜，怎能够说‘一味’款待？应该只有一味才对；我则微薄不成敬意，更说不上‘施’。”

章先生就是这样，珍视人家对他的诚意，不论多么微不足道。在一九九四年，我写完主与人同住：约翰福音纪传，请章先生指正并作序。我先写信征求他同意。他复信答应了。我就寄稿子去；想到他那时已经九十一岁，总不能叫高龄老人抱着一大堆稿件跑邮局投寄，所以我附足回邮的信封，可以方便他看完同序文一起托人投入邮筒就行了。他竟又复信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可见他是多么的谦卑，顾到每一小事。

可惜，不久他就中风卧病，一年多后逝世，那本书出版时他竟然未得看见。

小人的小，是因其只想到自己；君子则是相反的，常常想到别人，不专顾自己。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君子人，是基督徒君子。用圣经语词来说，就是“顾别人的事”（腓二：4）；这绝不是说专管闲事，而是说有基督醇厚广博的爱，自然流露在生命中。

在这危险的末世，一般人总是“专顾自己”（提后三：1），显出他是多么卓越出群，多么可贵。如果华人教会能多有几个这样的人，情形将会有多大的差别！

惟愿神圣善的灵作工在人心中，感动更多的华人圣徒，继起奋笔宣道，靠赖圣灵大能，攻破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归附基督（林后一〇：4,5）。这是章先生的心志，也是圣徒的责任。

#### 怀念章力生先生

一代卫道的勇士章力生先生，服事完他一世的人，就安息了。是的，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再听到他的声音，不能再看见他的形貌。他放下了笔，但留下了那健笔写出的著作，仍然向后代说话，引领人走在正确的信仰道路上。

综括他一生的持身为人，可能还是与早年所受儒家教导有关。儒家常用词汇中，有“小人”与“君子”之分；小人不一定是恶人，更不一定是笨人，反而常是聪明伶俐的，只是他们的心小，因此，章先生常见证神的恩典：“祂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诗一八：16）这是说，他基本的神学思想和经历，是认识人完全的败坏，神无条件的拣选恩典和拯救的大能。

章先生不止一次说：“我是最愚拙的人。”很多人听到或读到他这样说，但很难相信这是事实。他写信给我说：“小儿长基之才，胜弟十倍。”连他的公子长基，也信不下老父所说的是真的。但为甚么他这样说呢？我认为这是由于认识自己，认识主而有的谦卑。

打从我们开始通信，他写信总是自己称“弟”。对不少信主的人都是如此。我觉得比我年长几乎三十岁的人不必这样。他回信说，以后再加解释。但他总是不肯改。后来笼统的说：“我闻道晚，在主内实是后进”。用一句最普通的话来说，他真是谦谦君子。现在真的后进，也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呢！

英国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说得好：

"A king may make a nobleman,  
but he cannot make a gentleman."

照当时英国的情形，Nobleman 是贵族，有权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需要王特别的恩宠，才可以得到。Gentleman 虽然无权无势，却更是尊贵，在于其品格，不是任何地上的政权所能给他的。这个字相当于中国的“君子”：不需要有地位，只是一介平民，只要不是罪犯，不是奴隶就可以；但其所含品德的尊贵，不用任何人给他封号。

章力生先生就是一位君子。

中国人的语言中，把君子与小人对称。小人的小，是他的心胸狭小，只想到自己，自私自利。君子则是心胸廓大，想到别人，想到天下。小人是为了自己，没有原则；君子是固守信念，恒久不移。

综观章先生的一生，有他特异的地方。简单说来，是真正的伟大：伟大的基督徒，不同于世俗的伟大，是有大位，作大官，发大财等。基督徒的伟大，在于其长，阔，高，深。

### 信念之深

章先生悔改信主之后，蒙神恩典呼召，年逾半百，再作学生，发愤研读神学。他是笃实力行的人，全心致力，以文字弘道。除了在神学院教课之外，夜以继日不息的研读著述，焚膏继晷，有时只睡二三小时，或彻夜不寐；其书信或文章，有的注明作于凌晨三时，五时。他自己说，其所以如此作是要“赎回光阴”（弗五：16 英译），补偿从前失去的年日。在信主后约三十年的时间中，章先生有中英文著述共约八十余种，计五百万言；其中尤以晚年的总体辩道学及系统神学，为坚实的巨著。他这样作，是因为深信惟有基督圣道，是独一的救法，是人类的希望。他认为圣徒应该注意，忠心于主所交托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走出象牙塔，站在战神山（参徒一七：16-34），像使徒保罗一样的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林前一〇：4,5）这样的信念，成为他的负担和生命力，作成主交托的工作。

### 仁爱之阔

章先生平常不苟言笑，其实他是很容易亲近，很有爱心的人。要有真爱，必须有所不爱。圣经说，末世危险的日子，人只会爱自己，爱钱财，爱宴乐（提后三：1-4）；这样的人不能爱神，爱人。章先生平生致力写作，却不计稿酬，没有积财。他自己生活俭素，穿自补的袜子，真作到不怀居，不奢靡。但他不仅爱自己的家人，还在经济上奉献给十余个机构。更重要的是，他作的工作，完全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所以他的爱是广阔的，达到他工作所达到的地方，祷告所达到的地方。也许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是个代祷的人：他的信中提到代祷，书中提到为人代祷，使爱没有边界。

### 理想之高

当他还幼小的时候，不是牙牙学语，第一次说话的时候，说的就是一句完整的话：“我要作好人！”长成后人称他“才子”，立志救国救世，不曾昧心贪污，有清廉的佳誉。后来创办江南大学，想以教育改变人心，挽救颓败的世风。在皈主之后，更是“为祂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向着标竿直跑”（腓三：8,14）。虽然政府多次征召他出任部长高官，他并没有易志再去从政，也没有营求教职高俸

大名，作肥己的牧人(结三四：1-6)。他只是默默的事奉，不求人称赞，欣赏，只求主喜悦。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事奉肚腹。

### 恒忍之长

他本来世希圣希贤，是位近于墨家苦行派的儒者，半生过着“孔席墨突”（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的生活，栖栖皇皇，奔走呼号救国，宣扬“自力主义”。皈主以后的章先生，一直走着十字架的道路，全家也跟他共苦。初到麻省，阖家六口共居一室，生活刻苦，以至使来访的旧友吃惊，以为是“章力生疯了”！夫人本来是宦家千金，竟作助理看护病人，形同佣妇，以补家用；儿女则打工读书，赖奖学金。但靠主的恩典，他恬然处之，“无论在甚么境况都可以知足...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腓四：11-13)靠主的力量，恒久忍耐，结出美好的果子。

华人教会灵里荒歉，还没有能结出凯柏(Abraham Kuyper, 1837-1920)那样的果子。凯柏是荷兰改革宗神学家，政治家，曾任首相，又是作家，创办了著名的自由大学。章先生心仪凯柏，理想信仰，也都与其相近。这位华人的凯柏，离开我们去了，但他留下的著作仍然说话。祝圣灵化育人心，兴起更多像章先生一样心志的君子，忠心事主，弘扬圣道，结出丰盛的果子，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阿们。

## 08.TheHarvardOfChina 中国哈佛：广文大学

英国清教徒，为了寻求信仰自由，移民美洲。他们注重信仰的传播，而且具有远见，要为信仰植下根基。

1620年，五月花号航抵美国。建立社区以后，首先即兴筑教堂，作为聚会的场所。每逢主日，各家庭相率同往教堂聚会，也是教育的地方。于是，家庭，教会，学校，合而成为坚固的“金三角”。

1636年，哈佛牧师(Rev. John Harvard, 1607-1638)在新大陆建立第一所高等学府，学生一百二十名，属教会管理。后来为了纪念其创办人，命名“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发展成为著名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美国东北部海岸一带，是早期英国移民首先登陆的地方，所以称为新英格兰地区。以后发展成为文物荟萃之区；早期的国外宣教士，多出自那里。晚至十九世纪，美国全国的学校教师，还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新英格兰地区。

中国的山东省，与美国的新英格兰相似，称为邹鲁文物之邦，因为是孔孟的故乡，二千多年来，在中华文化上占重要地位。及至十九世纪，西方宣教士东来，山东半岛成为西方文化的发响地；特别是在两个庚子之间的六十年（清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00-1900），可谓独领风骚，曾是催动中国现代化的温床。

传福音与教育并重

1860年，北京条约，开放登州(今山东蓬莱县)等口岸为商埠，并准洋人入华传教。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差派倪维思博士夫妇(John Livingston Nevius, D.D.,LLD. 1829-1893)来华。他们于1854年先赴宁波及杭州工作，后于1861年到登州。

倪维思极有远见卓识，是近代教会增长理论的创始者，也是“三自”(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先驱；后来发表其著名的“倪维思计画”。

他看到有一座残破的观音堂，因为佛教当时在山东式微，无人使用，他就买了下来，在那里开始工作。他观察到中国妇女受压迫，多不识字，缠足持家，闲暇就求神迷信，情形十分可怜，应当是传播福音的对象，也可以使他们受教育，并学习维生的技艺。1862年，所办的女子学校开学，仅有两名寄宿生，以后才逐渐增加。这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已经是创举。

1863年，宾州的狄考文博士(Calvin Wilson Mateer,D.D., LL.D., 1836-1908)夫妇，偕郭显德博士(Hunter Corbett, D.D., LL.D., 1835-1920)夫妇，由长老会差遣，同乘机帆船，自纽约至上海，转往烟台，再抵达登州。初到的一年，潜心苦学中文并了解中国文化。

1864年，倪维思因夫人重病，返国就医。狄考文夫妇刚好赶上接替他的工作，掌理登州教区。狄考文的同乡郭显德，去烟台定居工作；狄考文夫妇留在登州。

还只有二十八岁的狄考文，正是青年有为。他初履民俗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看到那老大古国的贫弱落后，正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在美国的经验，是教会与教育并重；这也是自中世纪以来，在欧洲的作法：教育就是宗教教育，理当是教会的事业。现在，他心目中的负担，更是科技教育：

传福音不止是救人的灵魂进入将来的天堂，也要救人的肉身脱出现在的地狱。

于是，将已成立的女校，迁往督察院北，交由汉学教习于锡晋长老管理；狄考文夫妇则集中力量，在原观音堂四合院的位址，创办男校蒙养学堂：“蒙”是启蒙，“养”是寄宿并教养，为将来的学院立下根基。是为1864年。

当时风气未开，创办洋学堂的艰难，是我们现在很不容易想象得到的：如何有学生肯来就读？克服华人文化上和观念上的距离，自然是第一道难关。其次，读甚么？要编订，翻译课本，厘订课程，制定规章。还要克服的，是宣教士和差会内部的歧见：有人认为办学并非宣教要务，甚至认为会妨碍宣教；好像教育阻挡福音，无知是信仰之要素。这在今天自然不值一笑，在当时的人，会反因为果，不难接受异论。幸而师资不成问题：当时的长老会宣教士，多学识渊博，不仅能合格充任教师，而且胜任编写课本，于是在中国译员和学生协助之下，中国有了第一批现代教科书。在那时的中国，物理，化学，都没有课本，横行左起的书籍排列，还未见过；甚至数学的阿拉伯数字(实是印度数字)，更没有流行。这是说，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得从头一一开始教导。狄夫人邦就烈女士(Julia Brown Mateer)，除教授史地课程外，还为中国开辟了西方音乐的途径。她编写了乐理启蒙，制订了乐谱，音符，教导学生欣赏，演唱，以至创作歌曲，并收集民间曲调，配以新词传唱。

## 中国第一所大学

在学校初创时期，不仅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学生饮食，住宿，衣物，书籍，文具，以至回家路费等，

以吸收贫苦学生就读。即使这样，学生往往因为早婚，未毕业而退学，甚至弃学“逃亡”；现在听来简直是奇闻，当时却不乏其例。也有的庸劣不堪造就，而勒令中途退学的。

但狄考文与其同工教员，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办学认真，艰苦卓绝；对学生则教导有方，亲爱如同子弟，因而发展成高水准的中学。

1875年，英国浸礼会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与狄考文商谈，协议将在登州的房产让与长老会办学，而长老会则将其在青州伙巷的学校，让予浸礼会。以后，1881年由怀恩光(John Sutherland Whitewright, 1858-1926)开办中学名为培真书院；继由库寿龄(Samuel Couling, 1859-1922)接任发展，改名为广德书院。李提摩太热爱中国，精通中文，向差会建议在中国每省设立一所基督教学院，不获接纳，后悒悒离开英浸礼会差会，专从事文化工作。

长老会在登州校舍增广，规模益具。1882年，决定增设高等科，创立大学，定名为“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取以文会友的意思，“馆”字除馆舍的意思外，还是 College 的音译。经美北长老会批准，并筹维经费。是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那时，狄考文已差派毕业生在山东各地传道兴学，建立中小学六十余所；郭显德则在胶东各地，创设中小学四十余所。所以文会馆成立，学生来源已不再成为问题；许多邻近州县的学生，闻名前来求学，也有少数来自省外。

文会馆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瞩目。美北长老会予以重点支持；不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杰出学者来华。狄考文的四弟狄乐播(Robert M. Mateer, 1853-1921)夫妇在其兄感召动员之下，于1881年至登州，从狄考文学汉语，并汲取办学经验。狄乐播在1883年，去到潍县，开办格致院和文华馆，完全采用文会馆的教材和体制；并购地建校，成为以后广文大学的基础。赫士(Warson McMillen Hayes, 1857-1944)，于1882年到登州，在文会馆任教，后且接任馆主(校长)。柏尔根博士(Paul D. Bergen, D.D.)继来，加他们的二位夫人，与郭显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 1829-1895)等人，教师阵容坚强。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 1866-1941)较迟1897来到；其子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 1898-1967)

次年生于登州，以后创办了 Time(1923), Fortune(1930)和 Life

(1937)，成为大新闻企业家。著名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亦曾在文会馆任教。还有其他学者多人，或先或后，或久或暂的担任教席。

1890年以后，狄考文众望所归，受推选担任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委员会主席，主持中文译经的划时代工作，由赫士继任校长。狄考文于1908年逝世时，仅见到新约全书及诗篇的出版。(后由富善博士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任主席，继续完成翻译，并于1919年出版。)

文会馆的昔日规模，虽然不能与现今的大学相比，但其师资设备，都是第一流的，有文，理，工，化各科，仪器齐全。加上师生都是一时英秀，造就出不少人才。

早在1882年，狄乐播在潍县开办文华馆和乐道院，校舍广大，狄考文就着眼于文会馆迁并。那知到1900年时，义和团乱起，乐道院变成了一堆瓦砾！在那次震动世界的大变乱之中，由于山东巡抚袁世凯加意保护洋人，山东传教士得免于伤亡。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之役，结果，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子。全美国教会联合抗议，迫使政府不接受赔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用于在华兴办教育；从其中拨归潍县乐道院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三两；美国长老会复在本国募集三万余两，用以复建；

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山东巡抚袁世凯，再予地方赔偿四万五千两。加上狄考文历年积蓄用于文会馆的发展费，成为一笔可观的资金。

那时，青岛已辟为商埠，胶济铁路亦已完成；潍县位于胶济铁路中心，发展前景极为良好。于是，美北长老会的登州文会馆，与英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协议迁并至潍县，校名各取一字，合成为“广文大学”，其英文校名则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长为柏尔根博士。于乐道院原已广大的校址，增购西北毗连土地一百六十余亩，建成宏伟壮观之校舍；医院经过重建，也更为宽敞，设备齐全适用。大楼中央的钟楼，高达百呎，礼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厅可以供四百余人进餐，有完美之图书馆及阅览室，藏书丰富，有物理，化学，生物试验室，并有一座先进的天文台，运动场，还有木工厂，铁工厂，及理化仪器制造所等设备，可谓应有尽有。

1917年，广文大学在济南千佛山下购地六百余亩，集大量资金，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成为完全的大学，把潍县的文理学院，青州的师范学院和神学院，及全国不同地区的医学人才和设备，迁集在一起，合成为最坚强著名的医学院。这就是“齐鲁大学”，聘任方伟廉(William P. Chalfant, 1860-1917)为校长，赫士为神学院院长。方伟廉不久即逝世。赫士则因信仰问题辞职离去，于1919年，在潍县创立华北神学院，并任院长；1922年，迁移滕县，成为北方最有影响力的神学院，为华人教会造就不少人才，建立纯正信仰的根基。

## 广泽文化

狄考文眼光远大，学识渊博，可算是旷世奇才，是神给中国教会的极大恩赐。他编写的官话课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当时洋人学汉语的必备经典。此外，还有：要理问答，教会名目并会例，英文神字解，谈讲之法，得道途径等，并修订天路历程；又编写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振兴实业，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积分习题等。他还组织了赫士等人编写出：对数表，声学撮要，光学撮要，天文撮要，天文初阶，是非学体要(逻辑学)，以及救世略说，使徒史记等神学专著计二十四种；丁甦良编译社会经济学；狄并指导学生就随堂讲授笔记，编写了力学，数学，几何，许多种课本，是明代天主教士自西方来华之后，在翻译学术上的大贡献；后由商务印书馆等大书局出版，嘉惠华人学子二三代之久。以后，赫士利用文会馆的印刷设备，创刊了山东第一份报纸：山东时报。(1890年)

在登州，创始于1864年，文会馆于1882年(光绪八年)正式成为大学。以后，1886年，首届有三名毕业生。1872年，李鸿章奏请清廷派遣幼童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学，才有第一批留学生三十三名启程。可见狄考文的远见，和他关爱华人的心。特别是在艰辛开拓的时期，狄考文夫妇一生没有子女，拿出自己有限的薪给，铢积寸累，用于办学；狄夫人之妹，也变卖父母遗产相助，并征集美国信徒捐款，勉可维持学校开支，及供学生的费用；后来情形才有所改善。据说，登州的民国名将吴佩孚将军，早年也曾在校就读过。

袁世凯的立身行事，不尽可以称道；但此公的识略英明远见，很少可以置辩，甚至比一般宗教人高明得多。袁在宋庆将军麾下任军头的时候，驻在登州；其修理养护军械的技工，有的是狄考文训练出来的，技艺精到。袁项城见果知树，赞赏之余，亲去文会馆参观，对于狄考文和赫士诸人，大为钦服，

曲意结交利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廷就官书局原址,设立"京师大学堂",比文会馆迟了达十六年之久。由于文会馆的办学认真,声誉远播,聘当时办同文馆的丁韪良为总教习(教务长),并授权他选聘文会馆毕业生八人任数,理,化教习(教授),文会馆毕业生于志圣为汉学教习。状元孙家鼐为馆主(校长)。这是北京大学的原型。可见文会馆的重要地位。

### 速成大学第一名

1901年,慈禧太后于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时,化装农妇逃难"西狩"。在和约还未议定,也尚未回銮,即下诏变法;继更颁谕各省兴办大学。文会馆也正因义和团乱停办,迁潍县的校舍,兴建尚需时日;便应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恳请,由当时文会馆校长赫士曲尊下就山东大学总教习,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四人,华人教习张丰年等九人,都是早期毕业生;并简选新毕业生八人,及汉学教习二人,作为教授团骨干,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地质各科系。至于章程条规,以至经费开支,编制预算,无一不是依就文会馆规画,依样葫芦;连课本,教材,教学方法,仪器设备,都是沿用文会馆成章。至于校长唐绍仪,不过挂名而已,根本不懂,也未参与办学的实际事务。因此,山东大学的成立,创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迹:只筹备了一个月,就于当年十月间在济南正式开学!自然成为中国省办的第一所大学。

开学既成,袁世凯立即奏报。好大喜功的慈禧太后见奏大喜,在十月十五日,颁谕全国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上谕所到,各省纷纷仿效山东办学经验,争来罗致文会馆毕业生为教习。于是,京师大学堂之外,全国各省(除贵州)的大学堂;工,农,师范学堂;上海,天津等地官办的格致院(科学院),南洋公学,北洋师范,江南大学等,以至保定武备学堂及师范学堂,奉天,云南讲武堂等,都聘有文会馆的毕业生。至于教会大学中,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的更占多数,其中如:张丰年在圣约翰大学任数理及天文学教授,成绩卓著,甚为学生所敬爱。但各省大学需要师资太多,文会馆毕业生数额有限,穷于应付,后来连肄业生也被延致。因此,对于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体制的建立,文会馆贡献很大。

### 影响及检讨

慈禧太后传谕嘉奖袁世凯及赫士博士;并授命赫士为清廷制订全国的办学规画,方针,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颁诏全国奉行。反教反洋的慈禧太后,竟然颁双龙勋章给正统基督教信仰的赫士博士。

从文会馆到广文大学,从登州到潍县,狄考文,赫士等宣教士先贤的影响力,实不限于山东一隅。不过,狄考文建校的宗旨,是为了要造就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领袖,所以不教授英文;毕业生的第一选择,是作教牧,其次是教育;从政与工商业,则是又次的考虑,由此可见学校宗旨的正确。毕业生中有在国内传福音最广的丁立美牧师(1892年毕业,再入神学院深造),工作大有能力,有"知识分子使徒", "中国慕迪"等美称;在华人教会神学界影响最深远的贾玉铭牧师(1901年毕业);而于1911年毕业的滕景瑞(祥五),则是滕近辉牧师的先尊翁。这些是部分丰美的硕果。老一辈的基督徒常说,山东出了许多

属灵伟人，饮水思源，其根源实在于广文大学所栽培的人才。

进入民国以后，大学开设多起来，自然是只重数量，而不注重信仰和品德，正像开辟了园囿，任由嘉禾莠草并长。而国人以大为尚，广文的直接影响力，就不再那么明显了；而且由于当初狄考文不教英文的决定，毕业生出国深造的不多，也就少有影响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育人才。再经过两次大战之后，更由黯淡而衰微。

广文由盛而衰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地利”：校址不是设在像北京，上海的通都大邑，学生的来源较细。复由于国人重利，大学校园成为商业化，学生或想走买办路线，或期望“学而优则仕”，广文当然不是发财和升官最理想的桥。而在“人和”方面，教育成为政权的一部分，多由南方官僚统制，不仅对教会没有良好印象，且间歇的反教；而广文的思想传统，是不想多政治牵缠。同时，继起的领导人，没有注意到储备华人师资，派毕业生出国深造；而有力的教师领袖，如路思义等，又转到燕京等别的大学去了。

更不幸的是，当时西方教会有“自由主义”（新派）问题，起于“启明运动”，侵入校园。正统保守信仰的人，则以为纯正信仰和知识是相对的，而放弃学术和神学院，发起“圣经学校”运动。而敬虔主义者，则置身事外，只顾超然属灵，自鸣清高。反自由主义，也连带反知识，忘记了教会与学校结合的传统，把高等教育拱手让敌，给新派霸占。于是，信徒以为知识是反福音信仰的坏东西，必须反对；这种因果为因的想法，是错误的逻辑，不知警觉失去校园的失策，为害教会更大。

十九世纪末叶，在华宣教士团之间，有“李提摩太路线”与“戴德生路线”之争分。“李”是注重介绍西洋文化，以争取士大夫阶级，不惜同中国文化宗教妥协；甚至主张“万法一理”，“万善同归”，以基督圣道与儒，释，道杂合，用“主祷文”作结；其特点是关心社会灾苦，于中国现代化有贡献。“戴”则以传福音引人归信基督为主，初等教育和医药为辅，并不主张发展大规模的教育，医药等社会事业。以当时人力物力所限，可能有其不得不尔的原因；此虽然对于上流阶级缺乏大的影响，对福音广传，则一时效益颇大。但似不足成为取法的成规和准则，或甚么“路线”，更不是没有变进的可能。

可惜，有人把福音弄成“单行道”，以为同工必须同等，把不论甚么特殊恩赐的人，一律“下放”到穷乡僻壤，以苦行标榜奉献牺牲，而不肯安排到高等教育事工。虽然在基本训练上受苦是应该的，但矫枉过正，则违反肢体功能的原则。

其实，这种“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二分法，并没有多大道理；绝不应该忽略第三路线，就是“狄考文模式”。狄考文，赫士等人，从不忽略福音基要信仰，却有远见，并注重教育，且致力译经，办神学教育，为中国教会立下纯正信仰，是坚实的万世根基；郭显德，路思义等人，则注意社会关怀，有口皆碑。

也就约在同时，兴起了“独立教会”风气，是受敬虔主义的影响。敬虔本来是好的；但过于闭关自守，则成为问题。要问：“独立”是向谁独立？当然，不能向神独立，只能孤立；遇到强的领袖，发展成山头主义，以人为中心；弱者则无以自立。孤立无力，变成事事倚赖：用别人译的圣经，别人写的圣诗，在别人的学校受教育，或甘心受无神反教的教育，病了还得进入别人的医院，受医药照料。哪能算是独立？结果，徒唱高调作不成事，让教育被不信者控制，把信徒子弟，造就成忠实的“占尼撒理”（Janissary 或 Yani ceri，是鄂图曼帝国，把基督徒年轻的孩子，造就成回教徒，用来反基督教，以至杀死他们的父

母), 何等可哀!

早在 1877 年, 狄考文就揭示基督教兴学的五大要点:

第一, 造就可靠的传道人才。第二, 供给基督教教学师资并可藉他们将西方较优良的教育, 介绍中国。第三, 装备人才介绍西方文化的科学和艺术给中国。第四, 教育是进入上层阶级的最佳门径。第五, 教育能使中国教会有自立能力, 并使中国教会防止迷信侵入, 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怀疑主义者的攻击。

这番有道有理的话, 确是真知灼见, 到今天仍然合宜。最后, 他说: "为求达成最佳果效, 各传教会必须分工合作, 兴办学校。" 这对于现代圣徒, 仍有其启发意义。我们不能希望不信和反道的人, 为我们培养下代人才, 兴旺福音, 狄考文模式, 也正表现出其加尔文归正宗的理想: 传扬福音圣道, 并完成教会的文化使命; 个人得救, 道化文化。

本文承曲拯民先生校订及提供资料, 并多次电话往复讨论, 帮助甚大, 附此志谢。

主要参考书刊:

曲拯民 烟台教育发展史话。Paradise, PA: n.p.,1988.

----- "郭显德牧师传略", 文宣, 第 102 期, pp.4,6.

----- "创设华北神学院的赫士牧师", 文宣, 第 98 期, p.6.

----- "狄考文简传", 文宣, 第 93 期, pp.3,6.

韩同文 广文校谱。青岛: n.p.,1993.

汤清 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 道声, 1987.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 基督教文艺, 1977.

近代外国人来华人名词典。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Fairbank, John King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92.

Hsu, Immanuel C.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5.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0.

## 12.ASketchOfSantaClaus 圣诞老人画像

圣诞老人真面目

他本名尼可拉(Nicholas of Myra), 生在小亚西亚的海港城市帕他拉(Patara), 在今天的土耳其西南海岸。他的出生日期不详, 据传是在 343 年十二月六日去世, 在世的年代约与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 ca. A.D.260-339)相同。

### 爬屋的少年

当然，圣诞老人并不是生来就老。如果照今天的传说，肥胖臃肿的白胡子老人会逾墙爬屋，飞檐走壁，那简直是神迹。爬屋是他少年时候干的事。

尼可拉生在富裕之家，承受了丰厚的遗产。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同情贫苦的人，常常施赈济。他所作的是出于爱心，作在暗中，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所以总是隐名，从不张扬。

有一次，他听说有个贫穷人家，父亲养大了三个女儿，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却为了付不出妆奁费用而发愁，竟打算把亲生女儿卖入妓院！在一个深夜，窗外人影闪动，一包东西从窗口丢了进来。作父亲的以为是贼，急忙去追。追到筋疲力尽时，结果给追上了；发现原来是个大孩子！他告诉那个父亲，是为了好心送钱来帮他们解决困难的，并曾不偷窃甚么：他们家有甚么可偷的？父亲知道。唯一的要求是，不可把他的名字张扬出去。这当然可以同意。女儿们打开小袋子一看，里面原来是金币！不消说得，他们的问题解决了。

这是他的事迹之一。他常常作这种事。

### 受苦的主教

尼可拉去旅行了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回来，一踏进了玛拉(Myra)的教堂，发现会众捧着主教的衣冠和牧杖在等着他。原来那里的主教去世了。会众同心祷告，求神选派一位主教牧养祂的羊群：那天清早，第一个踏进教堂的人，那就是群羊的监督。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成为最年轻的主教。在当时，主教并不就代表高位厚俸，也没有权位荣耀；有的只是为了主受苦，作群羊的榜样。军阀出身的罗马皇帝狄克理田(Diocletian, 在位 284-305)，本来宽容基督徒；但到了 303 年，忽然连下四道诏书，残酷的迫害基督徒，强逼他们否认主耶稣。

罗马政府把尼可拉下在监狱里。他被鞭打；他被烧热的铁炮烙；他被铁箝夹手指；他被虐待当作取乐。到被弄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他们给他休养；到快要恢复的时候，再从头来过，使他旧痕加上新创。但他甘心为主受苦，至死不屈！

他有死的心志，却并没有死。迫害基督徒的人死了。康士坦丁皇帝信了基督教，迫害没有了。他又恢复了自由。

### 发怒的狮子

有爱心的尼可拉，也刚强卫道。

外面残酷的迫害，使许信徒人殉道了；但主的道却更加广传，教会更加清洁而得胜。

到基督教流行了，仇敌更凶猛，更恶毒的攻击来了；这次是从教会里面的稗子，就是亚流(Arius, ca. 250-336)派异端。

亚流本是亚力山大城的一名教牧强调苦行和品德，能言善文，吸引了很多徒众。但他注重理性，说基督是受的造的，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理，引起教会的争论。康士坦丁皇帝为了处理这争论，在 325 年召开尼西亚大会(The Council of Nicaea)，公辩解决。正统信仰的教会领袖，包括尼可拉，引用圣经证明基督

是神，有神一切的丰盛在祂里面；道成肉身的圣子，是与父同等，与父原为一，人看见了子就看见了父；祂是神荣耀的光辉，神本体的真像，在一切被造之先，所以祂不是被造的，而是创造者(参西二：9 约一：14 一四：9 来一：3)。亚流巧言善辩，口出褻渎的话，竟然唱起他自己所写的流行歌曲“盛筵”(Thalia)。有的主教愤而离席，有的掩耳不听。尼可拉却慢步走向场中，给亚流的恶嘴狠狠的一拳！当着列席的皇帝，这突然的举措，使全体愕然。无疑的，此举大快人心，也极有效；但于议程不合。主教们不能同意他的粗莽行动，决定免除他的主教职位(后来又恢复了)。会议宣布亚流派为异端，把亚流放逐了。

### 嘻笑的老人

尼可拉老来仍然满有喜乐。他在玛拉，看顾有疾病的人，救济贫苦，关心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在玛拉的街巷中，交通不太繁忙；他与玩童一同嬉笑，一同当街戏玩。那慈祥的白须老人，是那么平易近人，绝不像穿长衣游行的法利赛人，装成严肃不可侵犯。有时他还会摘下主教的高帽子来，给街头的玩童们戴！当然不会立他们为主教，或让他们祝福。同时，他保护弱者，使他们免受欺凌。他又见义勇为，给无辜者伸冤，不怕得罪有权势的大人物们，为了要施行公义。这样，你会发现尼可拉不像商业化的圣诞老人，那是因为他像耶稣基督。他去世以后，人称他为“圣尼可拉”。

### 后记

我们并没有尼可拉写的自传，也没有直接同他交接过的人所写有关他的记述。最早的记载，是在他去世以后二百多年，一位希腊主教写的，必然是根据口传的轶事琐闻。但有关其人的传闻很多，有些是理想化，甚至神话化了。

宗教改革以后，欧洲归正教国家如荷兰，德国等，却甚为喜爱这位圣尼可拉，把他跟“圣诞节”联系起来，认为是圣诞精神的象征。欧洲移民来新大陆时，可爱的“圣诞老人”也随同移民进口，而且经荷兰人给改名为圣可乐斯(Santa Claus)。

于是，“圣诞老人”的传奇，越加随时间而繁兴。

我们总该记得，“圣诞老人”圣可乐斯，不是个没有真理原则的老好人，更不是终日嘻嘻哈哈只往富人家里奔走的人；他不是为浪费欢乐的孩子们锦上添花，而以主基督的心为心，体恤疾苦。

小朋友们会问：“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是的，有圣诞老人；圣诞老人不是基督，是像基督的人：他不只想自己，而是常常想到别人，把欢乐送给人。你也可以这样作。不要只希望圣诞老人从烟囱中给你送来礼物；当你把礼物送给人，送给需要的人，欢乐就从烟囱里进来。

现代必须有圣诞老人。也许，你就是未老的圣诞人。

英国国会议员卫博福(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早年在剑桥大学的时候，是一个散漫的学生，只知自私的享乐。重生归主以后，完全改变了。他深感神把一个使命放在他肩头上：废除贩卖黑奴及重整道德。他奉献全心全力，投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作为他一生致力的目标。

他身材瘦小，而且体弱多病。当二十一岁的时候，竞选下院议员；卫博福在冷雨中的街头，登上了一张桌子演说。名传记作家包斯威(James Boswell)，在街角观看那身高仅五呎的眇小少年，写道："他看来像一只小虾。但我听下去，那小虾长大，长大，成为一条伟大的鲸鱼！"结果，当选进入国会。

1787年，卫博福以二十八岁的青年议员，开始在国会推动废除奴隶法案。那是个不受人欢迎的法案。

1788年，开始提出讨论。以后，他年年提出，年年不得通过。

卫博福能继续活下去，活得那么久，似乎是一项神迹。在1788年，他忽然得了重病，友人们悲哀担心；黑奴贩子们和支持贩奴的人，松了一口气，欢欣称快，以为再也没有人会阻扰他们的生意了。出人意外之外，他竟然恢复了。他继续活下去，作"英国的良心"，领导反奴役法案的行动。

1792年的一个深夜。他真是疲倦极了。对着一支微弱的烛光，四周是那么黑暗，似乎压得他难以呼吸。他太孤单了。虽然少数的人与他同志，但面对着巨大的反对势力，仍是像哈漠雷特王子，仗剑面对烦恼的海洋。又一次的失败，驱使他转向圣经神的话，支取力量和灵感。

丧志灰心的卫博福，在书房里翻开圣经，里面夹着的一封信，飘入他的眼帘。那信是一位老人颤抖的笔迹；写信的人，已经在一年多前去世了。这信是他在去世前不久写的：

亲爱的先生：

除非是那神圣的权能兴起你来，作"亚坦那修与全世界反对"(Athanasius Contra Mundum)，我不知你怎能成就那光荣的事业，反对那羞辱基督教，羞辱英国，羞辱人性的可咒诅恶行。除非神为此特兴起你来，你准会被人和魔鬼的反对所耗尽；但是，神若帮助你，谁能敌挡你呢？就算他们合在一起，能强过神吗？噢，行善不可丧志！奉神的名勇往直前，靠祂的大能大力，直至连日光之下最邪恶的美国奴隶制度，也从太阳下面消失。那位从幼至今引导你的，在这事上和一切的事上加力量给你，是敬爱你的仆人的祷告。 约翰·卫斯理

这位卫理宗的创立人，最为注重改革社会罪恶。卫斯理在1774年，发表"奴役制度的思考"(Thoughts upon Slavery)唤醒国人的良知，谴责蓄奴；并且呼吁为了神的缘故，不要贩卖奴隶。因此，他与卫博福志同道合。

现在，是卫博福最需要鼓励的时候，这是最适当的信息。

"行善不可丧志！卫博福深深吸了一口气，吹熄了烛，回到床上就寝，恢复力量，继续面对漫长艰辛的搏斗。

一年又一年，法案仍然不得通过，但卫博福缠斗不休。到 1797,1798,1799...废奴法案随着时间进入了十九世纪，仍然被阻压在国会，不得通过。

1806 年，卫博福的同学好友，二十六岁就任历史上最年轻首相的庇特(William Pitt, 1759-1806)去世了。他失去了奥援。但是，卫博福坚毅努力，锲而不舍，似是另一项神迹。议员兰牧(William Lamb, Viscount Melbourne, 1779-1848)等人，相信"宗教干预公众事务已经过时了"，并以为不必坚持原则。相信道德原则的卫博福，挫败连接着挫败。黑夜像是没有尽头。漫长的二十年过去了。在一次关键性的演说中，他声言：英国的前途所系，"不在于其海军和陆军，不在于执政者的智慧，而在于其众多的国人，爱而顺从基督的福音，他们的祈祷必然成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坚强不屈的奋斗。约翰卫斯理就是以祈祷支援他的人之一。

1807 年，英国议会以 283 对 16 票通过了禁止贩卖奴隶法案的二读。全体起立鼓掌欢呼，向卫博福致敬。他坐在位上，弯着腰，用手捧着脸，眼泪流下来。流着，欢欣的眼泪，为了非洲的弟兄姊妹们，为了人类良知的胜利。

体弱多病的卫博福，为了神所交托的使命，为了良知和理想，继续奋斗了十八年，在议会中见证，直到 1825 年退休。

1833 年，七月二十六日，英国议会二读通过禁止蓄奴法案，更进一步废除奴役同类的制度。三天后，卫博福去世了。

纽屯(John Newton, 1725-1807)牧师，曾作过贩卖黑奴的生意，后来蒙恩悔改信主，并在英国俄尼(Olney)牧会。他深悔贩奴的罪恶，尽力见证劝告人，废除那可咒诅的制度，以同样的是神照着祂形像所造的人，作为工具。纽屯也是坚定支持卫博福信念的人。其所写圣诗"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多年来被选为基督徒最爱唱的圣诗。卫博福曾向纽屯请教，因为是过来人，给他影响很大。

一封信，一首诗歌，在神使用的时候，可以发生很大的功效；在许多年后，仍然是这样，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神的儿女们，不要销灭圣灵感动，写吧！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写出家唱户诵的圣诗，像纽屯一样；但每个人总该会写信，这就是最基本，最有效的见证方法，勉励帮助需要的人。谁知道，靠主的恩典，会发生多大的效果呢！

#### 14.Athanasius 安坦耐修

基督教的中心教义，是"三位一体"的信仰；在这方面增减改移妥协的，就不是纯正的基督教。不过，圣经里面并没有"三位一体"的字句，这观念却是一贯的存在。这观念极其奥秘，极其难解，极多争议，也似乎极不合理；同时，也极为重要。在教会历史中，建立这教义最坚，维护最力，为了持守这信仰牺牲最大，受苦最多的，是不畏权势的亚坦耐修。因此，有句话说："亚坦耐修与全世界反对，世界与亚坦耐修反对"(Athanasius Contra Mundum, et Mundus Contra Athanasius)。

亚坦耐修(Athanasius, c.293-373)生于埃及亚力山大城，家道富有。有一天，主教亚力山大看到一群孩子，表演教会聚会情形为戏；亚坦耐修扮演主教给他们施浸。主教认为他"羡慕圣工"，将可任监督的职分。

他在那里受神学及哲学教育，在 313 年，任主教秘书，成为教会的执事，神学顾问。

那时，亚力山大城为世界基督教的中心之一，领导全埃及的教会。有一个长老名叫亚流(Arius, c.250-336)，能言善辩，在安提阿受过教育，亦为诺斯替主义所影响。约在 318 年，亚流散播他的学说，只承认一位至高的神，圣子和圣灵都是受造的，所以是较低的。在 321 年，北非洲一百位主教召集大会，通过革除亚流教职，禁止圣餐；但仍有相当多的群众跟从他。亚坦耐修则根据圣经，坚信神子是父神所生的，与父同质，同等，同荣。

因为当时的争执，可能引起教会的分裂，第一个基督教罗马皇帝康士坦丁(Constantine, 274-337)，于 325 年，亲自召开尼西亚大会(The Council of Nicaea)，议题中心：基督是真神，或是最先的受造之物。全国各地的主教和长老 138 人出席，由皇帝主持。会中反复辩论的是基督和天父"同质"(Homo-Ousia)或"似质"(Homoi-Ousia)。大会接受了"同质"的立场，定亚流派为异端；亚流派的教职人员放逐，亚流信仰的书焚烧。亚坦耐修认为这首次的普世性大会，是基督教会反对异端的巨大胜利。

亚流派余党并未就此消灭。328 年，亚力山大主教逝世，亚坦耐修继任主教。两名亚流派主教，采取当年犹太宗教人控告耶稣的故技，以政治问题，向康士坦丁皇帝诬告亚坦耐修，说他恐吓要发动信徒，阻止帝国的粮食供应。皇帝并没有经过调查，就把亚耐坦修放逐了。

337 年，康士坦丁崩逝。亚坦耐修回到亚力山大城，仍任主教。338 年，继位东帝国宝座的皇子康士坦丢(Contantius)，再降旨意放逐他。亚坦耐修逃往罗马，受西罗马皇帝康士坦思(Constans)庇护。一名亚流派人被任为亚力山大城主教。但亚坦耐修仍藉书信与他的教区信徒联系。罗马教皇为亚坦耐修缓颊无效；东西两方的主教在撒狄集会，共同向康士坦丢申诉，也遭拒绝。到 346 年，经康士坦思的疏通，亚坦耐修得以回到亚力山大城，受到信徒英雄凯旋式的欢迎。

350 年，康士坦思逝世，继有东西罗马内战；结果，亲亚流派的康士坦丢统一了罗马帝国。在 356 年，派五千名兵，把亚坦耐修逐出教堂。他第三次被放逐，避到隐修于埃及沙漠的安东尼等那里。迫害持续着。亚坦耐修则得以安静著述，并督导修道士们抄写他反对亚流派的著作。在 361 年，康士坦丢逝世，那不受欢迎的亚流派主教被杀。亚坦耐修于次年重返亚力山大城。他劝勉信徒坚守纯正的"三位一体"信仰，彼此和睦相爱。

叛道的朱利安(Julian)皇帝让亚坦耐修复位，只是存心给教会互相斗争，同归消灭；但不久即以"诸神的仇敌"，"危害和平"的罪名，再次放逐他。亚坦耐修离去时，许多朋友看年老的主教第四次被逐，流泪相送。亚坦耐修反以先知的语气安慰他们说："不要伤心，这不过是一片云，不久就过去了。"他避往上尼罗河地区。迫害教会的朱利安，在 363 年就死了。约维安(Jovian)皇帝拨乱反正，亚坦耐修主教得再度召回。

365 年，维伦斯(Valens)皇帝又是亲亚流派的，再次放逐亚坦耐修。但这最后一次的放逐，亚坦耐修仅在城郊他父亲的墓中，暂避了四个月；在这期间，地方人士向皇帝关说，让他回来。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总算在比较平静中度过，直到 373 年逝世。

贵格利主教(Gregory of Nazianzus, c.330-389)极力称扬说："当我赞扬亚坦耐修，我是赞扬美德本身，因为他集所有的美德于一身。"他是教会正统信仰的房角石。或被称为"正统信仰之父"。

亚坦耐修一生，为了所坚信的道受苦，虽多遭迫害而不妥协，给主基督的教会立下了正统信仰的根基。最后的胜利要到 381 年，提奥道修(Theodosius)皇帝召开康士坦丁堡大会，才正式确立。在教会历史上，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是后继卫护"三位一体"信仰最重要的人。

附记：

在教会聚会中，最多唱的"三一颂"，只有简单的四句圣诗，在普及"三位一体"的教义上，却比深奥的神学论著，有更大的功效。

作者启恩主教(Thomas Ken, 1637-1711)，早年就是一名孤儿。牛津大学毕业后，进入英国圣公会事奉。1670 年，有"风流君王"之称的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任他为皇家牧师。启恩勇敢直言，指责宫廷败德罪行。英王虽然受责备，却很钦佩他的刚直；每到礼拜的时间，王说："我必须进去听启恩告诉我的错失。"后来，查理任命他为主教。十二天之后，那赏识他的朋友英王崩逝。

继位的雅各二世(James II)要回到罗马天主教信仰，颁"宗教容忍诏"；启恩和其他六位国教圣公会领袖拒绝宣布，因此被监禁；后得开释。1691 年，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 III)免除启恩主教职。他在隐没无闻中度过其余生二十年岁月。1711 年逝世。史学家 Macaulay 称他是受软弱限制的世人中，最近于完全的理想基督徒。

启恩很注意灵修。1673 年，他为温彻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的学生写了一个祷告手册，其中有早，晚，午夜的祷告诗三首，都以颂赞三一真神作结束的副歌。晨祷歌部分还有人唱，其余大部分被遗忘；但那副歌普遍流行，就是今天各教会采用的"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世上众民都当颂扬  
天上群众赞祂圣名 颂赞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 15.Ambrosius 安波罗修

安波罗修(St. Ambrosius, August Wilhelm, c.339-397) 出生不久，他任高卢总督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寡母在罗马抚养他长大，在那里受教育。因为他的姐姐是修女，所以他常同来往的教会中人接近。他参与政治，仕途一帆风顺，年约在三十岁，升任上义大利的巡抚，驻在米兰(Milan)。那时的米兰，是罗马帝国的陪都，皇家常在那里，不仅是政治中心，教会也相当发达。在离罗马的时候，年长的义大利总督 Probus 特别勉励他说："去，不要像作审判官，要像主教一样。"

安波罗修到任后，公义宽仁，极得人民爱戴。

374 年，亚流派的米兰主教死了。教会内的亚流派与尼西正统信仰的信徒相争，将形成分裂。安波罗修职责所在，走进教堂去平息风波。当他正向群众讲话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喊着说："让安波罗修作主教！"会众以为是出于神的声音，两派齐声唱和："阿们！"欢呼拥立他为主教。安波罗修只

能接受。不过，那时他还未受洗礼；于是，从权在八天之内，先受洗而后任主教。

安波罗修奉献全身心服事教会，成为最伟大的主教。满有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尊严，精力充沛，而有智慧。他立即变卖巨大的家产和财宝，除了留给作修女的姐姐养生的以外，全部用为赈济贫穷。他照当时的苦行规律，自奉简约，夜间用长时间祈祷，有时同会众彻夜祷告。他熟习圣经，有口才，有能力。他每主日讲道，有时周日也讲道。他接见所有的人，特别是贫穷需要的人。综括说来，是一位最理想的牧人。

379年，罗马皇帝提奥道修(Theodosius the Great, 347-395)即位。次年，他宣布只有信奉三一真神的，才是基督徒。他的皇都在康士坦丁堡。维伦廷念(Valentinian)为西罗马的同执政皇帝。皇太后朱丝汀娜(Justina)是个热心的亚流派信徒，想要占有米兰教堂。在386年一月，她怂恿她的儿子下令，让亚流派使用教堂，违者处死。但安波罗修坚决拒绝。在棕枝主日，他讲道宣布，不将任何教产交给异端分子。在长时期的争持中，他聚集信徒固守教堂，不容人侵入。他们作守夜祷告；恐怕有人疲倦入睡，安波罗修特别写了诗歌，在祷告会中唱，以保持儆醒。他坚持教会的独立，不绝受地上政权的干预。他主张：皇帝是“属于”教会，不是“超越”教会之上。因此，皇帝是平信徒，不能审判主教，该是教会顺命守分的儿子。在这期间，麦克新(maximus)率军入侵，维伦廷安母子逃亡到希腊。提奥道修应请求出兵，战败并处决麦克新，使维伦廷安复位作同皇帝。住在米兰期间，提奥道修引导维伦廷安放弃亚流派信仰，接受尼西亚信经。显然的，提奥道修是统治全罗马帝国的皇帝。

在米兰，提奥道修对米兰的主教甚为钦仰。在390年，帖撒罗尼迦的暴民杀死一名罗马将军。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军队严厉报复；到他后悔的时候，已无法收回成命。结果，军队围住圆剧场，不分男女老幼，屠杀了七千平民。残杀的消息传到米兰。

安波罗修禁止提奥道修圣餐，并阻止他进入教堂。在教堂大门口，主教对皇帝说：“你的手滴着杀人的血，怎能够举手祈祷？你怎敢用这双手，领受主最宝贵的身体？你怎能用口接受祂的宝血？走开！不要自己罪上加罪。”提奥道修说：“大卫王也曾犯过奸淫杀人的罪啊！”主教说：“如果像大卫一样犯罪，也要像大卫一样悔改！”

提奥道修皇帝谦卑接受教会的纪律，放下皇帝的尊严，作罪人公开的认罪忏悔；并且下诏凡是判定死刑的，必须在三十日后才处决。此后，主教准予恢复圣餐。后来，奥格斯丁说到提奥道修忏悔的情形，“见到皇帝那样痛悔的人，为他受感流泪；忘记了他对他们犯过错时的发怒，为他求情。”

主教与皇帝的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皇帝对人说：“最近发现唯一对我讲真理的人，他是我所知唯一配有主教名位的人。”

395年，罗马皇帝提奥道修在主教安波罗修的臂抱中安然逝世。安波罗修在他的葬礼中说，皇帝在病床上，关心教会的情况，过于他自己；又对他的将士说：“提奥道修的信仰，是你们的胜利；也愿你们的真诚和信心，成为他儿子们的力量。不信使人盲目；但信心和忠诚，必有成群的天使。”

两年后，安波罗修自己病重。他得到奇妙的启示，听到天上的声音，并且说，他看到基督含笑向他显现。他的书记和传记作者保林诺(Paulinus)，常在病榻旁，见证说：“在他离世前不久，他口授诗篇第四十三篇讲解，我看见他的头上，有盾牌形的小火焰；他的脸色变成洁白如雪，许久才恢复自然。”

397年四月四日，安波罗修主教安息了。

## 16. Augustine 奥古斯丁

"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中国人旧时庸俗的观念，怎会跟圣奥古斯丁扯在一起？这里所说的"黄金屋"，是指天上的居所；借着读神的话，奥古斯丁从堕落泥淖的少年，成为圣徒，得到属天的福分。这位从读书蒙福的圣徒，也很注重读书，并且写了教会史上重要的著作，使无数的人蒙福。

近二千年来，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不是转战沙场的英雄，不是纵横政坛的政治家，而是非洲人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354-430)。他的著作，是教会正统信仰的宝藏，而且一直影响西方的思想。

### 读书的效力

奥古斯丁生于354年十一月十三日，在非洲北部Tagaste镇，父亲任职镇上罗马政府，母亲慕尼加(Monica)，是个敬虔的基督徒。他母亲从小就带他去教堂学道。少年时代，对于文学就很有兴趣，特别熟悉维吉尔(Virgil)的诗。

370年，父亲送他去迦太基(Garthage)去学修辞学，主要是学辩论演讲，为作律师及从政的准备。到了那里不久，只有十七岁的奥古斯丁，就与一名女子同居，他们的关系维持了十年，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亚督达涂(Adeodatus)。

十九岁那年，读了一本西塞禄(Cocero)的著作 Hortensius

(今已失传)，使他进入哲学思考的领域，探索语文与实意的关系。以后，奥古斯丁读过圣经；不过，那未经重生高傲的心，以审判的态度读神的话，不领会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文不雅驯"而失望。但他终不能把圣经的印痕从思想中完全抹去；圣言的光辉，在他失迷的黑暗中不时浮现。

奥古斯丁在这灵魂的幽暗时期，在思想上他沉溺于摩尼教(Manicheism)，后又想从新柏拉图哲学寻求智慧；在生活上则耽于肉欲。他决定放弃法律，从事文学，在迦太基教修辞学。

377年，他参加诗歌比赛，得了奖。383年，奥古斯丁到了罗马。据传，他的修辞学颇有声名，还曾给皇帝写过讲稿。那时，米兰大城的代表，在罗马征选精于演讲的"发言人"，职务是为他们说话；奥古斯丁被选中。

384年，奥古斯丁到了米兰。他的父亲早已去世；那位恒常为他流泪祈祷的母亲，不仅用祷告托住他，也已经来与他同住。他已经悟到摩尼的假智慧，脱离了他们；但仍徘徊在迷茫的道路，无法挣开肉欲的捆绑，十分烦恼痛苦。

就是在那段时间，他作了那有名的祷告："主啊，使我作贞洁的人；但请慢一步！"这显明他的情形，正是："我也知道，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罗七：18,19)

有一天，在花园里，奥古斯丁心灵的深处，作了一番彻底的思省，觉察到自己的污秽悲惨，"经过大风

暴，眼泪如雨倾流。”忽然，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Tolle, lege; tolle, lege!)他起初以为是小孩子在玩甚么游戏；但附近没有小孩子，也不知有这种游戏。随即以为那是神的声音，走到树下，有一本他读过放在那里的使徒书信，打开，眼睛落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上面：“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可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不必再读下去，他知道那是对他说的话。就这样，疑云黑暗一扫而空，宁静和光明充满心中。

### 认识安伯罗修

在米兰的时候，奥古斯丁去到大教堂，听有名的主教安波罗修(St. Ambrosius, 339-397)讲道，并领受属灵的教导。于敬佩他的有能力的言辞之外，在那里的经验，使他领悟音乐在敬拜和教导中的重要。他说：“即使你不在意领受讲道，美妙的音乐，也把言词带进你的心里。”

从前的读书人，多是书声琅琅的诵读。根据试验，眼睛看书，耳朵同时听自己诵读，进入脑子里，会留下更为深刻的记忆。增进学习的效果。一般说来，华人多善记忆，可能是在这习惯下培养出来的。另一种读书方式是默读。奥古斯丁看到米兰主教安波罗修读书：“眼睛注视书页，心中研思，声音和舌头却是静止的。”这种方式，适于深入思索，可以领悟奥理。奥古斯丁也应用这样的阅读方式。

奥古斯丁也很喜欢小组集体研读。他说：“小人物一同讨论伟大的事，通常可以使他们长大。”这种读书法，可以有激发进入高深的好处；不仅能够得知识的长进，其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不过，这还要有一定的纪律，免得陷入不着边际的闲谈。

387年的复活节主日，安波罗修主教为奥古斯丁施洗；同时受洗的，有他的朋友，和唯一的亲生儿子亚督达涂。

### 故土的呼唤

最欢喜的，是奥古斯丁的母亲慕尼黑。这位伟大的贤德母亲，一生所盼望的，就是这一天。

在她儿子有属世的成功，看来前途光明的时候，她知道儿子是在迷途黑暗当中；作母亲的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为儿子得救祷告。有一次，她去见一位主教，求她劝导浪子奥古斯丁。主教的回答说，在神的时候他会回归。作母亲的还是继续求。主教似是不耐烦，预言般的说：“妇人，去吧！流这许多眼泪的母亲，她的儿子绝不会灭亡。”

过了不久，奥古斯丁决定回归非洲。他和母亲，儿子，快乐的三代，同着两个朋友，一同归去。慕尼黑跟着儿子，从非洲，到罗马，再到米兰，在踏上非洲的土地前，慕尼黑死在她儿子的臂抱中。这位良善的妇人，她的一生，好像只是为了别人活着：在丈夫死前不久，她的见证和祷告，使他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是他的祷告，使她的这个儿子，成为神圣洁合用的器皿，是神给教会的赐福。

奥古斯丁的悔改，包括实际的行动。他完全离开了从前的情妇，也为她预备了生活的费用；他自己则终身奉献给神，专心于事奉。

在故乡，奥古斯丁过了三年的隐修生活，安静的读经，写作。他的儿子亚督达涂死在389年。

## 移往希泊

391年，他偶然访问海港城市希泊(Hippo)。那里的教会，主教年老，正在寻找适合的人为长老帮助；众口一声选他为长老(监督)，像安波罗修在米兰的情形一样。稍后，他把在故乡创始的修院移到希泊。395年，被选继任主教。他在希泊事奉三十八年，直到离世。

他希泊，他居住的地方，成了一所修院。修士们一同过着简朴的生活。奥古斯丁经常穿一袭黑衣，几乎全是素食。很多人欢迎他的讲道，有时在餐桌上也作为讨论的教室。

奥古斯丁不反对知识。他反对的是为了求知而求知。他悲叹有学问的人不是圣徒，而圣徒却没有学问。他以为圣徒有了真理，也应该具备有效表达的方法，这就是修辞学的价值。他说："不论在甚么环境论述真理，在公众或私下，对个人或对多人，对友人或敌人，系统的讲论或偶遇的谈话，写单张，著书，或写信，不论长短"，都可以为用。

在读经方面，奥古斯丁的规律，是首重实践，以爱心行真理。透过信心的眼睛，信徒对神的话敬畏顺服，如同仆人，而不是作审判官审判经文；持定神的话，灵智就得洁净而生发爱心。他规定，绝不许讨论不在场者的品格。有十位主教和许多较低的教职人员，到他那里受教。他的影响力超越非洲，遍及西方教会。

奥古斯丁在讲道中说："在世界上，不能找到比修院中更好的人；在修院中，也有世上最坏的人。"因此，修院的规律极严，其中之一，是不容许妇女进入屋内；连他自己作女修院主持的姐姐，也不例外，来访必须有别人在场。

奥古斯丁一生著述甚多，最重要的有：论基督教教育，忏悔录，论三一真神，及上帝之城等。除了使徒以外，他是历史上对教会贡献最大的人。

430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十六岁的奥古斯丁，在朋友和学生环绕下，安然离开世界，进入永恒，去见他所事奉，所爱慕的主。

一千多年之后，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位修道士，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和另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在思想上主要是受奥古斯丁的启发和影响。以后的教会也是这样。

## 17. Jerome 耶柔米

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和使徒们，在新约中所引用旧约圣经的话，跟我们旧约的文字有些不同？当然意思还是一样；但差别的原因在哪里？不要猜是新的启示，或是另外的翻译；说来很简单：虽然主在世所用的是希伯来文圣经，但使徒写新约记载的时候，用的是希腊文，他们没有个别翻译，而采用了当时通用的希腊文译本旧约，就是一般所称为"七十士译本"，这样，就与希伯来文旧约直接译文有些微的差别。

据说，约在主前第三世纪，散居在埃及和希腊世界的犹太人，从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每支派选出六人，

共七十二人，以七十天的时间，翻译完成旧约成希腊文；Septuagint 于拉丁文是"七十"的意思，所以简称为 LXX。

这说明了翻译在传播上的重要；或更说，这样作，是出于圣灵的启示。

教会史上最伟大的圣经学者，译经家耶柔米 (St. Jerome, Sophronius Eusebius Hieronymus, c.342-420)，是早期拉丁

教父中最博学的人，精通古典文学，圣经语文和基督教传统，也是提倡修道院和守独身最力的人。是耶柔米从希腊文七十士译本旧约和新约，译成通俗拉丁的 Vulgate 圣经，被罗马教会接受为标准译本，一直通行。

耶柔米的父亲，很注重儿子的教育，从小栽培他的宗教信仰，和基本的文学，就送他去罗马。在那里，他学好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也受了异教的熏染。他虽然没有甚么重大恶习，但失去了敬虔。约在十八岁时，他受了洗礼。他自己说："在星期日，我常与同龄同好的青年们，去浏览地下墓穴，看先前圣徒的遗迹。"约在三年之后，他经历了灵里的觉醒，完全悔改归正。

在 374 年，耶柔米去到安提阿，在那里住了一些时候。在病中发高烧，恍惚被带到基督台前受审判。审判的主问起他是甚么人，耶柔米回答是基督徒。基督严厉的说："你在说谎！你是西塞禄(Cicero, 罗马文学家)的门徒；因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下令加以鞭笞，醒来后身上仍有余痛。他深信不是出于幻觉，认为是主的管教。因此立志他的手不再摸异教的书籍。他退到安提阿东南的旷野，在那里，他离群独居了四年，过着苦行隐居的生活。

远离尘嚣，努力克制肉体，仍然不能完全祛除试探，无法禁制思想的游荡，回忆在罗马的宴饮生活，搅扰他的思想。他长期禁食，俯伏在基督面前，痛哭认罪。他悟到了语文同思想的关系，去找一个归主的犹太信徒，学习希伯来字母和文法；艰难的新语文，占据了思想。他说："苦学是撒种，收获了甜美的果实。"他精通了希伯来文，增加了见证的负担。

382 年，耶柔米到了罗马，受罗马主教达玛苏(Damasus)邀约，担任他的神学顾问和秘书。在日常事务之外，耶柔米把四福音书由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并修订拉丁文诗篇。

耶柔米的博学诚实，圣洁行为，为人所敬仰；他的刻苦生活，与罗马的环境难以协调；他的正直敢言，对教职人员的糜烂生活，败德行动，口诛笔伐，则给他造成了不少仇敌。

384 年，达玛苏逝世。耶柔米感到"罗马居，大不易"。在罗马，他结识了敬虔而甚富裕的寡妇宝拉(Paula)和她守独身的女儿尤索贞(Eustochium)。反对的人，造作谰言，诬指他和宝拉有苟且行为。本来知道耶柔米品德，和修道院生活的人，都不会相信；但他不是肯静默不言的人，在一封信中，耶柔米愤慨的抗言，说明了当时叫人难以置信的修道苦行生活。他透露：没见过宝拉吃饭，她整天穿粗毛衣，睡时就地而卧，常整夜流泪祷告眼睛几乎失明，形销骨立；她歌唱诗篇，差不多可以记诵全部圣经，而且还学了希伯来文。修院又是集体生活，她的品德岂容有怀疑的余地？

385年，耶柔米和他的弟弟保林念(Paulinian)，同着几名修道士，离开罗马去安提阿。九个月后，宝拉和尤索贞，并一批敬虔的妇女也随着前往。他们一队行旅“经巴比伦到耶路撒冷；不是尼布甲尼撒，而是耶稣应当统治”。

他们到了伯利恒，由宝拉出资，建了一座修道院，三所女修院。耶柔米则住在一个岩石凿成的巨大洞穴中，近耶稣降生堂。他以余生从事写作，有多卷释经著作；他认为与真理不合的时候，就用笔墨论辩，奥古斯丁也曾是他笔战的对象。但他最大的成就，是用一人毕生之力，把全部圣经译成通俗拉丁文(缺少少数几卷次经)，就是武加大译本，成为罗马天主教所接受的标准译本，造福教会一千多年。

410年，罗马为蛮族攻破。耶柔米亲自看见那伟大古城的女儿，沦为奴隶，贵妇成为乞丐，难民群也涌到伯利恒。耶柔米说：“我不得不同他们悲哀，为他们哭泣。我放下了以西结注释的写作，几乎是全部的研读，每天把圣经的话化为动作，把圣徒般的言论实行出来。”

耶柔米工作过劳，加以禁食祈祷，最后，他的视力衰退，声音消失，仿佛只是一具影子。

420年九月三十日，耶柔米安然离开世界。

耶柔米的武加大译本圣经，却流传下去。

耶柔米的圣洁虔诚，使他成为合格的译经者；他译作的认真，文体的优美，都受到极大的尊敬。只是他所根据的版本，或某些语词，不是完全没有瑕疵的。到十六世纪，著名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c.1466-1536)于1516年，出版了他的希腊文新约，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宗教改革的时候，是根据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直接翻译。

## 18. Anthonios 安笃尼

*对自己的知识，是升到对神的知识和爱必需的唯一阶梯。 --安笃尼*

近代的文明，带给我们官感享受和物欲，知识的增进。不过，这些都不能使人满足；外面的，仪式的宗教，也是如此。于是，基督教近年的发展趋势，是转向“灵修神学”；不少的人回到早期教会的修道运动去找灵感；在物质的泉源不能够止渴，人智慧枯竭的时候，有人到埃及沙漠中，去寻找古代隐修者的脚踪。

修道运动的精神，大致是反对物欲，也不注重仪式宗教，不注重知识，而着重默想，灵修，追求内心的平安，过舍己效法基督的生活。安笃尼可算是修道运动的发起人。

安笃尼(St. antonios, 251-356)出生在上埃及一个名叫克马(Koma)的村镇。他的父母是基督徒，怕他沾染恶

习，不肯给他出外受教育；所以他不懂当时通用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学，只懂埃及的科普替(Coptic)方言。不过，他聪颖过人；奥古斯丁曾说，安笃尼听了人诵读即能记忆，并且能领悟其意义。

在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安笃尼的父母相继离世。留给他不薄的遗产，还有需要抚养的弱妹。大约过了半年，有一天，他到教堂，听到宣读基督对富有的少年所说的话："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安笃尼接受这经文是对他个人的命令；回家去，把良田给了他的邻舍，把其余的家产变卖了，以所得的价值分给穷人，只留下自己和妹妹养身必需。不久之后，在聚会中又听到基督的话："不要为明天忧虑"。他就把所保留的也作为赈济，把他妹妹送入修道院中。安笃尼自己，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避静独居，过着刻苦的生活。据说，安笃尼曾从底比斯的保罗(Paul of Thebes, 寿高 113 岁)受过教。

他谦卑，仁爱，祈祷默想的生活，和各样的品德，成为一时的楷模。他的食物只是饼和水，加一点盐，偶然也吃棕枣。每天只在日落时进食一次，有时三四天一餐。他睡在一条粗席上，或就地而卧。为了寻求更安静的地方，他再迁移到一个更远的山边废圯，是埋葬过死人的墓穴；只有一个朋友，每隔一段时间，给他送些食物。这样过了约十五年。

285 年，他三十五岁。他更远离人群，渡过了尼罗河的东支，在山边隐居。有二十年的时间，安笃尼甚少见甚么人，只有一个每半年给他来送食物的人，能见他的面。

305 年，他五十四岁的时候，他才出山，于法耘(Fayum)创立第一所修道院。以后，效法他隐修的人渐渐多起来，在他附近筑舍居住，形成几个小社区。到 313 年，安笃尼移至东沙漠的一座山上，位于红海和沙漠之间。为了帮助别人，他订立了隐修的规律。

早期的修道士，并不只是消极的隐居避世，过苦行生活；他们以为自己是基督精兵，灵战的先锋。他们禁食祷告，克制肉体的情欲，与魔鬼的军兵争战。据说，魔鬼曾经用可怕的声音，或幻化为各种形象，来恐吓安笃尼；有一次，甚至攻击他的身体，痛打他，使他受伤失去知觉；他的朋友发现他，躺卧在那里几乎要死。

亚力山大城的主教亚坦耐修(St. Athanasius)，是正统信仰的柱石，早年即与他相识，说到安笃尼如何长期与魔鬼的试诱争战：先是叫他想到家庭的快乐和责任，又叫他思想所过生活的艰难；见到这些伎俩无效，就试图叫他发起成功的骄傲，化成一个黑男孩童的样子，畏谨承认给他打败了。又一次，魔鬼化作修道士的形象，特别在安笃尼禁食的时候，来送饼给他；有时幻化为野兽，或妇女，或兵士，安笃尼忍受了许多此类的攻击，有人见证确有其事。

肉体的另一试探是闲懒贪惰。因此，安笃尼种植一小块菜园。他也日常编织草席。据说，有一次他和亚坦耐修同用餐，食物只有一块饼；二人争论该谁谢恩：亚坦耐修尊安笃尼的年长；安笃尼说亚坦耐修是主教位尊。

他独居生活，但有时为人祈祷，或探访病人。不过，他绝不夸耀祷告蒙神应允的事，因为那全是神作的；他也不愿高举神迹，因为主耶稣说过，更应该为了名记在天上欢喜。

安笃尼曾有两次间断静修，去过亚力山大城。311年，教会受迫害，他去亚力山大城，勉励将要殉道的圣徒，坚守所承认的信仰。有一次，他在异象中，看见有一匹骡子，踢翻了祭坛；后来果然有亚流派迫害教会的事。约在351年，年逾百岁的老人安笃尼，应主教亚坦耐修之请，去到亚力山大城，辟斥亚流派异端。那时，亚流已经死了，但他的党徒，在政治上仍有颇大的影响力，不承认三一真神；他们说，基督不过是被造的。安笃尼反驳说：如果那样，信基督就变成敬拜受造之物的异教一样。他在那里住居了不过几天，宣讲基督是与神同等同荣。合城的人都聚集，争去瞻仰那位高年圣徒的风采，欢喜听他讲道；连异教徒也为他庄严的风范震慑，围着要见他。许多人受感动归信主。在那几天因安笃尼而信的人，比平常一年中皈信的人还多。当亚坦耐修伴送他出城门的时候，安笃尼行了一件神迹，奉主的名使一个被鬼附的女子复原。

据拉丁教父耶柔米(St. Jerome)说，安笃尼在亚力山大见过最负盛名的盲学者岱迪玛(Didymus the Blind, c.313-398)。当时，亚力山大城是基督教世界神学教育的中心，亚坦耐修主教委任岱迪玛为学校的首长。岱迪玛自幼双目失明，一生为平信徒，却是学问渊博无比。年老的安笃尼鼓励那位青年学者，不要因目盲而灰心，却要以使徒所喜爱的内心光明为宝贵；那能够使我们看见神，并且燃起我们灵里爱上帝的火焰。异教的哲学家，也多来同安笃尼谈论，无不惊奇他的温柔和智慧。

约在337年，康士坦丁大帝和他的两位皇子，写信给安笃尼，请记念他们，为他们祷告。与他在一起的修道士们表示惊奇。安笃尼说：“不要为了皇帝写信给我这样的人而希奇；却要为主竟会写信给我们希奇；祂更差祂儿子来向我们说话。”他本来不想作覆，推说不会写信。但门徒极力催促，他才勉强给了一封覆信，信中说：“要为你敬拜基督而欢喜。不要因地上的权势而骄傲。要想到将来的审判，并要知道基督是唯一的真实永远君王。要行公义，爱人民，关心穷人。”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

356年，安笃尼病了。他嘱咐门徒们，把身上仅有的一件外衣和一块羊皮，送给亚坦耐修，作为共同信仰和团契的公开见证；另一块羊皮给另一位主教；剩下的一块粗麻布留给修道院。然后，与他们拥抱道别说：“再见，孩子们！安笃尼要去了，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了！”他就停止呼吸，安然离世。他在世寄居的年日是一百零五岁。据为他写传记的亚坦耐修说，安笃尼一生过苦行生活，到老饮食简单，却全然健康无病。他至终神志清醒，眼睛未花，牙齿虽然年久磨损，却全无脱落；手足四肢灵活如常。他的名声传遍罗马帝国。他没有受教育，没有属世的智慧，也没有人的才能，却对神虔诚，可以作圣徒的榜样。

爱，是人人欢迎的，也是乐育接受的。可见人是多么的需要爱。

如果在中世纪的教会历史中，找一个人物，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都能接受，那就是芳济，可称为“心的圣徒”。

芳济中译或作法兰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生于义大利中部村镇亚西溪。父亲彼得(Pietro di Bernardone)业布商。当他生的时候，父亲外出，母亲在教堂给他受洗的时候，取名约翰(Giovanni)；到父亲回家，给他改名为芳济，所以他的全名是 Francesco di Pietro di Bernardone)。早年生活虽然没有大恶，但贪爱世界，是当地浮华少年的领袖。

二十岁时，他参加过地区性战争，作俘虏约一年，才得释放回家。在 1205 年，芳济又参与亚普里亚(南义大利)战争，但中途得病。他梦见一所巨大的宫殿，里面有许多许多的军器，上面都画着十字架的徽记，他以为这都是他和兵士用的。后来，他又听见天上的声音说：“要服事主，不要服事人。”他就顺服回家。

他在一个洞里，静修了一些时候。他去到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广场上，遇见长大麻疯的乞丐，向他伸手乞讨。乍见的时候，他嫌恶退避；但随即上前亲吻那丑恶可怜的手。此后，他常同情麻疯病患者和贫穷的人，穿着跟他们一样，同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的需要。

回到亚西溪，有几个人同他在一起，同过团契宗教生活。

约在 1208 年，他在 St. Damiano 教堂里祷告，听到十字架发出声音说：“芳济，去修理我的殿！你看，已经快要倒塌了！”他以为是指教堂，立即照着去作。回到父亲的店里，拿了大批的布匹，驮在马上，连货物带马都卖掉了，把钱交给教堂。父亲发现大怒，断绝父子关系，但他说钱已奉献，不能够收回。父亲去见主教。芳济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忽然，他一件件脱下衣服来，脱得一丝不挂，就指着堆在地上的衣服说：“到现在我称彼得本纳德为父亲；从今以后，我只称‘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教拿了一件长袍给他遮体。从此以后，他完全奉献为基督生活。

1209 年，法兰西斯听到：“传扬，神的国近了！医治病人，叫长大麻疯的洁净，赶出污鬼。不要带金银，囊中也不要带铜钱。”他就丢掉杖，囊袋和鞋，把使徒不积存钱财的生活方式，当作规律。名声传扬开，跟从他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1210 年四月十六日，他同着十二个衣衫褴褛的人，去见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教皇高坐在宝座上，为了考验他的真诚，对他说：“去，兄弟，去到猪群里，跟他们滚在一起；看来你与他们相同的地方更多，把你设立的规律讲给他们听。”法兰西斯顺从了，然后回来报告：“主，我已照吩咐作了！”教皇本来不想理他，但他作了一个梦，有一棵棕树从他脚下长起来；又梦见罗马首座拉特兰教堂将要倾倒，芳济将它支持起来。因此，口头给了他设立修会的许可，准他传扬悔改的福音。芳济并不要求

教谕甚么的档作护符。

他立心照着主耶稣的脚踪行，在生活上效法主，遵行祂一切的教训，舍己背十字架，叫人悔改。他们基本的法则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24-16 节，第十九章 21 节；和路加福音第九章 1-6 节。

芳济修会的人数急剧增加。他也设立了女修会。他发愿与贫穷结婚，不积财产，也不拥有教产。他爱贫穷的人，也爱自然界，称太阳为"日兄"，月亮为"月姊"，死亡是"死亡姊妹"，叫自己的身体是"驴身兄"；他更强调"如果不珍爱基督为他死的人，就不是基督的朋友。"

他讲道给鸟听："鸟兄弟和鸟姊妹，你应该多多感谢创造的主，祂给你羽毛为衣，翅膀能飞，为你预备一切所需用的。你不种，也不收；祂却看顾你。"更希奇的是，他驯服一只为害乡里的恶狼。那狼张牙舞爪的迎着他奔来，芳济吩咐："狼兄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不要伤害我或任何人！"芳济应许赦免它过去的恶行，条件是今后不再伤害人。那狼同意了，俯首跪在他面前，成了芳济的宠物"古比奥"(Gubbio)。

芳济修会的人数超过了五千人。他自己时常要出去游行布道。1219 年，他游行义大利，又到埃及和叙利亚。

当时的红衣大主教乌果林(Cardinal Ugolino, 后来成为教皇贵格利九世 Gregory IX), 建议来帮助；芳济接受了。照乌果林的观点，为了教廷的长远利益，修会必须改弦更张。

1921 年，乌果林修订了修会的规律，守贫的规律也修改了，并依修道院的组织规律，任命凯他耐(Pietro di Catani)为法兰西斯修会的总主持。1221 年，在他死后，其职位由考徒纳(Elias of Cortona)继任。修会也有了建筑，给弟兄们居住。

芳济远行归来，发现局面一新。他接受了。对他的弟兄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就当我是死了。这里是彼得凯他耐兄，你们和我都要顺服他。"就跪伏在地，表明顺服听命。在他的遗嘱中，他自称"小弟兄"(frater parvulus)，并且承认"他是我的主"，无论往哪里去，作甚么事，都不能违背他的命令。

1223 年，芳济渐渐退出修会。1224 年八月，他退到亚西溪附近的拉维纳(La Verna)山上，禁食四十天。在那里，他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如何讨神的喜悦；三次翻开福音书，盼望得到回答，三次都落在基督的受难。在九月十四日，清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从天降下一个形象：有一个撒拉弗被钉在十字架上，两个翅膀高举，两个翅膀遮体；他的面貌极其美丽，向法兰西斯温柔的微笑着。芳济深为忧伤。最后，这异象消失了。在他的身上，却奇妙的留下了五处伤痕，正与基督被钉和枪扎的部位一样。他着力隐藏这些印记不肯示人；在离世以后，才发现。深知芳济的同工理奥(Bro. Leo)见证确见过那些圣痕记(Stigmata)。

此后，芳济继续在世两年。1226 年，十月三日，如理奥所说的："他移民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了，就是那位他全心所爱并跟从得最完全的主。"他的遗体安葬在亚西溪。

他的朋友乌果林(Ugolino da Segni, 1170-1241), 在他故乡风光明媚的亚西溪，为芳济纪念大教堂立了基石。

乌果林于次年成了教皇(1227-1241)，在芳济死后二年，晋封他为“圣芳济”。

修会的继任总主持考徒纳，在安葬芳济的大教堂那里，作了一具大理石容器，收纳捐献；理奥以为是污辱，把它砸得粉碎。因此，他被逐出。

芳济本人受教育不多，仅粗通拉丁文，写来不甚好；他喜欢法文，说得也不完全。但他全心见证主的福音，不怕吃苦，不为自己积财。他认为爱邻舍，作善工，比学问更要紧。1220年以后，修会也讲习神学；他表示同意，“只要不销灭谦卑和祷告的灵。”改组后的芳济修会，也渐重学术；英国的威廉俄坎(William of Occam)和罗哲培根(Roger Bacon)，都是芳济修会杰出的哲学家。

## 20.Dominic 多明尼加

如果说，芳济是“心的圣徒”，则多明尼加该是“头的圣徒”。他们二人是朋友，也都是乌果林(后为教皇贵格利二世)的朋友。

多明尼加(Dominic, 西班牙文为 Domingo de Guzman, c.1170-1221)是西班牙人。早年受神学及哲学教育，并静修五六年。约 1195 年，受教职。约在 1205 年，曾随主教出使到丹麦。经法国的时候，见到信徒没有真理根基，受到了加他利派(Cathari)所迷惑，随立志教导信众，并毕生反对异端。

1214 年，他去到罗马，见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教皇欢喜接见他，但想要拒绝他建立修会的请求。那夜，教皇作了一个梦：罗马天主教的首座拉特兰圣堂(Lateran Church)将要倒塌，多明尼加上前用肩担当起来。想起几年前，他作过相同的梦，那次是芳济(法兰西斯)支撑起将倒的大厦。于是，他口头应允了多明尼加。

两年后，1216 年八月，多明尼加与十六名同工商议，决定采取最老的奥古斯丁修会规律。十月，多明尼加再到罗马。那时，坐在教皇位上的，已换了和挪留三世(Honorius III)，正式批准了他修会立案的请求。他继续留在罗马，到次年的复活节；在那段时间，结识了红衣主教乌果林(Ugolino)，后来的教皇贵格利九世(Gregory IX)，和圣芳济修会的创立人。

据说，多明尼加作了一个梦：世界罪恶满盈，将遭受神的毁灭，有两个人祈求，挽回神怒；其中一个是他本人，还有个不相识的陌生人。第二天，在教堂里祷告，见有一名乞丐走进来；他注视那人的面貌，竟是梦中所见的人：就是芳济。就这样，两个修会的创立人结交了。这个传说难以证实；但两个修会有个传统，在他们各自的创立纪念日，约请另一修会的会士来主持弥撒，共领圣餐，一直流传下来。多么美好的传统！

1217 年八月，加他利异端流行。加特利的意思本是“洁淨”；他们相信二元论，轻视物质，主张受苦，弃绝世界，只有加入他们“独一的真教会”才可以得救；又名为亚勒比根斯派(Abbigenses)。多明尼加把他的会士们分散开来：四名回到西班牙，七名去巴黎，两名回法国古城陶勒斯(Toulouse)，两名去法国

南部的普若邑(Prouille)，他自己则再去罗马。

抵达罗马后，教皇给他去塞思图教堂(San Sisto Vecchio)讲道。多明尼加在那里讲神学；又在圣彼得堂讲道。这系列的演讲持续了几个月；他的口才吸引了全城的人，也行了神迹奇事，包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使一个已死去的少年人，名叫乃朴良(Napoleon)复活。

1218年，他游行西班牙，法国，继往意大利；在1219年夏天，他到了北部的古城保诺尼亚(拉丁 Bononia, 即 Bologna)就定居在那里，后来也在那城离世。

他是个注重计画和规律的人。多明尼加首先决定建立的两个中心，是在巴黎和保诺尼亚，因为那里是欧洲两所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学。他在大学的附近，各建立一所神学院。多明尼加修会，着重传道救人的灵魂，也是首先规定会士必须定时研读，明白圣经。因此，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传道者。他注重城市的工作，依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在城市和各学术中心，设立据点；因此，影响了中世纪的大学教育。所以他被称为“欧洲第一个建立公众教育的使者”。他离世不久，多明尼加修会遍及欧洲各国的重要城市。

多明尼加善于规画，组织，注重纪律。他有远象，有理想和信念，然后熏陶造就他的会士，清楚指示方略和步骤，交给他们去执行，并完全信任他们。他很有说服能力；在早年，路过兰桂道(Languedoc)的时候，看出居停主人的深陷加他利异端信仰的迷误，彻夜开导，直到晨光临到，那人也进入光明。据说，他给人的印象是谈吐温和，连受到责备的人，在离去时也会欢喜。有人问他的讲章是如何研读来的。他说：“没有别的，只有爱。”

多明尼加修会因为坚持信仰，丰于知识，积极参预异端裁判所事工。因此，但丁(Dante Alighieri)说：“他对于朋友和善可爱，对于仇敌严厉可畏。”

多明尼加旅行遍远。访问威尼斯归来，他走完了在地上最后的路程，于1221年八月六日去世。他给修会的遗言：“作为我深爱的儿子们，我要求你们彼此相爱，谦自持卑，甘愿守贫。”

多明尼加修会最有名的会士，多马亚奎那(Thoma Aquino, c.1225-1274)，是建立罗马天主教系统神学的人，并著名哲学家。他的著作 Summa Theologica 被教廷定为正统教义和伦理学权威。

## 21. Thomas Aquinas 亚奎那

多明尼加修院，来了一名新学生：多马阿奎那。同学送他一个雅号“笨牛”，因为他体型肥胖，沉默。在课堂论辩的时候，那些预备作教职的少年们，都表现聪明伶俐；只有阿奎那常是静听，讷讷若不能言。教授和同学，都看他不起眼。

有一名好心的同学，以为他听不懂，自抱奋勇愿意给他补习，讲解每天的课程；亚奎那感谢接受了。但在进行过程中，遇难解的问题，教的人弄不出头绪；学生给他解说得清楚而极正确，以至使那同学惊异。不久，那同学看到了亚奎那的一份笔记，拿给教授看；教授希奇他学术上的高深程度。第二天，给他公开测验，在结束的时候，著名的大亚伯特宣告说：“我们以为多马弟兄是笨牛；但我告诉你们，有一天他的牛鸣要声彻地极！”

亚奎那一生勤劳治学，而为人谦卑敬虔，对教皇顺从，似乎是牛；但并不笨：他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干，以后几百年来，被罗马天主教奉为神学权威，至今治神学的人，必须熟习他的思想。

多马亚奎那(Thomas Aquinas, c.1225-1274)，出身贵族世家，父亲是伯爵(Count Aquino)，家道富有。他是四个男孩子中最年幼的。在五岁的时候，被送到家附近古老的凯西诺修道院(Abbey of Monte Cassino)受基本教育；十四岁那年，进了义大利的那浦里斯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在那里，他的教师是多明尼加会士，给他很深的印象，以至也立志进入修会。

他的家庭坚决反对：他们希望他将来作修道院督，或作大主教；因为那会有好的收入和声誉。1244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多马穿上多明尼加会士的黑衣，要往巴黎去读神学。他母亲派在皇家军中的两个哥哥，挟制他回家，软禁了十五个月；用妓女引诱他，又应许给他买那浦里斯大主教的职位。多明尼加修会同时上诉于教皇和皇帝；他的家庭见多马意志坚定，不为所动，只好让他走自己的路。

1245年，多马到了巴黎多明尼加修院，在著名的大亚伯特(Albertus Magus)门下受教。1248年，随着他的老师去科隆(Cologne)，作特别学生。研读四年之后，得了神学士学位，亚伯特介绍他回巴黎任教，并准备得硕士学位。他在那里执教四年，教导清新，析理论证详明，深得学生喜爱。照当时的规定，必须超过三十四岁，才可以作硕士；而在1256年，亚奎那只过三十一岁，就破例授予硕士，成为巴黎大学二位主任教授之一。

十字军东征中，发现了亚理斯多德(Aristotle)的著作，使学者可以有直接从希腊原文译成拉丁文，而不必再从阿拉伯文转译，可以增进正确的了解；但也助长了所谓科学和理性思考方式。亚奎那对亚理斯多德研思精深，成为他自己思想的主干，特别推重其伦理学；也对之极为尊敬，常称之为“哲学家”而不名。但亚奎那把人的知识领域分为二阶层：在自然科学和伦理问题上，可以运用理性；在属神方面，则必须赖启示和信心。他的思想立场为教廷接受，教皇对亚奎那尊重信赖，遇有重大问题，常请教他，以他为神学顾问和讲师。

1259至1268年，约有十年，他精力最旺盛，思想成熟的时间，用在义大利，受任为总教习，在各地学术中心，讲道授学；那也是他最有成果的时期。约在1266年，开始写作他最著名的系统神学 Summa Theologiae。

1269年初，亚奎那忽然被召返巴黎。因为有的学者，对于在神学研究上应用亚理斯多德有异议。亚奎那的讲述和论著成为定论，解决了争议。

1272年，他再应请到义大利，特任他负责重新制订所有神学课程，并由他选定地点。阿奎那选了海港城市那浦里斯大学，受任为监督。在那里，他开了系列的神学讲座，并写作了许多论著。

他的写作事奉忽然终止。在1273年十二月六日，正在主持弥撒的时候，他似乎是见到了异象，使他决定停笔，连他的系统神学也未完成。他说："我的工作要停止了。照我所得的启示，我所写的不过是干草！"

1274年，他奉教皇命贵格利十世的命令，去参加里昂大会(General Council of Lyons)，因病退席。最后，亚奎那应修会士们的请求，扶病讲解雅歌。三月七日离开了世界。

亚奎那有极大的才学，注重祷告生活。他常说，他在十字架下所得的，远超过从书本上学习的。有人因为他有这样大的成就，问他有没有过骄傲与虚荣的试探；回答是"没有"。他又说，如果偶而有这样的意念，常识立即告诉他，那是多么不合理的。他更常想到别人比自己强，不以为自己的意见有甚了不起。他为人极其谦和，在论辩中，从不动气；不论别人如何的激动，也不会出语伤人。

## 22.MartinLuther 马丁路德

在易北河(Elbe River)上，静静的卧着威登堡(Wittenberg)古城，是撒克森选侯腓德烈(Frederick the Wise of Saxony)的宫邸所在地。1502年，他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大学，他很爱那所新大学；虽然规模不大，但水准不差，有些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士在校执教。有一位圣经神学教授，是修道士马丁路德博士(Martin Luther, Th.D., 1483-1546)

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诸圣节前夕。马丁路德把一张拉丁文的告白钉在教堂的大门上：邀请参加"关于赎罪券功能的辩论，出于爱心和对真理的热诚，愿公之于亮光中"，有九十五条。那时，大学中常有这种辩论会；而教堂的大门，用来作公告板，发起的人，是一位忠心的修道士。

那份九十五条公告是印刷的；同时，他也送出一些给朋友们，和当地教职位人员。辩论会并没有举行；其中一份公告到了迈恩的大主教亚伯特(Albert, archbishop of Mainz)手里；亚伯特主要是包销赎罪券的人之一。他跟几个神学家商量，结论是应该送去罗马，并要求对马丁路德采取压制行动，同时责戒赎罪券贩子，不得过分夸张街售。到1518年初，公告已经被翻印，传送到好些城市，要求教会改革。主题

成了宗教与钱财的关系。在不到一个月之内，欧洲各大学和宗教中心，都掀起一片热潮。

在圣经正典中，并没有“炼狱” (purgatory)的教义，而是出于次经马克比书第十二章 45 节为死人祷告；再经过人加上些圣经中断章取义的字句，甚或异教的传说，汇成了如此一个想象的存在。

至于赎罪券的观念，可能起于对罪咎补赎的自然思想。即使是堕落的人，心中也有会公义的火星。而教会或行政机关，也有罚缓的规定；而且那时已经流行善功观念。在 1095 年，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发动第一次十字军，宣称志愿从征武装朝圣的人，可以抵减死后在炼狱受苦的刑期，而早得超脱。到了 1300 年左右，教廷宣称好多种的善功，都可以得到赎罪的效果，包括“禧年”去罗马朝圣。而为死人买了赎罪券，竟可以有万应的效果，甚至荒唐到可以未犯罪前，预付赎罪券，等于炼狱保险。为甚么能有这种效力呢？因为教廷有个“善功库”，历代圣徒的善功都存在里面，教皇可以随意拨付给合意的人，就是出得起价钱的人，所得的财富，没有谁能质问他的滥用；他有了彼得传下来的“钥匙权” (太一六：18)，不必担心要向任何人交账。一句话：有钱斯有理！在所有的教义中，再没有更荒唐的，而且违背圣经中所有的重要教训。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和天主教内的改革，到了天特大会(1562 年)，决定停止那项败坏教会的行动；但是仅在几十年前，那提出抗议的人，是冒着被判为异端，和烧死在火刑柱的危险。

#### 渺小的修道士

马丁路德的父亲翰斯(Hans)，在铜矿工作，自己有冶炉，虽然说不上富有，但家道小康，能够送儿子马丁路德去厄福大学(University of Erfurt)，盼望他成为律师。1502 年，他完成了学士；1505 年，得了硕士；开始修读法律。在同年七月二日的大雷雨中，闪电霹雳交作，近在他的身边。马丁路德在恐惧中许愿说，愿意作修道士，就进了奥古斯丁修院。两年后，正式成为神甫。

1509 年，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大学完成了圣经学士。

1510 年，路德去了罗马。在那里，看到教职人员的奢侈和败坏生活，使他震惊；他真诚苦行的心志，受到了摇动。

司陶辟滋(Johann von Staupitz, 1460-1524)对路德一生的影响甚大。他是当地奥古斯丁修院的主持，是路德的教师，良友，和支持者。在他的劝促之下，路德继续神学博士，并且于 1512 年，完成学位，成为威登堡大学的圣经教授；后来接替司陶辟滋为主任教授，一生事奉，直到他离世前不久。

1515 和 1516 年，在教授保罗致罗马人书信和加拉太书信的时候，研思“神的义”的话。路德对这个“义”字，以为是对付罪人公义的审判，使他困恼。他仍然对善功的观念未存怀疑；心中对公义的神惧怕，有时甚至私下怀恨：“我对那位公义刑罚罪人的神，说不上爱。我对祂隐存忿怒；我恨祂，因为可怜的罪人，在律法和悲惨恐惧下生活，不但被原罪毁坏，还要受福音折磨。...”

他祷告，默想，反复思考经文的涵义，最后得到了亮光：称义不是神公义的审判，不是人的义行，而

是神给人的恩赐。不是人去作，而是人去接受。”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心。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一：17)

路德本来能默诵全部新约圣经，和旧约的大部分；但到现在，这经文对他竟变成了全然新的。他说：“我觉得自己得到了重生，经过敞开的门，进入了乐园！”

他以为这是圣经的神经中枢；这也成为宗教改革神学结构的根基。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信的人：神的怜悯，使人的罪得以赦免，良心得以洁净；使人不再负罪疚的重担，而能由喜乐感恩，而产生顺服，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在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时候，罗马书第三章 28 节，路德译为：“人称义是[惟独]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有人批评他擅加了字，与原文不符；他坚持在德文文法上有必要。

改革运动的明确口号是：惟独信心(sola fides)，惟独恩典(sola gratia)，惟独基督(solus Christus)。这原则使人人可以了解，促成宗教改革的迅速发展。其本源则在于圣经：罗马书主旨是因信成义；加拉太书是恩典胜于律法，基督徒的自由；希伯来书则论基督是唯一的永远大祭司和中保，信徒皆为祭司。这形成了十字架神学的架构，宗教改革的信仰基础。

这是我的立场

迈恩的大主教，把路德的九十五条抗辩呈到罗马。教皇的反应，只是谕令奥古斯丁修会的总主持，处分那不守规矩的会士；那需要经过司陶辟滋。结果，路德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答辩书。然后，德国奥古斯丁修会在海德堡(Heidelberg)开会辩论，免除了路德区会监督的职务。

在这期间，路德热心的朋友，为他说话，而与反对他的多明尼加修会展开论战。多明尼加修会不甘示弱，指控路德是异端，要求罗马惩戒。但教皇投鼠忌器，不愿得罪威登堡的选侯腓德烈，交由红衣主教处理。德国许多学术界和教会的人，都渐渐站在路德一边。路德的态度，更明显的表示，没有服从教皇权威的意愿，只有神的话可以折服他。红衣大主教向选侯腓德烈控诉路德的桀骜不驯；威登堡的教员们，则要求他坚定支持路德，因为这关系大学的声誉和权威。

1520 年，威登堡的学生，在城门广场上，把教廷的书籍点火焚烧；路德自己把教皇谕令投在烈焰中，并且宣告：“因为你污损神的真理，愿神把你毁灭在这火里！”

到此地步，教皇不能再忍受。1521 年一月，教廷正式颁谕开除路德教籍。

四月间，德国议会在沃木斯(Diet of Worms)集会。腓德烈取得青年皇帝查理五世的许诺，不在听证以前定路德的罪。路德拒绝朋友们善意的劝阻，不顾危险，决定自己去大会。路德说：“即使鬼魔像屋顶上的瓦那样多，充塞沃木斯，为了神的真理，我也必须去！”有一群德国的武士，和许多民众，都站在路侧，表示支持他。路德成了举世瞩目的英雄。

四月十七日，路德站在大会之前。整个的大厅都满了人。一大堆路德所写的著作，放在那里。皇帝对待路德态度冷酷而不友善。问他要不要收回所持的意见。在读出那些书籍和文章的题目后，路德显得软弱，不愿立即以是否回答，低声要求回去再慎重思考。议会允准了。

那夜，路德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

第二天，四月十八日，下午六点，马丁路德庄肃而坚定的站在那里，与厄克(Johann Maier Eck, 1486-1543)对辩。

皇帝的代表问他，是否认错收回这些所发表的意见。路德清晰响亮著名的回答，震动了欧洲，决定了历史：

"除非圣经或理由清楚的说服我（我不信任教皇，也不相信总议会，因为他们时常错误，也自相矛盾），我受所引用的圣经约束，我的良心受神的话捆绑。我不能，也不愿收回任何的意见，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当。我不能那样作。这是我的立场，求神帮助我。”

路德昂然从仇敌中间走过，进到外面他的朋友中间。他扬起双臂，作出胜利的表达。

皇帝称路德是"恶名彰着的异端分子”，"恶魔化身”；他和他的党徒都该除灭。沃木斯议会定路德为"罪犯”，他的著作是违法的，应予禁止并焚烧。

### 隐藏的丰收

路德失踪了。他被许多名蒙面武士"绑架”，拥簇着进入了绿色的密林中。那是他朋友们的安排，经过腓德烈同意。

在幄特堡，却出现了一名武士乔治(Knight George)。他脱下修士的长袍，穿着平常衣服，蓄起了胡须。在寂静的环境中，路德有时情绪消沉，但他忙于著述：马利亚尊主颂注释，新约书信和福音书注释等。但最重要的是路德把圣经从原文译成德文(新约部分于 1522 年出版；旧约部分于 1534 年出版)。德文圣经的出版，使所有德国人可以读到他们自己的语言，了解神的话；不仅有助于宗教改革的进行，也影响了德文的发展规范，并且成为译经的典型。

没有路德的威登堡，陷于混乱当中。失去了信仰中心，几乎是各人任意而行。"先知”们忽然出现，自称得了启示，见了异象，作了异梦；而这些人各说各的话，他们的"启示”并不相符。有的则反对十一奉献，反对借放债取利。最危险的煽动者是牟则尔(Thomas Muntzer, c.1490-1525)，一个神秘主义者，激进分子；他本来是路德的跟从者；竟反对路德，写文章诋毁路德是"酒徒和说谎者”，只有他自己才有真理；后来参与农民暴动，事败被捕处决。

路德写信给选侯腓德烈说，现在不是你保护我，是我保护你的时候了。于 1522 年三月，他"出山”回到威登堡，住在那里直到离世。

有了路德的坚定领导，在登台传讲，又为文宣扬，秩序就恢复了。由于路德反对暴力，他支援镇压 1524 年农民暴动，也维系了社会秩序。

路德居住在威登堡，讲道教导；不过，他是非法罪犯的身分，他可以著述，写信，但不便在外公开活动。他没有跟腓德烈见面。

当时最著名学者经学权威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c.1466-1536)同情路德的立场，但认为他不必要过于激烈；也不赞成“教皇无情的谕旨”。在 1520 年十二月二十日，选侯腓德烈与他相遇，问起他对路德的意见。那位智者回答说：

“马丁路德犯了两项罪：他碰撞了教皇的冠冕，和教士的肚腹。”

选侯听了微笑，至死记得；这也成了千古名言。

他们相见五天之后，路德焚烧了教谕；沃木斯议会后，宗教改革的形势已成。伊拉斯谟写信给朋友说：“现在我们所能作的，是向最高良善和权能的基督祷告，祂能够使万事成为有益的；因为只有祂能作。”

## 路德的影响

路德有坚定的信念，雄辩的口才，系统的教导；但更有效的是他的健笔：神的恩赐藉他流露出来。他写得快而犀利，越是在受激动攻击的时候，更显出其锐不可当。在那时，德国的印刷厂，有三分之二因路德的写作而生意兴旺。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他没有远出过；但路德的著作，风行全欧洲，从君王贵族，学术界和宗教界，以至贩夫走卒，都受他的影响。

作为卓越的领袖，有许多远近的景慕者和跟从者，但他的至友和继承者，是墨兰顿(Philip Melancthon, 1497-1560)。路德自承生来擅场与鬼魔争战，但墨兰顿是和风细雨，能造就人。他说：“我喜欢腓力墨兰顿的书，过于我自己的作品。”路德时常向别人称赞他的学术成就和品德。这是多么难得的领袖风范！在翻译圣经时，他认为工作重要，邀约墨兰顿参与，但绝大部分是路德本人的贡献。路德不能公开外出参加的重要会议，都由墨兰顿代为出席，而能更和婉的表示路德的主张。在折冲樽俎，制订规章上，他的表现都甚出色。他更被称为德国的教师，当然也有路德的影响。至于墨兰顿，早就与路德在威登堡大学共事，彼此相知甚深，志同道合。在 1520 年初，墨兰顿宣称，他“宁死也不与路德分离”。同年十一月，他又说：“路德的利益重过我自己的生命。”

在威登堡大学，有路德的一班同工，他们持守相同的改革信仰，分头往不同的城镇，把信息传播开。布瑟(Martin Bucer, 1491-1551)原属多明尼加修会，后来接受了路德的信仰，是司陶斯堡(Strasbourg)改革运动领袖。

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于 1538-1541 年，在他门下受教三年之久，型铸了他的思想。布瑟则于 1548 年，到了英国，他一生的末后三年，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任教授；剑桥产生了很多英国清

教徒。

路德深知音乐的重要。他认为应该用音乐来敬拜神，并教导信徒。因此他鼓励同工写作诗歌；他自己创作了几十首，其中“上主是我坚固保障”，采取诗篇第四十六篇为主旨，是在情绪低落中写的。1527年，他自己有相当长的时期患病，威登堡地区有瘟疫流行，周围是死亡的阴影威胁着，有些朋友死了；他的家成为临时医院，需要照顾病患。他的笔下却涌出了信心之歌，家传户诵，很快全欧洲都唱起来，激励宗教改革的信念。

1525年，路德同凯瑟琳(Katherina von Bora, 1499-1552)结了婚。凯瑟琳原是修女。这表明他们坚决摒弃罗马天主教守独身的传统。婚后生活快乐美满，育子女六人，前一子二女相继夭亡；只有二子马丁和保罗，幼女玛歌丽特活到成人。他们家中晚餐后，常一起唱歌敬拜，有时客人也参加，或奏乐，或唱歌，其乐融融。

路德晚年的健康不佳。但他仍然勉力写作。1546年，两位贵族不和，路德扶病冒雪去调停。分争解决了。但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却病深不起。二月十八日，马丁路德在他的故乡爱瑟滨逝世。

### 23. John Calvin 加尔文

敌人的称赞是最真实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在日内瓦逝世，当时的教皇是庇乌士四世 (Pius IV, 在位1559-1565)。他当然不会哀悼，却真诚的说：“那持异端者的能力，在于金钱对他全无吸引力。如果我有这样的仆人，我的疆域必然会扩展，从这海到那海。”

近代美国史学家杜兰特(William Durant, 1885-1981)，对加尔文素无好感，但认为他的著作，是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十大重要作品之一。

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 1509-1564)，是宗教改革运动第二代最杰出的人物，也影响教会最深，于1509年七月十日，生在法国的诺阳(Noyon)，父亲是主教的秘书。在十四岁时，父亲送他去巴黎著名的芒太谷大学(College de Montaigu)，预备将来修读神学；但看到律师的收入丰厚，改变了主意，要他学法。因此，完成文学硕士学位后，他照父亲的意愿，赴奥良(Orleans)大学，修读法律。他父亲于1531年逝世，加尔文再返巴黎，研读古典文学和历史，有高深的成就。

约在1533年，加尔文接受了宗教改革信仰，忽然悔改归正。不久，他就开始传播宗教改革，许多人来向他求教。在次年，大学教授间因信仰分争，引起政府注意；他逃离巴黎，到瑞士的巴瑟(Basel)，在那里自己研读圣经和神学。1536年三月，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初版隐名出版，原是扩充的教义问答形式，阐明宗教改革的主要信仰。那书立即被认为是有系统的权威信仰解释。

以后，他继续修订，至 1560 年，成为定本。

1536 年八月，加尔文要往司陶斯堡去，因为发生战争，路途受阻，必须转道日内瓦。原想只住一夜，继续行程。他的表兄奥理维坦(Olivetan, 本名 Pierre Robert, 1503-1538)，在瑞士的法语区居住，完成了法文圣经翻译。那时，日内瓦是一个独立成邦，经过法锐勒(Guillaume Farel, 1489-1565)和富瑞(Pierre Viret, 1511-1571)的教化，和奥理维坦的帮助，日内瓦已从罗马天主教转变成为归正信仰。法锐勒知道了加尔文在那里，就直接进到他的住处，要他留下来，一同进行宗教改革。加尔文吃了一惊，像耶利米一样，他声明自己畏怯怕事，不能胜任领导改革工作，只想安静的读书写作，对教会或许更有帮助。但法锐勒坚持不让，劝说无效，他如雷一般的命令，并且加上咒诅说，如果他不参与这重要的事工，神必不赐福他。从那时候起，加尔文的生命和事奉，就与日内瓦连在一起了。不过，他第一次的居留时间，并没有太长，只制订了教义问答；因为纪律问题，市政领袖们意见不同，而致法锐勒和加尔文同被逐出日内瓦，去司陶斯堡。

到了司陶斯堡，加尔文接受了法语聚会的邀请任教牧。在那里三年的时间，是加尔文生命中的转捩点，有丰富的收获。他在当地的宗教改革领袖布瑟(Martin Bucer, 1491-1551)足下受教，从布瑟领受了预定论，教会的组织，及宇宙性教会的观点。

1539 年，天主教的红衣大主教塞杜徒 (Cardinal Jacopo Sadoletto) 写信给日内瓦，劝说他们回到罗马旗下。由于其人博学善文，日内瓦无法辩答，想起了加尔文，只得转向以前驱逐出境的人，请求他代表写信回复。他就写了复塞杜徒书，有系统的说明宗教改革的神学立场，是极好的护教作品。

1540 年，他出版了罗马书注释，是神学上的重要著作。同年，加尔文与爱德丽(Idelette de Bure)结婚，特地邀他的好朋友法锐勒主持婚礼；新娘是有两个孩子的寡妇，敬虔爱主，二人志同道合，相爱甚深。爱德丽也很能照顾丈夫的生活，在事奉上是很大的帮助。

日内瓦的教会领袖，感觉无以应付动荡的局势，需要加尔文的领导，劝说他回日内瓦。加尔文记得从前在那里的不愉快经验说：“我宁愿面对死亡一百次；如果我可以自由选择，我愿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作任何的事。”他实不愿再踏上那块土地。是甚么改变了他的意见？他相信并顺从神的主权。他说：“我把我的心作为祭物献给主。”他的印记就是手捧着一颗焚烧的心，也是他一生的目标。

1541 年九月十三日，加尔文回到了日内瓦，并且在那里事奉了二十三年，直到离开世界。

不久，议会专差的向导和马车，迎接爱德丽和孩子并家俱来。他们的家在离大座堂不远一条僻静的街上，后面是清澈碧蓝的湖水，院中有个小菜园，是理想和平的家，也是写作的美好环境。那城里虽然有反对的人，但有更多是他的朋友。只是他们伉俪在一起生活仅仅九年，爱德丽于 1549 年就离世了。加尔文未再续娶，作了好的继父，如诺把两个孩子抚育长大。

加尔文着心建立改革的教会，日内瓦议会接纳所拟订的规程。教会有四种职位：1.教师，要明白圣经神的启示，明察神学和哲学的思潮，供应教会需要；2.传道牧师，讲解神的话，主持圣礼；3.长老负责属灵的栽培和纪律，关心会众接受福音信仰，并用于社区生活；4.执事管理事务，经手财务和救济。

加尔文注重传讲圣经真理。据说：他的讲演不如路德，文章则超越路德。他把他系统性的讲道，辑印成书出版流传，影响更广大的人群，特别是邻近的城邦，如：本恩(Bern)和洛桑(Lausanne)，都接受了加尔文的改革信仰。

在日内瓦，他建立了教牧协会，负责甄聘新教牧，考查并维护信仰；起初有九位成员，加尔文任主席直到离世。

日内瓦在加尔文坚持之下，建立了一个纪律机构，类似法庭，叫 Consistory，由教牧和长老组成，并有议会成员参加，以决定纪律行动，裁定开除教籍，禁止圣餐等惩戒事宜。

为了坚持信仰，加尔文一直不缺乏反对的仇敌。有人给他的狗取名“加尔文”。有一个开斯梯路 (Sebastian Castellio, 1515-1563)，原是朋友，后来被放逐，一生以反对诋毁加尔文为事，直到死时。不过，反对者归罪于加尔文不能容忍，是为了塞维多(Michael Servetus)事件。塞维多否认三一真神，被罗马天主教定为褻渎罪，判受火刑，越狱逃亡。许多年前，加尔文曾冒生命危险，回到巴黎，只为想劝他悔改，但他执迷不悟。后来在全欧洲无法立足，逃到日内瓦，被人认出，逮捕入狱，依然不改。结果，被判受火刑；加尔文请求改为比较人道的刑罚，而被拒绝，竟如判决执行。

加尔文最著名的观点，是他的“预定论”。但他的神学系统，博大精深，影响深广而久远。他另一项重大的建树，是成立日内瓦学院(Geneva Academy)，委任比撒(Theodore Beza, 1519-1605)为院主兼希腊文教授。后来成为日内瓦大学。比撒则成为加尔文的继承人，并为日内瓦教牧协会主席。是他论加尔文说：“我是十六年的见证人，我想，我有资格说：这人一生到死，表现出基督徒的典型，不容易消逝，也极难效法。”

加尔文完全相信神的主权，想把圣经原则，应用在生活的每一部分。他谦卑而且舍己，敬虔注重祷告。他认为：“灵命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最重要的表现是祷告。”

他勤劳工作，远超过他软弱的健康所能负担。在生病的时候，不能步行到几百呎外的教堂；他要人用椅子抬去讲道；医生禁止他在寒冬外出，他把卧室当作教室。在世的最后时刻，他还要讲完玛拉基书。有人劝他休息，他说：“甚么！你愿意主来的时候，发现我闲懒？”

1564年五月二十七日，不到五十五岁的加尔文，为主烧尽了。当他来的时候，日内瓦动荡混乱；在他离世的时候，日内瓦成为最接近完全的地方。

加尔文主义五要点：T.U.L.I.P

荷兰以有很多美丽的花著名，但这特别的郁金香(TULIP)更传播远近。

经过了不到半个世纪，加尔文宗教改革信仰，已在荷兰盛行。但在荷兰新成立的礼敦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 1576)，一名最初入学的学生，后来成为神学教授，名阿民念(Jacobus Arminius, 原名 Jacob Narmenszoon, 1559-1609) 表示不相信神的拣选和保守，有些人跟随他，与正统的加尔文信仰者争论不休。

1618 年，荷兰改革宗教会在多特(Dordrecht, 或 Dort)召开大会，邀请欧洲改革宗教会代表参加。那时，阿民念已经离世九年。大会拒绝阿民念教义，宣布正统加尔文主义标准，即是五要点：

**Total Depravity 全然的败坏**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的保守**

因为堕落的人性全然败坏，无法自救；神的救恩临到，不在于人的情况；基督代死的救赎，足以拯救所有的人，但只蒙选的得着；信心的恩典由圣灵所赐，蒙选的人无以拒绝；重生得救成义的人，被神保守恒信到底。

这只是加尔文主义的基要，表示神绝对主权。但加尔文自己是学法律的，他也善于制订规程，绝不是反律法和道德；他更是教育家，从不反对教导的功能。他既承认人的责任，自然不能否定人的意志；只是不承认人绝对的自由意志，可以变更神的主权。

## 24. John Knox 诺克司

在英国国旗上，有一个斜的十字架 X 记号，代表第一个把福音带到苏格兰的使徒安得烈；传统说，他被斜着钉死在十字架上殉道。却是诺克司，使苏格兰成为归正信仰，离开了罗马的影响，把这个 X 加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旗上。

约翰诺克司(John Knox, c.1514-1572)是长老宗教会的创立人，生在苏格兰的东洛阡(East Lothian)近海碇屯(Haddington)在 1536 年，毕业于圣安得烈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受任天主教教职。约在 1543 年，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而悔改，诺可司经历重生归正，接受改革宗信仰。

1545 年冬，有个改革宗领袖威沙特(George Wishart)来到洛阡讲道，深得群众欢迎，但激起罗马天主教红衣大主教毕顿(David Beaton)的忿恨。诺克司为了真理，同情威沙特，并且手执双刃长剑，担任义务护

卫，随同他来往。那是很特别的景象：五十名武士，拥簇着一位传道者，公然进入教堂，然后召集群众，开始聚会讲道。1546年一月，威沙特知道是时候到了，遣散跟从的人，自己面对当权的宗教人，从容就捕。大主教毕顿没有兴趣听他辩诉，判威沙特为异端，三月一日，被绞死而后在火刑柱上焚烧。

毕顿恶名昭著，蓄有情妇，并有许多私生子，早为地方所恨恶。五月间，十六名武士乘夜进入圣安得烈城堡，杀死了毕顿，并暴尸堡门上。接着是群众占领城堡，法国雇佣军队在外面围而不攻。诺克司趁机带着他的学生，进入城堡中。

这样，开始了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大体说来，苏格兰的改革，不是从大学里发起的，而是由基层开始，真是个“大刀阔斧”进行。当时的苏格兰，女王是罗马天主教徒，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属于罗马教会；因此，在政治上是亲法国的，常备军队也多是法籍雇佣兵，宗教势力甚大，国会形同虚设。贵族和地主，则不满这样的政教体制，不仅同情，而是向往英国和大陆的宗教改革。1532年，英国已经与罗马分离，并完成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改革；苏格兰对英国的援助寄以期望。

在圣安得烈城堡中，诺克司教导他的学生。有一个主日，他在聚会中讲道；一位政治领袖和一位传道，忽然起立宣布要举诺克司为城堡的牧师。会众全体赞成。诺克司受感动落泪。推辞不得，经过了短时间，他接受了呼召。

1547年，英国应许的援助没有来到，法国军队却来了。圣安得烈城堡在固守了一年之后，终于被攻破，短暂的改革也黯然收场。重要的领袖们被处刑；诺克司被押为奴隶，到法国船上，充当荡桨手。

经过了十九个月的苦役，1549年，诺克司获得释放，到了英国。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被任为敬虔的幼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1537-1553)六位宫廷牧师之一，并要他任伦敦教区的牧师，和罗彻斯特(Rochester)的主教，他都谢绝了；而成为柏维克(Berwick-upon-Tweed)的牧师。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清教徒型的教会，建立了地方秩序；也在那段时间，认识了玛茱丽(Marjorie Bowes)，后来于1555年成为他的妻子。由于他正直敢言，到哪里都不缺仇敌，也不怕得罪政教的权贵。到爱德华六世早逝，1553年，天主教“血腥的玛丽”女王继位(Mary Tudor, 1516-1558)，宗教改革受挫。诺克司是最后离开英国的教会领袖，到法国作难民。

1554年，他由法国到了福兰克福(Frankfur am Main)，作了英国难民教会的牧师。几个月后，他到了日内瓦，也是负责牧养英国难民教会。在那里，从加尔文受教。在日内瓦，他非常欢乐，写信给朋友说：那是“从使徒时代以来，基督在地上最完全的学校。”诺克司一直留在那里到1559年。诺克司勤奋好学，他本来就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到五十岁，他才开始学希伯来文，达到能翻译圣经的程度。不过，他有两件一直牵萦的心事：柏维克的玛茱丽，和他的故国苏格兰。在1556年，他有九个月的时间，去到那两个地方，与玛茱丽结婚后，经苏格兰回到日内瓦。

1558年，诺克司发表了他最著名，也最富争议性的小册子，叫作第一次吹角反对妖邪的女人统治(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攻击英国和苏格兰的女王(Mary Tudor, Mary of Guise & Mary of Scots)。其为文措辞凌厉，引据了旧约圣经，并早期教父的文字。文中说，这种女人早下地狱更好，免得荼毒世人。基督徒不应该为他们服务；可以反对拜偶像的当权者，也有责任这样作；并且求神兴起耶户，除灭邪恶的耶洗别。诺克斯先把文稿请加尔文过目；加尔文不表赞同。他又征询其他改革信仰教牧的意见，无人敢赞一词。他还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精神进行；而且故意一反惯例，直接写给女王，而不经由秘书代达。那年英国天主教玛丽女王去世，她的异母妹妹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继位，复归宗教改革，对诺克司也没甚好感。

在日内瓦，诺克司写信指导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归正教会迅速增长。他告诉贵族们团结在一起，不参加罗马教的弥撒和礼仪，每周自己聚集读经讨论，互相勉励；如果统治者迫害阻挡归正者聚会，可以“合法的抗拒”。贵族就聚集立约，称为“主的教会”(The Congregation of the Lord)。摄政女王罗马教的玛丽知机妥协。1559年春，他召集改革的领袖于五月十日见她。归正教会的贵族，地主和平民，在登堤(Dundee)聚会，邀请诺克司回国领导。五月四日，诺克司返抵国门，同他们汇合，到了波茨(Perth)。诺克司讲了一篇激烈的道，颓丧灰心的信徒得到激励，群情奋发，聚集砸了教堂中的偶像，又毁坏了天主教修道院，形成了革命的情势。

情势发展到六月底，爱丁堡(Edinburgh)已在归正教会的手中。诺克司在圣吉勒斯(St. Giles)大教堂讲道。那时，如果改革运动被法国支持的政权扑灭，英国和伊莉莎白都将陷于危险。伊莉莎白虽对诺克斯个人不满，但苏格兰贵族和领袖们的代表，陈明利害。1560年春，英国终止了犹豫，派出兵一万人至苏格兰。四月间，摄政女王逝世。国会宣布取消罗马天主教的教权体系。英国与法国各自撤军，由苏格兰自决。

1561年，继位的玛丽女王(Mary of Scots, 1542-1587)自法国来到，意图使苏格兰重归罗马天主教。年轻的女王以诺克司为她的大敌。她曾五次召见诺克司，前三次还保持礼貌；第四次的会面，约在1564年，她表示要与罗马教的西班牙王子凯洛斯(Don Carlos)缔婚；如果成功，苏格兰和英国，以至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都将遭受威胁。诺克司警告贵族，群起反对。他当面告诉信奉罗马教的女王：“罗马教会是那穿朱红衣服的多淫妇。”(参启一七：3-6)据说，在他们第五次会见时，女王流着气愤的泪，向着那位“异端”的传道者说：“到底你是王，或我是王？”诺克司庄严的宣布：“神愿意把我放在这地位：我是人民和教会的守望者！”她惧怕了，请求诺克司不要叫改革派信徒，对罗马教神甫动刀。诺克司回答：“公义的剑是神的，如果君王不善运用，别的人也会用。”女王忿怒喊着，称诺克司为“叛徒”。但侍卫没有人动手拿他，内阁拒绝定他的罪。

诺克司的妻子玛茱丽，在1560年去世；年约半百的诺克司，继娶了十七岁的玛格丽特(Margaret Stewart)

是女王的远亲；当然未经女王同意。那年，女王免除所有的改革信仰者的官职，要亲自统治，但在婚姻上和施政上，犯了许多错误，以致众叛亲离，政不能行。1567年，苏格兰女王玛丽退位，出走到英国。诺克司的旧友，亲英的改革信仰者司徒华 (James Stewart, Earl of Moray, c.1531-1570) 伯爵任摄政。苏格兰在内战的边缘，诺克司不能免的涉及争议；又因中风，半身不遂。1571年，为了安全，大家决定他还是移到圣安德列居住。

1572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法国发生圣巴多罗买之夜大惨案，在巴黎，三千以上的胡格诺 (Huguenots) 改革信徒被集体屠杀；在其他地区被杀的，达七千人以上。十一月十九日，诺克司觉得不能静默不言，扶病到圣吉勒斯大教堂，登上讲台，作最后一次讲道。十一月二十四日，诺克司离开世间。

在他将死的时候，仍然以微弱的声音，为了苏格兰的教会祷告。有人说，他忠勤为主工作，应当去得奖赏。他说："这败坏的肉体已经够骄傲了，不要再夸耀他。"魔鬼也试探他，叫他失望，说他的罪不能得赦免。诺克司叫妻子为他读那信心"第一次下锚的那章"圣经，意思是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然后安然去世。

这苏格兰的以利亚去后，未完成的宗教改革，由神预备的"以利沙"迈威勒(Andrew Melville, 1545-1622)继续。他坚持抗拒罗马教，也不肯接受英国的圣公会国教制度，而建立长老会，一直是苏格兰最主要的归正教会。美国初期移民，也是以长老会为主；英国人称独立战争为"长老宗造反"。在英国的清教徒革命，长老宗是主力；后起卫斯理的循道宗，虽然是阿民念信仰，却参考长老宗的体制。诺克司的影响可谓深远。

诺克司以有能力著名，是十六世纪的以利亚。他要朋友给备妥一匹马，以便随时应用；也曾遭人暗杀过，在窗外用枪射击而不中。他讲道通常先以半小时讲解圣经信息，和风细雨；然后，应用到当时当地的环境，转而激昂猛烈，拍案顿足。作笔记的人说，"他使我激动又战兢，拿不住笔。"他的讲道不如马丁路德，文章不如加尔文，学问也不能跟二人相比；但其刚勇无畏，正直敢言，比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品德，也是无可指摘。

诺克司的讲道，大有能力，因为他坚信所传讲的。诺可司的祷告，更使人惧怕，能震动苏格兰，因为他坚信他所事奉的神。那位苏格兰的以利亚，祷告真像是在同神摔跤，真诚而热切；他那著名的祷告："主啊，求赐给我苏格兰，否则取我的灵魂！"

神听了他的祷告，而且超过他所求的。苏格兰人民气质，也因他的事奉而改变，成为诚朴正直，并注重道德。

诺克司遗嘱，不要为他的坟墓立任何标识。在下葬礼拜的时候，对这苏格兰的疾雷，摄政王给他最适切的称赞是："这里躺卧着一个从不会谄谀，也不怕人面孔的人。"

在瑞士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纪念碑上，铭刻着他的名言：

一个人与神同在总是多数。(Un homme avec Dieu est toujours dans la majorite.)

## 25.WesleyBros. 卫斯理兄弟

十八世纪的英国，是最没有希望的国家；早期的“工业革命”带来社会转化的产痛，贫富不均，道德败坏，教会腐败，像法国那样的暴乱，似已成熟。神及时兴起了卫斯理兄弟领导的循道运动，把英国挽救过来。

有个旅人，经过一座许久熟识的酒馆，发现已经停业了。他问是怎么回事。主人脱下帽子，指着墙上的一幅画像，恭敬的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他引用约翰福音第一章6节介绍施洗约翰的话，见证神借着约翰卫斯理改变了他的生命。这样的见证有许多。

约翰(John Wesley, 1703-1791)和查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Samuel Wesley)，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母亲苏散拿(Susanna Wesley)，有十个儿女。他们都自幼受母亲的熏陶，敬虔爱主。

1720年，约翰卫斯理进了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1727年，获硕士学位，受选为院士，任讲师，并被按立为圣公会执事。

1726年，查理卫斯理入学牛津。1729年，他组织了几名同学，经常在一起读经祷告，并互相勉励，照圣经规范生活。戏笑他们的人，称之为“圣社”(The Holy Club)，或称“循道派”(Methodists)，还有“经蛀虫”等名，他们都欢喜接受。约翰年长，成为当然的领袖，被称“圣社神父”或“牧者”。他们的会员，还注意探访医院，监狱传福音，并孤儿的工作。

1735年，撒母耳卫斯理牧师逝世。约翰邀同查理，要往美洲作宣教士，但因父亲新丧，难以决定成行。他们的母亲苏散拿说：“如果我有二十个孩子，我也愿意他们作宣教士，即使不再见他们的面也无妨。”但她很快就再见到他们回来了。

在航行途中，船遇见大风浪，甚为危险。英国乘客们，惧怕死亡，不知所措；却见同船有一组德国莫拉维(Moravians)弟兄们，甘心服侍别人，作低贱的工作，在风浪中安然唱诗，全然不惧怕死亡，给他们很深的印象。

1736年的乔治亚州(Georgia)，是新辟的地方，一切没有秩序；查理与当地官员不和，半年后即返回英国。约翰继续留在萨凡那(Savannah)的小教会事奉。那里有一名妇女，与他有感情的纠缠，遭受牧师责备并

禁止圣餐；她的家族不服，控告卫斯理牧师，有被监禁的可能。他不得已，在 1737 年底，潜离返英。

1738 年二月一日，约翰卫斯理离开祖国二年四个月后，再踏上英国的土地。他说："我到美洲去，是为了改变印地安人归向神；噢，但谁来改变我呢？谁能拯救我脱离这不信的恶心？" 他想，如果自己没有得到救的把握，不能够胜过死亡的恐惧，岂不是为了一个梦，而愚蠢的付上那重大的代价？

卫斯理兄弟有一段时间，同莫拉维弟兄会一起聚会。约翰一有机会，就出去讲道；但不能解决得救确据的问题。他同莫拉维的弟兄保勒尔(Peter Bohler)讨论过圣经与经验的问题，一直萦回在他心里。五月十九日，五旬节前的星期五，查理经历了内心完全的平安，疾病也痊愈了。

1738 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晚上，约翰勉强去参加在伦敦爱德门街(Aldersgate Street)的一个聚会。他的日记写着这著名的经历：

会中有人宣读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信序文"。约在八时四十五分，当他描述神借着人对基督的信，在人里面所施行的改变，我觉得心中奇异的温暖。我觉得自己确已信靠基督，惟靠基督得着了救恩；并且祂给我保证除去我的罪，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同年六月底，约翰卫斯理去到德国，见到莫拉维弟兄会的领袖岑森道夫伯爵(Count 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他们在他们中间约一个月，然后回到伦敦。有一段时间，他仍然与莫拉维弟兄会交往，但发现他们过于高举岑森道夫，并倾向敬虔派，而且有神秘的色彩。到了 1740 年，宣布不能进一步合作。

1739 年，威特腓开始露天布道。三月二十九日，威特腓同约翰卫斯理谈起这新的布道方式。约翰起初持保留的态度，因为习惯于礼仪和规范，认为救人的灵魂，必须在教堂举行。但威特腓提醒他，主耶稣自己是在野外讲道的，要从大路上和篱笆外请人来听福音。约翰自己也接受了这种布道方式：一则圣公会的教堂，常拒绝给他们使用；再则聚会的人数太多，由一千人增加到五千人，不久就有上万的人聚集，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此后卫斯理一生骑马乘船旅行了约二十五万哩，讲道四万多次，大部分是在户外举行。卫斯理从四堵墙中间解放出来，形成了"世界是我工场"的事奉观念。

神的能力与约翰卫斯理同在，圣灵在聚会中彰显，有人哭喊倒地，也有神迹奇事随着，鬼被赶出去，疾病得治愈。卫斯理勉励会众安静，守秩序，严格禁止造成混乱，注重纪律，要人认罪，对付罪。

1739 年，威特腓到美国旅行讲道。1741 年，威特腓与约翰卫斯理辩论加尔文派信仰和阿民念信仰问题，二人的意见不同，决定该分开。不过，以后彼此尊敬；威特腓常纪念约翰在信仰上的引导。1770 年，威特腓在第七次到美洲殖民地布道时去世。有人问约翰卫斯理，将来在天堂的时候，会不会见到威特

腓。卫斯理回答说：“当然不能！因为他远在我的前头，比我更接近宝座。”十一月十日，约翰卫斯理在威特腓的葬礼上讲道。

卫斯理兄弟都善音乐，注重圣诗在敬拜和教导上的功能。查理一生写了约七千五百首圣诗，发表的有四千五百首；其中有部分是韩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 1685-1759)为他作曲。约翰写的较少，但他决定编校出版。但两兄弟的曲谱都是由别人作的。他们的圣诗，在推广循道运动上有很大的贡献。现在所有归正教会使用的诗集，无不选载他们的圣诗。

由于早年的不愉快经验，威特腓到美洲殖民地布道时，约翰卫斯理认为没有希望而阻止他。但到1776年，美国独立的时候，循道派信徒约五千人；十八世纪初，已有五万人，且曾成为会众最多的归正教宗派，现在更远超过了在英国卫理宗信徒的数目。约翰卫斯理本不愿从圣公会分离出来；他的目的是复兴，洁淨，成为像使徒的教会。从1739年，在伦敦旧铸造厂，建立第一座教堂，到1791年约翰逝世，在英国的会友超过了七万人。

查理于1749年与赛莉(Sally Gwynne)结婚，新娘比他小了近二十岁，婚礼由约翰卫斯理主持；婚后生活美满，育有子女三人，其中查理(Charles II)和(Samuel)是有成就的音乐家。他于1788年逝世。

约翰迟至1751年与一寡妇玛丽(Mary Vazeille)结婚，多疑善妒，使约翰非常痛苦。1755年，即曾分离；至1771年一月二十三日，更离去不再返回；到她于1781年十月十二日去世时候，她丈夫竟不知道。

约翰卫斯理到八十五岁时候，仍能骑马出去讲道。1790年十月七日，他讲了最后一次露天布道。次年，二月二十三日最后一次传福音，经文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6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相近的时候求告祂！”

约翰卫斯理于1791年三月二日离世。他一生不为自己积蓄钱财，都济助了穷人人；自己只为了主而过简朴生活。

## 26. George Whitefield 威特腓

乔治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是神在十九世纪兴起布道家中的布道家。他不像爱德务滋是神学家；也不像约翰卫斯理特有的组织恩赐；神给他的是布道恩赐。他也善用这恩赐，尽忠到死。

与他同时代的圣诗作家纽屯(John Newton, 1725-1807)曾说：“他的演说独具风格，是主赐他的。他不模仿任何人，我也未遇到任何人能够成功的模仿他。”

当时的英国名演员盖瑞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擅场莎士比亚剧，犹以饰理查三世(Richard III)著名，

对威特腓极为倾慕，曾一连听他同一讲章达四十次之多，从艺术观点对他赞赏不置。盖瑞克说："我如果只能把那个‘噢！’说得像威特腓一样，我愿出一百金镑。"

著名的怀疑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 也去听威特腓讲道。途中有人遇见他，问他既然不信威特腓讲的，为何还要去听。休谟回答："我虽然不相信，但他相信他所讲的。"

乔治威特腓生在歌劳斯特 (Gloucester)， 在那里完成了基本教育。在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之前，一个开书店的朋友，介绍给他一本再版的书：对敬虔圣洁生活的呼召(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著者是劳维廉(William Law, 1686-1761)。他只略一展阅，就把书交还给他的友人，但记得其中的一句话："虔诚的人不再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也不行世界的道路，只行神的旨意。"这句话抓住了他的心，成为在威特腓里面燃起了新火焰的火花。

1732年，威特腓入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 结识了比他年长的查理卫斯理；查理一见面就喜欢这新生，但威特腓以跟他走在一起为耻，因为是被人目为狂热分子，后来才渐渐投契。查理介绍他给哥哥约翰卫斯理。他参加了约翰领导的一组虔诚青年，被称之为"圣社"的团体。

1735年，威特腓的心灵里感觉到极大的干渴。在大斋期间，他更连续禁食，每天单独寻求神，长时间祷告；他的形体消瘦，但里面的灵渐渐洁淨更新。在七个礼拜之后，他感觉有极沉重的担子压在身上，以至倒在床上喊着："我渴了！我渴了！"不久之后，得着在救主里面的喜乐，随禁不住的唱出诗篇。过了些时间，荣耀主同在的欢欣，渐渐长久而增加。那年底，卫斯理兄弟往美洲殖民地宣道，威特腓成为圣社领导人。

1736年六月，威特腓被按立为歌劳斯特教会的执事，不久就开始讲道。但因他与循道派的关系，英国国教圣公会的门向他关上。1739年，威特腓开始露天布道。他的讲道大有能力，常有几万人聚集。他宏亮的声音，响彻田野，唤醒英国教会沉睡的灵魂，许多人认罪悔改。卫斯理兄弟起初不赞成；随即效法他的布道方式，带来教会的复兴，社会文化因而改变。

那时，在美洲殖民地，圣灵的风吹动，"大觉醒"渐渐开始。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在1737年，出版了新英格兰地区复兴的记述，引起了许多人的渴慕。二十五岁的青年威特腓，于1739年来到，从乔治亚直到新英格兰地区，燃起了遍地复兴的火焰。大约在这时期，他的神学思想受到强烈加尔文主义的熏染，而致回到英国后，与卫斯理兄弟分开，但终生彼此推重。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尊重威特腓。新英格兰自由派领袖，波斯顿第一教会牧师的昌西(Charles Chauncey, 1705-1789)，有次在当街遇到威特腓，因他反对复兴布道运动，就说："很遗憾，又看到你。"威特腓回答："魔鬼也是这样！"

实在的，威特腓所到地方，魔鬼的工作受到打击，黑暗的区域缩小了，罪人悔改蒙恩，进入神的国度。

威特腓被认为美国复兴的创始人，催发了灵命"大觉醒运动"。在他三十四年的传道事奉中，讲道约一万五千次，听众计数百万之多。在英国，爱尔兰，威尔斯之外，他十四次去到苏格兰，七次横越大西洋至美国。威特腓叫人彻底悔改重生，并注重敬虔，也提倡平信徒事奉。他强调教育的重要，在布道之外，并且协助建立三所大学：普林斯敦大学(原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并由富兰克林所建立宾夕维尼亚大学(原 The College of Philadelphia)，达茅茨大学(Dartmouth College)。乔治威特腓于 1770 年，逝世于麻萨诸塞州。

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说："威特腓吸引人，永不会使人失去兴趣。每当我读他的生平，总会心灵苏醒振奋。他活过。别的人似乎是半死半活；威特腓是全然生命，火焰，风，能力。"

英国诗人圣诗作家库柏(William Cowper, 1731-1800)这样写道：

他爱那恨他的世界；  
落在圣经上的眼泪诚实不假。  
受到口舌的争闹毁谤咒骂，  
他只以无可指摘的生活回答；  
对那些铸造枪箭和投射的人，  
他都报以弟兄般的爱心。  
保罗爱基督并且坚贞不渝，  
他完全效法也完美的表露。  
他跟从保罗；热诚爱骨肉的火焰，  
爱心范模也正是如同使徒。  
像保罗欢然横渡波危涛急的海洋，  
放弃家园，亲戚，朋友，和舒畅；  
像保罗，他劳苦，也像他，知足，  
忍受一切，背负羞辱，不论何往。

### 威特腓与富兰克林

威特腓于 1739 年到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在非拉铁非见到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3-1790)。那时，非拉铁非是美洲的首城。富兰克林已三十三岁，在当地办的报纸和印刷事业，已相当成功，并且参与领导社区服务工作，曾屡次接待那位青年布道家。富兰克林听他的讲道，能够分辨哪是纯熟的讲章，听来特别觉得是享受，说是"其快感如听完美的音乐。"

富兰克林属于十八世纪"天才"典型。虽然没有受过甚么么传统的教育，但成为企业家，作家，科学家，

思想家，外交家和政治家，算是当世最成功的人。他的宗教信仰，如果依现在福音派的标准来看，恐怕不够正统；也不够当时清教徒的尺度：未见到他有重生归正的属灵经历，像爱德务滋等人一样。不过，他似乎比当时盛行的“理神论”思想，更近天国一些。他相信神的存在，相信末日复活及审判，只是对于主救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模糊。这一向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自传中，富兰克林说：  
我从来不是没有宗教规律的人：我从未怀疑神的存在；  
我相信祂创造世界，并且护佑管理世界；祂所最喜悦的事奉是向人行善；我们的灵魂不灭；作恶的要受刑罚，  
道德得赏赐。...

不过，富兰克林到底不是神学家，也不算属灵人。他的贡献是在人类社会方面。法国政治家涂果 (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881) 是认识他的人，颂扬说：“他从天上夺取雷电，从暴君手中夺取权杖。”实在很切合。但如果再加上一句：“从基督手中领受救恩的杯”，将会更完全，更理想。

富兰克林自传中，讲到他跟威特腓的交往：

在 1739 年，威特腓牧师从爱尔兰来到我们这里；在那边他是有名的布道家。起初，还有些教会准他去讲道；但不久之后，教牧们不欢迎他，不给他讲台，他只好露天讲道。各宗各派的人，无法数计的人，去听他讲道。我也参加过他的聚会。据我看来，他所影响听众非常之大。他们仰慕他，尊敬他；尽管他骂他们是“半畜生，半魔鬼”。居民的生活型态，可以看出明显的改变，真是奇妙！本来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似乎是全世界都变成敬虔了；晚上，如果走过城里，不论那条街上，总会听到有些家庭歌唱诗篇。

这是很客观的记述，但可以看出福音的真效果，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了社会文化，真是神的大能。他又说：

离开我们之后，威特腓一路布道，下到乔治亚。那里刚有人开发定居。...看到他们可怜的境况，威特腓善良的心受了感动，立意要为他们兴建孤儿院，可以照顾养育他们。...我不赞成那个计画。因为乔治亚当地极端缺乏材料和工人，如果从非拉铁非运去，耗费甚为浩大；不如在此地建造孤儿院，送他们到这里来。我这样建议；但他决定照他的初意而行，拒绝接纳，因此我决定拒绝捐献。不久之后，我去听他讲道。我预料他最后要收奉献，我默默下定决心，莫想从我得到分文。在我衣袋里，有一把铜钱，三四个银圆，还有五个金币。当他讲下去，我软化了，决定捐出铜钱。他的言词继续打动了，使我自觉羞愧，改变决定捐银圆；到他那么可敬佩的作结束，我倒空口袋，金币和一切，全都放进了奉献盘里。...威特腓的仇敌们，以为他把所收的捐款作为私人薪酬；我对他甚为熟稔，替他印过讲章和纪事，从未对他的廉正有过丝毫怀疑；直到今天，仍然心意坚决，以为他在行为上是个完全正直的人。我想，我的见证应该更有分量，因为我和他没有宗

教上的联系。他实在曾为了我的悔改归正祷告；但始终没有满意相信他的代祷得到了应允。我们之间仅是君子之交，两方面都坦诚相与，持续到他去世。

下面的事，可以显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有一次，从英国到了波斯顿，写信告诉我，不久要到非拉铁非来，但不知该到哪里住，因为听说他的朋友本乃慈迁到德国城去了。我回信说："你知道舍间的情形；如果你不嫌狭隘，我将最竭诚欢迎。"他答复是，如果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有此爱心接待，必不会不得报赏。我再回答："不要误会我；不是为基督的缘故，是为你的缘故。"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取笑这种圣徒的习惯说，当他们受人之惠，常是把欠人情的担子，从自己肩头卸下，置之天上，我想把它放在地上。我最后同威特腓先生见面，是在伦敦。他跟我商讨所关怀的孤儿院，计画发展成立学院。他有个响亮的声音，运用得那么完善，在很远的距离之外，一字一句，还可以听得清楚，特别提他的听众保持完全肃静。有天晚上，他站在法院的最高台阶上讲道。位于市场街中段，与第二街西边成直角。两条街上都站满了人，直到相当的距离。我在市场街的最后面，好奇心起，想要知道他的声音可以听到多远，就沿街走下，往河边去；他清越的声音一路可以听到，直到近前街，喧闹的市声，才使他的字句不大清晰。想想看，从我站的地方起，作一半圆，全满了人，每人给二呎平方，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三万人能够听到。我有时候怀疑，历史上将军们能向全军队演讲；报纸上报导威特腓向二万五千人讲道，实在与事实符合。

这段话，不是朋友情感的论辩，而是科学的查证，富兰克林应该是合格的证人。

以下是富兰克林的宾夕维尼亚公报上，发表有关威特腓在那里的记录，可见其受欢迎的情形：

1739年十一月十五日 威特腓牧师把他所写的纪事和讲章稿件，交给我印刷。如果反应良好，得到充分鼓励，我将尽量出版。讲章将分二册，另纪事二册，印刷完竣交书时，每册二先令。愿支持这工作的人，请尽快向我登记姓名，以便统计。

173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威特腓和他的朋友们一行，从纽约来到；他在那边讲道八次；每天二次，有很多人参加。星期二在德国城，从阳台上，向约五千人讲道。昨天晚上，他的告别讲道，听众过多，以至教堂连一半也无法容纳；只好换到会社山。他从阳台上讲道，听众至少有一万人。今天他离开本城。

1739年十二月五日 上星期四，威特腓牧师离去时，约有一百五十骑伴同他到采市特，向约有七千人讲道。星期五，在卫令屯，约五千听众。同日晚间，基利汀那桥三千人。星期日，在白垩溪，他讲道两次，中间休息半小时，向八千人讲道；据计算，其中约有三千人是骑马来的。大部分时间下雨；但他们站在露天。

1740年五月十五日 今晚，威特腓由纽凯塞勒登船航往乔治亚。星期日，他在非拉铁非讲道二次。后一

次是他的告别讲道，听众极多。星期一，他在达贝和采市特讲道。星期二，在卫明屯和白垩溪。星期三，在诺汀罕。星期四，在雾邑。在每地，听众都比上次大为增加。据说，在这些地方，他收集了约四五百镑，包括实物和金钱，作为乔治亚孤儿院之用。

1740年五月二十二日 下星期一，威特腓牧师的著作将出版，讲章和纪事各一册。另二册也将近完成，不日出版。全部预约名单远超过所印书数额。已付款或持现金购买者，将先得书。

圣灵中的喜乐 (George Whitefield)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第十四章 17 节*

有一种“圣灵中的喜乐”。

我常想：如果今天保罗来讲道，我们会以为他是世间最大的狂热者之一。他讲论到圣灵，讲论到感觉圣灵。因此，我们必须都感觉祂，经验祂，接受祂；否则我们不能见圣洁的神而得安慰。我们得圣灵，不是为了好行神迹；因为“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我们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而无分于天国。但我们必须受圣灵，使我们的本性成圣，心灵洁净，能进入神的国。

除非我们重生，心中有圣灵，就是在天堂也不会喜乐。使徒保罗不但以为我们必须有圣灵，而且以为是必需条件，好使天国在信者的心里，也必须有“圣灵中的喜乐”。

我相信，好些人以为作基督徒是可怜和忧郁的事，而怕作基督徒。但是，我亲爱的朋友，在神和基督里的喜乐之外，再没有真实的喜乐。我知道，恶人和寻乐的人，会有一时欢笑；但那算甚么？不过是在锅下烧荆棘的爆声。爆发一下，立即消失。我知道甚么是罪中之乐；但我知道，在此之后，经常是痛苦随之而来，万倍于所得的短暂满足。

但在神里的喜乐，是与外人无干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喜乐；那是因有完全信心的确据，他的灵魂已经借着基督与神和好，耶稣住在他心里；当心灵默想的时候，就彰显主，在神他的救主里喜乐。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撒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那太监“就欢欢喜喜的走路”；那禁卒和他的全家在神里面都很喜乐。噢！我的朋友们，他们知道自己的罪得到赦免，是何等的喜乐！他向前面看，见到永远无尽的喜乐，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他得益处。噢！愿神使你们都有分这喜乐。

在这里，我们要把神的国总结：那是公义，那是和平，那是圣灵中的喜乐。当神的国在心里，是神掌权，是神居住并行走：那受造者成为全能神的儿女！但是，我的朋友们，多么少的人是在这国度里有分的人！在多数人心里，会是魔鬼的国，而不是神的国。这本来该是神喜爱的所在。我希望有人与我同说：“赞美神，我们有了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 27.WmTyndale 廷岱勒：译经殉道

法国文学家雨果(Victor-Marie Hugo, 1802-1885)说："英国有两本书：圣经和莎士比亚；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但圣经产生了英国。"

英国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说，在所有的作家中，他最鄙视莎士比亚；因其人是个"文盲"：仅略懂些拉丁文，全不通希腊文。这绝不代表多数人意见，但所说的却不违背事实。但有一个英国人，有不少反对他的；但没有英国人会看不起廷岱勒。

以上两个矛盾的断语，怎可能统一在莎士比亚身上？就是因为廷岱勒(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

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只有拉丁文，用于学术和官方档；不精于通行的拉丁文，是不光彩的事情，算是"文盲"。是廷岱勒，把圣经从原文译成现代英文方言(vernacular)的圣经，就是"日内瓦圣经"，英国人民才得以普遍了解神的话。莎士比亚所用的，正是这圣经。他用大众化的语文，成功的以戏剧和诗，寓教于娱乐，把真理传播于人间。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 1517 年，兴起宗教改革运动，提倡把圣经翻译成各族方言。宗教改革的文字，很快就传到英国。1522 年，德文新约圣经出版。

1512 年，廷岱勒在牛津大学毕业(B.A.)；在 1515 年，完成硕士(M.A., Oxford University)。不过，他并没有受任教职。而于 1519 年，进入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修读博士学位，但中途辍学。于 1521-1523 年，他成了华勒士爵士(Sir John Walsh)家的教师兼牧师，住在 Little Sodbury Manor.英国受尊敬的学者，宗教改革家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 1330-1384)，曾在牛津任教，虽逝世已一百多年，但他的思想仍然影响着英国；他批判罗马教会的改革意见，他从拉丁文译的中古英文圣经，也还有人知道。而剑桥大学，正是宗教改革和早期清教徒运动的温床。

在 1450 年，谷腾堡(Johannes Gutenberg, 1395?-1468)制造欧洲第一部商业用印刷机成功。从此，圣经和宣道文字，可以有效的复制流传，而不必倚赖手抄。不久，在各地，都有这种新兴事业。Publish 这个字的意义，由传讲延到印刷。

荷兰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修订的希腊文本新约圣经，在 1516 年出版。华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君士坦丁让国"论(Treatise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tine)的论文，揭穿教廷伪造文书丑剧，虽早于 1440 年写成，在 1517 年才得出版问世，动摇教皇俗世政权的根基。

廷岱勒所住的华勒士家，是一个好客的家庭，座上常有贵族和教职人员。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发现那些教职人员对圣经的无知和不重视，到了可耻与可惊的程度。有一次，他对这样一位宗教人宣告说：“如果神假我以年，不用多久，我将使扶犁而耕的孩子，比阁下更明白圣经！”这豪语，是伊拉谟斯希腊文新约圣经“序言”的回声：“我愿神使扶犁的耕者唱诵经文，织布的人在梭声交织中低吟诗篇。”在这段时间，廷岱勒对译经的呼召，越来越感到负担，可能也作了些新约的初译。

约在 1524 年初，廷岱勒去到伦敦，见当时的主教谈思陶勒(Cuthbert Tunstall)；因为那主教是个学者，又是伊拉斯谟的朋友，希望从而得到支持翻译圣经，是很合理的事。但失望了。因为自从威克里夫以后，英国恐怕涉及异端的争论，而在 1408 年禁止翻译圣经。廷岱勒不久就知道：“不仅在伦敦的主教府邸没有译经的地方，全英国也不能容许翻译圣经。”

稍后，在同年，廷岱勒得伦敦一个布商蒙茂慈(Humphrey Monmouth)和华勒士夫妇经济上的帮助，去到欧洲大陆。

当时，英国还是属罗马天主教的，对于廷岱勒译经，自然反对。

起初，他在威登堡大学 (University of Wittenburg)注册，因为那里是抗罗宗的基地，从马丁路德领受教益；直接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翻译圣经。1525 年，他在科隆(Cologne)开始准备排印英文新约圣经。不幸，有一名助手因酒口风不严，被反对者发觉了；廷岱勒虽得逃脱，但印好未装订的经文章页全部被查抄。廷岱勒只好移到沃木斯(Worms)。在那里，初版英文新约圣经六千本出版了。不久，就暗运过海峡，普及全英国。

廷岱勒是个旷世奇才。他在译经外，还写了些论辩的书及小册。其中有基督徒的顺服(Obedience of the Christian Man)一书，当时是禁书，落在英王亨利八世手中。亨利大为赞赏，认为可以收为己用，以达成为离婚辩护的目的；于是差人往欧洲大陆找到廷岱勒，应许给他特赦并保护，加上丰厚的薪水，只要为他效力。廷岱勒自然敬谢。他说：只有在英王准许英文圣经译本在英国流通的情形下，他才会返回祖国。

中国的专制皇帝秦始皇，以为“焚书坑儒”的手段，可以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一千七百多年后的英国，坎特伯里大主教乌尔罕(William Warham)，也采取焚经杀译者的方法，以禁止人民领受圣经真理。因为在圣经真理的光中，罗马教职人员的无知和腐败，就无所遁形。在 1527 年，他差人从市场上收购廷岱勒译印的新约圣经，然后焚毁！自称为主的教会，而焚毁神的话，真是奇闻。但他想不到，他所付出的书价，含有相当的利润，可以使廷岱勒印刷更多的圣经。收购焚毁圣经后来停止了；但收购败类，追杀译者的行动，却不曾停止。

廷岱勒在欧洲居于定所，为了躲避追捕，不停的迁移；不过，他译经的心志不移，随走随写。他一面修订新约，一面继续翻译旧约。同时，他还要应付那忠于罗马教的英国首相茅尔(Thomas More)，二人

持久笔战。1531年，廷岱勒译印的旧约摩西五经，在英国流行了。

到了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 在位1509-1547)与罗马决裂，宣布自己是英国教会的元首。不过，他仍然自以为是忠实的天主教徒，罗马也还未开除亨利的教籍；因此，并未停止追捕行动。同年，廷岱勒到了荷兰安俄埠(Antwerp)，有一名英国侨商派恩滋(Thoms Poyntz)，是华勒士夫人(Lady Anne Walsh)亲戚，收容保护廷岱勒的安全。

当派恩斯外出的时候，一名英国青年腓利浦(Henry Phillips)来同廷岱勒结交。其人外貌良善，对人有礼，巧言令色，奉承他的工作，得到廷岱勒的信任。其实，腓利浦是英国的特务，诱骗廷岱勒外出，在1535年五月二十一日，绑架了他，囚禁在威武得堡(Vilvoorde)。虽然失去了自由，在困苦的环境中，廷岱勒依然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翻译未完成的旧约圣经。

十七个月之后，经过草草的形式审判，于1536年十月六日，英国译经者廷岱勒，被绞死后再焚烧。他爱慕主的道，也为所爱的主殉道。在就刑以前，廷岱勒祷告说：“主啊，开英王的眼睛！”

主果然开了亨利的眼睛，他准许英文译本圣经出版；但他的眼睛未全开，不知道那仍是廷岱勒的作品。

廷岱勒的朋友和助手克华德(Miles Coverdale, 1488-1569)继续完成了旧约翻译，于1535年末，出版了英译全本圣经。虽然隐去勒廷岱勒的名字，但几乎全是他辛劳的成绩。英国的政情改变，坎特伯里大主教换了克兰麦(Thomas Cranmer)，总理教务是克伦维勒(Thomas Cromwell)，都是支持宗教改革的人，劝说英王亨利，得到了他的首肯，英文圣经得以在英国自由印制并发行。到了1539年，稍经克华德修订的圣经，称为“大圣经”，更有英王的谕令，每所教堂，均应预备一册，供会众自由阅读。这是何等大的转变。

廷岱勒的译经，不为当局所容的原因，显然是时间问题；而他明显的采取马丁路德的信仰立场，语句，注释中有时翻译路德的部分作品，也不会有帮助。但在殉道以后，廷岱勒到底是胜利了。他不愧称为“英文圣经之父”。

1553至1558年，英国“血腥玛丽”(Mary Tudor, 1516-1558)统治期间，恢复天主教，迫害宗教改革，禁英文圣经。克华德逃往日内瓦，主持修译；在参与其事的人中，包括约翰诺克司(John Knox)，亦受加尔文(John Calvin)的影响。修订本新约于1557年出版，新旧约全书于1560年出版，称为日内瓦圣经，运到英国后，深受欢迎，超越以前的译本，莎士比亚和弥尔敦(John Milton)，都使用日内瓦圣经。

英王雅各一世(James I, 1566-1625)，不喜欢日内瓦圣经所附注释中含有清教徒思想，在1604年，所召开翰浦屯宫邸(Hampton Court)会议中，决定另译英文圣经，不附注释。成果是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其中仍然约百分之九十是廷岱勒的译作；标准修订本里，也至少保留了百分七十五他原来的译文。

如果查考英文成语，常会发现，不知不觉是廷岱勒在说话。这真是“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然说话”。

## 28.WmCarey 维廉克理

没有学位，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钱财和当权的朋友。出身贫苦的鞋匠学徒，竟把圣经翻译成二十多种语文，并成为近代宣道的先锋。他的名言：“望神行大事，为神作大事”，扩大了基督徒的远象。

维廉克理 (William Carey, 1761-1834) 于 1761 年八月十七日生于英国保罗司浦 (Paulerspury, Northamptonshire)，十四岁时，去作鞋匠学徒。十八岁那年，有一天，他在外面商店使用一枚假币，被人发现，回来后心甚不安。有个同事的青年，看出他心中的不安，把福音介绍给他。他在神面前祷告认罪，悔改重生了。

克理感到把福音真光照进黑暗的重担。他在寝室的壁上，悬挂一幅世界地图，天天为了失丧的灵魂祷告。这个小人物的心，扩展到广大的世界。同时，照着神所给他的异象，积极准备自己。神给他语文恩赐，克理着心研究，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并义大利文和荷兰文。他从 1783 年，就是浸礼会的会友；1787 年，被按立为家乡附近一教会的牧师，仍然兼作制鞋业。但他早已预备好福音的鞋了。

1789 年，克理受聘任莱斯特(Leicester)浸信会牧师。三年后，发表基督徒应尽力传福音使外邦人归正。那年，教会的年会在 North Hamptonshire 举行，他在会中分发，并向大会提议讨论“大使命”。当时的大会主席 John C Ryland 当众教训他说：“年轻人，坐下！当神要叫外邦人悔改时，他知道怎样去作，用不着你我操心。”

不过，克理并没有长久安坐不动。他进一步联合十二位教牧，组成英国浸礼会宣道协会，会员缴纳会费，支持国外宣教工作。在那年五月三十日，克理宣讲了一篇划时代的信息，经文取自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 2 至 3 节：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信息中的名言：“望神作大事，为神作大事”，为许多人辗转传诵。

近代宣教运动的火焰燃起了！

1793 年，新差会派遣克理和多马(John Thomas)医生，到印度加尔各答。

次年，克理请求退出宣教士名单，因他受任 Mudnabati 蓝靛制作厂的监督，在经济上自给。他讲道，教导，并开始翻译圣经成孟加拉文。他的宣教异象，和英国的政策不能合辙，被迫离开英国殖民地地区；

克理挈家迁移到近加尔各答的丹麦社区塞兰坡(Serampur)。

1799年，马士曼 (Joshua Marshman, 1768-1837)， 和华德(William Ward, 1769-1823)等到印度与克理同工。马士曼出身织布工人，也是语文学者，后来成为更正教第一本中文圣经的翻译者(1822年出版)。因为英浸宣会支持的经费有限，马士曼夫妇创立了三所学校，其中二所教导欧洲人子弟，一所为印度儿童。克理则在威廉堡大学 (Fort William College) 教授东方语文，继续三十年；以所得薪资，加上马士曼收的学费，后来发展了二十六个教会，一百二十六所学校，学生达一万余名。华德学过印刷及新闻，后奉献勤修神学，参与宣道事工；是杰出的印刷者。三人同心合意，配搭恰当，是最理想的团队，称为“塞兰坡三子” (Serampore Trio)， 组成了独立宣道会，并设有印刷厂，印发圣经及书籍。英国政治家，国会议员兼人权运动者卫博福(William Wilberforce)称之为“英国的殊荣”。

克理把圣经译为孟加拉文(Bengali)，北印度文(Hindi)，梵文(Sanskrit)，阿萨姆文(Assamese)，及 Oriya, Marthi 语文。并将部分圣经译成其他二十九种语文及方言，又编订六种不同语文的文法及字典。加上与马士曼合译的，使印度共有四十四种圣经译本。他们也把印度文学中的史诗，和中国古典文学，译英文介绍给西方。

1800年，第一个印度教徒，受浸成为基督徒。克理不仅自己传福音，更鼓励印度信徒作宣教士；这在当时是崭新的宣教战略观念。为了促进文化和社会福利，他首创印度的医药宣教事工，储蓄银行，并神学院，女童学校，和孟加拉文报纸。他也建立了印度第一所现代印刷所，造纸厂，和蒸气火车。他也翻译西方的农业及园艺书籍介绍到印度，并推广农业改良试验；于1820年，成立了印度农艺学会。

他关心社会问题。印度有个传统的恶俗，就是把寡妇用火烧死，给亡夫殉葬，称为“苏替” (Suttee, 梵文作 Sati)；克理深深恨恶，以为是极不人道。他得到了印度“大圣人”泰戈尔(Maharidhi Debendranath Tagore, 诺贝尔文学奖诗人泰戈尔的父亲)的支持，1829年，正式禁除了这恶俗。

1834年六月九日，维廉克理服事了远方的人四十二年后，在印度塞兰坡逝世。

他的宣教行动，激励后来宣教差会相继建立。他也编写了孟加拉文字典及文法书，被尊为“孟加拉文之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于1913年，成为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他的得奖作品是诗祭(Gitanjali)，是用孟加拉文写成，后来自己译为英文。

这位印度的使徒维廉克理，为了遵行主的“大使命”，作近代宣教的先锋，把一生奉献给遥远神秘的印度次大陆。环境是那么困难，成就是那么大，更唤醒了教会，注意从事宣教运动，所结累代的果子，无法数计。在他长卧之处的墓碑上，却写着：

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我落在主慈爱的臂抱中。

## 29. John N Darby 达秘

他不是弟兄会的创始人，却对弟兄会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并且影响了福音派教会；不仅在当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他的神学思想，影响了著名圣经教师，包括慕迪(D.L. Moody)，麦钦韬(C.H. MaCkintosh)，和司可福(C.I. Scofield)等，形成十九世纪末对抗自由派神学的主力。

约翰达秘(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生于 1800 年十一月十八日，父亲亨利达秘(Sir Admiral Henry Darby)是海军将领，为英国著名海军英雄耐尔逊 (Viscount Horatio Nelson)的得力部将，所以他的幼子约翰受洗时，以耐尔逊为教父。

达秘幼年在伦敦西敏学校受教育。在十五岁时，随家移住爱尔兰，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819 年毕业，获得古典文学金奖章。继续攻读法律，于 1822 年成为爱尔兰的律师。

达秘着心研读圣经，约在 1821 年，悔改归正重生，觉得应该放弃律师业务，全心事奉神。父亲见他聪颖过人，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对他如此的决定甚为不满，竟然剥夺其继承权。1825 年八月七日，接受英国国教会(圣公会)按立为执事；他并积极参与国内宣道及圣经公会的事工。次年，成为 Calary 山地教会的牧师。他尽力服事教区会众，特别关心贫穷家庭，刻苦自己，帮助需要的人，勤于探访，常工作至半夜才就寝。

1827 年十月的一天，他在乘马时，猛然被摔下撞在门柱上，受伤甚重，送都柏林就医。他姊丈 Edward Pennefather 是爱尔兰的首席法官，夫妇和全家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在那里休养了三个多月，在这期间，达秘认识了新任家庭教师法兰西斯纽曼(Francis W. Newman)，纽曼大主教(John H. Newman)的弟弟。

长时间的疗养，不仅达秘的身体健康恢复，也使他的心灵健进。他经历基督所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约一四：20)，这宝贵的真理，在他成为真实的，使他得从律法的杖下得以自由释放，并领悟五项有关的重要真理：圣徒在基督里面的新位分，神权能的话语，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主的再来，和建立地上的国度。

那时，达秘的脚踪还没踏出英国和爱尔兰之外，可能是基于一时一地的观察，他用以解释历史的规律，归纳出“邪恶的进展”，仿佛是教会退化史观。关键字是：“败坏”(Ruin)和“分别”(Separation)。他以为在每一时期，人败坏了神的计画，神就不再作恢复的工作，而是要开始新的时代；因此，忠心的信徒，应该照神的心意分别出来。这也称为“非复原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Non-restoration)。因此，达秘被称为时代主义之父。这看法显然跟约翰卫斯理不同：卫斯理认为教会是可能恢复的。其余多数人则是接

受现状，不想作任何事。

1934年，达秘的父亲亨利去世了。虽然父子关系已经恢复了，虽然他的哥哥是英国国教会的牧师，达秘却拒绝参加丧礼；理由是丧礼由国教会主持，他必须持守分别的原则。

健康复元以后，达秘有短时期回去任教区的牧师。不过，从圣经真理中，他了解教会的元首不应该是地上的王，而是复活在天的基督；教会是祂的身体，必须与天上荣耀的头相配，表现主的圣洁合一，各肢体由圣灵安排，而不是像今天地上教会的分争，成为社团的形象。他更以为传统的“按立”和“圣职”的分别，于圣经真理不合，认为必须消除教阶制度：全教会只包括有新生命的圣徒，“都是弟兄”（太二三：8）而凡是重生的信徒，都可以参与事奉，而没有甚么教阶制度；“圣礼”也不必圣品人员来主持。这就是“弟兄会”观念的由来。这样的观念，使他不能继续在英国国教（圣公会）中任职，也不适于在独立或非国教教会中事奉，只有回到使徒行传第二和四章的初期教会。

在那时，有几个同样心志的青年人：柏乐特（J.G. Bellett）戈洛弗（A.N. Groves），克路宁（Edward Cronin），还有贺钦生（Francis Huchinson）。他们在一起谈论属灵的事，有相似的感动。他们在各人家中，开始奉主的名聚会，读经，祷告，并且擘饼纪念主。但他们并没有立即脱离国教会，有时也会到独立教会聚会。达秘则自由传讲，教导，有时也接受国教会讲台的邀请，传讲信息。这样，“弟兄会运动”，有了雏型。

约在1828年二月间，达秘离开了英国圣公会，与弟兄们一同奉主的名聚会，祷告，擘饼。起初，有二三年的时间，达秘受到邀请就去传递信息；后来，他觉得不能尽“吹无定的号声”，应该有一定的见证，就开始建立弟兄的聚会。由于人数的增加，没有一个家庭可以容纳这样的聚集，都柏林的聚会就租了一个拍卖场，作主日聚会之用；到礼拜六，弟兄们到那里动手移开家俱，主日则在那里读经，祷告，擘饼纪念主。这是爱尔兰聚会的开始。

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当达秘到英格兰去的时候，法兰西斯纽曼介绍他与牛敦（Benjamin Wills Newton）会晤。时间是在1830年五月。牛敦住在浦里茂茨（Plymouth），离牛津不甚远；那时，牛敦二十三岁，是Exeter College的院士。他们一见投契。达秘也结识了魏格润（George Vicesimus Wigram），正在预备进入教会事奉。还有贺尔（Percy Francis Hall），二十六岁，从海军的舰长退役，在村镇游行布道。这几个青年人同心合意，开始了浦里茂茨的聚会。不久，人数即急剧增加。在1831年十二月二日，家资富有的魏格润以750英镑，买下了洛里街的聚会所，直到1840年需要另建更大的新堂。同年，开始发行基督徒见证（The Christian Witness）期刊，以文字传播所信的，达秘是主要撰述人之一。

初起一代的弟兄会领袖，都是年轻人，多数二十几岁，少数过三十岁；其中有国教会的教职人员，有不少律师。他们满有理想，诚心爱主，寻求祂的旨意，完全投入的事奉。

浦里茂茨的工作非常兴旺，以至当地的住民，每家至少有一人参加聚会；据达秘估计，一时达七百人。

信徒都渴求分别为圣的属灵生活。当地的戏院没有了生意，财务亏损，关门了三年。戏院老板并没有恼怒，反参加了聚会，热心事奉主。他们的聚会，本来以没有名字而著名；后来人问起，回答：“浦里茂茨的弟兄们”，因此而得“弟兄会”之名。

在英国其他地区，弟兄会运动发展甚速。单在伦敦，就有五千信徒，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聚会。布锐斯陶(Bristol)的弟兄会，人数也很多；柯瑞克(Henry Craik)和后来以信心办孤儿院的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为领袖。他们聚会的地方称为毕士大(Bethesda)会堂。

1830年，达秘到法国去，帮助莫诺德(E.P. Monod)的工作；那是他初次踏上欧洲大陆。以后，从1836至1879年，他多次到瑞士，德国，欧洲各地，并北美洲，澳大利亚，纽西兰；脚踪所到的地方，弟兄会运动就随着展开。

当1845年，他再到浦里茂茨，听说那里在牛敦领导下，有分裂的倾向，在预言的教训和教会真理，与弟兄们共同的立场不同。经过数方面的疏导无效，达秘与他们分离，并指斥牛敦为异端。牛敦承认了在基督的人性方面教训错误，并发表声明，改正了几项观点；但达秘认为其缺乏实际的悔改行动，终于开除了他们。

有几名从浦里茂茨来的信徒，到了布锐斯陶，参加毕士大的聚会。他们没有随从牛敦的错误教导，毕士大就接纳他们到主的桌子。达秘认为必须公开声明反对牛敦，才可以接纳。毕士大未采取任何行动；达秘指他们对真理没有立场，以后他也不接纳毕士大的弟兄。因此，弟兄会同情毕士大的，称为“开明”(Open)派；反对的，称为“严格”(Exclusive)派。

达秘认为信徒都该有属灵的恩赐，因为圣灵装备信徒，在教会事奉。现代教会最重要的恩赐是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自认没有特殊传福音的恩赐，但切愿传福音。不过，他的恩赐在牧师和教师。他不仅登台说教，也注重探访：不是热衷于往有财有势的大门里跑，而是去探访贫穷需要的人家，常是在城市中极悲惨的贫民区，那些人都缺乏知识，或酗酒，品德败坏。一次，有个老妇人向人说起，先前有两位年轻人来探访，很有知识，但她不能明白他们说些甚么；以后，来了个“单纯的长者”，他所说的她都能够懂而领受：那是达秘。他能用简单的话说明真理，而且衣着也简单到破旧的地步。有一次，朋友看到他的衣服过分陈旧，乘他睡觉时，为他换了一件新的衣服，他醒来穿上，也浑然不觉。他的不修边幅以至于此。

有一次，他应邀去教堂讲道。他们要他穿上日内瓦长袍，因为那是学位袍，他照作了；因他并未正式退出国教会，他们要他也束上教品的带子，他就说：“不，不！”

达秘性喜简单，对于装模作样自然厌恶，特别不喜重看财富外表的势利小人。在早年时，有一次，他去访问一位教职人员，交谈属灵的事，那人以为他不过是乡下牧师，全不在意。到后来，看到了他父

亲派来的马车，有车夫和穿着绣有勋衔的制服，才改容相向，恭敬有加。达秘对那人甚为鄙薄，认为其人升任了主教以后，仍没有进步。

他极为厌恶称赞。有一位妇女，在他讲道后，向他说了许多恭维的话。达秘大声说："这些话，魔鬼早就告诉我了！"

但他很能俯就卑微贫穷的人。有时在贫民区讲道，去听道的人，以为是搞错了地址。下去，下，下到卑矮的地下室；但听了激扬心灵的讲道后，他以为"升到了天上！"

有一天，人发现他在理发店里帮忙。原来有位弟兄病了，达秘来义务相助。

在美国讲道的时候，有次住在贫穷的农家。那家孩子们，养有几只兔子。在餐桌上，他看见有个孩子很不快乐，就问他为何不欢。虽然家人吩咐过，小孩子还是讲了实话：他的宠物被宰了在桌上饕客。达秘那餐没有吃盘中的肉。餐后，他带那孩子到外面，温言安慰他，从袋中摸出玩具来送他，二人在池塘边盘桓了一个小时。

不过，有时达秘也会言语尖刻，甚至不必要的强烈。在美国的一次查经会中，有许多教牧在座，聚精会神的听。中间潘特可(Rev. G.F. Pentecost) 提出一个问题，达秘简要的回答。潘没有抓住要点，请求再说一次，达秘照作了。潘仍不清楚，要他再稍详细说明。达秘不曾趁机加以发挥，竟不耐烦的说："我是来帮助释经，不是‘补脑’！"

在芝加哥，慕迪邀请他主持一系列查经聚会，有很多爱慕神的话的人参加。达秘讲人意志的败坏："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不在乎那定意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约一：13 罗九：16)断言人甚至不能决意得救。慕迪以为那是极端加尔文主义，指出主耶稣说那些不信祂的人："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五：40)；证明人必须为他意志的决定负责任。达秘遽然阖起圣经，不肯再讲下去。不仅使聚会不欢而散，也失去很多工作机会。此后，达秘指慕迪的教导，会有使人世俗化的可能。

布仁敦(Rev. Sir Charles Brenton)说，两个"亚当"在达秘的里面都极强壮，似是不太过分。其实，有些别的领袖也是如此，更可惜的是他们恩赐远不及达秘。

达秘的时代，启明运动并没有带来人民的福乐；工业革命所给多数人的是痛苦；稍晚的马克思，其所应许没有神的"天国"，并不能满足人的心灵。那时，人心向往卫斯理的神，再一次赐下教会的觉醒和复兴。达秘的国度真理，具新的亮光和盼望，自然对人有极大的吸引力。

早期教会对国度真理的教导，认为在主耶稣降世后的一千年，就会再临；结果失望了。又有人从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开始算起，天国仍未实现。到宗教改革时期，归正教会多对启示录和千年国度采寓意的解释，以教皇为"敌基督者"，称为"非千禧年主义"(Amillennialism)，认为基督不是在地上建立有形的国度统治，而是以教会为祂的国度，而末后必将再临。达秘的建构，则是圣经应许的双轨制：

犹太人有属地的应许，教会有属天的应许。他对预言的处理，有的作寓意解释，有的按字面解释，以避免某些困难。他以为主基督是：“从死人中”复活，信徒也同主一样不是“从死里复活”，而是“从死人中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启二〇：5,6），因此，信徒与荣耀的元首相同；还存留的信徒将要被提，然后同主再临，一同作王统治一千年；最后是审判并进入永世。

弟兄会运动的成功，在于其注重圣经。当时的英国教会，多属于礼仪，缺乏属灵的实质。真正神的儿女，渴慕合一，追求神的话。弟兄会在这方面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达秘有多方面的学问和恩赐，在奔走讲道外，著述甚多，其文集达四十余卷；但一般认为甚晦涩难懂。但他的讲道则浅白而有感力。其诗歌则涵义深远。弟兄会出版基督徒诗歌(The Christian Hymn Book) 和小群诗选 (Hymns & Spiritual Songs for the Little Flock)，中国的聚会所，初期名为“小群”，来源于此。达秘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并拉丁文，现代语文中，精通法文，德文，义大利文；在著作之外，还从原文翻译了英文，法文，德文的圣经，影响深广。

其实，弟兄会的观念，由来久远；即使不说是初期教会的原型，在欧洲大陆，也可远溯到宗教改革时期。不过，达秘所领导的，是时代派的弟兄会，或英国弟兄会。其信仰特点，是从宗派出来，加上时代主义(Dispensationalism)。在教会体制上，则主张教会的独立。由于其注重重生得救的真理，强调信徒皆为祭司，鼓励普遍的事奉，对于发扬福音颇有贡献；惟由于地方性教会的分散，不能集合发展较大规模的事工；复因不注重教育，自然不能有系统的延续。

虽然其从宗派分别出来的立场，不曾被普遍采行，但关于预言和国度的教训，为更多人所接受。在美国的福音派和基要派教会，不少赞成其大灾难前教会被提和千禧年观点，特别是司可福注释圣经出版后，传播更广；内地会大多赞成弟兄会的国度观。约在 1920 年前后，弟兄会的信仰由宣教士介绍到中国。有两位福州海军退役军官王载，王连俊(约翰)，开始了类似弟兄会的聚会；倪柝声稍后也参加了；后来二王转移其他的事奉，由倪继续领导，发展成全国性的聚会所地方教会体制。神学家贾玉铭，放弃原来的长老会改革宗信仰，而接受达秘的国度教训，惟未接受其教会体制，影响华人教会甚大；加以成寄归的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推广，蔚成为华人教会的主流神学思想。

在政治上，1948 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宣布复国，世人对预言热达到最高峰。英美等国一向支持以色列，以为是遵行主的旨意，是圣经的应许。只是近年世界局势的发展，使预言的解释发生某些困难，而巴勒斯坦人中的基督徒，远比犹太人多，非千禧年信仰者，以为教会才是心灵受割礼的“真以色列人”；对于教会和犹太人之间的选择支持，人权的问题，使信仰在政治上的衡量，不容易平衡。保守信仰的犹太人，则不承认现政府，仍在等候弥赛亚国度。因此，不少人对弟兄会的预言观点，也在调整中。

约在 1835 年，达秘与迪道霞夫人 (Lady Theodosia Anne Powerscourt) 相爱而订婚。她是一位勋爵的遗孀，与达秘年龄相同，敬虔爱主。但弟兄们认为并不适合，加以劝阻，二人为了主的事工，各自同意解除

婚约；迪道霞夫人未曾再言婚嫁，于 1836 年逝世。此后，达秘即终身未娶。他除了藏书甚丰之外，并未为自己积蓄财产。

从 1858 年起，达秘住在伦敦的 Lonsdale Square 寓所，他不出外旅行的时候，有二十四年，那里是他地上的家，直到 1882 年，在那里离世。

### 30.Watts & Modern Hymnology 华慈与现代圣诗

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在各种聚会中，总是有唱诗，这几乎与基督教的存在同其久远。其实，我们可以说，基督教是在歌唱中诞生的；且不谈旧约的先绪，耶稣基督降生的夜里，就有天使天军歌颂；在祂被钉十字架受死之前，也是唱诗：那是圣经对耶稣唱诗唯一的记载。

早期的圣诗，多是敬拜，颂赞，有少数具有训诲教义性。那些诗，多是吟诵(chant)的形式，圣诗中注入歌唱者的宗教情感，则是晚近的事。

#### 划时代的诗声

今天教会的圣诗，在所有不同文字的作品中，大概以英文圣诗最多。虽然英国很早就有圣诗，但普遍的发展，却来得迟缓。在改教运动中，马丁路德重用慷慨激昂的圣诗，发扬信仰的时候，英国教会却拖着沉重的脚步，远远落在后面。

1706 年，伦敦马可巷独立教会 (Mark Lane Independent Chapel) 的牧师华慈 (Issac Watts, 1674-1678)，出版了圣歌集 (Horae Lyricae)。在次 (1707) 年，他又继续刊行了圣诗灵歌集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所载作品如：“Jesus Shall Reign Where'er the Sun” (耶稣统治万国)，“Joy to the World” (普世欢腾)，“Lord of the Worlds Above” (诸天之主)，“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 (上主是人亘古保障) 等，在今天所有的圣诗集中，都可以找得到，可见其价值的久远。文学评论家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更认为华慈所作的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我每仰望奇妙十字架)，是最佳的英文诗歌。但当时的人骂他为“虚骄”，“自作聪明的亵渎者”。但后代教会历史称他为“教会圣诗篇之父”，和“英国圣诗的伟大老人”。1727 年，爱丁堡大学赠予他荣誉神学博士 (D.D.)。在威斯敏德大教堂，有华慈的纪念像，天使在他的耳旁低语。

#### 诗童以撒

以撒·华慈 (Isaac Watts) 于 1674 年七月十七日生于英国南汉浦屯。他父亲以诺·华慈不赞同英国国教 (圣公会)，在独立聚会处任执事，因而数度入狱。父亲注重教育，在以撒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拉丁文；在那时代，还算是受教育者的正式语文。他还在童年，就已经娴熟希腊文，法文和希伯来文。

以撒生来瘦弱矮小。他从小就喜欢作诗。他母亲办了一所男童寄宿学校，以撒是学生之一。有一次，

她征求最佳短诗，奖金四分之一便士。比赛结果，一首隐名短诗获奖；她惊奇的发现，竟是她七岁儿子以撒的作品。

以后，他有时会在意想不到的场合作诗缀句。有一晚，他跟八个弟兄姊妹同父母跪在一起祷告，以撒居然在家庭祷告中纵声大笑。他父亲严厉的责备他，诘问发笑的原因。以撒说："我偶然睁开眼睛，看见一只老鼠，爬上壁炉旁的绳子。"这触发他的灵感，作了二句有趣的短诗：

一只老鼠找不到更好的梯阶，为要祷告爬上绳索来。

据说，父亲把他拖到柴棚里管教："要把诗魔从他里面驱走"。孩子给打得含泪求饶-又是两句短诗：

亲爱的父亲，手下施怜悯，今后再不敢卖弄诗文。

当然，这应许只保持到他离开家庭；也幸而如此，教会幸哉。

#### 立心改进圣诗

华慈自早年开始，就对教会中的音乐不满意；特别是他自己的非国教教会。他认为那不仅不能帮助敬拜，且足以妨碍敬拜。在晚年，他回首当时的情形，感慨的说："教会唱诗颂赞上帝，是最近于天堂的敬拜，但其表现是举世最糟的。"

糟到甚么程度呢？Oscar T. Gillan 说到当时的情况："唱诗时，是选一首诗篇，谱曲粗陋，由领唱的人逐行读出。领唱的人负责定基音及选曲调。有些教会中只会三个曲调；每个人用他自己会的或喜爱的曲调，也不罕见。教会里没有风琴定音调。"莫怪当时的唱诗是闹杂无章！

华慈准确的看出了毛病的根源：教会只限唱大卫的诗篇。年轻的华慈，逢人就抱怨聚会中音乐的枯燥单调。他父亲听厌了他的批评，就说："如果你会写更好的诗歌，何不试看！"十八岁的华慈说："我会的！"

以撒因为是非国教信徒，进入了一所收容非国教学生的学院。毕业后，于1699年三月八日，受任为马可巷独立会堂的助理牧师。1702年，成为主任牧师。(当时非国教圣公会的，不能称为教会和教堂，只能称 chapel。)在那里，华慈写下了第一首圣诗："看哪，荣耀的羔羊"，取意自启示录第五章。在下次聚会时，这首诗介绍给教会，会众十分喜欢，央求他再写几首。这样，华慈常在主日预备一首新诗，选辑为1706及1707年的诗集。

Oscar T. Gillan 评论说："华慈的第一首圣诗，不但是聚会音乐的新纪元，并且树立了模式，他自己写了七百首，别的圣诗作者继进，写了数以千计。"这样，教会的敬拜，得以增进了许多。

但是，这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当时的教会传统，是唱诵诗篇。在圣公会（英国国教）中，部分准许使用时人作的圣诗。例如：但恩（John Donne, 1573-1631）所作的诗，曾在他所主持的圣保罗大座堂聚会中唱诵。赫伯特（George Herbert, 1593-1633）也写了不少圣诗（约翰卫斯理曾改作乔治赫伯特的诗，请人谱以曲调）。但在非国教教会中，绝大多数持守着在 363 年老底嘉大公会议的决定：“平常人所作的诗章，不得在教会中使用。”

华慈是个平常人。但他英勇先导，为了人作的圣诗辩护。他的批评者吵着说：任何人想“改进诗篇”，是个“虚骄，自作聪明的亵渎者，以为他可以教导圣灵如何写作”。他们夸大的说，如果写一首基督徒诗歌，不载于圣经，是一种渎圣罪，等于写“另一章以赛亚书”。华慈辩说：“诗篇根本是犹太人的书，不是基督徒的。”他们不加理会。华慈坚持基督的福音是教会音乐中至高的信息，他解释说：“有些诗篇是跟福音的信息不协调的，许多对新约的原则无关，与基督徒现下的环境不同。如果我们以诗篇作基督徒圣诗，首先须予重写，好像大卫是一个十八世纪的基督徒，而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虽然他的看法不无可非议，但他主张圣诗语文须适合现时现地的原则，是正确的。

华慈到底试行重写诗篇。在 1719 年，出版了一本诗集：大卫诗篇仿意(The Psalms of David Imitat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New Testament...)。如：“上主是人坚固保障”，他最著名的诗，是取意诗篇第九十篇；但有些实在难以算是意译和重写，品质也并不一致。其中“普世欢腾救主诞降”，生动感人，柯腓力（Phil Kerr）说在此“初见曙光”。他又说：“面对苛苦的反对和狂热的迫害，华慈为了原则而搏斗。二十世纪的教会，得享有歌唱圣诗创作的自由，英勇的华慈厥功至伟。”

### 重棧遗珠

华慈自幼体质荏弱，虽然不是终生卧病，却是其貌不扬，躯不过五尺左右。有一天，一个久慕其名的人，经引介来见。那人惊异的说：“甚么！这是伟大的华慈？”大有见面不如闻名的意思。华慈立即作一短诗：

我岂有伸展到地极的臂膀，  
岂能用海绵吸尽古老的海洋？  
真我必须从灵魂测量，  
衡人的标准是在于思想。

不幸，华慈所钟情的那女子，却不能欣赏灵魂或甚么的思想，嫌他的躯体不够英俊；求婚遭受拒绝。那女子说：“我仰慕那珍宝，却不仰慕那筐匣。”为了伊人重“棧”，华慈竟为“遗珠”。华慈抗议说：“血肉之躯承受不了你的拒绝。”女子反驳说：“血肉承受不了，皮和骨头必须承当，因为我决不嫁你！”

此后，华慈终生独身未娶。

### 更大的蒙福

华慈在教会的事奉，却很为蒙恩。那非国教的会堂，有伦敦的富商巨贾来聚会，信徒持守清教徒信仰。著名的欧文博士 (Dr. John Owen, 1616-1683)，一度曾任那里的牧师。在华慈牧养之下，吸引了很多的会众；六年之内，需要二次改移更大的会所。这样，华慈成为伦敦非圣公会最显要的传道人。因他的贡献，独立的非国教会众，不仅是被容忍的小群，而且得到尊敬。因为他性喜宽容，帮助沟通非国教的信徒与圣公会国教会之间的团契。

1712年，华慈受热病侵袭，似乎难以再复健康。会众中间有个艾伯尼爵士(Sir Thomas Abney)，曾任伦敦市长及国会议员，其 Hertfordshire 的别墅，林园之胜，为全英国之首；信徒关爱牧师，邀请华慈去他的乡居小住，预期是一周的休养。在那里，诗人有单独的起居所，得到主人的照顾，可能延长了他的寿命多年，也使他多结果子。

在着幽美的环境中休憩，华慈的笔却未休息。他常在户外阅读写作。他本就喜爱孩童，为了尽力还报主人的盛意厚爱，为艾家三个女儿写了一卷圣德歌集(Divine and Moral Songs)，成为受欢迎的儿童诗歌文学的重要作品。

他竟在那里住了三十六年之久，直到 1748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那里离世，年七十四岁。

华慈学问渊博，一生著作甚多，包括有神学，天文学，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及教育伦理学，共五十二卷，其中的逻辑正确推理于追求真理(Logic, or the Right Use of Reason in the Enquiry of Truth, 1725)，成为标准教科书，数代之久。他晚年见到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所写的圣诗"摔跤的雅各" (Wrestling Jacob)，竟说，那首圣诗价值超越他一生的作品，如果此人早出，他可以不必写诗。可见其如何谦卑和推重后秀。

在神学方面，他为了调和与亚利乌派 (Arianism)的历史性争议，而在三一神的真理上偏差；甚至有人说，他晚年倾向于神体一位(Unitarian)思想；但从未能证实。

### 圣诗和俗调邪乐妖歌

华慈的作品，都是堂堂正正的作品，是敬虔圣洁的器皿，谨慎祷告写成，并没有求名牟利得动机，但为荣耀神，和造就人，也蒙神悦纳。

魔鬼知道利用音乐的重要，近世各种人，都以诗歌传播邪恶，仇恨，淫邪的信息，迷惑败坏人的心性。不幸，有些教会不加分辨，竟然采用，或仿其音调，以为可以吸引年轻人来参与教会聚会。其实，那

只能败坏人，不能造就人。约翰卫斯理精通音律，曾说：“如果唱诗的时候，只欣赏其音乐，而不思想其意义，就是犯罪。”看来今天的教会，聚会的音乐敬拜，真值得再思。

想到中文圣诗的境况，说来真是“乏善可陈”，更近于可怜。不必说，中文圣诗作品够好的还少听到，即以翻译而言，也达不到水准。有的文字典雅而失之艰深，有的不通而俗，有的则孱杂异教语词，如“合十顶礼”，“十字宝架”等语句，也出现在教会诗歌，更有的则生硬直译，不知所云。在聚会中使用这种诗歌，只能收到使人口唱而心不和的效果，阻碍敬拜至深且巨，很可痛心。深盼关心于圣诗的华人基督徒，亟起努力。教会能出几个华慈是最好的，不糟蹋华慈作品的佳译，也是莫大功德，免得愧对先贤。

### 31. Allyn Cooke Of Li Su Mountain 栗傈杨智敬

在中国云南省幽僻的层山里，依山散布着几间竹房。那里离最近的市镇和公路，徒步跋涉也要两个礼拜才到，没有车辆可通。不用说，那是个十分静谧，远离任何市声的地方。那里居住的人，是栗傈族，属于彝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但今天，那里有许多喧闹的声音，那是喜庆欢乐的声音，那是乌烟瘴气的欢乐。在一间相当宽敞的竹屋里，好几十个人聚集，在饮土制的威士忌酒；酒气，烟气，人声，乱成一片。那是栗傈族人阴历新年的狂欢。但在一个角落里，有位英俊的美国青年，坐在那里哭泣；他哭出声音来，哭得很沉痛。

喧闹杂乱的声音静息了。那些善良同情的栗傈族人，过来围绕这个异乡人。他们认为在这喜庆的气氛中，居然有个陌生人在哭：他那么大了，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高；作主人的，应该了解他的沉哀，并且有责任使他一同快乐。有个栗傈人关切的问：“老师！你为甚么哭？”这白人就透过翻译告诉他们，自己从好远的地方来，要告诉他们神的话，叫他们离开罪得救，他们竟不肯听！

他们惊异的问，他竟是那么深切的爱他们吗？

那被称为“老师”的白人，是新来的宣教士，对栗傈话还是乍学未通。于是，他用不纯熟的汉语，经过一个土著信徒的翻译，把福音告诉他们。他们都严肃的安静听着，都真实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他们的救主。他们把祭偶像，祭祖宗的东西，毁弃焚烧了，立即决志悔改相信，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真神。他们清醒过来，把各家缸里自酿的威士忌酒，连糟粕一起倒给猪吃。人清醒了，猪儿们却醉了；正好给他们看见自己未信主前的情形，如同从镜子返照，前后多么不同！

归主的浪潮就这样展开了。也延展到别的栗傈地区，情形也是如此。这是1920年的事。

这宣教士是杨智敬牧师(Allyn Cooke)。那时，他年二十四岁。以后，他继续在那个地区工作了共有三十

年之久，把青年的时间，完全奉献服事那些不认识的人；他的全家住在他们中间，直到 1949 年。他就这样把自己交托给那些半开化的异族人，在主里面，与他们成为一家。那些单纯的人，也把心身灵魂全交托了给他。

他见证着栗僮人历史性的改变。这不但是划时代的，而且真是福音的光照在黑暗里，有明显的不同。

栗僮族人的信主，是从 1908 年开始。那时，只是极少数的人，如同零星的种子，落在石头地上，工作十分艰难，他们的心，就如山上的石头那么硬。但到了 1920 年，圣灵的风吹过，昏睡的灵魂都醒转了，以后是成百成千的归信。

1983 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印了一批四万本栗僮文的圣经；信徒抢着购买，还是远远不够供应。据说，云南一区的栗僮人，在约四十万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相信基督。真是：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诗一二六：5,6)*

杨智敬牧师于 1896 年二月七日生在旧金山，长大在奥立根州。1918 年，在洛杉矶圣经学院毕业(现在的 BIOLA 大学，就是取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的 acronym 组成)后，参加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为宣教士，立志要到中国西南部山地土人中传福音。但到了中国后，内地会派他先去云南省大理的城市教会中工作；在那里，学习汉语；到 1920 年立为牧师。那里是去山区的大门，所以大理城中汉夷杂处。而云南省区域，有二十多个不同的少数民族。

在十多年前，有从英国来的“栗僮使徒”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 1886-1938)在腾冲(腾越)开始向栗僮族传福音的工作。杨牧师在那位资深宣教士提掖之下，对栗僮人民及文化有了些认识；而富能仁注重祷告，灵命高深，也装备了杨牧师成为有效的宣教士。在 1922 年富牧师回国休假，由杨牧师接替，负责在滇及缅边界山区栗僮人中工作。

栗僮族本来是崇拜邪灵，媚求鬼怪的；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儿女献给鬼魔，以祈福求安。但神福音的大能，使他们有完全的改变。

首先，他们信主以后，经历到从迷信奴役之下，得着真正的解放。所以不用多加劝说，都乐于认罪悔改，诚实的离暗就光。圣灵的大能，作成了这工作，使他们从里面，到外面，彻底的洁净，除去了一切罪恶污秽，在日常生活上，也开始有了清洁的习惯。

彝族的山歌，是很有名的。栗僮人在信主以前，只是互唱山歌，追逐异性。但信主之后，圣灵把新歌放在他们心里，他们“口唱新歌”，满有喜乐的赞美神。杨牧师夫妇是音乐家；在他们教导下，这些信主不久的土人，快乐分部合唱圣诗。于是，在层峦深谷之间，处处听到歌颂的声音，山谷响应，十分美好。在聚会时，他们热爱歌唱，有时候整个小时的唱诗颂赞神。当然，他们不会用风琴或钢琴伴奏，

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所有的，是内心满溢的喜乐，使他们欢然歌唱。那时，他们刚开始有宣教士为他们所造的拼音文字，还没有译出来的圣经；这样，歌唱把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唱入他们心里，把福音唱出去(参西三：16)。

栗僮人对文字的喜爱之深，是另一件奇妙的事。栗僮民族本来没有通行的书写文字，是宣教士们，照他们的语言，为他们创制了拼音文字。起初，只有部分的圣经和一些诗歌。直到1938年，在富能仁离世前不久，杨牧师夫妇完成了栗僮文新约圣经翻译；他们也完成了第一本栗僮文圣诗集，包括三百首圣诗。

从1924年开始，他们举办短期门徒训练课程。1939年，栗僮新约圣经出版后，基本的教科书有了，改称为雨季短期圣经学校，有三十名学生。次年，达到了一百十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圣经学校仍然继续；一直延续到1950年。

1943年，杨牧师的元配夫人去世。次年，主为他预备了另一位贤妻，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工作上的理想助手，杨文德夫人(Esther Freeman Cooke)。他们共有三男三女，只有幼女是在美国出生的。

1945年，第一本栗僮福音期刊出版。同年，栗僮教会联合会也告成立。因为战时及战后运输困难，到1947年，栗僮文新约圣经才大批运到，供应部族信徒，深为他们所喜爱。也就在那年，为了少数民族语文的印刷厂，在昆明启用，印刷宣道文字大为便利。

他们对文字的珍视，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土人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对于书刊却是要买的。这近乎一种牺牲。在战争期间，宣教士们没有收到外间的通信，有二年之久；也就是说，断绝了外来的经济供应。说来难以使人置信，他们竟能靠卖书的收入，维持简单的生活。这可算是文宣圣工的榜样。那时，他们艰苦的情形，就不用说了。不过，却很少为人觉察得到。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不艰苦过。土人们也是简朴生活。大家都同样住在竹屋里；好在天高皇帝远，用不着付租付税的骚扰。

当汉人基督徒，还在宣传自立自养自传的时候，那些在文化上比较落后，在接受福音也迟了一个世纪的栗僮少数民族，却得风气之先的实行了。其实，他们开始就是这样的。既没有新鲜口号，也没有谁觉得新鲜：这本来是原始教会的榜样。

他们的教会是全然自养的。教牧和家属的生活费用，完全由本地信徒供应，出于信徒的稼收奉献；信徒视之为当然的责任，其余的义务工作人员，全然没有薪给；不过，当他们出外的时候，所到的村社，信徒供应宿住饭食。因此，在经济上自始不仰望于差会；教牧也不是差会的雇佣。

他们的教会也是自立的。每到年终，有区域性的长执会，一切议事由栗僮牧师主席，制订规律，记录决议案，由各教会执行。宣教士们只充顾问，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他们的教会更是自传的。悔改接受基督之后，信徒即自动向邻居亲友见证，向别的村庄传扬。实际上，他们早就超越了自传，迈进了差传的阶段，差遣宣教士向别的部族传福音，帮助苗族和别的少数民族。

在栗僂族的福音事工，看见圣灵的大能在工作；宣教士们不拦阻圣灵的工作，只照主所托付的真道牧养他们。杨牧师和别的后进宣教士们，不求急功，不辖制羊群，真是"上帝国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

1949年十月，杨夫人得了盲肠炎，人用担架抬着，去保山转往昆明的医院就医。他们年纪大的孩子们，已经在美国读书；她的丈夫随后步行；栗僂信徒们帮助背负行李，扶掖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所爱的栗僂山区；栗僂信徒依依不舍的远送。其实，他们都以为这次的分别，是一次度假的暂别，并不知道就不能再回去；如果知道，他们会更加难舍哩！

进到外面的世界，才知道世局已经有了急剧的变化：共军到了云南，先肃清边境；到秋天，开始封禁教会活动。栗僂山区是不能再回去了；杨牧师一家，也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杨夫人的盲肠炎，已经由溃烂而奇迹的自然结痂；那时，昆明医院关闭，建议她到泰国曼谷去施手术清理。于是，在稍经休息之后，1950年二月，一家人越过了险峻的山隘，进入缅甸的一个山村，真是已筋疲力尽了，也难免情绪的低落。幸而主的爱感动情深义重的信徒们，伴送他们直到进入缅甸，看着他们安顿下来，又自己返回中国境内，继续主托付的工作。杨家则在休息后，转往曼谷。

1951至1952年间，有许多栗僂信徒，步行攀越一万八千呎的山隘，进入缅甸境内，也有的到了泰国北部。原居在缅北及泰国边境的栗僂族人，加上由云南下来的族人，竟约有七万名基督徒。

看到了那边明显的需要，杨牧师夫妇在美国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51年又到了泰国。在那里，他们帮助新进宣教士学习语文，找寻散居的栗僂基督徒，向栗僂，拉祜族，及在山地边区的华人难民传福音。在其他宣教士和栗僂信徒协助之下，他们也继续进行旧约圣经翻译。到1960年才再返美国。

在东方宣道四十年之后，杨牧师夫妇似乎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杨牧师觉得用栗僂语文表达自己的思想更为方便；初回来的时候，讲英语不知不觉夹上栗僂语。从1961至1965年，他们在加拿大的草原圣经学院(Prairie Bible Institute)教了五年书，以后再回到美国，定居在奥立根州。

在这段时间，他们仍然致力于帮助翻译校订栗僂文新旧约全部圣经，到1966年完成。可以想象得到，谁能比直接参与制订那语文的人，更能胜任翻译的事工呢！也没有人比他们更欢喜见到这事工的成就。他们感谢主，因为栗僂族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圣经，是把全部神的话，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翻译的。圣经公会于1967年接受印刷，到1968年出版。看到信徒们的欢喜，他们就如同种植的，看到人享受所种树上的果子。这是预见许多人因神的道而得救的喜乐。

1975年，近八十岁的杨牧师，又和夫人到了泰国，有三个月的时间，把属灵的恩赐分给那里的信徒。

以后，在 1977 至 1978 年间，他们又去泰国北部，工作了一年，主要是指导一个委员会校订栗僮文圣经的工作。这距他初去东方宣道，已是漫长的六十年了。

杨智敬牧师没有能再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喜爱奥立根州撒冷附近的银瀑公园(Silver Falls Park)。八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走在那里的山径上。他说，那边的景色，很像是云南的栗僮山区。他是那么的爱栗僮人，为主，把一生给了他们。

他有一架栗僮文打字机，已经相伴他超过半个世纪了；那是 Underwood 公司特地为了宣教士们定制的，全世界不过十架。九十高龄的杨牧师，仍然坐在那架打字机前，为他所爱的栗僮族基督徒打圣经讲义，每期印刷二百多份，分别寄去在缅泰北部的栗僮教会领袖们，有的也寄到中国，古老的打字机，古老的福音。生命活水由那里流出去，滋润许多的人。

他的中文名字是杨智敬。不少人觉得奇怪：为甚么 Cooke 译成“杨”？为甚么不译库，葛，或郭等音似的字？原来栗僮族中几个有限的姓氏，杨是其中的一个；那些单纯可爱的人，听到别的不常见的姓，会觉得奇怪好笑。为了福音的缘故，正是“在甚么人中就作甚么样的人”。有这样可敬的动机，与部族的人完全认同，他们还有甚么留下不给栗僮人吗？

就是这样，这位“厨师” (Cooke) 牧师，用灵食喂养着栗僮的信徒群。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栗僮宣道史，更是文字宣道史。宣教士不但传播了救人救世的福音，也散播了文字和文化的种子。这效果，是何等的宏伟而恒久呢！

Isabel Kuhn 称他为迦勒。

专心跟从耶和華的老迦勒，去见约书亚，对他说：“求你将耶和華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参书一四：6-15)。杨牧师仁者爱山，也爱山地的人。他凭信心为主得了那美好的山地为基业。谁是继起的勇士呢？

栗僮人是中国人。杨智敬牧师于 1990 年安然离世，到主那里领受奖赏。但他仍然活在栗僮人的心中。栗僮基督徒每有特别节日及聚会，从没有不提到他的。

### 32. Yih-Ling Liu 刘翼凌

刘翼凌先生于 1903 年九月十四日诞生，1994 年十月二日离世，在世寄居的日子是九十一岁。

记得寇故监督世远先生说过，刘先生是“华人教会第一枝笔”。这话不是不懂文艺的人盲目吹捧，也不

是溢誉之词。

这句话，是指他的文笔高越说的。那枝笔，为了主使用，流露出多种著述翻译的书籍，许多篇文章，是教会内外所熟读熟知的；但我特别欣赏他的诗。他的诗清雅绝俗，平易可诵，有时带豪迈之气。

这句话，也可以指他的笔法，特别提草书的造诣。故青年音乐家李英，也是在草书上很有成就的，在其所作草书千字文叙中说，刘先生的草书，是于右任以后的第一人。可见其手笔之高。

如此说来，刘先生可说是“诗书双绝”。但他并不用以沽名，也不引以自傲，更不曾低鄙到想藉此以大赚其钱；他的文章，诗词，书法，都是用来荣耀主。他是真实的基督徒文人，文宣士。

笔之所以称为第一，还要看其作品的特质，也就是其永恒的价值所在。苏辙(子由)曾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见“上韩枢密太尉书”)他是说，文章在于气质。接着，举孟子为例：因为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所以为文“宽厚宏博”；又举司马迁：因他周览天下名山大川，与豪侠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二人都不是学作文章如此，而是其气流露，形之于文的结果。

为文如此，写字又何独不然？唐朝的柳公权，书法劲秀，唐穆宗甚为欣赏，问他怎能写得那么好。柳公权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是说，要写得好字，先得作好人。古希腊哲人的看法也与此相似。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都相信，品格好的人，在歌舞行步上也自然会好。

刘先生因为特有的修养与品德，使他的诗文与一般的名利小人不同。自然的，这种才质流露出来，会得到人欣赏。

早年欣赏他的，是陈树人先生。那时，刘先生在侨务委员会任职。论官位，陈树人是侨务委员长，部长级的特任官；论文名，陈是岭南派的名家，诗书画都极佳妙，与当时的双照楼主汪精卫主席齐名。论年龄，他跟陈的儿子相仿佛。刘翼凌不过是科秘级的小官，而在陈树人1938年出版的诗集战尘集，居然请刘作序。当时的国民政府显要中，还有许多学人文人，为陈的著作写过序的有：蔡元培，柳亚子，经亨颐，孙科，汪精卫等人，而陈竟然请一名年三十几岁的后生小子作序！（见刘翼凌：“往事前尘忆战尘”，文宣第79期）此后，陈的著作都是由刘作序。这是对他诗文欣赏推崇的证明。

陈树人在一首“对月吟”五古百韵的长诗中说：

难忘素心人 吾党二三子...最忆陈曙风 温温瑚琏器  
狂侠亦温文 功名早敝屣 交游二十年 撝谦尊德齿  
比来道益进 不求复不悒 爱人救世界 服膺基督理...

其次忆刘子 觥觥翼凌氏 此君气概豪 风骨亦俊异  
天马行空中 不受勒与羁 自笑受人哄 曾作猢猻戏  
共事亦十载 患难不相离 官阁每会文 惊座发奇议...

可见他们的交往，不在世俗的官位，而在“尊德齿”，以年高与有德为尚。是那位陈老曙风，首先在未信主的刘先生心中，播下福音的种子。在刘着美心集里，有“报曙风书”：

时非凶岁灵无食 自照心魂已日枯  
多谢故人乐施舍 时时为我说耶稣

我们无从确知，陈老的生活与话语见证，对日后刘先生皈主有多大的影响，但这是历史上的渊源。

1948年，刘先生在巴基斯坦信了主。在由探索到皈信的过程中，从宣道文字得很大的帮助：首是圣经，其次是一本戴德生的传记 Hudson Taylor: The Man Who Believed God, by Marshall Broomhall.

信主以后不久，他即开始作文字宣道工作。神借着两个人赏识他，帮助他，以后与他同心在文宣上事奉：一位是内地会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赖恩融牧师(Leslie Lyall)，一位是主持宣道出版社的包忠杰牧师(Paul Bartel)。先是翻译工作，接着，是写文章，出版书籍；以后，延请刘先生入证道出版社，并主编灯塔杂志十一年(1956-1967)。

在同工中有知音，还需要读者中的知音。作文字工作的困难很多，但更苦的是孤单的感觉，不被认知：看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更少。一枝出色的笔，自然是阳春白雪，知音少，可是却不缺少批评的人。

在灯塔出版之后，有人看了说，印刷的太漂亮了：一精美就不够“属灵”了。因为那时的灯塔，是以美国新闻处出版的今日世界同样水准设计的，有些宗教人看惯了白纸印上黑字交账的出版物，以为太现代化。现代人物就说，封面上“灯塔”两个大字，写得不好。其实，那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写的“多宝塔”碑拓印出来的。(见刘翼凌：枯杖花，页26)一般人对字的欣赏水准如此，对文学的欣赏能力还用得说吗！不过，灯塔到底是通俗刊物，销行还差强人意，而且多是宣教士推广的成果；论道书籍就更不行了。

以后，刘翼凌先生来了美国，又创办了宇宙光杂志，继续办文宣双月刊。“宇宙光”和“文宣”的封面字，是集王右军书法。有人看了，也批评说是写的差劲；跟他讲是王右军所写的，竟然瞠目不知其人是谁，以为武夫军人怎会写字！说起王羲之的大名，还不错，他倒听说过，只是搞不通怎的右将军羲之会是同一个人。

刘翼凌创办文宣的时候，已是七十三岁的高龄了；是孔子叹“获麟”而辞世的年纪。他竟然开始作更艰

巨的工作：提醒教会“以文载道”，还要作育以文载道的文宣士。这种精神，这种远象，这种使命感，真是值得钦佩，值得效法。到现在，教会注重“文宣”的程度，还是嫌远远不够；可是“文宣”用来作术语，已经大为流行：文宣社是 1976 年成立的，在此以前，没有人如此使用，现在已甚普遍。不过，“文宣”原意是“文字宣道”；现在不仅不限于宣道，连宣传反道的文字，也使用这名词，只当作文字宣传的简称。我们该怎样想法？

刘先生的一生，跟英国诗人但恩(John Donne,1572-1631)相似：但恩前半生以诗文名世，后半生作了圣保罗大教堂的首牧。诗人凯路(Thomas Carew, 1594-1640)有两句诗：

这里躺卧着两祭司，都是最好的：

先献给亚波罗，最后事奉真神上帝。

Here lie two flamens, and both those the best:

Apollo's first, at last the true God's priest.

这话用来为刘先生的一生作结语，也正恰合。

刘先生写过一首七律，其中有两句自述：

圣事岂容争意气

生平最鄙用权谋

这是说，他最不喜欢用手段。他作过官，却不是贪官，赃官；后半生信了主，在教会里，却不是那种用心计，耍手段的教佞，教棍。这是多么难得呢！人不仅在乎其有多少作为，却在在乎其有所不为。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这才是文宣士和传道人应该有的精神，必备的气质。

记得：在 1978 年，我们从俄立根州南下加州访晤，刘先生甚为振奋，有诗志盛，并以相勉。那时候，他已经年高七十五岁，还仍健旺，期望共同振兴文宣事工。

于中旻教授远道来枉顾赋诗迓之

飞驰六百哩相存 此日双流汇义津

莫道古风今又见 如君高谊古无伦

曾抛残睡读君书 史笔诛心忆董狐

引镜直言严斧钺 至人异梦早相符

哲士桓桓战士姿 并肩赴敌岂容迟  
海山胜处安营好 秋以为期定可期

这里不仅可见其诗清新可诵，更可见其为文宣热诚，秉心正直，临老不衰，十分难得。

现在，刘翼凌先生已经放下了他的笔。盼望教会的主在华人中，在读过他书的人中，兴起更多的笔来，奉献在主的祭坛上，为主所用。愿大家努力支持文宣圣工，造就文宣士，以文载道，弘扬福音。

四十年前四本书

那是一册四十年前的照相簿。黑白的相片，有些已经褪色了，有的变黄了，有的脱落了。

那是时间的记录。...

照片越黄，照片中的人越是青年。

"那是曾住过的旧房子。那是隆庆，只有十几岁的少年。哎，这里是怡芳和传芳。..."

说话的维廉，看来并不老。一个巴基斯坦人，头发有些斑白了；额上有些皱纹。他穿着深青色西装。六十三岁。他仍然是那个 William Gill。

1951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四岁的维廉，一个空军航空工程师，刚走出家门。地点是在达卡(Dacca)一条静谧的街道上，离聋哑学校不远。那时，东巴基斯坦还没有脱离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共和国还没有诞生。

怡芳和传芳，是两个中国小女孩，一个八九岁，一个七八岁，迎着维廉走来：脸上带着些顽皮的神气，却是纯洁天真。他们问："你是基督徒吗？"

在巴基斯坦，虽然有英国人留下来的宗教，留下来不少的教堂，基督徒却是不多。

"我爸爸是基督徒。你要来我们家吗？"原来小天使在地上有家的。维廉跟着，走进了小女孩的家门。原来他们就住在对面不远的楼上。就这样，在那家里，他们同喝下午茶，女主人亲手作了酥脆的花生甜点。四十年后，维廉还清楚记得。那家的主人，是刚信主不久的刘翼凌教授，在达卡大学里教中文，以前是作外交官的。但他实在更是诗人，是文人，曾把中文诗词译成英文出版，所以在巴基斯坦的文学界，很多人知道他。

但那天他们所谈的，不是诗文，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他们所用的，都不是本国语文，而是用

英文谈话，但神的圣灵动工，超越了文化界限。分手的时候，维廉变成了新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成为基督徒。主人送了他一本圣经，和印度圣徒巴克星的小传。不久后，又送了他戴德生传，还有乔治慕勒传，都是英文本。

1954年，刘翼凌一家到了香港；以后，又到了美国。时间在流逝，人在流动。

当年播下福音的种子，却是落在好土里，发芽，长大，结实。维廉用心的读圣经，追求真理；加上几位宣教士的栽培，成为很有长进的基督徒青年。他原是旁蔗部(Punjab)地方的人，跟有名的印度圣徒孙大信(Sundar Singh)同乡。他先在本乡为主见证，以后去到首都达卡。

1959年，维廉凭着信心，走上了全时间事奉的道路。因为读了中国内地会创立人戴德生的传记，和信心伟人穆勒的生平，他一天一天的经历，使他相信：戴德生和穆勒的神，是活的神，祂今天活着；祂也会供应我的需要，只要我忠心事奉。

他没有在世上发达，却有在主里的喜乐和丰足。他有四个儿子，全都奉献事奉主；三个女儿，其中有一个丈夫是医生，一同在回教区里作宣教士工作，把福音带到平常艰难的土地。在牧养教会之外，他也是巴基斯坦福音协会的主席多年。他们也有电台广播，制作福音录音带，并有神学训练造就工作，预备下一代的传道人。福音传递了好远，传了好多代。

维廉与刘翼凌有书信来往，却并不多；但他在祷告里，常记得引导他信主的人。这见证，他已经讲给，写给了许多百万人，在亚洲和美洲之外，也包括去欧洲各地讲道时的见证。

四十年后，现在1991年，维廉又坐在刘家的客厅里，地点是柏客里。维廉说，他从来没有忘记，是神借着中国人，领他进入了神的恩典中，所以他对中国人有特别的感情。问起他：“你有个中文名字吗？”“那很容易，我姓刘！”他说：“在我的办公室里，挂着刘教授伉俪的照片。”又说：“巴克星已经很老很老了，不能说话，也不能行动，已经九十多岁了；他是刘先生的朋友。”我们多么希望，主兴起更多年轻人，造就他们，成为合用的器皿。

在地上相逢又别离。

告辞的时候，他要八十八岁的刘教授为他祝福祷告。他双膝跪在老人家的脚前：那么恭顺，属灵的真儿子！虽然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出到外面。风吹在身上。风是从哪里来的？

风，随着意思吹，并不承认国界。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大能，没有文化的分隔和限制。

1991年二月

后记：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几点意义：

家庭是传福音最好的基地。个人见证是每个人都能作的，是引人归主最有效的途径。我们该关怀别人。孩子们也可以成为福音的小天使。随时忠心为主撒下真道的种子，主能叫它生长。文字是宣道的有效工具。一本圣经，三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而改变许多人，结出美好的果子。有人慨叹"同工会变成同攻！"但"攻"字是"文工"合成的；何不同心用文工，向撒但黑暗的国度进攻？

有人统计，美国图书馆里，每册书的平均价格是二十二美元，就可以影响一个人，以至许多人的生命和思想。盼望你注意文字事工。

### 33. Talking Leaves 伊利安宣道

时间是 1957 年。那是照外面人的日子，山中无历日。

吉本斯(Don Gibbons)，在伊里安(Irian Jaya)的深山丛林中，动手建造一间树皮小屋。钉子用完了。

他随手拿起一小张纸，在上面用铅笔涂了几个字，交给在旁边帮忙的一个达茅(Damal)族土人，要他去送给一位宣教士同工拉尔生(Larson)："你去给我带些东西来，好建完这间屋子。"

那个达茅人看着那片"叶子"(Ogolal)，却皱着眉头说："我不愿无缘无故下过谷那边，空跑一趟！"对于没有文字，没见过纸张，对写信的观念无法了解，既不能写，也信不过的人，如何解释法？这是个问题。

吉本斯笑着说："这是一片'说话的叶子'。只要你拿去给吉尔生，他就会把所要的东西给你。"那达茅人摇头说："叶子不会说话。"

吉本斯拾起一根钉子说："我告诉你我要的是甚么：我要一些像这个一样的钉子。但你甚么话都不要讲。只把我'说话的叶子'交给他，看他会给你甚么。"

不到一个小时，那人回来了。他满怀兴奋，惊奇不已。他向吉本斯报告："这是你要的钉子。我一句话都没有跟拉尔生讲！他只看了你'说话的叶子'，就把钉子拿给我！"

那天晚上，在土人的男宿舍里，神奇"说话的叶子"，成了主要的讨论话题。这故事传来传去，说吉本斯如何只在一片叶子上，画了几个记号，拉尔生看了，就知道他的意思。

伊里安原称新几内亚，曾是荷兰殖民地；现在属印度尼西亚。1954年，吉本斯和拉尔生初到那里。达茅族第一次见到白人，以为白人与他们不同，只有他们自己是“真的人”。他们见到白人能从天外的“大鸟”（飞机）飞来，从大鸟的肚子里面出来，又吃罐装的奇怪东西，认为是与“人”不同。他们慢慢发现，难解的怪事还有许多；纸和书写是最大的怪事之一。

“达茅”这名字，就是“人”的意思。他们还生活在石器时代。那时，他们中间极少数人拥有一把斧头；不但是罕有的利器，并且是极宝贵的财产。他们没有书写的文字，也从来没有见过纸。因为他们的观念里没有“纸”这个名词，所以你可以理解，也不知道文字可以像语言一样传达意思。因此，吉本斯把纸称为“奥高罗”（Ogolal），就是“叶子”的意思。但语言可以书写成为文字，还远超越他们理解的范围。

吉本斯是宣道会的宣教士，一家住在达茅人中间。为了向他们传扬基督的福音，必须学得足够的达茅语言。

有一名聪慧的达茅人，名叫提他（Tita）。他留心观察吉本斯可以吃他们一样的食物，判断这个白而高大的人物，可能也像达茅一样的是人，吉本斯在学话的过程中，有时表达错误，提他就改正他。吉本斯在“说话的叶子”上作些记号，下次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使提他十分希奇。

有一天早晨，提他发现吉本斯独自坐在石头上读圣经。提他问：“你在干甚么？”

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书”，“圣经”，以及“读”，“上帝”，都是土人观念中所没有的，也就没有这些语词；该如何表达？在这个机会，吉本斯从他有限的新达茅语词汇中，铸成一个新字“甘公安美”（Unkangam-Me），意思是“创造的那一位”：“创造者”。

吉本斯说：“提他，在这些叶子上面，写着创造者的话。创造者说的话写在这里。我看这本书，这些叶子，就能够听见创造者对我说话。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懂得。你的小黑书，一定对你很重要，因为我看见你时常在看它。”

向部族土人传福音，还需要教他们读圣经，这样，他们的信心才会有根基。起初，是用集体背诵默记的方式。吉本斯和另一语言学的同工，就为他们创制书写文字系统，是用十七个字母的拼音文字。于是，从记录语言，进而翻译圣经。当然，还要教他们识字并写字。

达茅人和邻近的各部落，本来在邪灵的迷信和恐惧捆绑之下。1958年，圣灵大大动工，他们纷纷焚烧传统所崇拜的物件（Fetishes），悔改归向真神，成千的归正，几次受洗，都数以百计，约有十万人。吉本斯夫妇，和其他同工们，同时举办圣经学校，推行识字运动和主日学教育。提他就是早期圣经学校毕业的学生之一。

土人信徒从撒但权下归向真神，亲身经历了救恩之乐，满心愿意向人见证，真如活水涌流，并不是宣教士雇用来作工。有了文字的圣经，在真理上受了栽培，不但热心，而且有真知识；圣灵同工，神迹奇事随着，信而归主的就很多了。现在达茅族人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信主的。在易里安的盼凯山脉地区(Puncak Jaya Range)中，几个部落的信徒，超过二十万人，建立了一千五百多个教会。他们的教会行政及经济，全都是由本地领袖及信徒管理，用不着宣教士们插手；并且还差遣宣教士，去向别的部族传福音。这情形，就如初期教会一样。

文字宣道工作，是支持远方宣道的后卫。二者互相辅助合作，使教会得以建立并增长。当然，信主以后，并不是一切问题都随之解决；这些新信徒，所遇到生活上的问题，都是从文字的圣经中找答案。

圣灵借着“说话的叶子”，使人明白神的旨意，改正了错误，使信徒结出了仁义的果子。

1986年，笔者遇到吉本斯。他所展示的幻灯片，传达出达茅主内肢体的情形。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多大改变。很多男仍然只穿着“瓠裤”（用一种特产的长颈葫芦遮住下体），女的只穿草裙；也有的改穿印尼装。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由拜物教及精灵崇拜，而归向真神；除去撒但奴役的惧怕，而得着基督里的喜乐；放弃凶杀斗殴，而有仁爱和平。这都是福音真光照进黑暗的结果。

节录自 Alice Gibbons: The People Time Forgot. (于中旻译：世外人。文宣)

### 34.Fox&Quakers 福克斯及公谊会

乔治福克斯 (George Fox, 1624-1691) 生于在英国磊斯特郡(Leicestershire)，是 Drayton 乡村一名织布匠的儿子。幼年没有受过甚么正式教育，作过鞋匠的学徒。他勤于读书，博览群籍；也能写作。

早年受清教徒影响，不满于外表仪式，和繁文缛节的宗教生活。十八岁那年，福克斯离家去寻求真诚的宗教教导，和属灵经验。约在二十岁那年，他得到“永生基督的内在亮光”：

“主指示我，给我清楚看见，祂不住在人吩咐，人建立的殿中，只住在人的心里...祂的子民是祂的殿，祂住在他们里面。”

根据自己的经验，福克斯认为宗教上的争辩，都不过是细微末节；圣经的真义，幽深难明，教条礼仪，更是人的作品；所以不注重去教堂，守圣礼，而主张以神对个人心灵说的话，为可靠的引导。他强调“内在亮光” (Inner Light)，不重视教职人员的教导，因为信徒皆为祭司。他说：

"我看见这些事，不是由于人的帮助，也不是从字句，虽然那是用字句写的，但我看见是由于主耶稣基督的亮光，直接从祂的灵和能力，正如圣别的神人，写成圣经那样。"

在他的记述中又说：

"主显明给我，牛津和剑桥的造就，并不能使人合格成为基督的仆人。"

这样极端反传统的教导，使学院派反对的人，讥称他所谓的"亮光"，只是"游磷鬼火" (Ignis Fatuus, Ignis Fatui)。

福克斯又主张所有的人是平等的，不应该有种族的歧视，性别的区分。他说：

"我曾遇到过一种人，他们以轻蔑的态度，认为女人没有灵魂，并说，女人不胜于一只鹅。我指责他们，告诉他们那是不对的，因为马利亚说：‘我心 (soul) 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

因此，福克斯以为女人和男人一样，只要得到神的启示，都可以传道，称为"真理传布者" (Publishers of Truth)。信徒则称为"真理的朋友" (Friends of Truth)，这就是"朋友会"或"公谊会"名称的来源。有一次，他被控褻渎罪，福克斯昂然无惧面对法官，并且向审判的人宣称，他应该"因神的话恐惧战兢" (tremble at the Word of God)；因被称 "Quakers" (战兢者，中文音译"贵格会")。

他们反对各样的虚衔，如：主教，爵士等，只彼此称各人的名字，主张和平，宽容，反对战争，也拒绝参与战争，包括纳税支持战争，以个人"良心的自由"为依据。也拒绝宣誓。信徒彼此之间，则实行诚实爱心相待，有交易行为，只需一言为定，不必立任何契约。

福克斯教导单纯的敬拜聚会，在聚会中静默，得到神的启示才传讲信息，劝勉会众。

可惜，他生逢没有容忍的时代，英王以为宗教信仰是效忠的一部分，"真理卫护者" (Defender of the Faith) 统治人的身体，也不放过人的灵魂，因此颁谕人民："效忠国教，否则离国！" 偏有人民选择第三条路：反抗，使他失去教会，也失去国家。公谊会是和平主义，不同意战争，也不接受王所定给人民的选择，只有入狱。

这样，有足够的理由，使他们受宗教和政府的反对迫害。福克斯本人前后入狱八次，约有六年的时间在狱中度过。这使他的健康受损，但使他看到监狱内部的情形，力倡监狱改革。

在清教徒当政期间，他们得到较大的自由。福克斯还有两次蒙执政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召见谈论。

福克斯在各地周游传道，跟从的人渐渐多起来。有一位公谊会的游行传播者洛伊(Thomas Loe)，1666年，在爱尔兰引导宾威廉(William Penn, 1644-1718)接受了这新信仰。宾威廉学过法律，写了许多宣扬教义的作品；是海军上将宾恩爵士的长子，父亲在1670年去世，使他继承了爵位和家产，与英王雅各二世(James II)有深厚的友谊，也与许多政治显要相识。1689年的“容忍法令”(Toleration Act)颁布后，公谊会才比较更被接纳和了解，并有些受尊敬。

1671至1684年期间，福克斯旅行到英国殖民地加勒比，北美地区，马利兰及罗德岛，并到过荷兰和欧洲大陆。他在世的最后年日，则多在英国巡回劝勉同道，也同许多人通信。他于1691年一月十三日，在伦敦离世。

1681年，宾威廉和十一名同道，在东纽泽西买得一些土地所有权。后来，他从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取得德拉威河以西的广大土地授与权，以抵销查理欠他父亲的巨额债款为交换，取名宾塞维尼亚(Pennsylvania)。用意是要建立一理想的宗教殖民地，收容公谊会信徒，及一切为宗教信仰和良心自由受迫害的移民。宾威廉任为总督，本人躬亲规画，并制订章程(Frame of Government)，着意不在求取自己的利益，反而是要立意保护人民，以限制其本人和以后的继承者“不得任意为恶，不能以一己之意志而妨害全民的利益。”其首城定名为非拉铁非(Philadelphia)，是“弟兄相爱”的意思。他于1682至1684年，在宾塞维尼亚；离去后委任James Logan摄理。宾威廉高瞻远瞩，并拟订美洲各殖民地联邦计画草案(1696)，不仅远在美国立国之先，并且预布宪法和近代民主制度精神，就是人罪恶本性，必须予以限制。

宾威廉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但他知道人性的恶，唯一的希望，在于神的恩典，圣灵的感化。曾说：“人在迷径中劳倦寻求神，讲论神；但如果要真正认识神，必须领受祂给我们的印记：我们的心越柔软，祂所给我们的印记，也越加深刻，越加明显。”

1692至1694年，宾威廉挈家再来美洲，为要亲自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此后即未再踏上美洲的土地。1718年七月三十日，宾威廉在英国离世。

在美洲殖民地的土地上，公谊会和别的移民，得以自由发展。但在这土地上，有许多不自由的人，他们是多数的非志愿移民，而且不被当作人，是人所拥有的“活工具”。那是来自非洲的黑奴。

解放黑奴的先知悟勒曼(John Woolman, 1720-1772)，是公谊会的真理传播者。

他生在虔诚的公谊会家庭，自幼受信仰熏陶，生活行事如同古圣徒，同情人的疾苦，对于人权和尊严，极为敏感；他早就反对以奴隶为财产的不合理制度，认为“人拥有人”是不应该的。他以为自己生意发展得太庞大，会使灵命瘦弱，宁可放弃经营，而个人从事裁缝维生，传福音不收费。

悟勒曼说：“我认识一个卑微的人，靠神的赐福，生活得简单；有人心高志大，经营成功并不能满足他的贪欲；常是财富增加，贪爱财富的心也增加。”

他独立特行，在那个时代，华盛顿，杰弗逊，立国先贤普遍蓄有奴隶，只有悟勒曼不蓄奴，也致力反对奴隶制度，到处宣扬，勉励同道，唤醒人的良知。他也赞助莫拉维弟兄会的宣教士，向印地安人传道，并寻求公义对待土人的政策。

他的生活简单，穿着朴素，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徒步行走，也避免买任何与奴隶有关的商品。他影响公谊会宣告反奴的公定信仰，并曾劝说许多个人解放黑奴。

公谊会的信仰是和平反战，但不避免真理的争议，是美国反奴先锋。诗人惠礼尔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2)的作品，据说，有助林肯 (Abraham Lincoln, 1809-1865)为第十六位总统(1861-65)。在“道义之战” (The Moral Warfare)一诗中，他写道：

我们总要倚靠神自己的能力  
预备面对那要来的战争，  
单为了神的旨意奋勇  
敢于敌挡邪恶的权能，  
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用天国的爱，真理，和光明。

那勇于真理的精神，跃现纸上。惠礼尔虽然缺乏高深的学问，其诗浅白近人，表现敬虔，仁爱，激励良善。在内战后的重建时代，被成为“学房诗人”，为学童所普遍诵读，有助于心灵和品德的建立。

### 35.C.H.M. 麦钦陶

大布道家慕迪 (Dwight Lyman Moody, 1837-1899)曾经说过，他只要有一本圣经和 C.H.M.的五经笔记就够了。

麦钦陶 (Charles Henry Mackintosh, 1820-1896)有名的著作五经笔记(Notes on Pentateuch)等书，风行世界各地，署名常作 C.H.M. 父亲是高原军团的上尉，驻扎在爱尔兰的卫克劳 (Wicklow) 郡，C.H.M.就在那里的军营出生。他母亲是维勒顿夫人 (Lady Weldon) 的女儿，是世居爱尔兰的贵族。

在十八岁的时候，因他姐姐来信，述说她归正的见证，心灵觉醒，向慕属灵的事，读达秘 (J.N. Darby) 所著圣灵的运作(Operations of the Spirit)，读到“是基督为我们的工作，而不是祂在我们里面工作，给我们平安” (It is Christ's work for us, not His work in us, that gives Peace)，得到帮助，而得着心灵平安的效果。

这个新基督徒进入 Limerick 的一所公司工作，他勤于博览群书。1844 年，他在西港 (Westport) 开办一所学校，由于他勤奋认真，颇为成功。1853 年，他觉得教育事业，太多占据他的心，影响他以基督为中心，随停办学校。

在这期间，他的笔忙于写作摩西五经的注释，前后达四十年，出版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各一卷，申命记二卷。这些书，深蕴着福音信仰，融会新约的宗旨，以基督为中心，扉页写着“新旧两样的东西”(Things Old and New)。初版序言由他的朋友密勒 (Andrew Miller) 署名，出版费用是他帮助筹得来的；他正确的介绍那书说：“人全然被罪败坏，神借着基督完全的救赎，都充分的，清晰的，常是精警的表现出来。”

作为注释者，C.H.M. 有其锐利深入的观察，有力的表达出他的看法，使人得激励，而忠实于神的话，坚定的信靠基督。

放下教育工作后，C.H.M. 去到都伯林，作公开讲道事奉。多年来他勇敢的卫护真道，宣扬福音，神大大使用他，赐福他的工作。当 1859 至 1860 年，大复兴横扫爱尔兰，他尽力的参与。他是大有信心的人，常经历试验；但他专心从事福音的事工，神从未让他缺乏生活上的需要。

C.H.M. 生活敬虔，非常注重祷告：不仅是个人灵修祷告，还鼓励信徒参加祷告会；他并且主张，要跪下祷告，并不能藉词推却。

他在世最后四年，住在柴屯罕 (Cheltenham)。因为年事已高，不能多在讲台事奉，就专注写作。他一生有很多著作，明晰而简朴，短章与单行本，难以数计。最后系列的短章，称为“几把牧草”(Handfuls of Pasture)。他的著述流行甚广，对世界各地的教会影响甚大而久远，无从估计；有极多的来信，表达对他注释摩西五经的满意。

1843 年，他第一个短章“神的平安”(The Peace of God) 出版；在 1896 年，他最后的作品是“平安的神”(The God of peace) 写完交付出版者，就此停笔。几个月后，他平安进入永远安息。他所写的杂着集 (Miscellaneous Writings)，以几种不同方式出版。他忠勤的事奉，长达四十多年，功效大而持久。

1896 年十一月二日，七十六岁的麦勤陶，安然睡去。虔诚的人，把他的遗体移至柴屯罕墓地，在各地来的人群送别中，安葬在他爱妻之旁。爱丁堡的悟斯屯博士 (Dr. Wolston)，以安葬亚伯拉罕为题讲道 (创二五：8-10 来八：10)。会众在散去以前，唱达秘美好的圣诗：

噢，光明和蒙福的家乡，

那是罪不能侵染的地方；  
我们的心灵渴慕那景象，  
虽然现今还在地上飘荡。

在创世记笔记中，C.H.M. 讲到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仑，买地安葬撒拉，他看见了那“美好的复活清晨”：

信心不能长久注视死亡；感谢永生的神，祂赐给更高的标的！复活永远充满信心的远象，它的能力使人从死亡面前站起来。...死亡是撒但的边界；撒但的尽头，神的起头。(创二三：7)

### 36.ARealRichman 富而能足有百祥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口向地广人稀的西方发展，寻求致富的机会，随之形成商业和文化的迁移。在中国，随着民国的建立，满洲人不仅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连老家也失去了；大量的移民，涌向东北去求发展。

有个基督徒吴百祥，原籍河北，早年赤手空拳进入东北。那时，货币制度也随着时代改换了，银两，银圆变成了纸币；官家随手印刷方便，人民携带容易，只是有一个缺点：流通日久，就由陈旧而破烂。当时支票还没有通行，破旧的钞票，实在不受欢迎。这样，有一种行业就应运而生。吴百祥作的就是这种生意：纸钞换银圆，旧钞换新钞，然后去银行兑换，从中赚取小利。以后，就负贩三块瓦皮帽子，也卖线针织的袜子；因为传统的中国袜子是用布缝制的，所以那种袜子称为“洋袜子”。他见这种简单手工业并不难作，就积存了些资本，买了几部针车，家人在家自织，拿到街市上兜售。由于他作事诚实认真，又肯观察研究，织成的袜子比别家出品好，穿来也更合脚，所以颇受欢迎，生意也就越作越发达。

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笃信神的应许，对事奉神也极为热心；每逢主日，必定全家休业聚会，不作买卖，凡所得的，必定献上十分之一。他原来所受的教育很有限，但甚有聪明和才能，蒙主恩眷，生意扩展很快；不到二十年，自己在哈尔滨建立工厂，生产针织品，衣物，肥皂，化妆品，日用百货等，规模阔敞；还建了大罗新百货公司及同记商场，四层钢骨水泥的大厦建筑物，全是由他自己绘图设计建造。在第四层楼上，是礼拜堂，可容一千多人；自己延聘牧师，成立教会。每至主日全体停止营业，集合员工敬拜主；他自己为全部的诗篇谱写曲调歌唱。不用说，这是真正的自立，自养，自传教会。他又办了中学一所，小学一所，入学的学生免收学费。到了主日，他自己徒步率领成群的学生，到教堂赴主日学及聚会，真像是走在羊群前面的好牧人，是好的见证。

吴百祥事业大了，上下员工有四五千名，经理五十多人，常派人赴欧美考察，增广见识，改进业务。

因为树大招风，到了“满洲国”期间，政府想要他出来领导工商业；他拒绝了，由经理一员作代表来应付，竟被举为商会会长。吴自己并不求名，自奉甚为俭约，一套中山装，可以穿上十年不换；自己安步缓履，从不坐车；妻子操持家务之外，也要亲自摇纺车来倒纱。但对于传道人，则尽量接待，以为是神的使者；凡信仰纯正的神仆，不视宗派差别，一律款接，临别还有馈赠，帮助他们往前行，为主工作。凡属主的事工，都尽力协助；他从来不只看见自己的教会小圈圈，而是有远大的眼光，广阔的襟怀，对主身体的真理深有认识。有一次，某宗派教会向政府申请到一块墓地，有数百亩之大；他就往见负责的牧师，晓明基督徒活着也不该分宗派，死后的遗体哪还好有差别？他出资建造周围的砖墙，用了当时的币值八千元之巨，好让所有信徒死后有葬身之处，等候主再临复活。这好像是对教会建“围墙”者的讽刺和教导。至于众教会协合的事工，在众肢体奉献之外，所差的他都全部负责，有时高达几千几万元之多，也毫无吝色。

在当时，中国用汽车的人还不多见；外国宣教士仅少数有自备汽车。吴百祥衡量实际情形，就说：“洋人牧师有坐汽车者，吾国牧师何可出无车！”因此，为教会牧师建造新马车一辆，出入代步。那时，中国教牧多从西差会领薪水，每月仅在十几元，或二十元，有的少至八元，跟宣教士的厨子或佣人差不多；小学教员月薪二十五元，中学教员四十多元。这是一般的待遇标准。但吴百祥聘请丁立美牧师为会牧，每月奉献银圆三百，并且为会牧建新式住宅，有暖气设备，并有佣人二名，以免牧师之劳。可惜，丁牧在那里任期不久。这可能由于二人性格不合；吴或有东家与西宾的观念；丁则被宣教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徒”，视之为当世保罗，而品性高洁，不为物质所役，固然显得可敬，少说也不免有些傲气。据说，当分手的时候，丁对吴说：“你不过就是有几个钱嘛！”可见是不欢而散。

但吴百祥到底是个谦虚而真诚的人，待人宽厚，慷慨有爱心。有一位任职多年的老牧师，晚年双目失明；吴奉献三万元以赡养其老。至于他每年的十分之一奉献，积达数万元，当地教会足用有余，中国也没有教会机构可以称为“神的仓库”，统一管理分发；他就询察外地主的事工，有甚么需要，不分南北，不问远近，不管识或不识，更不待人来索取，随从圣灵引导，径行寄去奉献，而且不求显名，从不挂甚董事等名衔，更为可取。说到他助人施舍为善，则是不胜数纪了。真可以称良善忠心的好管家。只是不知甚么原因，他没有办过教会传播事业，也没有办大学；虽然他有那个力量，说不定是没有相知可托的人，也许是其原因。

最特出的，还是吴百祥的基督徒化经营原则。

事业大，用人众，赚钱多，利润该怎么办？每到年底，结算全年营利总额，税是要纳的，但向神“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先取出来，然后分为三份：一份归劳工，一份为营管，一份给资方。每人所得的数额，并不全是现金，而是有部分为公司股票(20%至30%?)。这样，事业是大家的，全体员工都成了股东，也都是劳工，作事自然也更为认真。不过，就是这么智慧合理的事，工人待遇也好过一般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效法，还有极少数的一小撮人，不喜欢这种作法：唯一的原因是创新。吴百祥的理想超过他们前头四五十年。

以后，政局改变了。吴百祥并不用满载远逃，资本家成为清算斗争的对象，有的下场极惨。吴百祥的遭遇如何，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在大风暴中，他也曾遭受相当严重的冲击；有的说，他只受到轻度的为难。据说：在被当作“资本家”对付的时候，热热闹闹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并找不到他剥削劳工的罪证，指控不能成立。他的生活同大家一样的简朴，多少年来的见证，在众人面前，是一本敞开的账簿，并没有为自己积财；他也没有参与政治的事，更没有勾通外国，作甚么帝的特务。实在说，他秉性耿介，不会趋附，还似乎多少会有些“反帝”的倾向。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把一切企业都交了出来，符合了政策。吴百祥其人的下落如何？他肩上背着一个褡裢，内中是圣经，圣诗，简单的日用物品，和一些干粮，飘然走向山僻的村庄，传扬福音去了。以后，再没有人看见他的身影。到现在，也没有听说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资本家”的出现。

这些日子，哈尔滨这名字和形象，倒还听说过，见到过，那是国际有名的冰雕展出：许多精美可观的建筑物，几乎是整座城市的景物。但那都不能存在多久，不等夏天再来，就都消化了，过去了。但我们都知道，吴百祥的工作，总不会消化。

汽车大王亨利福德(Henry Ford, 1863-1947)说过：“伟大的人看出时代的需要，并能供应那时代的需要。”吴百祥可以说是那样的人物。因此，他值得人长久怀念。

在许多年前，一位认识他的老牧师，提到他的名字和传奇般的事迹。我也遇到过在他公司工作过的人，连不曾直接认识他的人，也传诵他的声誉。又是好多年后，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乘客，人看来庄正安详，说是哈尔滨人，早年在吴百祥的学校读过书，上过他的主日学。可见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但现代继起的吴百祥在哪里呢？

### 37.DavidLivingstone 李文斯敦

在英国的一个小教会，长执们在开会。他们觉得应该辞退那牧师，因为在过去一年，竟没有一个人信主，为教会增加会友。其中有的人说，牧者年纪已经大了，要叫他往哪里去另有高就？不如再留他一年。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在那年里，他领了一个年轻人归主，就是摩菲(Robert Moffet, 1795-1883)。

摩菲生在苏格兰中部近爱丁堡的东洛阡(East Lothian)，离诺克司(John Knox)诞生地不远。他被称为“非洲的使徒”。于1816年，受伦敦宣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往南非宣教，到1838年回英国度假的时候，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到处演讲，鼓励人献身宣教。他描述那黑暗的大陆，在撒但奴役下的悲惨：“村落成千，炊烟处处”，却没有宣教士的脚踪踏到过！有谁肯去把福音带给他们？

有一位青年医生的心，被他话语的火焰燃烧起来。他是苏格兰人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1813年三月十九日，他生在苏格兰的布兰台(Blantyre)，父母贫穷却敬虔。在十岁的时候，就进入棉纺厂作童工，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他抽暇读一点书，并每天两小时的夜校。十二岁的时候，他重生悔改皈主。在二十岁时，立志去中国作医疗宣教士。

为了充实自己，他到附近的歌拉斯高(Glasgow)去修读医学，并读希腊文和神学；假期就回到棉纺厂工作，以赚钱缴付学费。1840年，李文斯敦遇到了摩菲，这次的会晤，决定了他事奉的路程。那时，适因中英鸦片战争，中国去不成；摩菲劝邀他去非洲；伦敦宣教会按立他牧职，派遣他往南非。

1841年，到达开普敦(CapeTown)。在还没到摩菲在库汝曼(Kuruman)的福音站之前，李文斯敦所见到的情形，就使他不能静默不言。在英国，早于1833年，禁止奴役法案通过实施，殖民地也应该遵行；英国海军巡逻制止贩奴活动，但非法的奴役仍然存在，每年出口往古巴，巴西，及美国的黑奴，仍然有六万名之多。李文斯敦表现出他是不讨人喜悦，也不避争议的人物。以一名后进宣教士，他立即在讲道中反对白人剥削压榨黑人。他似乎忘记了，那是白人的奉献，在支持宣教“圣工”啊！黑人有甚么经济贡献？这样，他不啻是他捣了许多人的肚皮。后来，他也批评宣教士只聚在南部沿海城市，不肯北上到内地乡村。岂不是在踢不肯前进的人的屁股？这在习惯上应该容忍，知道也不能讲的。更加上他主张在宣教工作上引用非洲人，更等于伤害了白人的优越感，撕下他们的高帽子。虽然那是英国宣教世纪的时代，这个不知避忌的青年人，与一般宣教士不同，他们之间的相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他远远走在同时代的人前面。想想看，在李文斯敦去了天堂一百多年之后，南非的教会还是一面传福音，一面搞种族隔离；李文斯敦的先知作风，是多么不可思议，也多么不可原谅！以后，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带给女儿的礼物，竟然是一个黑洋娃娃！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李文斯敦到达库汝曼福音站。一年后他已超越任何白人所到最北的地方，也学了非洲的语言文化。

1844年，在摩菲的福音站附近玛保萨村(Mabotsa)有狮子为患，吃掉了许多牲畜。迷信的土人，相信那些狮子有邪灵附身。李文斯敦不仅要为居民除害，还要为他们破除迷信。于是他召集了村民去猎狮。他们发现有几头狮子，在大石上休息。李文斯敦用双管猎枪，拣那群中最大的一头雄狮，把双管子弹都射中它。当重新装填子弹的时候，那受伤狂怒的狮子猛扑过来，咬着李文斯敦的左臂。一名土人信徒麦保维(Mebalwe)，向那狮子发射了一枪，没有发火。狮子转而扑向麦保维，咬伤了的大腿；又咬伤另一土人的肩头，然后忽然倒在地上死亡。

1845年六月二日，三十二岁的李文斯敦，同摩菲的长女玛丽(Mary Moffat)结婚。在婚后三年之内，他们三迁其居：不是为了选择更好的社区，而是每次都更北上，深入不可知的非洲内地。李文斯敦不仅

是顺口说爱，而是关心土人福利，作他们的朋友。李文斯敦的宣教心志，照他自己所写的：  
我心目中的宣教事工，不同于那些忧郁类型的人，臂挟着一本圣经。我劳碌作砖和泥，打铁，作木工，同时讲道并医疗。我觉得不是自己的人。当我为跟我的人射猎一头野牛，或仰观天文，都是事奉基督。靠神的恩助，我盼望所采集的资料，能够造福非洲人，使他们有前所未有的丰盛。

李文斯敦为天国而忘家，他的眼睛一直注视更远的地方。1852年，玛丽的健康退步，为了安全和孩子们的教育，他只好让玛丽带着孩子们回到苏格兰，因为他去的环境，实在不适于家庭。一个女儿已在那里夭折；现在所剩下的四个孩子，三子一女，最大的长子罗柏才只有六岁，要变成跟父亲隔绝遥远的“孤儿”。那离别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那离别竟长达四年半之久，直到1856年李文斯敦回国，才有短暂的相聚。

1853年，李文斯敦从事六千哩的穷荒之旅，历时四年，从西岸的大西洋，到东岸的印度洋，横越非洲大陆，到从没有白人脚踪踏过的地方。但那不是淘金，也不是猎名；在以后出版的日记中他写着：“我最高的目标，是关系基督的国度，没有甚么比这更重要。”

在这长途疲劳的旅行中，他身罹疾病，冒有些土人部族的反对，野兽侵攻的危险；但他坚持严守自律：探险观察，研究语文，采集资料，写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报告，持续他著名的日记，出版后赢得广大的名声。1856年，李文斯敦第一次返国度假，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并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授金奖章，牛津大学赠授给他荣誉博士学位，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单独接见。当他留在英国的时候，出版了其在南非的宣教旅行和研究(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 in South Africa)，成为畅销书，售出七万本之多，坚定了信徒的信心，激励宣道热诚，并对科学及疾病研究有重大贡献。版税的收入，纾解了他家庭的经济困难，也增加了一个幼女。

他不是像今天那些“缺席的父亲”。他知道也感受自己对家庭的亏欠，尽量用满有柔情的书信补偿。他的价值观也影响了下代：他的儿子罗柏(Robert)，不喜读书，跑到美国，参加解放黑奴的内战，入伍在合众国的军队中，于1864年受伤被南军俘虏死亡，是了为信从父亲持守的种族平等信念，而壮烈殉身，年纪不到十九岁。

李文斯敦不采取固有的宣教公式，而主张全人的宣教，关怀人的生活，不像个传统“全时间”的宣教士，人看他是探险家，甚至是冒险家。虽然他受按立牧职，所到的地方，常举行宗教聚会，自己有规律的属灵生活，但他们宁接受有“专业”之名，而不全时间宣教，或实际上甚少宣教的人，却视李文斯敦为非我族类。而他持守严格的原则，不随便给人入教，也编织不出动人的报告和数字。结果，导致他的退出伦敦宣教会。

但英国到底还有同他异象的人。1857年，李文斯敦应邀于剑桥大学演讲，在他号召下，成立了大学非

洲内地宣教会。他也领导英国政府支助的探险队。后来，因为他同土人友好，批评贩奴业务，引起殖民地和外交圈内人的不满，政府的支助终止。那在他发现世界最大的维多利亚瀑布之后。

1862年，玛丽再度到非洲，在尚比梓(Zambezi)与丈夫重聚，但不久就逝世了。新寡的李文斯敦，并没有时间悲伤，于1864年，短暂的回到英国，把孩子们交托朋友照顾，1866年一月二十八日，自己回到非洲，更奋勇的投身深入非洲腹地。

从1866至1871年，外面的文明世界，没有人见过他的身影。1867年初，一名仆人带着他的医药箱逃走。但他不顾一切，继续往前推进，发现新的地理疆域。后二年多，外间连他片纸只字的消息也没有。有些人造出谣言，说他已经埋骨蛮荒。李文斯敦的探险，成为神话故事般传开。纽约前锋报派出他们年轻的记者司坦利(Henry Stanley)远去非洲，探察李文斯敦的消息。但李文斯敦的踪迹杳然。

最后，他追查得李文斯敦曾在乌济集(Ujiji)。但派去送信的使者却是一去不返。当他到了那里，他和随行的人及向导，大吹号角，鸣枪庆祝，使镇上居民震惊。在混乱中，司坦利听到一个声音，用英语喊着说："How do you do, Sir!"原来是李文斯敦差来联络的仆人，去迎见那高举美国国旗的旅队。

1871年十月二十三日，当司坦利走近的时候，他看见那须发斑白的探险宣教士，戴着海军便帽，穿着红色毛织上衣，已经病弱不堪，还活着，在那里等他。

怀着敬畏和惊喜心情的司坦利，在面对着那位伟大的老人时，竟然不知该怎样问候。他说：

"李文斯敦博士，我猜想你是？"

回答说："是的。你给我带来了新生命。"

司坦利跟李文斯敦同处五个月。他见证李文斯敦："是一个真正的虔诚人，有深在的真实宗教... 真诚的，实践的宗教，从不错过静默实在表现的机会，却从不张扬夸耀。如果不是用行动，就是光明的榜样。"他自己说：在没有见到李文斯敦以前，是"对宗教怀有成见，如同伦敦最恶劣的不信者。"

1872年三月十四日，司坦利同李文斯敦握别，动身回到英国，成为一个完全改变的人。他不仅接受了福音，也对非洲黑人变得友好；他所写对李文斯敦的报导，感动了许多人继起到非洲宣道。

李文斯敦拒绝了司坦利要他离开非洲的要求。有了司坦利给他的补给和医药，李文斯敦以衰弱之躯，继续孤军奋进：要寻得尼罗河的源头，和废止贩卖奴隶。他同疾病挣扎，多时要靠人抬着走，在泥泞丛林中行进缓慢。

1873年新年，他在祷告中再一次奉献自己。

那年五月，仆人于现在的尚比亚(Zambia)一间泥屋中，发现他跪在小床前祷告去世，年六十岁。他曾多次冒险，面对死亡，最后终于为非洲烧尽自己的生命。

他几名忠心的仆人，其中有朱玛(Chuma)和苏塞(Susi)，是他十年前解放的奴隶，一直跟从他。他们把

李文斯敦的心，埋葬在他所爱的非洲；用九个月的时间，把他的遗体用白布裹了，在日下晒干；经过一千五百哩的漫长路程，抬去海港，再运到英国，前后历时近一年。由云莱特 (Jacob Wainwright) 伴守着遗体到南汉浦屯。当船靠岸的时候，皇家骑炮兵队鸣礼炮二十一响致敬，全国哀悼。在许多穿黑衣的显要群中，一名小黑孩子，手持一面牌子，上面写着："纪念李文斯敦博士，非洲之友。" 他的遗体已经辨认不出是谁，只有从他臂上被狮子所咬的伤痕，认出确是那伟大宣教士"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加六：17)。 他已升天领取荣耀的冠冕，留下残破的帐棚，安葬在卫斯敏斯德大教堂，墓铭刻着：

"三十年来他致力于教化土著，探测未发现的秘密，废除中非洲破坏性的贩奴贸易。"

这样犯难受苦的一生奉献，李文斯敦自己说："我从没有牺牲甚么。当我们纪念主离开祂父天上的宝座，降世为我们受死，我们不该谈甚么‘牺牲’。" 又说："我不知道爱我们的天父，最后如何使光照入黑暗，但祂知道，祂必作成。"

但他只差二百哩，没能发现尼罗河水的来源；英国政府全面禁止贩奴，也是在他去世后一年实行。李文斯敦只领一名巴克万(Bakwain)土王席凯勒 (Sechele)皈信；但后来因为不肯放弃多妻而退后。

但非洲纪念这位"伟大的白人父亲"。二十世纪非洲反殖民地风起云涌，罗德西亚早已肃清了罗德 (Cecil Rhodes)的印痕，改了国名，不愿留下任何可耻的旧记忆。但有两个非洲国家，都以李文斯敦命名他们的城市，尚比亚(Zambia)和马拉威(Malawi)；马拉威的首都布兰台，更是取李文斯敦出生地的名字。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在他离世的地方，现在世李文斯敦市，有个纪念馆，陈列他的遗物；有一座巨大的铜像，面向着浩荡的维多利亚瀑布。更重要的是，这"伟大的白人父亲"的形像，深印在无数非洲人的心里。那些开发黄金，钻石，收采象牙的人，那些殖民地的军队，官员，不能长久征服的心，却甘愿的献给了一名无兵无勇无钱无势的苏格兰人。

李文斯敦的心，埋在尚比亚中心的一棵 mupundu 树下。到 1899 年，当地人因为那棵树染病，把它砍伐了，锯下树干上刻有"李文斯敦"名字的一段，运往英国。

在 1940 年，李文斯敦最晚的女儿也已去世，坦桑尼亚还有一个老人说："他有三个妻子：一个是条河，名叫尼罗河；一个是反对奴隶制度；一个是宗教。" 连一个阿拉伯人也说："他是一位圣人。"

1964 年十月二十四日，尚比亚共和国成立，地球表面上唯一基督教国家。他们的宪法上写着："我们人民宣告，本共和国为基督教国家。" 在全国九百万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基督徒，且在增长中。

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一二：24)

### 38.PhilippMelanchthon 墨兰顿

世界上许多问题，是一些争要作头的人搞出来的。因此，争权夺利，篡夺相继，都想爬在别人的头上。幸而有甘为第二人的人。

有个这样的人是约拿单。他是扫罗王的儿子，父亲属意他继位为王，好永远有家天下。所以扫罗与神拣选的大卫为敌，虽然他是国家的栋梁，扫罗却一直迫害他。看约拿单：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我也作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撒上二三：17)

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其中一个是宗教改革的领袖墨兰顿(Philipp Schwartzerd Melanchthon, 1497-1560)。不过，在他上面的，不是妒贤嫉能的扫罗，而是忠心为主，爱同志，能容人而善用人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马丁路德于 1517 年十月二十三日， 发表了他的"九十五条"，虽然奢侈逸乐的教皇利欧十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局势的发展，与教廷的对立，渐形紧张。那正是马丁路德需要帮助的时候。

1518 年八月二十五日，威登堡大学来了第一位的希腊文教授，一个二十一岁谦和的年轻人，墨兰顿。四天后，他在大学演讲："改进少年的研读"，成为德国教育的里程碑。后来他被称为"德国的教师"，改进并建立多所学校，和数所大学。墨兰顿注重教育，认为如果没有教育，宗教必将衰落，人类社会将沦为无异禽兽。他成为神对宗教改革的赐福，是神应允了马丁路德的祷告。墨兰顿的性格不像是约书亚，却像是和睦少争的亚伦。

路德听了墨兰顿的第一篇演讲，即对那二十一岁的少年才学和品格，无限倾佩；二人一见投缘。路德在与许多朋友的通信中，称赞墨兰顿的旷世奇才，学识和敬虔。墨兰顿充分领会并接受路德的信仰立场。1519 年，他在莱比锡，跟路德的对头，罗马教的学者厄克(Dr. Johann Eck)辩论，主张圣经的权威，并在路德之先否认圣餐的化质说。他成为路德的主要助手，他的写作，并建立了主要的复原教义。

墨兰顿受父母的熏陶，终生敬虔。在十岁时，父亲去世。他自幼颖慧过人，受著名人文学者的舅公罗可林(Johannes Reuchlin)教导，酷爱拉丁文及古典文学，并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罗可林照当时的风尚，把他的原名 Schwartzerd(黑土)，改为希腊文的同义字"墨兰顿"(Melanchthon)。他十二岁入大学；十七岁，获硕士(M.A.)学位。在二十岁以前，他已经有六本着作，包括受普遍采用的希腊文文法。那时，因他的

名声远播，有数所大学争相罗致；但他选择到威登堡大学，薪资远为菲薄。以后，路德和选侯要为他加薪，都为他拒绝而未成功。在 1519 年，他得到威登堡大学授予的神学学士(B.D.)学位；但谦逊不肯接受博士学位，可能是他尊敬路德，不愿跟他同称为博士。他终身没有接受按立教职，从未登台说教；仅为了不通德文的学生，于每主日在一个课室，以拉丁文作福音讲章。

不久，墨兰顿即成为威登堡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他每天的工作开始于上午二时；凌晨六时的讲课，常常有六百学生拥挤满堂听讲。

在路德促请下，墨兰顿讲解罗马书。1521 年，出版了有名的罗马书概要(Loci Communes)，将路德宗信仰系统化，成为改革信仰的第一本系统神学。到 1525 年，就已经再版十七次之多。以后，多次重版，每次都有增改；并且翻译成不同的文字。1535 年版，题献给英王亨利八世：亨利前极卫护罗马教，受教皇封为"信仰卫护者"，与路德相争甚烈；那时，有倾向更正教的趋势，墨兰顿愿意藉此缓和表示好感。后来英国脱离罗马教系统，女王以利莎白(Elizabeth I, 1533-1603)以 Loci 为了解神学的基要，熟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剑桥大学，列之为必读书。到 1558 年再版时，更大为扩展增订。路德认为其书价值同于圣经正典。

1521 年，墨兰顿写了哥林多书信讲义，却不愿出版；路德偷取去出版，并在"序言"中说："是我出版了你的注释，再送给你。"1523 年，路德以同样的手法，出版墨兰顿的约翰福音笔记。

1529 年，路德在为墨兰顿的歌罗西书注释写的"序言"中说："我喜爱墨兰顿写的书，超过我自己的作品。"

早在 1520 年四月，墨兰顿即宣告："宁可死也不与路德分离。"同年十一月，又说："路德的福利比我的生命更为重要。"后来他果然为了跟从路德的神学立场，不得不与留在罗马教阵营的罗可林分道扬镳。

路德说："我生性粗犷，刚烈，暴躁，好战。天生我是为了同那无数的巨怪鬼魔斗争。我必须除去树桩石头，铲掉荆棘蒺藜，清理野森林；墨兰顿则温柔谦和，来照神所给他的丰富恩赐，喜乐的撒种浇灌。"神奇的安排二人在一起，相知相补，对于宗教改革有极大的贡献，成为教会史上不可多见的佳话。每遇到路德暴怒的时候，墨兰顿就从旁委婉缓解。

1530 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帝为了土耳其人西侵的形势，召开奥斯堡会议，寻求合作的可能，以共御外敌。其时路德仍处于非法分子的身分，且被教皇开除，自然不能公然赴会。墨兰顿所拟订的奥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说明其立场；此信条坚定宣告福音信仰，成为路德宗的信仰基要。为后来抗罗宗信条的楷范。路德称许其温和。

温和避免争议，是墨兰顿的性向；但不是所有路德宗的人所喜悦的。这形成路德以后，为了细微差异而纷争的原因。

当世首屈一指的人文学者伊拉谟斯(Erasmus)，对这位后起之秀的学者，极为称赞。后来伊拉谟斯派的罗马教学者，甚至说：墨兰顿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与宗师伊拉谟斯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墨兰顿与路德的声誉，各方的教授学者，纷纷来归，那正是腓德烈王所深想罗致的；作生意的也来威登堡设立印刷厂，一时成为文化的中心。

1521年，皇帝和教皇的代表，在沃木斯会议定路德为非法者，他被隐藏在瓦特堡，潜心翻译圣经为德文。那时，威登堡的改革事工，乏人领导，众说纷纭，有的主张放弃教育，有的声言他从圣灵领受直接启示，成为纷乱状态。墨兰顿的性向中和，显然不适合于处理危乱的局面。路德知道情势的严重，不得不于1522年三月，亲自回威登堡。他讲了八篇有关爱心的有力讲道，秩序得以恢复。

在威登堡安静的厄尔波河岸边，是腓德烈王为墨兰顿购备的住处；后面的小花园，同路德寓所的花园相连。有时两位改革家挚友，共坐在树荫下，谈论神学问题。

墨兰顿小于马丁路德十四岁，长于第二代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John Calvin)十二岁，是联系两代之间的重要人物。但他主要的恩赐是教师，不是组织的领袖。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共同忠心事主，致力于宗教改革事工，赤诚相见，终生不渝。路德去世以后，墨兰顿未能受一致拥戴，承继路德的事工；但他建立的德国教育制度，产生了许多后代的人才，使教会继续并发展。

1560年四月十九日，墨兰顿逝世，葬在威登堡墓地马丁路德旁边。

### 39.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是美洲殖民地和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1703年十月五日，生于康涅提克州的温莎 (Windsor)。他的父母都是出身于清教徒的家庭：父亲是牧师；母亲是北翰堡屯(Northampton)第一教会牧师司陶达(Solomon Stoddard)的女儿。他自幼在家受虔诚的宗教教育熏陶，在十三岁，入耶鲁 (Yale)大学。1720年毕业，继续在校研读神学。

1721年，十七岁时，爱德华兹得到重生的经验。他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7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阿们。"他想到将永远享受那样一位神的同在，心中无限喜乐。1722年八月，那个不足十九岁的青年，还在耶鲁修读神学，受聘任纽约苏格

兰长老会的牧师，到 1723 年五月。

1723 年一月十二日，爱德华滋"庄严的向神奉献自己"。而且记下：

"我将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所有都奉献给神；将来凡事都不自己作主；凡事都不自己行动。我庄严许愿，要惟独以神为我的整个生命和喜乐；在盼望和生活上，决不以别的作为生命的一部分；且以神的话作为我服从神的规范；应竭力抵挡世界，情欲，魔鬼，直到此生尽头。"

那年，获硕士学位 (M.A.)。次年，留在耶鲁任教。不到二年，即于 1726 年，因病辞职。

1727 年，爱德华滋受邀为他外祖父的助理。同年七月，与撒拉·彼伊本(Sarah Pierrepont)女士结婚。两年后，司陶达牧师以八十六岁高龄去世。爱德华滋继任为牧师。

司陶达信仰纯正，讲道有能力，忠心传扬悔改赦罪的道。但许多年来，信徒反应淡漠，虽然有人得救，大多数仍然是不冷不热。

年轻的爱德华滋，和当地其他的教牧，感觉到教会昏睡的情形，对人的灵魂极为关心。在 1734 年，他在教会讲台，开始强调传扬福音的重要。起初，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他努力不懈。在年底以前，看见圣灵奇妙的动工。几年内，翰浦屯附近的村镇，有相当多人皈依，呈现复兴觉醒景象，他的会众有三百多人承认基督的名。爱德华滋自少年时就长于逻辑分析，表现出深谙科学的治学方法；现在他用于对属灵现象的观察和报导，结果成为一本书，是神希奇的作为纪实(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于 1737 年，同时在伦敦和波斯顿出版，到 1738 年末，已经再印了许多版。此书被普遍传诵，为"大觉醒"作了准备。他观察到，起初是人关心罪行的败坏，以后就注意到罪心的问题，而有深刻的悔改。

爱德华滋事奉上的重大转变，在 1737 年。有一次，他照着平常的习惯，乘马到林中祷告默想。他说：

"我在异象中，看见神子耶稣基督，是那样的荣耀，奇妙，伟大，完全，圣洁，祂满有恩典和慈爱，温柔而谦和。祂的恩典平静而甜蜜，伟大充满天上。基督是那样的超奇完美，超过言语所能形容，足以涵盖所有的思想和观念。我想，如此继续约有一小时之久；在那段时间中，大部分我流泪并放声大哭。我不知如何形容，只能说感觉灵魂灼热，倒空并消灭；躺卧在地上，又完全被基督充满；用神圣清洁的爱爱祂；信靠祂，为祂而活；事奉并跟随祂；全然的成圣并成为清洁，有神圣属天的清洁。我有多次大致相同性质的看见，并且有同样的效果。我也有许多次经历真神第三位的荣耀，作成圣的工作；这神圣的运作中，把神圣的光和生命输送给灵魂。神的圣灵显现出无限的神圣荣耀泉源和甜美；能够完全的充满灵魂，浇灌甜美的交通，像太阳的荣耀，甘甜而喜乐的注入光和生命。有时我感到神超奇

的话是生命之道；是生命的光；甘美的，超越的，能赐予生命的道；伴随着渴慕神的话，丰富的住在我的心里。" (The Works of President Edwards, vol. I)

1740年，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由英国来到了美洲殖民地，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仿佛猛烈的风扫过，神使用祂的仆人，赐下了灵性的"大觉醒"。神的时候到了。

威特腓在新英格兰旅行布道中，到爱德务滋牧养的北翰浦屯教会。在他的日记中记载：

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爱德务滋先生是坚实的，最优越的基督徒，但现在身体软弱。我想，我在全新英格兰地区未见到可以跟他相比的。当我登上他的讲台... 提到他们起初的经历，那时他们如何的热心和活泼，牧师和会众都深深哭泣。

当时并不是旅游发达的时代。那个周末，威特腓受到爱德务滋的接待，在牧师住宅中。爱德务滋的妻子撒拉，生育十一名儿女。那是一个温暖的模范家庭，给威特腓深刻的印象。

十月十九日，星期日。在爱德务滋先生的家，感到大为满足。他们是我所见过最可爱的夫妇。孩子们并没有穿着绸缎，非常朴素，却显出基督徒简约的榜样。爱德华滋夫人是以温柔安静为装饰；专谈论神的事，显然是她丈夫的贤慧助手。有好几个月，我没有为自己的婚事祷告了，看到她，使我重新在神前祈求，如果合乎祂的旨意，赐下亚伯拉罕的女儿给我为妻子。

那时，威特腓是二十五岁，爱德务滋比他大了十多岁，在思想上已经相当成熟。但他对这青年人的爱护推重，是非常难得的。威特腓的神学观点，由阿米念信仰转变为改革宗思想，极可能是受爱德务滋的影响。对于"大觉醒"，当时的人持有不同的反应。

自由派的态度，是讥笑和否定。他们保持冰冷的礼仪，枯燥的讲章，对于复兴不感觉兴趣。这些人以波士顿第一教会的昌西(Charles Chauncey, 1705-1787) 为代表，这些人称为"老亮光"。

另一种则是极端派，激动情感，无秩序，无节制的吵闹，虽然比"旧酵"好一些，但过分的"新酒"，有的人受不了，而给大觉醒带来恶名，招致反对。还有稳重的中间派，占信徒中的最多数，不反对圣灵的工作，但避免过度的动作，是爱德华滋所主张的，被称为"新亮光"；他们为大觉醒感谢神，分辨灵的真假和悔改的是非，传赦罪的恩惠福音，引导人重生得救，进入神的国。

爱德华滋不是仅守住自己地盘的人，他也游行布道，愿意把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

1741年七月八日，他受邀往恩斐(Enfield, Connecticut)教会传讲信息。在那里，爱德务滋讲了他著名的"罪人落在忿怒的神手中"(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他关切罪人的灵魂，不愿意人受审判，遭沉沦：

啊，罪人啊！想想你们在何等的危险当中！那是一个巨大的烈怒火湖，极广阔的无底坑，满了烈怒的火！神的忿怒向你们发作，...没有谁能救你脱离这忿怒之火！...

他并不是狂呼大叫的那类人物，只是以平静而侵彻的声音，宣讲神上面来的信息。圣灵动工，会众不能自约的哭泣，有的抱住座椅或教堂的柱子，恐怕就坠入地狱，混乱的情绪，淹没了讲员的语声。他只得停下，叫会众安静不要哭喊，让他讲完信息。

有的人以为爱德华滋专爱讲这类信息，那实在是误会；其实在他留下的一千多篇讲章中，这类信息仅约百分之一。

爱德华滋的名字，时常同美国的"大觉醒"连在一起；但绝不是狂热分子。他作过纽泽西大学（后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但绝不是只重知识的学院派人物。他主张平衡的基督徒：

在今世里，基督徒品德的均衡，难以期望达到完全。由于缺乏教导，判断错误，天生的气质，和许多别样的条件，以致常是不能完全。虽然如此，真基督徒绝不能像假冒为善的宗教人，表现那种丑恶的不相称。

且举例说明我的意思。在真基督徒有喜乐和安慰，也有属神敬虔的忧愁并为罪悲伤。我们绝不能有属神的忧愁，直到成为基督里的新造；真基督徒的记号之一，是他的忧伤，继续为罪忧伤："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五：4）在真宗教里，救恩的喜乐，与照着神的意思为罪忧伤，二者并行。另一方面，许多假冒为善的人，欢乐而没有战兢。

假冒为善的人，另一种丑恶的不均衡，表现在对待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事上。以他们对爱的应用来说。有人极力表现出对神何基督的爱，对人却是分争，嫉妒，好报复，并毁谤。这全然是假冒为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人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约壹四：20）在另一方面，有人似乎很热情友善对人，却不爱神！

也有人爱那些爱他敬他的人，却不爱那些反对不喜欢他的人。基督徒的爱必须是全面的！"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太五：45,46）

有的爱人顾及他们身体需要，却不爱他们的灵魂。有的装作极爱人的灵魂，却不顾恤人的身体。（大表演对人的灵魂怜悯慈悲，常是不费分文的事；怜悯人的身体，我们就得拿出钱来！）真基督徒的爱，是兼顾到我们邻舍的灵魂和身体。在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怜悯。祂怜悯人的灵魂，使祂教导他们；祂怜悯人的身体，就行神迹，变化五饼二鱼，给众人吃饱。

这样，你就明白我的意思，假宗教的不均衡而缺乏匀称。我们也能从许多别的方面，看出其不均衡。就如有的人，为了其他基督徒的罪而激动，却不为自己的罪烦恼。不过，真基督徒，感觉对自己的罪

关心，过于别人的罪。当然他为了别人的罪难过，但他常更容易发现而责备自己的罪。也有人热心作属灵的领袖，却没有相等的热心祷告。有的人在基督徒中间，会有宗教热情，在个别独处的时候，却是冷淡。（见 Jonathan Edwards, The Experience that Counts）

1750年六月二十二日，北翰浦屯教会以二百十八票对三十票，通过辞退爱德华滋牧师。那并不是偶然的事件。原来他教会里，一年多来就有所谓"半路信约"(Halfway Covenant)信徒的争执：照他外祖父司陶达时代的向例，受过洗礼的人，虽然自己知道他没有悔改重生，也可以领受圣餐，这种信徒称之为"半路信约"，他们的儿女也是如此。后来，爱德华滋觉得那样不对，决定只有真正清楚重生得救，而有良好品德的人，才可以有资格领受圣餐。为了区分谁合格，谁不合格，自然不得不指明不合格的理由。这样，是大部分会众所不能接受的。而反对他的人，就乘机煽动，造成教会辞退忠心服事二十四年的牧师。七月一日，四十六岁的爱德华滋，讲了"告别讲道"。

1751年，他迁移到当时的边远地区树桩桥(Stockbridge)任公理会教会的牧师，并作为印地安人的宣教士。那是布伦纳德(Rev. David Brainerd, 1718-1747，爱德华滋女儿 Jerusah 之夫)曾工作过的地方。从过去二年的争持，变迁去到那样的新环境，爱德华滋都无怨无悔，而且能够抽出时间，潜心写作，他有好些重要著作，是那时期的作品。

次年，他把二十岁的三女嫁给布尔牧师(Rev. Aaron Burr)。那时，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已经沦为自由派掌握，福音派成立了纽泽西大学(1746年，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布尔受任校长后，因工作过劳，竟以四十二岁英年，于1757年九月二十四日病逝。

爱德华滋经过友人的劝说，才勉强答应了继任的邀约，于1758年一月到达普林斯顿，二月十六日正式视事，为纽泽西大学校长。为预防天花，他遵医嘱接种牛痘；却因而受感染，于三月二十二日逝世，在任只一个多月。

爱德华滋是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他的著述，立论严谨，析理分明，本于圣经，很少引用其他作品。他着意高举神的至高主权，人的原罪和败坏，神的恩典和荣耀。他的后代繁衍，很多有极高的成就，传为美谈；但他有更多属灵的后裔，影响力无可估计。其阐述加尔文主义的著作，尤为有力，不仅在美国，亦影响欧洲神学界。在他去世以后，仍然不衰。

#### 40. Robert Raikes & Sunday School 创始主日学的睿可司

有人说他爱虚荣，有人以为关心社会，就是忽略福音，或说关心平民教育是破坏主日的不敬虔行为。但主日学运动，到底传开了。到今天，虽然再没有谁来反对了；不过，仍然需要再加强推行。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教会遭受自由派的侵扰。正统的基要主义者，采取“敬虔的逃避”政策，仓皇寻求自保，以至避社会福音，也避免关怀社会：只传个人得救的福音，不涉及社会疾苦。也就是说，只求人将来进入天堂，不管他现在陷于地狱。幸而教会保留了主日学，就是宗教教育，使后来的一代，得有复兴的机会。

主日学的创始人睿可司(Bobert Raikes, b. Sep.4, 1736 - d. Apr. 5, 1811)，生于英国哥劳斯特(Gloucester)，父亲拥有一间当地的日报 The Gloucester Journal。1757年，父亲去世后，他以二十一岁的少年作了发行人，接手经营。

哥劳斯特是一个古老的工商业城市。因为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犯罪率很高。睿可司有兴趣于监狱改良工作。他随即发现，监狱并不生产罪犯，是社会生产罪犯。他看到许多幼年童工，每天劳苦在工厂工作，星期天休息，则游荡无所事事。他们既没受过教育，品行一般都很恶劣，容易感染坏习惯，正是培养罪犯的温床。因此，睿克司商请邻近教区牧师司陶克 (The Reverend Thomas Stock, 1749-1803)的同意，发动了几名妇女，自己出薪资延请他们，在各人家中召聚儿童，给他们基本的读书课程，和圣经，并教义问答等宗教教育。

1780年，在当地的圣公会教牧支持之下，开始了这种称为“主日学”的事工。睿可司在他的报纸上撰文倡导，渐渐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在全英国各地，都有人效法。于是，主日学渐成为教会的事工。后来，教员也从受薪而改为义务事奉。这项运动极为成功。在1783年十一月三日，Gloucester Journal 撰文宣称过地狱般生活的儿童们，享受到“主日的天堂”。

像任何新兴的事工一样，主日学也受到人的反对。教会中有人反对，以为那会破坏虔诚的敬守主日；更有人反对普及平民教育，认为那会引起人民造反，发动革命！主日学运动，得到约翰卫斯理的赞成，并协助推广；连王后也予以支持。在当时，以敢言知名的政治家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也曾赞成。1785年，在伦敦设立了主日学协会。主日学运动也超越了大西洋；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通过后仅二年，在非拉铁非成立了超宗派的主日学协会。到1811年，睿可司去世的时候，建立了三十一年的主日学，单在英国已有约五十万学生。现在，更不分宗派，主日学已成为教会普遍接受的节目，是宗教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主日学的教室，保守许多孩子免于走进监狱，却走出去不少的领袖。

美国的主日学，本来发展最快；以后，到了提倡公立学校的曼恩(Horace Mann, 1796-1859)起来，主日学就不再是贫民子弟获得教育的唯一地方，影响力也低减了。

后来东正教也有主日学，其他宗教也有仿效的宗教教育。天主教则大致无主日学，而有其自己的宗教教导。

我们都应当记得：宗教教育是教会的骨干。不止幼童应该参加主日学，成年人也应该参与；不是主日学的教员，就该是主日学的学生。注重宗教教育的教会，信仰都有良好的根基，也能迅速的增长。

#### 41.Wycliffe 宗教改革先锋威克里夫

伦敦全城都轰动起来。人潮只朝一个方向涌去：圣保罗大教堂。

1377年二月十九日，伦敦主教要在那里讯问威克里夫！虽没说是宗教法庭。很少人不知道威克里夫博士。他是牛津大学里最有名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替老百姓讲话，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专制，腐败，那正是人民想说的话。

威克里夫来了。他的器貌很平常，配不上他的名声；穿着一袭黑色长衣，腰间束条带子。望着面前那巍峨的大教堂，似乎更显得渺小，并有些畏怯的样子。人们见过那些主教的威严，这区区牛津教授算得甚么，那会是他们的对手？只要用一根指头，就可以轻易的把他压碎。那些宗教权威也这样想，只少他们但愿如此。

威克里夫不是一个人来。伴着他的，有牛津大学的四位博士。接着，还有一位穿着不同的人物，那是叫人闻名生畏全国的公安总长泼奚(Henry Percy)；同行的还有英王的次子兰凯斯特公爵约翰干特(John of Gaunt)。

预定听讯的大堂里，早已经挤满了人。泼奚举着他代表权威的银头手杖，搪开人群，走在前面。一列戴着高帽子的宗教要人，已经坐在位上，由伦敦主教寇特耐(William Courtenay)主持。他对着威克里夫说："如果我早知道你有这些技巧，我将不会要你到这里来。"

干特刚进们，听到寇特耐含忿的欢迎辞，冷肃的说："他要保留他的技巧，由不得你说！"脸上带着微笑。威克里夫显然很紧张，面色有些苍白，用力的拄着手杖。泼奚看到了，说："威克里夫，请坐！你许多话必须回答，在这个舒服的位子坐下来休息。"

寇特耐受不了，吼说："他必须站着，受审讯的人按理不可以坐下。"干特不肯失去这挫折寇特耐主教的机会，说："泼奚爵士的建议有理；至于你，养成如此傲慢骄狂，我不仅要教训你，还要挫折全英国教职人员的骄傲！"全体群众齐声欢呼，远处的人更拥挤向堂内，乱作一团。干特仍不算完，继续说："你不必指望你的父母救你，他们有够多麻烦，自身难保！"寇特耐说，他不是靠地上的父荫庇，信心在天上的父。干特越加恼火说："我不耐烦听这主教的胡言，我要揪着他的头发，把他从这里拖出去！"群众狂呼声音震耳，强行挤进堂内看热闹，审讯无法进行下去。久经战阵的干特，挽着威克里夫的手臂，从另外的出口离开会场，泼奚和四位博士后随。闹剧收场。群众还不曾发觉他们已经离去。

威克里夫立刻成了全国的英雄。他至少暂时不必担心迫害，远离狂热的群众，回到牛津，在那里安静的继续写作。

那个出身农家子的学者，为何惹下这样的麻烦？

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c.1330-1384)生在约克郡，天资聪颖，但家庭不富裕；父亲见他体弱，不适于务农，送他从邻近的教会牧师学习拉丁文。1345年，十五岁时，他因为家贫，要靠奖学金入学就读；又因为没有马，要徒步二百哩，进入牛津大学的贝理奥学院(Balliol College)就读。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早的大学，开始于十三世纪初，创立之时没有校舍，要租借房舍及教堂上课。十四世纪初，规模渐具，到威克里夫的时候，有神学，法学，医学等科目，仿照巴黎大学制度，但更严谨，更有名。

少年威克里夫勤奋向学。布莱华定(Thomas Bradwardine)是他的数学教授，却在神学方面给他很大启发，特别是神的预定和恩典，给他立下好的基础。

约在1350年，因为黑死病在英国流行，蔓延到牛津，导致很多人死亡，大学停课。威克里夫未离开牛津，忙于救助病患，安慰死亡临到的家庭。他看到罗马天主教的教牧人员，只顾自己，人民对教会失去信仰，却不认识真的基督教的悲惨情况。到1353年，瘟疫过去，学校才复课。1355年，他获得学士学位。1360年，威克里夫完成了硕士，并受按立为斐令罕教会(Fillingham, Lincolnshire)牧师。为了要继续在牛津研读，不能到遥远的地方，他聘任助理执行牧师职务，自己留在牛津的女王学院院士，教导并任住校监督。

1372年，威克里夫获授神学博士学位。他有良好的品德，是爱国，爱教会的人；本来就同情贫苦的人民大众，厌恶教职人员的腐败奢侈。多年的研读，使他对圣经认识更深，确定圣经是唯一的真理引导，罗马教廷是真理的敌人。

1374年，威克里夫获得英王任命为卢特沃(Lutterworth)教会牧职。那是林肯郡一个富庶的教会，薪俸丰厚。

不久，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派威克里夫为七人使团之一，到布卢治(Bruges)，与教皇代表讨论英国和教廷间的问题。使团由班格(Bangor)的主教领首；其次，牛津学者威克里夫。随后，兰凯斯特公爵干特也到达协助。

在一次休会期间，他和代表们同坐在一张橡木长桌旁，干特也走来参加。他站起来说："威克里夫博士，或许我们该找时间在英国会面。不必看来希奇，我认得你，尊名在英国已经是无人不知。"坐了不久，

干特站起来说："我倒不是急于同那些主教们晤面，但我们总得相助作出改革，你同意吧！"这涵意深长的话，是冲着威克里夫说的。那时，大家都站起来了，他向其余的人点点头，然后走去。

这次使团的经验，使他对罗马教廷的腐败，有更进一步深的认识。回到英国后，他对罗马口诛笔伐，在公开演讲和写的小册中，称教皇为"敌基督者"，称拥护罗马的教职人员"该撒的教牧"。他勇敢直言，指出教会应有的改革，以圣经，道德和常理，斥责教廷的黑暗和错误。这在当时是没有人说过，也没有人敢说的。

他更说："教皇必须在使徒和王的职分选择其一：如果他想要作王，他就不能宣称自己是使徒；如果他作使徒，他就不能要金子。"他说，教廷已经拥有英国三分之一的产业，还要贪婪苛求，向英国的贫苦大众勒索大量的金子和十一奉献，如果他贫穷，我们可以济助，但没有义务奉献。因此，他认为英国应该在教职人员的任用权和经济上独立。这正是教廷和英王政府争议的所在。

他的观点，同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领袖们相似，是以后的清教徒信仰的部分来源，但他比时代早了许多年。

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受政府和国会延请为宗教法律事务的顾问，却也惹起主持教政者的痛恨，导致要对他进行审讯，封闭他的口和笔。

威克里夫近年的著作，引起教廷的忿怒；偏有个本尼狄克会的修道士伊思屯(Adam Easton)，对威克里夫积怨，在火上加油。这导致 1377 年二月圣保罗大教堂的审讯；只是没有进行成功，威克里夫仍然在牛津的女王学院，继续他的写作。可以想象得到，教皇的势力，总不肯罢休。

1377 年五月二十二日，教皇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XI)发出三道谕旨：一致总管英国教政的坎特伯里大主教，要他会同伦敦主教查明威克里夫的信仰，如果确与天主教的教训抵触，则必须绳之以法，并阻止其异端散播；一致牛津大学校长，叫他不可作懒惰的农夫，任由稗子在田间滋生；一致英王爱德华三世，要他监督认真执行。谕旨于十一月才到达英国。

1377 年六月一日，久病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崩逝。他的长子早亡，由长孙理察二世(Richard II)继位，因为年幼，由王叔干特及王太后昭恩(Joan of Kent)共同摄政。在那情况下，政府当然没有兴趣去处理信仰上的问题。而牛津大学的校长，艾伦·邓务慈(Alan Tonworth)是威克里夫的老朋友，处理办法是要他多在女王学院，自我约制。只有主教们积极要对付威克里夫。

1378 年一月，威克里夫收到一封信，是英国教会的首长坎特伯里大主教苏保利(Simon Sudbury)写的，用惯用的富丽辞藻，写在羊皮上，约他去圣保罗大教堂见面。威克里夫拿着信去见校长唐务慈。他的老朋友读了信，面色沈郁的说："他们要你再去圣保罗，必定没有好事；恐怕是要鼓动群众，捉住你不放。..."

如果你在牛津事情好办得多，兰凯斯特公爵在附近，那些主教们无能害你。"

威克里夫说："真难以相信，教会的人竟要使用暴力。艾伦，我知道。但这次我可以推辞不去，但无法长久抵挡教皇的势力。"

果然，三月里，主教团的召请来了。这次是要他去南伦敦的烂巴茨(Lambeth)大主教公邸。威克里夫只手中拿着杖，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束纸，是他写的答辩。群众仿佛要看被围猎的热闹，拥挤得庭前全无空处。他费好大的力，才挤进小教堂。

当主教们往外面望的时候，发现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兰凯斯特公爵亲信理察·克利浮(Richard Clifford)爵士，大踏步走到台前，宣告说："我有一封信，上面有王太后亲自的封记。"

苏保利请他立即宣读。理察清理下喉咙，着力的读道：

"致在烂巴茨的众主教，并一切有耳可听的人：我奉英王理察所赋予的权力，谕示今天不得对威克里夫博士牧师进行审判或作任何判决。"

然后，他高高举起那文件，交给主教，转身大步走去。

威克里夫又一次安然自由离去。但上次在圣保罗，是乘乱从旁门出去，这次，他更像是凯旋。他昂然面对大主教说：

"苏保利总主教，由于今天我没有机会说话，我愿意向你和众主教表明自己所信的。这是我的书面辩诉，我以所写的自豪，你同任何人可以随意阅读。"

说完，把手中的那束纸，交给苏保利，转身自去。望着那穿着简素长袍的背影，苏保利气愤难平。几天后，他同别的主教交换意见，都有同感：必须对付威克里夫，止息那有毒的利笔。但一时不知如何着手。

1378年三月，教皇贵格利十一世逝世。威克里夫所受迫害松缓，暂时再得安息。

那年，他连续发表了论圣经真理，论教会，论赎罪券等，加以他对于预定论的认识，使他知道人得救惟独靠赖恩典，不在于教会，更不是由于善功或圣礼。这结论使他对圣餐中罗马教的"化质说"提出质疑：这一百多年前兴起的传统，在圣经中找不到根据。他认为"主耶稣在设立圣餐时，说：这是我的身体和血(林前一：23-27)，显然是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有甚神奇的变化，成为身体，因为那时祂的身体就在那里。"所以他拒绝接受，斥为教职人员的迷信把戏。约在1380年，他在牛津对这问题如此宣讲教导，并写出来传播。

牛津大学起了骚动，议论纷纷。这新的学说，不像过去威克里夫的言论，提出所应改革的事实，是他们能够看得见的，不肯接受的人，也只能暗地里不满；这关于圣礼的意见，只是教条，是对于圣经的解释，不是实际上道德的问题。

那时，他的老朋友邓务慈已经辞去大学校长。接任校长的薄顿(William Berton)虽然也是威克里夫的旧识，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不是他的支持者。薄顿秘密遴选了十二人，组成委员会，审查威克里夫的信仰，其中七人反对，五人赞成；结果断定他的理论错误，不得在校内传播，并停止他的教授职务。

威克里夫虽然不怕反对，而且预期会遭受反对，但想不到是来自大学当局，更想不到如此严厉。他写信向政府和国会申诉。但他以为要几个月的时间，才会有所反应。

牛津那小市镇，从未曾看见过这样的声势。

摄政兰凯斯特公爵干特，竟然会忽然临到。许多穿着鲜丽的武士，骑着骏马，十多面彩色的旗帜招展，最后飘扬着绣有爵徽的旌旗。先锋开路，前扈后拥行来。有许多人去访谒摄政公爵，但公爵亲临访问的事，却是难得一见。

是谁能承受公爵的临访？

公爵没有去校长公邸。从牛津大街，转女王街，公爵下了马，迈步进入女王学院大门。威克里夫对于干特公爵的突然来访，而且来得如此快，像别人一样的意外。

公爵进到室内，落坐后就说："威克里夫博士，我读到你向王的申诉，也读了校长和委员会对你的处分。"威克里夫插口说："他们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不在场，没有得为自己的立场申辩。"干特摆手说："现在，你可以，对我辩诉。"威克里夫说，化质说是百年前开始的传统，并不是圣经的原义，是基督对祂在十架上受死代赎的象征说法。干特听下去，脸越来越胀得通红，似是尽力约制；最后，用拳击着桌面说："那是奥秘的事，只有神知道，你怎敢擅自以为能知道这神圣的事！"

威克里夫试试图再次说明，仍是徒然。最后，在分别前二人约定：威克里夫可以仍然在屋子里写作，但要严守校方的规定，不能讲课，不得把他的意见传播；用英文写作时，不能够使用"饼和酒的本质"这句话，用拉丁文与学者讨论时可以。二人就这样分手。

干特公爵是讲实际的人。对于威克里夫所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腐败，道德和行为上的问题，他都同意。从国家利益着想，天主教把持教产，剥夺英国财富，视英国如臣民，他更反对。不过，对于"化质说"这样的神学问题，太玄奥了，还近于理性和异端，并不关乎爱国和政治上的利益，也不具体实际，他既不能领会，也就缺乏兴趣了。

威克里夫知道，自己在牛津来日无多。

1381年，他已经发现左手有时候会麻痹，不大灵活。在那年里，他决定是离开他所爱的牛津，在那里三十六年之后，到林肯郡卢特沃教会。

早在1380年左右，他就看出天主教的错误，在于其违背圣经；而且他们限制信徒不得自己读经，以至很多教会没有圣经。他认为根本的办法，需要翻译本国文字的圣经，使信徒能够普遍诵读，明白真理。真理可以使人自由，脱离罗马教的迷信桎梏。

基督教的真理，越普遍的被人知道越好。因此，圣经不能仅限于拉丁文，应该译成大众化的方言。...如果基督的恩典，使祂的圣言临到外邦人，岂能从基督教的英国夺去祂的话？如果你说译经就是异端，也就等于把基督贬为异端。

他在牛津开始这项工作。虽然没有教会的支援，牛津的同事尼哥拉·赫尔浮(Nicholas Hereford)，与他志同道合。他们从耶柔米的武加大拉丁译本，翻译成英文。威克里夫因为不擅希伯来文，翻译新约，到1381年已经完成；赫尔浮翻译旧约，再由威克里夫审察修订。当他离开以后，因为主教们对他衔之入骨，牛津所有涉嫌的旧友们，也为了“威克里夫异端思想”被整肃。赫尔浮天真的远去罗马申诉，成了自投罗网，被监禁在那里。

威克里夫本人，反倒像是在暴风圈外，安然无事。病弱近于日薄西山，在教会讲道，也继续写作翻译。在他的牧师住宅中，有他两位忠诚的助理，一位是朴玮(John Purvey)，是杰出的学者，接续赫尔浮未竟之工，由朝至暮，焚膏继晷的翻译旧约，可能于1382年底完成。此外，他还把全部译本修订成为较易于了解的英文，也把威克里夫的拉丁文写作译成英文。

威克里夫的外体虽然衰残，但他不失望，老人的斗志依然坚强。真理的光在卢特沃仍然明亮。他不屈服的写道：

你想，你是和谁斗争？是和一个已经在坟墓门口的老人过不去？不，是在和真理作对。真理比你更为坚强，必然要胜过你。

那时，因为活字印刷还未发明，圣经和他的著作，需在朴玮督导下，请人手逐字抄写在鞣制的牛皮上，牧师的住宅，仿佛是小书坊，不仅缓慢，费用也极为浩大。那里来的这许多费用？有的人不能不猜想，还是由于特及王太后昭恩，暗地里庇护支持。后来，朴玮自己翻译的英文全部圣经，于1395年问世，流行了一百多年，直到有廷岱勒(William Tyndall)的译本出版。

威克里夫注重讲道。他先选读经文，加以详细解释；后半则是讲到如何实用践行。他以神的话为首要，

最反对人站出来在前面。他写道："这不是别的，只是人的骄傲；各人都求自己的荣耀，各人都讲自己，不是基督。"

1382年十一月，有一天，威克里夫倒在卢特沃教会的圣马利亚堂里，给他另一位忠心的助理浩恩(John Horn)发现。那青年人见他仅存一息，好像是中风。此后，他失去行动的活力，但仍然继续工作，只是渐渐衰弱。

1384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圣马利亚堂的弥撒中，堂牧举起圣饼祝谢的时候，他再次感觉四肢麻痹，倒在地上。这伟人从此卧床，不能言语，只能开阖眼睛，表示知道人来探视。三天以后，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伟大的宗教改革先锋，终于离开有人爱他，也有人恨他的世界。

威克里夫末后的几年，在卢特沃安静的度过：始终未被开除教籍，也没有受到干预；他从来不曾否认自己的信仰。

1411年中，牛津大学再度整肃威克里夫思想。审查结果，发现有二百六十项异端或错误，所有著作予以销毁。但反罗马的思想，在晚成立的剑桥大学存在，并且发展成为清教徒的大本营，并造成十六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成功，及以后的清教徒革命及执政。

1414年的康思坦斯(Constance, Switzerland)大公会议，判定把威克里夫发墓暴骨焚尸。1415年，任林肯郡主教的是威克里夫的旧友锐平顿(Philip Repingdon)，曾一度在受迫害的时候，否认威克里夫的信仰；虽然卢特沃教会属于他管辖，但问心有愧，不敢去视墓，更无意动老友的骸骨。他违背上级的命令，拖延了十二年，直到他去职。

1427年，新主教到任，在十二月十六日，掘出威克里夫的遗骸，焚烧成灰，撒在随弗特河(River Swift)上，河水流经卢特沃圣马利亚教堂附近，载着骨灰远去。

但宗教改革的种子，在全地上更加散播开来。